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考茨基文选

〔奥〕卡尔·考茨基 著 王学东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 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郁中建 喻阳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考茨基文选

[奥] 卡尔·考茨基 著 王学东 编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100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编者说明	1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摘录)	1
第五章 阶级斗争	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1
第二节 佣人和仆人	5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8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9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10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 之间的斗争	16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18
第八节 工会运动	21
第九节 政治斗争	29
第十节 工人党	35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39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44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47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53
在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 问题的决议草案	61
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	63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	75
斯拉夫人和革命	88
社会革命	93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93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93
2. 演进与革命	96
3. 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102
4.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106
5. 阶级矛盾的缓和	111
6. 民主	129
7. 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140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52
1. 任务的限度	152
2. 剥削者的被剥夺	155
3. 没收还是赎买?	160
4. 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163
5. 提高生产	170
6. 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175
7.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180
8. 精神生产	184
9. 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193
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	197
一、夺取政权	197
二、革命的预言	203
三、长入未来的国家	213
四、经济发展和意志	219
五、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不惜任何代价的 合法性	229
六、革命因素的增长	244

七、阶级矛盾的缓和·····	252
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261
九、革命的新时代·····	278
帝国主义·····	295
一、生产的比例性·····	295
二、简单商品生产·····	298
三、资本主义生产·····	300
四、积累和帝国主义·····	305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	312
二、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312
三、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多样性·····	315
四、帝国主义以前的扩张意图和民族对立·····	318
五、对于帝国主义意图的军事抵抗·····	320
六、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差别·····	320
七、帝国主义的变化·····	321
无产阶级专政·····	323
一、问题·····	323
二、民主和夺取政权·····	324
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329
四、民主的效果·····	336
五、专政·····	345
六、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354
七、苏维埃共和国·····	360
八、实际事例的教育·····	370
九、专政的遗留物·····	377
(一)农业·····	377
(二)工业·····	387
十、新理论·····	395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403
一、社会主义的起源·····	403
二、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406
三、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	419
四、列宁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424
五、共产国际·····	431
六、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436
七、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	453
八、社会主义与民主·····	463
九、取得政权之路·····	469
十、“统一战线”·····	475

出版说明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文本或其片断,这些文本能够“客观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的思想的要旨之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和思想相互作用的人类现代社会史的主流之一。在其中,思想对于实践的认识、理解、总结,以及对其可能的发展路向的预测、从而对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枢机。

所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然”的深层理由,也是理解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的思想根据的基础方法。

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伟大的当代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在当今正引领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大方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也就包含着宏大的艰巨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在蓬勃前进的同时确实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古人的几句话:“温故而知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这些宝贵的方法论,在以积极的实践态度大力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以积极的理论态度,放开眼界,扩大胸怀,重温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激活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肯定

会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迫切问题有所启迪。而从理论研究的高层次来说,盛世治史,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中,重新反思、解读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史的诸多重要文献,实乃推进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之必需,实乃推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必需。

当然,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两点,提请读者注意: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文本,都是我们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他们作出正确的、从而也是科学的和客观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提倡对具体思想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所选人物和其文献的文本是否得当,敬请尊敬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把选编工作做得更好。

2008年4月

编者说明

卡尔·考茨基(1854—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1874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1875年1月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0年迁居苏黎世,从事研究工作并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年3月在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在斯图加特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担任主编至1917年。1885年侨居伦敦。1890年回到德国,参加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成为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曾多次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发挥重要作用。1910年起转向中派主义,提出“超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7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社会化委员会主席。1921年联合各国中派成立第二半国际。1922年促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合并。1924年迁居维也纳。1938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布拉格,不久又逃到荷兰,同年10月17日卒于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一生勤于写作,著述颇丰,涉及面甚广。本书只收录了其直接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且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所收的11篇著作均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反映考茨基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发表于1892年,是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原则部分所作的阐释,是他在这—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因篇幅较长,本书只节选了第五章《阶级斗争》。

在1900年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关于夺

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在会后发表《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一文，为这个“橡皮性决议”和自己的折衷主义态度辩解。本书全文收录了这两份文件。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中，考茨基参加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写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一书和一系列文章、书信。因篇幅所限，本书只收录了较有代表性的《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1901年)一文。

《社会革命》(1902年)和《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是一战前考茨基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专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的代表性著作，尽管篇幅较长，仍全文收录。

关于帝国主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考茨基写过不少论著，并提出了著名的“超帝国主义论”。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了《帝国主义》(1914年)和《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两篇。

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一书中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与12年前在《斯拉夫人和革命》(1902年)一文中热烈支持俄国革命，欢呼“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形成了鲜明对照。本书将这两篇一并收入，以反映考茨基的思想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一书是在考茨基去世后，由大卫·舒勃和约瑟夫·舍普伦从其1932—1937年间的著作中选编的，集中反映了他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因此本书将其全文收入。

考茨基的以上著作都已经有了中译本，编者以现有的中译本为基础进行编辑加工，对译文和注释作了以下技术处理：

1. 对书中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引文均按最新的中文版进行了校订并重新注明了出处。

2. 对人名、地名和部分名词术语尽可能按照现在通行的译法予以统一。

3. 原有的编者注、译者注和作者注大多予以保留，但原来是篇末注的一律改为脚注，用“原编者”、“译者”和“考茨基”标明，未加标明的

则是本书编者加的注。

4. 每篇著作均注明其中文版和外文版的出处,并列出译校者的姓名。

编者

2005年11月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摘录)

(1892年6月)

第五章 阶级斗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则部分最后几段写道：

“这种社会变革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现状下受尽苦难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尽管它们的利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都是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并以维持现代社会基础为共同目标。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

使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往来和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日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同样参加的事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

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从这些观点出发，党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反对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的。”

第一段的头几句话，大概不必解释了。我们早已经详细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符合一无所有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符合有产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要知道，他们也备受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们有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没落，另一些人则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当中。他们所有的人都彷徨在濒于破产以及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有产者和剥削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而且怀着猛烈的敌意反对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单纯由于缺乏知识和见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当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会中和科学界所占的地位能够最快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

现代社会的状况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凡是愿意认真地从政治或科学方面考察这种状况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根据了。相反地，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头脑清醒的人士都承认，这种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颗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有在社会不是经过突然变化或突然改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要这些政党中的某个政党赶快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极其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决定性关头，甚至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那些最能理解这种

批判的代表人物,也仿效这种办法,借助于不彻底的逻辑,避而不从这种批评中作出结论。可是,我们知道,从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得出结论,却是必要的。

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虽然有产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他们更切身的、为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却要求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

当然,这首先与富人有关。他们不能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处。就算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对他们也有好处,可是这毕竟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相反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给他们带来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们必然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荣誉,根据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有些人也许会牺牲自己的安乐和荣华。

对有产阶级的下层,特别是对他们中间本身就是被剥削者的那些人,即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和荣誉可损失的;至于福利问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他们的眼界必须高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观点。小资产者或小农根据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可是他们的狭隘观点,却使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至于对现代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点他们确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他的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业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业者,小农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农,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们就要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肯抛弃,而且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紧紧地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束缚在他们的落后的经营上面,甚至当这种经营已经不能保证他们好歹度日,而去从事雇佣劳动却能保证他们改善境况的时候,他

们也不肯放弃这种经营。

由此可见，私有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束缚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剥削而他们的财产不过是“私有制”的辛酸讽刺的人，也束缚在这上面了。

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绝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们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形成的无知和眼光狭小极其严重地妨碍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生活贫困和对可能使他们免于贫困的方法的狂热追求，使他们很容易成了夸夸其谈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诺言的一切蛊惑分子的战利品。

有产者中比较站得高的阶层，文化水平较高，眼光比较远大。许多有教养的人士，还保留着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时代，即启蒙时代的旧的理想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残余的引诱而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而实现这种思想的资产者，是可悲的！他们必须赶快选择：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切断直到今天不仅束缚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的一切社会纽带。只有少数人具有走到这个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气和独立精神，而在他们当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地切断同本阶级的联系。但是，甚至这少数中的少数人，到今天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沉下去：感到自己“年轻时过于热情”，而终于“明哲保身”起来了。

在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家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对大多数这些对社会关系及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有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说来，他们的这种理解，只不过使他们徒劳无益地把他们的精力耗尽于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上面罢了。这种解决方案，目的在于把他们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知识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然而，他们这种企图，正像寻找潮湿的火，或寻找燃烧的水一样，毕竟是不可能实

现的。

有些资产阶级理想家,不仅有必要的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至少和资产阶级割断了内部的联系,同时又有勇气和力量去切断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外在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寄过多期望于有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能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然而这只限于他们当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识已经不属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之有联系的那个阶级的人。他们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天平上将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队伍中才真正会开始绝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大军的唯一丰富的补充来源,并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虽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阶级,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阶级。

第二节 佣人和仆人

但是,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泉源。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叙述无产阶级的自然发展史。这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叙述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时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想作几点补充说明,而这对于阐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尽管庸人们惯用的格言,即穷人似乎永远存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承认贫困和商品生产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错,在最初的时候,贫困通常只是个别的现象。例如,在中世纪,没有为自己营生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为数极少的穷人当中,大多数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钱人的家里找到充当助手、雇农、帮工和佣仆等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希望将来独立经营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妇一起工作,和他

们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由于他们是有产者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完全不是无产者；他们感到自己同这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家庭的兴衰都要影响到他们。这种现象，在至今还保存着这类家长制关系的偏僻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这种地方，佣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员，尽管他们没有财产，他们却维护着私有财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手工业中的帮工，也处于这种地位。（参看第二章）

除了雇农和帮工之外，又出现一类特殊的仆人。有一部分穷人，在大的剥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这些大的剥削者主要是贵族、诸侯、高级僧侣和富商。穷人到这些人的家庭里来服务，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劳动，而是作为他们的佣兵或奴仆来保卫他们和侍候他们。这里，同劳共食这种家长制关系，已经消失了。所以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主人和佣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出现了另一种连带关系。凡是在仆人数目很多的家庭里，仆人中间就有地位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权和沽名。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恶为转移。仆人越会迎合主人，越能俯首听命，越能在这方面比其他仆人表现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宠的仆人感到自己与主人有连带关系，可是，对自己的同事则心怀敌意。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还形成另一种连带关系。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势力越大，荣誉越高，他的仆人由此得到的残羹剩饭也就越多。对于那些专供显示荣华或“排场”的仆人，尤其是如此。这类仆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尽快地和尽情地挥霍金钱，勇敢而“忠实地”为主人的一切恶劣行为和罪恶勾当服务。因此，在对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上，仆人感到自己同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密切的连带关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还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要知道，一个主人，如果他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他是不会杀死给他孵金蛋的母鸡的。保护这样的母鸡，不仅可以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的后代带来好处。但是，仆人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残暴无情,已被人编成谚语。人们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贱的品质的总称。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着下层出身的穷人的性格,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出身的穷人或者略有资财的人的性格。例如为寻求自己的幸运而到王公的府邸充当随从的没落的小贵族这类比较高级的奴仆,也有这种性格。^①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只是就下级仆人说的。因此尽管同小贵族出身的仆人作比较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应当再继续比较了(其实他们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要把比较进行到底并不困难)。在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尽管仆人属于穷苦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补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们倒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剥削的加强,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以及为这种增加的结果的奢华的加甚,都促使奴仆人数增加。就是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个没有财产但对社会主义运动说来却不是可靠的补充源泉的阶层的成长。但是,社会发展还算有幸,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兵,自从法国革命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以后,即自雇佣军队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军队代替以后,大大衰落了。当然,雇佣兵还没有完全废除。直到今天,“武装的人民”远没有成为民主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现代军队仍然保存着雇佣兵的残余。

尽管奢华不断加甚,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压制着这种特殊仆人和各种普通佣人的增加。这种趋势就是过时的家庭形式不断解体和分工日益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把各种家务劳动和服侍私人的劳动变为专门的独立的职业,比如出现了理发、司厨、赶车和信差等职业。诚然,

^① 勒萨日在他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这是一本描写仆人的自然发展史的经典著作)中,极其有趣地为我们指出:奴仆和王公府邸中的随从之间彼此极为相似。另一方面,奴仆和流氓无产阶级甚为接近。吉尔·布拉斯从奴仆和流氓的最下等地位爬到西班牙宫廷首相的秘书和宠臣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本性。——考茨基注

这些从佣仆工作中分离出来的职业，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的前身的特点，但也逐渐地具有产业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特性和养成这个阶级的观点。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尽管为了经营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仆人数目很大，尽管帮工和佣兵的人数很多，可是这些职业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吸收进去。穷人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残疾者，当然不能依靠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活。我们已经说过，在近代的初期，还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应当加在这里面。这批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农民。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得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沦落到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窃或卖淫。他们不得不在饿死和不顾一切关于廉耻、荣誉和自尊的传统观念之间进行抉择。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顾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顾不得自己的名誉。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极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腐化作用，还因为失业的贫民成为社会的最大负担而一直在增强，他们不但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地，把他们消灭掉，还可以使社会解除这个不必要的负担。然而，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成了累赘，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必要的职能，就必定堕落。这种情况，不论是对上层阶级还是对下层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们即使用自己骗自己的办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他们根本想不出他们的阶级曾经对社会有过什么功劳；他们也没有力量迫使社会供养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们不过是容忍他们罢了，所以恭顺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职，同时又被人们看成是穷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仆一样，这种无产者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膝，而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表示反对。相反地，他们依靠富人食桌上抛下来的残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想消灭富人呢！他们本身不受人剥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剥削越重，富人的收

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从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同奴仆一样,他们也参与分享剥削的果实。既然如此,怎么能要他们去反对剥削呢?在德国,在宗教改革初期,天主教会由于以前剥削社会的各阶级,深为这些阶级憎恶,但是这一类的无产者却继续尽忠于教会,因为他们从教会得到的施舍多于从吝啬的市民或破产的农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自愿地反对过剥削。但是,他们也同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军队一样,当然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他们胆小怕事、毫无原则,一旦给他们施舍的人失去财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人,而不管他们死活。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日益扩充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性格和观点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可是仍然企图依赖上层阶级的布施来勉强维持外表。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大工业,也非常乐意从上述这些阶层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所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而是善于忍受和不会反抗的工人,它使这些工人毫无意志地变成现代工厂中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这种大机器,只有当它的无数齿轮中每一个都能精确地不断地按规定转动的时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用的基本工人群众,主要来自地位与流氓无产阶级接近的各劳动阶层,而且有一部分来自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以这

些阶层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资本家打算给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标准。至于劳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欢谈论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劳动本身首先是使他们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们上升的根源。由于工人无力反抗，使资本家能够将劳动时间极度延长下去。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多的。如果不对资本加以强迫，它是不会给予无产者以过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时间的。凡是资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筋疲力尽为止。即使在劳动和睡眠之间还有一点余暇时间，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暂的享乐，或沉溺于酒色，使得对自己所处的贫困境遇的认识日渐消失。男女共同劳动，成人和儿童共同劳动，在乐观的、自由自在的和有义务观念的人们中间，本来可以成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对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中，由于工厂的败坏道德和使人堕落的作用，这种共同劳动反而使道德败坏的危险更加增大，使无产阶级的堕落更加迅速了。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阶级相差无几，这是不足为奇的。无产者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颓废和堕落的泥沼，从恩格斯向我们作的关于 19 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叙述中^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当时，“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极端堕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现在也还有人抱着这种看法，而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有人自命为“先进”人物。但是，在劳动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还在外表上保存着许多共同点的时候，两者之间就已形成了一条鸿沟。

不论流氓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作为大量的现象出现，

^① 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于 1845 年首次出版，以后在德国再版多次。——考茨基注

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现代的伦敦或柏林的流氓无产阶级，同古代罗马的流氓无产阶级并无不同。相反地，现代的劳动无产阶级却是世界史上从未见过的完全独特的现象。

首先，在流氓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无产阶级之间有极大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寄生虫，后者是社会的根基之一，同时这个根基不仅日益成为社会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无产者尽管没有财产，可是他们决不是依靠施舍维持生活的乞丐。他们不仅不靠社会供养，反而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社会。不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工人无产者还感到自己是被救济的穷人，并把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看成是给了他们以工作，从而给了他们以面包的恩人，看成养育他们的人，他们的雇主。这种“宗法”关系当然非常适合于资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工资，不单要求工人完成规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这种美好的宗法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们早晚会发现：正是他们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他们。当他们照旧贫困不堪，而有时比以前更加贫困的时候，资本家却越来越富有。而当他们请求工厂主这个假家长给他们以更多面包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是一块石头。

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者和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依靠剥削者的剥削所得生活；他们同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参看第二章)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是跟剥削者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他们住在残破不堪的贫民窟里，却为他们的剥削者修建华丽的宫殿。他们忍饥挨饿，以便剥削者大吃大喝。他们尽力劳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以便给剥削者及其喽罗们创造着消磨空闲时间的手段。

这种对立，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穷人之间的对立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旧时代的穷人羡慕富人，他们用惊叹的眼光

仰望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自己也成为富翁，也成为这样的剥削者。他们也不会产生消灭剥削的思想。工人无产者却不羡慕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们憎恨和鄙视富人，憎恨富人是剥削者，鄙视富人不劳而获。最初，他们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资本家，不久以后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资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于是，他们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发展成为对全体资本家阶级的有意识的敌视。

对剥削者的这种敌视，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阶级仇恨决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宣传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以前很久。仆人、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是不可能具有这种高度的阶级仇恨的。在从事这些职业的成员和其“主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职业中，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主（或业主）之间也有不少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往往以和解而结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会对企业主怀着最激烈的敌意，然而丝毫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企业主甚至可能不会觉察出这种敌意。

最初，这种仇恨情绪只是畏畏缩缩地在个别情况下表露出来。但是，如果说等到无产者终于明白工厂主给他们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当时间，那么，等到他们拿出勇气同自己的“主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流氓无产者深感自己无用，又没有任何物质保证，所以他们既胆小又驯服。最初，工人无产阶级也保存着这种品质，因为他们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与其接近的各阶层的。不错，工人无产阶级是体会到所有那些加在他们身上的凌辱的，但是他们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紧拳头。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热情的人的愤怒情绪，还表现在偷偷的犯罪行为上。

只有当我们所谈到的工资劳动者这几个阶层都认识到他们的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滋长出反抗精神

来。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情感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开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时,劳动无产阶级也开始脱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泥潭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条件,就向无产者指出了紧密团结一致的必要,个人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旧时的手工业中,每一个人独自生产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劳动上面,即建立在协作上面。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有丝毫作为。但是,如果他们团结一致,按照计划从事劳动,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可见,劳动本身就使他们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觉而愉快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既是协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无产阶级为反对剥削而进行各种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教育着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准备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对于唤起无产阶级的团结情感说来,劳动条件的一致,也许比协作发生着更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纪的行会中,国际主义已见端倪,不过当时各种行业还是严格分开的。我们曾说过,在奴仆之中,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在现代工厂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别,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同。无产阶级要想升上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况高级职位极少,以致大多数工人对此连想都不敢想。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会受到这种肥缺的引诱而腐化下去。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能单独地仅仅为自己而改善这些条件,他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即他的全体劳动伙伴的境况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错,工厂主企图在工人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故意地造成劳动条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现代大工业促成一致的作用甚为有力,以致要采用计件工资、奖励制度之类的办法才得以长期麻痹工人,使他们意识不到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生产越继续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团结也就越紧密、越巩固,也越是成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在这方面，劳动无产阶级和奴仆有多大不同，我们只须指出前面就奴仆所谈到的各点情况，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农业中的农奴和手工业中的帮工，远远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

手工业中的帮工的团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则远远超过这一点。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团结，并不限于在同一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手工业的帮工，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逐渐体会到劳动者到处都会碰到相同的敌人，到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还固守小城市和小国家的分散状态的时代，手工业帮工就已经组织起包括整个国家的全国性机构。现代无产阶级，不论在感情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完全是国际性的。在国与国之间的最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在统治阶级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了。

我们从手工业帮工那里就已发现国际性组织的萌芽；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逾越国家的界限。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逾越职业的界限。德国的制帽匠或铜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礼遇。但是，他却受到本国，甚至本乡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业中的行业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学徒在没有成为帮工以前，要一连学习许多年，而且得终生忠实地守住自己的本业。他个人的幸福也取决于手工业的繁荣和壮大。如果说帮工对本业的行东怀有敌意，那么，他对其他手工业的行东和帮工所怀的敌意也不小。在手工业全盛时期，各种手工业的帮工组织之间就有过激烈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把各种各样的行业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大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人共同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完全消除生产中的行业观念的趋势。机器把以前劳动者所需的数年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机器使每一个工人能够由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而没有特别困难。机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变成无用，把他们抛到街头，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们唯恐在“未来国

家”中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事实上,对今天的工人说来,这种选择职业的自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逾越过去手工业帮工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一方面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中间。

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同样地,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不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工资劳动者才结合成一个阶级。他们完全体会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们日益使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这种利益),服从阶级的伟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19世纪,工资劳动者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同时,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一斗争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限于消除当前的弊害,工人运动也才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

“工人阶级”的概念日益扩大。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指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企业中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对全体工资劳动者也日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并且,手工业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场手工业接近,或越是沦落到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地步,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就会越迅速地掌握手工业中的劳动者。

城市中的非工业的劳动者,即在商业、运输业和旅店业(按德国职业统计术语来说,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 und Erquickung)的行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也逐渐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中来。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瓦解农业中旧的家长制经营形式,并使农业变成利用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利用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员的奴仆来从事生产的产业时,农业中的劳动者也逐渐体会到自己与其余的工资无产者的利益

是一致的。最后，团结的情感开始打动生活没有保障的独立手工业者，而在情况有利的时候，甚至会感染农民。于是，一切的劳动者阶级日益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灵魂就是人数不断增加和经济意义不断增长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所固有的友爱团结精神，共同的纪律和对资本家的敌视态度，日益在这个阶级中间普及开来。同时，无产阶级所固有的那种无厌的求知欲（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也日益在他们中间增长起来。

于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轻视、被虐待和日益沦落的无产阶级中间成长起来。旧的势力开始在它的面前发抖。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学，人数日益增多，团结日益加强，经济意义日益增大，自觉性日益增强和眼界日益扩大的新阶级，成长起来了。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无产阶级日益沦落。无产阶级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过这种趋势及其代表人——资本家展开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生，除非加强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因时间、地点和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决定于市场的情况，各企业间的相互竞争的程度，该工业部门的机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本家对其利害关系的认识水平等等。同样地，在无产者各阶层内部发展起来的反抗行动，也决定于各式各样的条件：决定于这些无产者的主要补充来源的各阶层人民的习惯和要求，在他们从事的工业部门中劳动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体力情况，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普及程度，各部门中人数不等的产业后备

军的数量,工人的觉悟程度,最后,决定于该劳动部门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还是使工人团结或集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条件,因工业部门和工人阶层的不同而非常悬殊,并且由于技术和经济革命不断发生,而经常变化。遭受资本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新地区和新职业,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产部门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产部门则在不断发生变革。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断有着新的阶层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随着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占上风而不断发生变动:一些阶层上升,另一些阶层则下降。

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入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一旦这种趋势在这一阶层或那一阶层的无产者中间强大到足以唤起他们的自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对本阶层成员相互之间和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坚强的团结产生的力量;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他们的自尊心;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确信工人阶级正在走向美好的未来;一旦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要再把他们拉回到堕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则是无比困难的。这一群堕落的人虽然也能产生憎恨,但是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他们对本身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醉生梦死,没有从自己的苦难中养成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愿望,而只是养成胆小怕事的俯首听命的恶习。一旦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扎下根来,几乎就无法把它铲除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发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业部门所见到的那样,只要这种压迫不使这一阶层灭绝,而仅使他们下降,则它就只能使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们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压迫只会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会使人颓丧,反而只能使人更加坚强。压迫不能使更多的无产者沦为流氓,而只会使更多的无产者上升为殉难者。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如果无产阶级的每一阶层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这一上升过程就要比实际上所有的开始得晚得多,而且进行得缓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开端,都有其固有的困难。无产阶级中现在处于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阶层,在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们推进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开端,也有这种困难,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克服过这种困难。无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所得到的外援,来自地位比他们高的社会阶层,即一部分来自劳动无产阶级的上层,一部分来自有产阶级。

这后一类援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义的。

在中世纪,贫困的现象并不严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会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不难把它对付过去。当时,贫困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于劝人行善的想法。他们认为贫困是上帝的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贫困降在行为不端的人的头上,人们便把贫困看成是惩罚;如果贫困的牺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们便把贫困看做一种考验,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神。而对富人说来,贫困为他们开辟了练习行善的场所。这种行善,就像锻炼身体所必需的操练一样,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所必需的。

但是,当旧的封建农业因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当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开始“人口过剩”,城市中的失业和大量的贫困普遍起来的时候,这种新的、可怕而又危险的现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举办慈善事业这种中世纪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对付大量的贫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灭了一个最重要的施舍来源——天主教会的贫民救济。照顾所有的贫民,这对社会说来,越来越成为力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消灭贫困的问题。人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方法。这些

方法,因发明者的见解和人格各异而极不相同:从通过消灭穷人本身(比如把穷人处死或流放)来消除贫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经过周密考虑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计划。后一类计划,得到有教养的人士极大的同情,而各国的统治者和政府贤达则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无产者被斩首或被污辱的越多,贫民的人数也越多。

但是,贫困问题逐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并开始日益广泛地传播,越来越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认为,消灭贫困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消灭无产阶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进行。大量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大量财富的基础;谁想使大量的贫困缩小,就等于侵犯财富。谁在今天想要消除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的这种状况,谁就是在摧毁私有财产,也就是社会的颠覆者和敌人。

不错,某些资产阶级人士所怀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对无产阶级有利。要知道,贫困对整个社会有危险,因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贫困迫使一些头脑比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资产者为无产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没有勇气又没有力量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大多数资产者说来,问题已经不在于消灭无产阶级,而在于改善无产者的状况了。无产者应当是能够工作的人,而且应当是永远甘愿效劳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博爱),也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当然,在这个限度内,慈善事业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大多数方法,不是完全无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暂时的慰藉。

但是,这个概括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劳动立法。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当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先是纺织业)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带来它所能产生的一切可怕灾难的时候,一些眼光远大的慈善家开始确信:唯有一个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业的工人完全沦落,那就是国家实行劳动保护,最低限度对工人当中的最没有自卫能力的阶层——女工和童工实行这种保护。

当时,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在有产阶级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产阶级中的非资本家即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其次,由于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使英国工业繁荣的基础——工人阶级趋于灭亡,也赞同这种限制,而且这种想法不能不使有产阶级中头脑比较清晰和能够看到长远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倾向于赞同劳动保护。最后,个别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甚至也支持这种限制。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限制转嫁出去,并使生产适应于这种限制,而他们的力量较小的竞争对手,只是依靠对工人作最残酷剥削的办法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实行劳动保护,这批小竞争者就得完全破产。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工人阶级本身展开了要求劳动保护的强大运动,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谨慎的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增补,也还是经过一番顽强斗争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无产阶级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阶层来说,却是促使他们由糊涂状态中觉悟过来,以及在他们当中推动那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趋势发生作用的动因。即使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以前,这个斗争本身也足以启发无产者,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个斗争已经把他们激发起来,唤醒了他们的自觉和自尊,粉碎了他们的绝望心情,并为他们提出了一个超越日常需要的长远目标。

在资产阶级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手段当中,另一种手段就是开设国民学校。详细研究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超出本书范围之外。学校确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这个手段毕竟不如彻底实施的劳动保护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大工业越排挤其他的生产形式,或者改变后者的性质,也就越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保护,不仅需要把劳动保护立法推广到大工业的一切部门,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广到手工业、家庭工业甚至农业中去。但是,随着工业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影响的增长,

非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资本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则由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领导者，变成了决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眼前利益的仆从。

资本主义生产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躏，以致只有最贪婪和最无耻的资本家及其伙伴才敢于拒绝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劳动保护。至于超过这种狭小范围的比较广泛的劳动保护，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义，相当于英国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实行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今日在有产阶级中间只有少数人支持。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越办越缩手缩脚，越来越使工人走上为争取全面的劳动保护而独立斗争的道路。目前争取通过立法手续来缩短劳动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已与英国在上一世纪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斗争完全不同了。如果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维持标准劳动日，但这也不是出诸仁爱之心，而只是因为他们的选民——工人迫使他们如此。为争取劳动保护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变成纯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争取实行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比英国开始的晚得多，但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产阶级的支持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阶级中最先具有斗争能力和斗争企求的人数众多的阶层的力量。

第八节 工会运动

工资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决不是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末叶，我们就已经在手工业中看到帮工和行东之间展开这种斗争了，因为行东在当时商品生产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潮流和趋向。早在15世纪，某些行东就已力图增加帮工的人数，以期自己可以不劳动，而依靠剥削帮工的劳动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给帮工去做。行东越来越想延长劳动日，限制帮工的假日，甚至

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时，一些有钱的行东极想在生活方面同帮工分离，而帮工也只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以前的家属关系削弱了。最后，行会的行东开始禁止帮工升为行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行东的儿子或女婿，就很难上升为行东，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为行东。于是，帮工这一阶层不再是处于由学徒上升为行东的过渡阶段，而变成独立的阶层。

随着行东开始扮演资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现如下的结果：他们和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像后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那样，变成非常尖锐了。但是，帮工同大工业开始时期的备受压迫和苛待的无产者无法比较。准备反抗和展开斗争的帮工，不仅抵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打击，而且力图给予对方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当时，城市的规模还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业的帮工，人数也比较少。通常，一种行业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区，所以帮工们能够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劳动把帮工们彼此分离开来，因为一个行东至多雇用两名帮工，超过两名的时候极为少见。但是，劳动并不是帮工的全部生活内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进行社交活动的要求当时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下于劳动，而社交活动也确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当时，小酒馆成为他们的组织中心，即成为他们酝酿展开斗争的场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动上同他们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彼此隔离的情况，那么，受到同行的这种排斥，对于帮工说来，就等于受到社会排斥。因此，一种行业的帮工团体——行会，都包括从事这种行业的全部帮工在内。当时几乎还不知道产业后备军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一个行业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工人也还不可能。因此，就对行东的关系而言，帮工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用的武器是罢工和抵制，而且被应用得极为广泛。当时热烈拥护行会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纪的手工业能够复兴，他们以为中世纪的手工业复兴了，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就能够和平共处。因此，如果15世纪和16世纪的主要手工业中发生的罢工也像今天的罢工这样，

随着当前工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和顽强起来,恐怕他们一定会怒发冲冠吧!

只是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权力,才把帮工压制住了。压制劳动阶级是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效劳,而且迄今仍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于是,限制工资(即规定最高工资)、禁止工资劳动者的一切组织、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来压制这些组织的时代,便开始了。但是,国家也并不能把帮工完全压制住。帮工也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很清楚地知道,团结起来将产生何等的力量,而没有组织就会怎样地没有保障。所以,他们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到处保卫自己的组织。凡是不能成立公开组织的地方,他们成立秘密组织。他们为此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和迫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破坏他们之间的联系。反对社会党人的法令^①(不管这项法令本身多么残酷)加诸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过去数世纪以至19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劳动者所受到的苦难,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他们最后仍然战胜了这一切迫害,而成为胜利者。

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却没有手工业帮工那么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给许多劳动者承担的,其中的每个劳动者只需做一种或几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学徒期限缩短了,女工和童工开始涌入工业部门。其次,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工业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纪小城市里的帮工那样,可以不通过任何劳动而能互相结识了。当然,手工业的帮工也因大城市的发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过,这些痛苦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敌人——行东的人数也增加了,从而行东之间的纠纷也增加了。反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仅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同少数的企业主对立着,这些企业主却能容

^① 指德意志国会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对付社会党人的特别法。按照这一法令,禁止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活动,查封工人的报刊,没收社会主义书刊,把社会民主党人驱逐出德国。1890年撤销了这项法令。——原编者注

易互通声气。

此外,行会的限制也妨碍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曾经不得不设在行会制度管辖地区之外,大部分设在农村地区。在这里,对劳动者容易加以监督,而劳动者得不到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最后,由于中世纪的许多假日被取消,劳动者的社交集会时间大大减少了,而这种集会是团结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一致的手段。

诚然,工场手工业集合了许多工人群众,并迫使他们共同劳动,即实行协作。但是,对工人的团结可能发生影响的一些有利后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个阶层招募来的,而且还因为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种工序的报酬特别悬殊。在这里,正如豪门的奴仆有等级之分一样,工人之间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虽然工人属于哪一等级主要决定于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而很少决定于他个人的机灵程度,从而这种等级不会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间滋长起来,但是,它却使同一企业中的各个工人集团的利害关系大不相同,因此,他们难于认识到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虽然他们的学徒期限比手工业工人短得多,可是他们的工作全凭熟练和灵巧,而这非经长时期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别人所排挤的。况且,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发展阶段,尽管失业求职的无产者为数很多,其中熟练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却很少。产业后备军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来说,一般还没有重大的意义。

只是机器的使用,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机器使全体失业者听从工业的摆布,把无产者的妇女和儿童一批一批地送进劳动市场。这种变化,对工人的反抗能力发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自从在生产中应用机器以来,整个工业以异常迅速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并不是说在一切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企业都立即变成使用机器力量进行生产的工厂。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至今仍然

保存着工场手工业,像排字业就是如此。也有一些产业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只要不是为大量生产服务,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手工生产,比如裁缝业就是这样。而仍处在手工业阶段的任何工业之施行资本主义剥削,通常都引起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而不致引起大生产。但是,家庭工业的劳动者的反抗能力则是最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尽管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占统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业部门(这样的工业部门正在日益减少)需要经过训练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业本身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劳动部门,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一些劳动部门,这些劳动部门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艺和专门知识,因此不怕未经训练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竞争。例如,金属开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某些部门,过去和现在情况都是这样。

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就被分成两大阶层。一为上层的无产者,由经过训练、或有一定技艺的(英文叫做 skilled)熟练工人构成,他们的条件比较有利。在他们下面,是大批与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生产部门不需要特殊的知识、熟练或技能。在这些工人当中,尽管有些人富有生产知识,有相当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被看作未经训练、没有技艺的不熟练(unskilled)工人。他们很容易被别人所排挤,谁也不注意他们,他们的反抗能力也不强。

条件比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那一部分先进无产阶级。当他们实行罢工时,雇主们难于找到代替他们的人,这一事实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优势。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能够先于其他人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已经在许多次冲突中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

他们的地位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帮工大致相似。他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帮工的传统,比如仿效帮工的组织 and 斗争的方法。工人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新的经济组织——工会,往往就是旧时帮工组织的直接继续,至少在工会运动的初期,这种工会常常是仿

照工资劳动者从行会帮工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而组织起来的。

工会运动继承了行会帮工运动的传统，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会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帮工的行会精神有时表现在这些方面，有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一种行会的故步自封的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业的狭隘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工人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有时十分严重，以致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忘记了自己同全体工人阶级保持团结的义务，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余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业的学徒人数，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依靠这种限制，确实使本行业的劳动力的供给有所减少，但这只是牺牲了其他劳动部门的工人，因为其他劳动部门没有可能实行类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劳动力向这些部门蜂拥而来。

不过，有组织的工人以劳动“贵族”自居而与“苦力”分开，并高踞于这些人头上的这种意图，仅仅见于个别的劳动部门。比如在德国，大多数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场。而在英国，所有的熟练工人都与不熟练工人分开。受到工厂法保护、从而条件比较有利的劳动部门的工人，也属于熟练工人之列。在英国，这种工人直到最近都是与广大的工资无产阶级群众分离的工人贵族，其中一部分至今还是这样。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狭隘观念，以及处境比较有利的工人的贵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促使整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们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今日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现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现的人，这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阶级，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

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阶级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们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据统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见,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较有利的条件,他们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们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和他们团结起来。这些工人阶层,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该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作用各异,他们的贵族化倾向的消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倾向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层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组织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廉,所以能够用他们来对付有组织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钱的、而且组织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资本主义使他们沦落的影响,更不用说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们认识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薄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也会认识到:骑在陷入泥坑里的人们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们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们就必须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们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贵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们反对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伟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其他

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们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争，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护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语）^①。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②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 *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

^①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6页。——原编者注

^② 安泰，根据希腊神话，是利比亚的大力士，波赛当和该亚（女地神）的儿子。他在战斗时被人打倒于地后，一接触土地就可以得到新的力量，然后战胜自己的敌人。——原编者注

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强烈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的工人大众中间,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饶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

第九节 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仿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取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们说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秘密组织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单有结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

数都比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馆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简陋，城市与城市之间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维持各城市组织间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认识他们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们参加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谈，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须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现代工资劳动者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没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代的交通工具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有必要。交通工具是资本家阶级反对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比如，有了交通工具，资本家就能够迅速地把大批工人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地区招来一批工人，来换掉原有的工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人之间，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因此，随着交通的发达，日益需要将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分散的地方性运动结合成全国的，以至所有工业国家的全体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工人运动。但是，工资劳动者的这种全国性团结和国际性团结，比地方性的组织工作更加需要出版物。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

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增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的直接影响,在专制国家,就曾经是(现在也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牛耳,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拥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议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

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像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它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议会。再者,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视该阶级的议会活动能力为转移。

对于头两点,是无需说明的。只是最后一点,尚需我们说几句。从事议会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依靠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演讲活动,才能得到。此外,它还需要有广阔的眼界,远大的眼光,能够理解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农民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都缺乏这些参加议会活动的先决

条件。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阶层的精力完全用于劳动上了。劳动使他们孤立,把他们彼此分开,使他们每个人的交往只限于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们的眼界必然极其狭窄,对于具有极为普遍意义的一切问题,他们都用个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时需要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仅阻碍了他们中间议会政治活动家的成长,而且也妨害了这些阶级结成坚强的全国性政党(指包括全国范围的整个阶级的政党)。他们形成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群众。他们不仅不能从本阶级中间选出代表参加议会,而且也无能为力对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加以严密监督。手工业者或真正的农民,在议会里不过是白色的乌鸦。农民或小资产者为了在议会中有代表,他们不会推选地位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们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律师或是教授,如果他们具有保守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大地主、僧侣或高官。显而易见,这样的代表,即使心地诚恳,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何况他们的心地往往并不诚恳。一旦他们进入议会,他们就要为所欲为,而他们的选民,则毫无办法制驭他们。选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届选举中使叛徒落选,但是,在一届选举中他们不过又选出另一个叛徒而已。

因此,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议会制度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资产阶级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拥有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他们可以在竞选期间和在议会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士,这些人习于管理庞大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知识和演讲艺术为职业,比如律师、教授等等便是。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资产阶级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支配着议会。所以,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怀有激进情绪的小资产者,喜欢

把议会制度看成是维持奴役下层并使这种奴役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议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倾听一下,而确信只要完全取消议会制度,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和议会制度是彼此分不开的,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这看来也许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不外是承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破产而已。

就对议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比起农民和小资产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生产方式怎样使无产阶级提高,使它摆脱屈辱的状态,以及怎样唤起无产阶级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会现象的整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单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作为政治家就高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他们能容易地掌握政党的原则,欢喜原则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时情绪、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广大同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他们要求自己的先进战士遵守,同时,先进战士也要求他们本身遵守。所以,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进行的活动,以及在这种组织中的活动,是从事议会活动的最好学习场所。这种活动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议会的方式,为无产阶级培养演说家、法律专家和组织人材。

因此,无产阶级现在所处的地位,能够组织自己的不依赖于其他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在德国每个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资产者至今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他们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善于控制他们的代表,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①最后,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能够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阶级出席议会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① 或许有人以经常在议会中叛变工人阶级的英国“工人议员”为例,来反对我们的这种主张。不过,这些先生们的当选,并不是出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而只是依靠想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自高自大的抱有帮会的排他主义情绪的工人贵族的力量。布罗德赫斯特先生及其伙伴,就是一直遵照他们的后台老板的意志行事的。——考茨基注

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正是这种斗争才是唤醒无产阶级中的对斗争抱着消极冷淡态度的阶层并使他们产生自信和对美好未来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这种斗争,也是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最有力手段。最后,它还是无产阶级现在拥有的影响国家政权,使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并迫使国家政权作出在现存条件下能够做到的让步的一切手段中最有力的手段。简而言之,这种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议会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议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

除了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也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第十节 工人党

并不是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它们,几乎到处都有企图重新剥夺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倾向。现在,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并维护必要的政治权利,正面临着一场长期的、需要很大牺牲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开始政治斗争的初期,由于有产阶级内部发生斗争,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业资本家、商人、地主、宫廷官宦和专制统治阶级等等,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倾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每一集团都努力于寻找同盟者,给后者以少许让步,使他们加入自己的一伙。但是,在斗争胜利之后,进行分赃时,同盟者却往往受骗,得不到什么。另一方面,某些政党,为了能继续获得某一下层阶

级为它服务，也常常被迫给予这个阶级以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事实。

统治阶级最常诉诸无产阶级，它们本身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政治斗争舞台上来了。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独立，统治阶级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权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自愿为剥削者利用。实际上，无产阶级也不止一次地为剥削者效了这种劳。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是极端对立的，以致它们之间的政治意图无法长期一致。在每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以后，都迟早必然要导致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起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需多加解释，因为，我们已就这个阶级的利益、意图和观点，作过详细说明了。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必须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即所谓必须切断把它同自己的母体——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联系起来的脐带，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团结，主要是由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条件，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迟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两个条件：工人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势的认识水平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就德国而言，这两个条件至今都特别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分离，而且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工业国，都有利得多。因此，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摆脱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来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尽管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国工人运动，因不同条件的影响，进入组织独立的工人党的时期迟早有所不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规律，使其中的每个国家进入这个时期。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统治权为目的。它们必然要力图使国家政权从属于自己，即服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必然要力图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同样地，工人阶级组织独立政党，也自然而必然地为自己规定出这种目的，而经济的发展也将自然

而必然地导致这个目的得到实现。但是,这里也同工人与资产阶级政党决裂一样,开始实现目的的时期,不仅决定于该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同时,其他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条件,也起着作用。同样地,实现目的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极不相同。但是,凡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别是对最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过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人数、精神力量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养成团结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扩大它的眼界,它的组织也就不论在其范围与团结方面都不断加强;随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日益成为最重要的阶级,即成为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要依靠它的活动来维持的唯一的劳动者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各阶级,将在人数上不断减少,明显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们不仅变成多余的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于生产的进展。在他们领导之下,生产越来越乱并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方面将最后得到胜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产阶级就已经为它们的末日逼近而发慌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所感到的胆战心惊,却不肯承认,企图以假装镇静和故作欢喜来麻痹自己的这种情感,闭着眼睛不看他们所奔向的深渊,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通过这种盲目行为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使这种灭亡更加无法挽救。

但是,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流氓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它属于寄生阶层),不能像其他阶级历来所做的那样,利用它取得的统治权力,把被剥削的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使自己变成一个剥削阶级。它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消灭自己被剥削的状况,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剥削现象。但是,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既然无产阶级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能使它废除私有制,那么,它的被剥削状况,将迫使它废除剥削,并以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只要商品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的共同生

产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生产形式,为了用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废除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而代之以社会并在社会的监督下而进行的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无产阶级无意利用它在国家中的统治来达到这种目的,即借国家政权的帮助来掌握生产资料和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事理的逻辑最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出现,不过,事先可能会遇到不少失败,发生许多错误,付出不少无谓的牺牲,无益地浪费了精力和时间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到来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来。只要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须设法利用自己的胜利来消灭剥削,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大企业、卡特尔或国营企业中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出发点,它将促使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并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胜后打算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的一切企图。这样,即使无产阶级最初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图,它最终也必然会自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指望随便哪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会对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否定态度。只会出现如下的情况: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并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敌并使它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识和知识方面,还处在幼稚阶段。然而,就是发展中的这种不平衡,对无产阶级说来,也是很难得有的。我们已经一再指出,一旦无产阶级从最初的被压制状况中解放出来,由于机器的帮助,理论思维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伟大任务与远大目标的能力,便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而我们在站在无产阶级上面或先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其他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中间,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的。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进行得极其迅速,成为非常显著的普遍现象,以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点,都能够马上看得出来。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指针,因为马克思完成了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同时就使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进程和整个经济机构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扩大了。

这一切合在一起,促进战斗的无产阶级极其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实行精神的自杀,他绝对不会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对这种学说,无产阶级能够长期漠不关心或甚至抱着敌对态度吗?

凡是组织了独立工人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党迟早自然而必然地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来,即使它最初没有这种倾向,最后也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变成社会民主党。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补充来源的精确轮廓。简言之,可以把我们以上所述的结论,总括成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但是,无产阶级对其相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扩大,对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感情越发生强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也就越卷入社会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在这种生产建立以前,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同无产阶级最后一定成为统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应承担的使命的。当然,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以前,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种使命。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古老。在无产阶级作为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告诞生了。但是,无产阶级存在了很长时期,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生活的任何标志。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和唯一的来源,是上层阶级中的慈善家对贫苦不幸的人民表示的同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些人类朋友中的最勇敢

和最有远见的人士；他们知道得最为清楚，产生无产阶级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曾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坚定、最透彻和最伟大的表现。那时，还不存在像目前这样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号召人们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利益。他们只能求助于上层阶级中的理想家的热心和同情；他们试图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作诱人的描写，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情况作鲜明刻画，来吸引这些理想家。这就是说，他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是利用和平说服的方式，规劝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出资，以便大大减轻贫困和建立理想的社会。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曾对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以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结果大失所望。

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出独立生活的标志。在19世纪30年代，我们已经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看到强大的工人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了解这种运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使贫穷、无知和粗鲁的无产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实现这种宗旨所必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他们对工人运动不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们早就认为工人运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运动有驳倒他们的一个最重要论据的危险。要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指望敏感的资产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们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是至少可以减轻贫困的唯一手段；证明缓和贫困和把穷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尝试，在现代社会都是徒劳无益的；证明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运动却按照和这种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开展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日益上升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已从需要救济的可怜的不幸者，变成了需要镇压和制服的可鄙的无赖汉。于是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源泉——对于贫民和不幸者的同情——开始

干涸了。在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无害的玩具,而是一种会被群众所掌握并带来不可言喻的灾祸的危险武器。简言之,工人运动越加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中间宣传社会主义也就越困难,统治阶级也就越敌视社会主义。

只要社会主义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只能来自上层阶级的看法,他们就不仅会对工人运动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会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必然倾向于认为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莫过于阶级斗争了。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得不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们的反抗,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说,对无产阶级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们的斗争勇气的危险,那么,这就会容易使无产阶级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在现实斗争的应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态度。在工人运动刚开始的初期,战斗的无产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无知和愚昧的,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也对这种情况发生了促进作用。他们的眼光狭窄,妨碍他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他们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还缺乏深刻和明确的认识。他们只感觉到漠然的阶级本能在发生作用,它教导他们不信任一切来自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信任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

当时,某些工人阶层(特别是英国的)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最新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在英国差不多没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

但是,尽管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有时很深,社会主义仍然是十分适合思想日益发展的无产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众对

社会主义抱着敌意的地方，工人阶级中的最聪明人士，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就极其乐意归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不必顾虑他们所憎恨和激烈反对的资产阶级。想依靠上层阶级中的善良人士的协助来拯救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在工人手中变成了要依靠无产阶级的拳头来实现的暴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对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并对阶级斗争，至少是对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当然，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是与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在学识方面，他们也不可能超过这些空想主义者。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们就既没有必要的余暇，又没有资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就必然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对经济发展毫无认识，不知道这种经济发展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因素，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培养出一个其使命在于掌握这些物质因素、从其中发展出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趋成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这些无产者认为社会形式同房屋一样，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筑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拟好的计划，任意建筑起来。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自信具有建筑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够力量。问题只在于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当然，他们已经不寄望于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会给他们这一切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要由革命供给；革命将要破坏旧的房屋，打垮旧的政权，让新建筑物设计人或设计小组实行专政，以帮助新的救世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厦。

在他们的这些论点中，没有阶级斗争容身的余地。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感到他们所处的贫困境况实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

即消灭贫困。即使他们能够想到阶级斗争会逐渐提高无产阶级,使它有力量进一步发展社会,他们也会认为这个程序过于麻烦。其实,他们也不相信这种逐渐提高。他们仍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而在这少数的战斗的无产者当中,目光超过维护暂时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社会,为社会主义者扫清道路。这些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使群众忍无可忍而起来粉碎压迫着他们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时刻,也就一定来得越快。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为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不但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因为逐渐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转瞬即逝的改进,只会使群众苟安于现状,从而推迟他们起义摧毁现存的一切东西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永远根绝贫困的时刻。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不以立即和彻底摧毁现社会为目的的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即任何一种严肃而有效的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对人类事业不折不扣的背叛。

这种观点出现于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达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还没有消失。准备加入战斗的无产阶级行列的一切无产者阶层,都有倾向这种观点的趋势。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明确理解社会情况,不相信自己有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但已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低卑难忍的地位,并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出现。但是,因为新的无产者阶层日益不断地从被经济发展推进去的泥潭中爬出来,许多国家相继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出现无产阶级,所以早期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可能又不断地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幼稚病,它威胁着一切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影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目前,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叫做无政府主义,但它决不和无政府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来自对现社会有明确的认识,而只

是来自对现实社会的本能愤怒；这种观点可能与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有联系。其实，早期无产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同今日精巧的小资产阶级的往往是非常伤感和风雅的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有联系。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甚大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厌恶和甚至憎恨顽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厌恶和憎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有时被情势所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容易动摇，所以他们参加斗争未能导致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彻底结合，而只是引起后者排斥前者的结果。大家知道，凡是在无政府主义（应把这一词理解为上述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成为普遍现象和变成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无政府主义即使外表看来很激进，也始终要或早或晚地以变成排他的纯工会运动或排他的纯合作运动而结束。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应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争，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

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阐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们的学说为基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说的阐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说而取得了新的性质。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转,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较满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结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社会上的一些中间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缩短(不论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法来回答。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和日益痛苦。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说具有经济的意义,毋宁说具有精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结果,一般只有缓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话);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们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他们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结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的意义。无产阶级在这种提高中的成

长,大大快于在现代剥削制度所能容许的经济状况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担心它们会使工人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后于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带来的要求。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使无产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改进大大落后于精神的提高的地方,这种不满自然就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长时间地抑制住这种不满的增长。因此,只要阶级斗争不想超出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最后就会变成没有目的和没有成效的斗争。阶级斗争越使无产者提高,无产者认为自己离奋斗的目标也就越远,离符合他们对人类尊严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远。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由于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差别,才能根绝工人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也能消除由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所产生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强烈刺激。然而,如果消灭了这种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会超过与他们现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料相适应的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将如何使这些资料大量增加。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有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满和“渴望”。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当被剥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并不比剥削者差,或甚至比剥削者还优越的时候,阶级对抗和剥削制度,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剥削阶级达到如此高度,而还没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剥削,那么,它的“渴望”也不会消灭。

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和社会主义相对立;只要这个斗争除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让步使无产阶级得到一个可以满足的地位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标,它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斗争就和无止境的螺旋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旦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工人运动有了目标,并明确地向目标迈进;这时,斗争的一切方面,都会发生作用,即使那些不会产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启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提高阶级的威信,加

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养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时,看来已经无救的战役,也会转败为胜,这时,每一次受挫的罢工,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每一次被否决的法案,都表明向争取人类应有的生存目标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涉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发愤图强和精神提高,不管它们对无产阶级怀有敌意还是善意,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处;从此以后,战斗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支停滞不前、费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勉强保卫住一度到手的阵地的队伍。现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无产阶级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战胜者,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新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它的两个创始人,都是德国人;德国人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早的学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批著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单是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什么最先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最初在德国生根。同时,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语的工人的地区,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国。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看出工人运动现在到处都力图具有国际性。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国际往来自然而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联。从简单商品生产发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各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世界贸易是不可能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外国商人在他通商的国家也能像在本国一样受到保护。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商人永远是漂泊无定的人,他们的原则一向就是:“哪里好,

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

因此,随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世界主义的倾向,即要求各国间永久和平与人民友好的愿望,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了。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时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一方面无产阶级陷入堕落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统治阶级的水平的趋势;一方面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个人受尽奴役的趋势。同样地,实现各国人民友好的趋势,又与国家对立加剧的趋势携手并进。贸易往来要求和平,而竞争却引起战争。既然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资本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在彼此关系上都经常处于永久交战的状态,那么,不同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并把他国的商品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竞争越激烈,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危险也越增加。国际往来越密切,民族闭关自守的意图也越坚强。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战争的危险也越严重。这些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矛盾,恰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完全符合。它们早就潜在于简单商品生产之中,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它们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庞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加剧了走向战争的趋势,而又以同样的程度使和平成为必要的事情,这个事实,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灭亡的许多矛盾之一。

无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那样,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成为独立的阶级,在各方面,下述事实也就越明显。这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中,只有一个趋势对无产阶级有影响,而另一个趋势,则越来越失去它对无产阶级的一切作用。例如,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有使生产者结成一个从事共同活动的大同盟的趋势,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产者反对一切生产者的激烈竞争的趋势。但是,第二种趋势在无产阶级中间却不发

生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看不到那种使资本家阶级精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而只看到两个对立趋势中的第一种趋势,即促进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巩固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方面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越来越受到密切的国际团结趋势的显著影响,而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斗争的趋势,则在他们当中失去一切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一无所有以后,就把他们的一切基础挖掉。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祖国。同商人一样,他们所持的原则也是:“哪里的劳动条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过去手工业的帮工就已开始流浪他国,他们这种流浪的结果,产生了我们已经指出的国际团结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流浪相比,帮工的这种流浪,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帮工出外流浪,还有重返故乡的打算,而现代的无产者,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劳动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户。他们不是游客,而是流浪汉。

同无产者一样,商人(至少是经营世界贸易的商人)也是要远离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证他们获得商业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并不因此失去他们同祖国的联系。要知道,商人在国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能否顺利经营业务和欺骗外国同业,主要依存于他们的祖国,即保护他们的那个国家的威势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国外仍然怀念祖国。这些先生通常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祖国的伟大对他们的钱包有多大重要意义这一点,有最直接的体会。

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国内,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国外,至少是在文明国家里,他们也不需要祖国的保护。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到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们本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他们还有利。他们的工作上的新同志,决不想在他们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时候,即在对剥削者的关系上,剥夺他们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去关

心他的抵抗剥削者的能力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现代无产者的离乡背井，大大不同于行会时期的流浪异乡的帮工或商人。他们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们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诚然有一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比较好，因此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上述的世界公民会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造成不便，甚至带来危险。要知道，这些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将会由于要求较低和反抗能力较弱的工人的竞争而受到妨碍，那是毋庸置疑的。

有时，这种竞争也与各国资本家间的竞争一样，会引起民族对立的加剧，使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产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资产阶级之间为常见现象的民族斗争，在无产阶级之间却往往只带有暂时的性质。

要知道，无产阶级迟早必会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也将根据亲身的痛苦经验体会）廉价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先进地区，也同工业使用机器和采用女工一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力的入境，也同机器和女工的应用一样，是无法制止的。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落后，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损害。后一种国家工人所受的剥削程度，被比较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用作反对工人通过立法和“自由”协议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意图的最好借口，有时也成为这种反对的有效理由。

结果，留在国内的工人，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开始明白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成就，是怎样依存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成就。即使他们有时对外国工人怀有敌意，最后也会放弃这种情绪，而认识到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国的落后所发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灭这种落后本身。德国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国和外国提高工资与缩短劳动时间，并尽一切可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英国工人也应当关心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而美国工人则应当

关心欧洲各国的工人。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与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密切依存关系,自然而必然地导致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的紧密团结。

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产生的民族闭关自守的残余与民族仇恨的残余,越来越消失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摆脱民族偏见;工人越来越学会承认操任何语言的外国劳动伙伴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并尊重他们。

在各个国家目标相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相同的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之间,国际团结自然也必定极为密切。

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它的目标、力量和规模方面应当超过一定的界限,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认出了这一斗争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无产者呼吁,而以“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使这个同盟瓦解,但是在60年代初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再起,它又以“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成立)的名义恢复。这个协会的灵魂,仍然是马克思。这个协会的任务,不仅要在各国的无产者中间唤起国际团结的情感,而且要向他们指出共同的目标、指明走向这一目标的共同道路。协会彻底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第二项任务,有一部分未能实现。第一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实现战斗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结合。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运动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辅助手段;只要无产阶级继续从属于作为它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反对派。随着人们看清这些原则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反对派也加强起来了。在30—40年前,为数还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

一切拥护者，以及像行会那样排他的工人贵族的纯粹职业团体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国际所追求的东西，便相继退出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衰亡。

但是，第一国际播下的国际团结思想的种子是不可能被压住而不发芽的。

自这时起，《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占据了全欧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然后，又占据了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到处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目标和手段，在各地都趋于一致。因此，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产生了日益亲密的情感，对这种运动目的的国际性的认识越来越强，只要有一个外来动因，就可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上（它是利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①一百周年的机会召开的），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以后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又促进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继续加强。这种加强除此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②上。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人，不像资产阶级和平大会的代表那样是被本阶级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人。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极其令人感动地表明：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劳动人民大众都洋溢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心情，他们反对战争，并宣布所谓国家与国家

① 巴士底狱，是巴黎的一个堡垒和国家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被攻克，揭开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原编者注

②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第二国际1889年7月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为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规定的国际节日，即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巴黎代表大会是根据1886年5月1日美国发生的事件，通过规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的决议的。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浪潮，要求规定八小时工作日。1890年，许多国家首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把它作为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阅的日子。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原编者注

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消除，广大人民阶层的这种国际团结，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在扩军备战的叫嚣下进行的，便会觉得它更加伟大。这种扩军备战，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不堪言状的压迫之下。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倍坚决地强调它的国际主义观点。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社会民主党单就它的实质来说就已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同时也表现出日益变成民族政党的趋势，即表现出日益变成不但代表工业工资劳动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劳动和被剥削者阶层（即一般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人民政党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无产阶级有最后成为唯一的劳动者阶级的趋势。我们也曾指出，其他的劳动者阶层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正日益和无产阶级接近。最后，我们还已经知道，在劳动者阶级当中，劳动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增强对自己目标的认识的阶级，并日益成为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不断减少的残余成员的集结中心。劳动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对全体“小人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工资劳动者承担起领导人民的责任，工人党也变成了人民的政党。实际上，在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开始感到自己是无产者的时候；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或至少他们的子女铁定不移地要沦为无产阶级，而除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外别无其他方法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从这个时候起，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他们不怕社会民主党得胜，社会民主党得胜反而对他们有利，因为这表明将要建立一个使所有劳动者（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也有小工业的独立劳动者）不受剥削和压迫，并保

证他们生活幸福的社会制度。

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将来，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也保护一切“小人物”的利益。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它不完全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就不能使自已从剥削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因此，不管剥削和压迫采取什么形式，无产阶级都是它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也是这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的先进战士。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第一国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无产阶级为支持起义的波兰人反对沙皇俄国压迫而举行的示威，成了创立第一国际的诱因；其次，第一国际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给美国总统林肯的致贺信^①，表示国际工人协会同情黑奴解放事业。最后，第一国际虽然成立于英国，有英国人参加，但它是第一个袒护而且是最坚决袒护被英国统治阶级压迫的爱尔兰人的团体。不管是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还是波兰人的解放运动，或者是黑奴解放，都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可以举出很多。

不错，有人说：社会民主党是以经济的进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大生产尽可能完全排挤小生产；因此，小企业的灭亡，即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的沦落，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促进这些人灭亡，所以它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这些说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会民主党不能制造经济发展；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并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助力，对这件事情最关心的是资本家阶级；当然，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种发展。但是，希望制止经济发展，完全不等于要维护小农和小资产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为此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必然失败。如果说，这种尝试一般还可以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那也只能造成祸害，而不会带来好处。给手工业者和农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们的小生产再回到“黄金时代”，

^① 参看卡·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22页。

也决不等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永远无法实现和只会使他们脱离最好保护自己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虽然小生产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一定要在没落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它现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厌现象。我们已经说过,小生产的消亡不过是一出长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它的前几幕所表演的,只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缓慢而痛苦的灭亡。但是,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灭亡,对社会民主党丝毫没有好处,相反地,要是不发生这种事情,倒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要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的那些集团越没落,也就越难把这些来源供给的新成员提高到使他们能够和愿意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程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力量,却依存于这支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依存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增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要求越低,他们越习惯于不断的辛苦劳动,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队伍时,也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允许受别人剥削,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越对原来处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国际团结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导致无产阶级同供给它新成员的那些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无产者体验到和表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日趋破产的小农和小资产者试图依靠牺牲无产者的办法,比如极度剥削学徒、或阻挠工资劳动者的团结,来维持自己的原状,那么,他就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猛烈反击。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反,它将最坚决地拥护一系列可以使小农和小资产者境况得到重大改善并减轻他们负担,而不会给无产者带来损害甚至反而会有助于他们的那些措施。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由社会民主党作为要今日国家加以实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来。《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一一列举了这些要求。纲领中写道:

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满 20 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

有无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而在未实施这种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调查重新划分选区。依法规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举行。对当选的代表支付报酬。除禁治产外,取消对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

(二)实行以创制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国、各邦、各省、各区的人民有权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负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责任。每年核定税收。

(三)对全体公民实行普遍的军事教育。改常备军为民兵。宣战与媾和问题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一切国际争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四)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

(五)废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权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每个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把教会和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结社,它们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

(七)学校属于世俗。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教育。公立国民学校不收学费,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伙食;高等学校的成绩优良并宜于继续深造的男女学生,也享有这种待遇。

(八)诉讼和司法辩护免费。由人民选举的法官审判。刑事案件有上诉权。对无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给予赔偿。废除死刑。

(九)免费医疗救护,包括助产和供给药品。免费安葬。

(十)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以使一切公共开支全由税收偿付。纳税者有自估自报的义务。遗产税按遗产多寡和亲等累进计征。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公益的经济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础上制定本国和国际的有效工人立法。

1. 规定最多不超过八小时的标准工作日。
2. 禁止雇用未满 14 岁的儿童从事工艺劳动。

3. 禁止夜班作业,但由于生产本身的特点、技术原因,或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业的工业部门,不在此限。
4. 保证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于 36 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5. 禁止实物工资制度。

(二)由帝国劳动局、地方劳动处和劳动科监督一切营业性企业,调查和调整城乡的劳动条件。彻底实行生产保健卫生工作。

(三)承认农业工人和佣仆同工业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废除佣仆条例。

(四)保证结社权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险事业交由国家经营,并有工人参加管理工作。

详细考察以上这些条款,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实践要求。在阐述基本原则需要援引实践要求的时候,我们才提到实践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打算在结束本书的时候,就实践要求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已对构成《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思想发展进程阐述完毕了。

首先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专门在于保护工资劳动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绝大部分要求,都涉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提出来;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为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得出来;可是,甚至对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社会民主党力图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减轻他们的负担,它主张通过废除间接税,对所得、财产和遗产计征累进税,把大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富人,通过废除常备军,取消与常备军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债等等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减轻经济负担之外,社会民主党也极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仅要求免费的国民教育,以满足现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费供

给教学用品和由公家负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唯有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费医疗,免费司法辩护和免费诉讼。

只有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改善小企业独立劳动者的境况。把手工业者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加以帮助,维持他们的落后生产方式,将与经济发展进程相矛盾,而且也无法实现。同样地,也不可能使他们全体,或至少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变成资本家。对这一切“小人物”群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来最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表示友好的政党,却使他们作为消费者大大加重负担。这种负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触到的。因此,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小生产,不外是狂然的空想。

把小资产者和小农作为消费者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这不仅不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小生产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单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虑其他许多理由(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虑,一部分出自对贫苦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同情),也是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境况越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们的见识越高,他们想依靠饥饿的竞争来反对大生产的一切意图,也就放弃得越快,他们停止这一绝望的挣扎和加入无产阶级以壮大这个队伍的时刻,也就来得越早。同时,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不会增加无产阶级中的卑躬屈膝、没有抵抗能力和要求过低的最下层的人数。恰恰相反,他们将直接进入战斗的、“贪得无厌的”、自觉的无产者的行列,从而加速他们的胜利。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既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衰落。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地反对这种衰落——无论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还是无产阶级的衰落——并且是尽力而为之。因此,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有好处,而且有利于依靠自己的劳动生

活而不是依靠以剥削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现代国家存在一天,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他阶级。而在今天,他们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私有制下养成的本能,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党的怀抱,也就是使他们同上层有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中的一个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在寻找这种联盟,这一部分是纯粹政党的需要,因为它们把这些小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较深刻的考虑。要知道,它们了解得非常清楚,小农和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从而也是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的最有力支柱。它们毫不关心小人物的福利;它们随时准备尽量加重作为消费者的小人物的负担。它们任凭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产不完全垮台,因为小生产把小人物束缚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同时这些政党都关心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从而关心经济发展的进步。它们希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答应给予他们以这种支持,但在实际上,它们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扩大大生产的统治,并压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

社会民主党对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维持小生产,而在事实上小生产也不用害怕社会民主党。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是资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消灭这种剥夺的唯一手段。而且作为消费者,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一切理由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即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能期待这种思想会很快地在他们中间普及起来。但是,小资产者和农民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脱逃了。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脱逃,因为首先弃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们当中的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时,他们的这种临阵脱逃并不是为了躲避斗争,而是为

了从为延续他们的可悲生存而进行的小冲突中脱身，投到震动全世界为建立一个使一切成员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新社会而进行的壮阔斗争中去，即投到为全体文明人类和甚至全体一般人类摆脱有扼杀人类危险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现存的生产方式越使人无法容忍，它走向破产的趋势越明显，当权的政党越无力排除惊人增加的社会灾难，这些日益蜕化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党变得越无价值和越无原则，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人数也就越多。

（选自《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38—204 页。由陈冬野根据英文版译出，黎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俄文版并参照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的日文版校订。）

在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关于夺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草案

(1900年9月)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行为才有可能给战斗的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反之,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只是部分地代表自己的党,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有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说,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不是促进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而是阻止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

总之,大会确认,即使在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当退出内阁。

(选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51—52 页。
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根据《1900 年 9 月 23—27 日在
巴黎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记录》
巴黎 1901 年法文版译出。)

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

(1900年10月)

美因兹和巴黎的代表大会满足了我们对它们怀抱的期望。两次大会表明,在激动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上,特别是在今天起决定性作用的海外征服政策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巴黎和在美因兹,实质上都再一次提出了同一个引起相当深刻的冲突并且极大地激动人心的问题:在反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问题。当然,问题在美因兹出现时的形式,和它在巴黎被提出时的形式不同,那里看问题的着眼点也与这里完全不同。在德国,前几次代表大会已经在原则上承认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是可以容许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实践中实现这一参加的最好途径。在法国却相反,社会党员部长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一年以来在实践中已经解决;这一参加是否可以容许的问题却一直没有确定。

国际代表大会决定接受我根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决议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过是在遭到很大的反对之后才通过的,而且后来从右面和左面都对决议作出了极其多种多样的解释。

虽然我早已要求发言,但是辩论的结束使我不可能发表意见,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详细地谈一谈这一决议和它的主题。

这并不是为了替我的受到伤害的革命纯洁性挽救名誉。责备我过分“节制”,正像责备我过分激进一样,都不能使我激动。但是一年多以

前我对关于米勒兰事件的国际性调查所作的回答可以保护我不受说我在米勒兰问题上屈服的责备。我当时写道(《小共和国报》，1899年9月28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否参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国家能够作出不同的回答，我不敢以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参加在瑞士和英国是可能的，在德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正因为我不能作出无条件的回答，我也不能断言，阶级斗争的原则禁止一个社会党员在任何情况下加入资产阶级内阁。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站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党员不会愿意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正像一个无神论者不会愿意加入教权派的内阁，或者一个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加入波拿巴派的内阁一样。他在这样一个内阁中的活动，长久下去，除了腐化和玷污他自己和他的党以外，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别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例外情况下，为了一定的目的，社会党人不能在不致损害阶级斗争的原则的情况下一度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一政府中为反对共同敌人合作。这种做法固然总是危险的，但是可以设想有这样的使它看起来有道理的情况。

一句话，我不把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看成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看成一个策略问题。

至于我对于引起这次调查的那一具体事件的想法，我已经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了。”(这是说，我不久以前在《前进报》上坚决表示不赞成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

这是我在去年8月12日写的，那时我刚好完成我那本反对伯恩斯坦的书，并且正以最恶劣的搜索异端行为和最疯狂的教条狂热著称。可以看出，我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想法同一年以前完全一样。

那时我的回答和今天具有同一的性质；如果说这一回答是含糊的、橡皮性的，那么这不能归咎于回答者的思想，而是要归咎于问题的类

型。对于一个策略性问题，只有在它是联系着一定的事例提出来时，才能给以清楚的和确定的回答。凡是需要从原则上回答一个策略性问题的人，始终将面对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把一个只有有限的适用性的回答当作无条件适用的，或者提出一个给解释的艺术留有广泛活动场地的附有条件的回答。

遗憾的是，这两次——在国际性调查时和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问题的提法都犯了这种错误。无论是这一次还是那一次，都不是要求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发表对米勒兰事件的观点。一次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是否绝对地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另一次又提出夺取政权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

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这样笼统地表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怎么能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夺取政权！可能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更久，但是也可能比我们可以梦想的更短。我们是否在3年、30年或90年以后达到这一地步，有谁敢对此说一些确定的话呢！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这一决定性历史事件中，正像在任何一个决定性历史事件中一样，预料不到的事物将起很大的作用，这一事件将在同今天大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而我们居然要在今天绞尽脑汁去考虑我们在这些一无所知的、对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是不同的条件之下打算怎么办！这真可以说是：还没有下蛋就想孵鸡。

夺取政权的问题只有在同米勒兰事件联系起来时，只有在理解成这样的问题时才有意义：米勒兰的加入内阁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开始吗？这也是普遍的见解，而决议是与此符合的。但是问题提得不清楚，不精确，因此回答也不可能清楚和精确。

但是问题之所以用这样复杂的形式提出来，是有它的正当的理由的。法国同志在米勒兰事件上彼此不能取得一致，他们打算把它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裁决。但是大会必须在原则上拒绝对个别社会党的内部的策略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它不介入法国人因为米勒兰事件的争执，正如同它不干涉美国人因为工会策略的争执一样。

老的国际就已经避免这种干涉。例如，没有一次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德国同志的斗争中支持和反对过约·巴·冯·施韦泽^①，没有一次代表大会企图使两派和解。德国的分裂维持到国际结束以后，要知道国际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像马克思这样的威信很高的人，国际是一个严密的、有一个执行机关为首的组织，而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特点还发展得很差。今天我们没有马克思，没有国际总委员会，每一个社会党组织都如此被本国的事件吸引住，以致我们中间只有很少几个人有时间像为了作出国际裁决所必需的那样密切地注视外国的事件，而这时居然要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一个社会党的内部争执问题！

如果尽管这样人们仍旧想作出裁决，那就除了以笼统的措辞表述具体地设想的问题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那时人们对于所得到的回答也就不应当奇怪了。

但是正因为对笼统的问题的回答必然不能像我们的大多数法国同志所希望的那么明确，正因如此，把我的决议说成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批准，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在忠实地解释时也不能把它理解成这样。它仅仅说明，米勒兰的加入内阁不是从根本上应加谴责的行为，而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审查。

关于这样的审查的结果如何，决议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它的确已经提出了审查时应当考虑的最重要的几点。

我的决议首先尖锐地和毫不含糊地反对米勒兰的信徒所努力主张的那一见解，即似乎政府权力正像议会、地方参议会等等一样，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似乎凡是认为集中制国家的政府是一个统一的机构、只能或者全部加以占有或者根本不去占有的人，都是布朗基主义者和盲动主义者。

尽管关于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府的见解如此奇特，它今天在所

^① 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1833—1875)，德国新闻记者，拉萨尔分子，曾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原编者注

有那些人中间仍旧找到了人数很多的信徒,这些人认为,进步无论怎样逐渐地进行都不为过分,甚至推翻一届内阁,只要带来了彻底的制度变革,也意味着一次灾变,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这些人如果生活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会希望通过路德教徒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大主教团而取得路德教的胜利。

在集中制国家中,凡是存在着具有明确坚决的纲领的强大政党的地方,政府总是清一色的一党政府。联合政府在和平时期是腐化的结果;它在各政党丧失了自己的伟大的、独立的观点的时候,在它们成为政客的派系的时候出现,这些政客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把它用来为贯彻一个明确的纲领服务,只是对国家进行掠夺。

如果社会民主党有一天成熟到加入这种联合内阁的程度,那么这将是它的彻底堕落的一个标志。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希望它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

此外肯定也有由具有高瞻远瞩的纲领的力量充沛的政党所组成的联合内阁,但只是在紧急状况之下,为了对来势汹汹的、力量过于强大的内部或外部敌人进行自卫,这一敌人威胁着各有关阶级的生存利益或民族的生存利益。

如果 1870 年在推翻帝国以后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被吸收入法国的民族保卫内阁,恐怕“国际派”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对此提出反对的;如果今天——这当然是不很可能的——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被沙皇的军队打败,并且存在着鞭子政府^①在欧洲称霸的危险,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定片刻也不会犹豫就把自己的代表派进负有组织人民战争的任务的内阁去,即使他们在这一内阁中必须同自由派和偏左的中央党人合作。

因此如果基本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威胁,那么社会民主党也有权利同任何有用的资产阶级同盟者在一个共同的执行机关中为保卫民主制度而合作,如果用别的方式不能拯救民主制度的话。

① 指沙皇俄国。——原编者注

在研究米勒兰事件时的大问题是，在米勒兰加入内阁时是否存在这样的紧急状态。国际代表大会只能提出这一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这样做的。这一问题要由法国同志的代表大会来回答。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证据表明米勒兰的入阁是为了拯救共和国所必需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所需要的是社会党人在议会和人民中对它的支持；即使米勒兰不加入内阁，他们也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确，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那时也许更加容易提供这种支持。

但是紧急状态的存在仅仅是我的决议为社会党员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一个严密的党组织的同意。米勒兰无论如何没有满足这一条件。奥尔^①说，在法国没有米勒兰可以对之提出询问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对于米勒兰来说还要糟，因为只有当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而是作为战斗无产阶级的代表接受他的职位时，他才能令人满意地任职。人们说到存在着紧急状态。我们否认这一紧急状态。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存在着紧急状态，那么它是要求恰恰米勒兰个人加入内阁，还是不如说要求战斗的无产阶级支持内阁呢？米勒兰的加入内阁，只有在他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普通的个人时，才能对拯救共和国有所帮助。

但是法国同志也根本不是处于像在代表大会上看起来那样的混乱之中，他们有自己的各个具有执委会的严密的组织。米勒兰如果打算作为社会主义的代表加入内阁，本来是可以询问这些组织的，是必须询问的。事实上米勒兰既没有询问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五个大组织中的一个，也没有询问由这些组织选出来作为联系环节的社会主义协调委员会，也没有询问议会的社会党党团。

他尤其必须询问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即工人党（所谓盖得派）的领导，这个党在上次选举中曾经独力给自己征集了 30 万张选票。

米勒兰成为部长时并没有得到法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同意，

^① 伊格纳茨·奥尔 (Ignaz Auer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的领袖之一。——原编者注

而且情况立刻表明，他是在同各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对立的情况下担任部长的。

他死赖在他的职位上，尽管共和国并不需要他参加拯救，尽管他看到他的部长职位极其深刻地威胁了刚刚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的他的党的统一，并且把新的钉子打进了刚刚来得及统一起来的组织。

但是对于部长席位上的不服从纪律的党员同志的敌视必然也要成为对于内阁的敌视，于是米勒兰由于把自己的入阁强加于他的一部分党员同志，而得到了这件事本来应当得到的东西的反面：入阁本来是应当通过争取议会中和国内的社会党人支持内阁而拯救共和国的，它却使社会党人分裂，从而削弱了共和国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最强大的力量，并且使一部分社会党人动员起来反对内阁，而这一部分人如果不是因为米勒兰入阁肯定是会保卫内阁的。从盖得派当年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内阁的坚决性看来，这件事是丝毫无可怀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米勒兰通过自己的部长职位简直是削弱了社会党人对于内阁的影响，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是如此奇特。凡是在社会党人作为独立的团结的力量对待一个其生存取决于他们的投票的激进派内阁的时候，这一内阁必然对他们有所顾忌，必然对他们作种种让步。米勒兰却做到了使法国社会党人分裂成两派，一派对内阁抱敌对态度，另一派在一度发表意见支持米勒兰以后对他和他的内阁追随不舍，并且愿意与他一同赴汤蹈火。内阁无需害怕这一派别，因为它是内阁的俘虏；但是同样也无需害怕另一派别，因为它的投票由于前一派别而失去了效力。

只有这样看才能说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为什么能够纵容自己作出像驱逐意大利社会党议员莫尔加利这样的反对社会党人的丑恶行为，甚至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府，如果多少看重它在工人中间的声望的话，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

米勒兰是作为某种高级工厂视察员和官方发言人而受到内阁容忍的。法国社会主义对于社会党员部长和通过社会党员部长所起的政治

影响等于零。这位部长只不过用为数众多的警察队来欢迎国际代表大会，而在公社斗士墓前献上一个简单的花圈时在旁监视的大批骑兵和步兵，在许多外国的党员同志看来，同样也是社会党员部长对政权的夺取的奇特象征。

如果说我的决议为社会党员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所提出的条件是米勒兰事件实际并不具备的，那么被我接受的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就是直接针对米勒兰留在内阁这件事的了。这一修正案宣称，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员在这一内阁一旦表明反对无产阶级的偏私态度时有义务立即退出。即使人们想随同米勒兰的朋友们一道假定，关于夏龙屠杀^①的案件还没有结束，那么还有仅仅以莫尔加利曾经组织罢工的工人为理由就把他驱逐出境的事。社会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这一可耻的行为承担责任。他必须阻止这一行为，或者如果他被多数票击败的话，就必须辞职。

可见我的决议决不是对于米勒兰的部长职位的批准。不过它的确不包含任何对米勒兰是否满足了那些条件的直接判断，只有这些条件才使社会党员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成为看起来可以容许的。我们再说一遍，作出这一判断不是国际代表大会的任务。

可惜我们工人党内的朋友们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作出只有一国的代表大会才能作出的决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要求，国际代表大会应当把策略性问题转变为原则性问题，它应当颁布不许社会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和任何情况下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条件禁令，它应当通过宣布这种加入为触犯原则而说明米勒兰和一切赞成他担任部长的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原则，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有阶级觉悟的社会党员队伍之外了。

代表大会不想也不能走得这么远。如果它由于处理这一问题而被迫干涉法国的国务，那么它这样做也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

^① 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以后，曾协助反动政府镇压法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枪杀夏龙地方的罢工工人。——原编者注

一的意图，而不是出于任何别的意图。

我也是按照这一意图来理解决议的任务的。如果说指引我的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还有实际的考虑，那么这一方面的考虑促使我给予决议以这样的形式，使它能够成为敌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而不是这一个兄弟可以拿来打倒另一个兄弟的武器。这次表决说明，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的意图。

我们的工人党的同志们本来完全可以投票赞成决议，而丝毫不致有损自己的尊严。就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势来说，决议已经尽可能迁就他们了。由于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并且拒绝了决议，由于他们做得太过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多数派的决议获得了它本来不应当有的那种意义，决议的通过被看成米勒兰的一次胜利，对于工人党的国际同情显著地降低，而这一同情在这以前已经由于德莱福斯案件而减少了。

我们为对于工人党享有的国际同情的降低感到衷心的遗憾，因为我们远不想像现在屡次出现的情况那样，把它看成一个 *quantité négligeable*^①。工人党不仅对现代法国工人运动有着不朽的功绩，这是它通过值得羡慕的、紧张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取得的；而且它今天仍旧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支柱，尽管有个别的策略错误。它就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来说即使不超过、也几乎等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还在统一和团结方面胜过它们，而现在新成立的、没有它参加的社会主义的联盟是一个从布朗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直到想用总罢工代替政治斗争的半无政府主义者、想通过消费合作社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温顺的唯合作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工人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是一致的，而新的社会主义的联盟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首先是在米勒兰入阁这一决定性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不幸的是，在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的新的分裂，不仅像任何分裂一样有严重地削弱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危

① 拉丁文，意为：“无足轻重的事物”。——原编者注

险,而且有促使两派的不同特性发展到极端的危险,在针锋相对地斗争时,分歧的因素比联合的因素被强调得更为厉害,而那些最彰明较著地代表这些分歧因素的分子最出人头地。

在工人党内,对于我们运动的原则性基础和严格纪律的强调特别强烈地发展起来。在相反的方面,适应实际情况的必要性和自由的自我批评被提到了首位。这一方面的因素同另一方面的因素一样,对于我们运动的进行都是必要的。它们不一定要在一个人身上全都具备——它们的和谐的结合造成完美的政治家——但是它们在党内必须均衡地发展。无论是这一方面还是另一方面的因素的过分发展都是有害的。而这是目前的分裂威胁着法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

片面地强调原则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即把原则缩减为缺乏实质的抽象,把它们从由现实推演出来并且为对现实的较深刻的理解服务的原则,变成据说可以用来驾驭现实的公式。严格的纪律如果被夸大了,最后就有压制思考和行动方面的一切独立性的危险。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实际条件的适应,如果不是建立在透彻的理论见识的基础上,如果不懂得区别本质性事物和非本质性事物、持久性事物和暂时性事物,就有成为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无节制地自我批评导致怀疑主义,导致对自己和对运动的怀疑,人们就会仅仅因为需要运动来实行眼前事物才置身运动之列;无节制的宽容为一切混乱制造者和一切野心家大开方便之门。

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断定两派已经具有这些特征。无论在这一方和那一方,群众和站在前列的同志们都没有发展这些特征的意图。但是如果两派长久分别地并且互相敌视地行动的话,它们就会被驱向这一最终目的。

可惜不能指望这种运动很快告一结束。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已经表明双方的个人仇恨如何强烈,而后来发生的事件只会使它加强。至少只要主要的争吵根源即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员部长还没有被排除,我们就很难指望两派取得统一,不管我们多么迫切地希望如此。

这一争吵的问题的本身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最好的解决。固然我们有一切理由假定,无论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还是在法国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性的多数都赞同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所发表的意见。我如果发言也会表示这样的意见:赞成我的决议决不是意味着批准米勒兰担任部长,米勒兰的加入内阁是一个错误,他留在内阁已成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不幸。但是,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由于盖得和他的法国朋友们采取拒绝的态度,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对于旁观者来说就带上了对米勒兰友好的性质;而法国的全国代表大会又被形式问题吸引住了,以致应当由它而不是由国际代表大会来回答的决定性问题、即对待米勒兰的态度,根本没有提出来讨论。

因此这位社会党员部长又从各社会党方面赢得了一次新的缓刑期,他尽可以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了,如果对于一个社会党员来说,通过瓦解自己的党而维持一个部长席位能够算是胜利的话。

尽管如此,他的部长威风是不会耐得住长久的批评的,因此整个如此吸引我们注意的问题将长期地、也许永久地被埋葬。

乐观的人固然已经预言,这一问题对于其他国家、对于比利时、对于意大利来说不久也会成为迫切的问题。据说那里的联合起来的各人民政党大有在下次选举中取得多数的希望,它们将因此能够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同组成联合内阁。

如果即将来到的选举真正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我们将大为高兴。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后果肯定决不会是资产阶级和社会党的联合内阁。由于社会党的胜利,那时所有善良的自由派都将提心吊胆,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联合内阁,不过是一个自由派—教权派的或者自由派—保守派的联合内阁,而不是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内阁。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在目前的选举中是屡次出现的,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曾经造成混合内阁。这种联合是一种形势的产物,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值得重视的盟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反动势力变得更为强大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

能凭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它寻找援助并且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了援助，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有着同一的敌人，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将它清算的地步。

可见法国的社会党员部长同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的各人民政党的选举联盟以及英国的这种选举联盟的萌芽一样，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标志，不如说仍旧是反动的力量的标志。

反动分子一旦被打倒，形势在当天就会完全改变。从那一天起，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将是无产阶级，因此从那一天起，自由主义将毫不犹豫地投入反动派的怀抱——这是假定反动派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把自由主义吞掉，假定一切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在这以前就抛弃自由主义的旗帜。

自由派—社会党的联合标志着一种形势，在其中这两派都处于守势。在向统治的政府进攻时无产阶级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政权的夺取只能由无产阶级独立地完成，就是说只有在它已经强大到足以胜利地进行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的时候才能完成。无产阶级将不是依靠着一种联合，而是反对着一种联合来完成它。

(选自《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53—66 页。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根据《新时代》第 19 年卷(1900—1901 年)第 1 册第 2 期德文版译出。)

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

(1901年6月)

大家知道,5月17日伯恩斯坦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的演讲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片庆祝胜利的号叫。但是如果有谁在拿到印好的讲稿时指望在其中发现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那是会大失所望的。

当然,这次演讲也不是像伯恩斯坦在讲稿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无害。他在那里说:“在演讲以后展开的辩论中,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指出这一演讲可能会遭到的最重要的理论方面的指责时说,我所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只涉及一次关于科学这一概念的词句之争。如果把词句之争换成定义之争,那么我承认这句话在形式上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问题实际上首先在于确定‘科学的’这一概念的界限。”

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演讲的题目并不是“什么是科学?”而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伯恩斯坦的颂扬者对于他就定义展开的争论是很不关心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如何运用这一定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在这一演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促使我们研究它的也是这一点。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科学了。伯恩斯坦却把推翻这一论断当作自己的任务。

当然,在这样做时起决定作用的,一方面是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关于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界通常的观点不同,人们已经屡次给他指出来了。

他说(第 32 页):“如果我们严格地表达科学这一概念,那么,科学仅仅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① 在第 35 页上说:“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② 在第 37 页上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党的学说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③。在前面他已经宣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④ (第 19 页)。

伯恩施坦赞同“回到康德去”的号召,因此他可以算是康德主义者。但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看到他给知识下的定义恐怕是不会满意的。“知识就是对于事物的真正性质和联系的认识。”这就是说知识是对于物自体的认识。但是即使完全撇开知识的这一定义不谈,科学的定义恐怕也会使大家都“摇头”,“科学是经过系统整理的知识”,也就是说,是一切已知的、确定的事实的系统的概括。据我们所知,这是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观念。中国人的科学和欧洲科学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受因果性思想、受探索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原因的冲动所支配的。对于我们来说,有条理的研究同系统地概括研究成果一样,也是科学的一项职能。但是研究要以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为前提,要以假说为前提。假说同对“已经确定的事物”的知识一样,也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假说恰恰是科学的最有价值的产品。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5页。

② 见同上书,第367页。

③ 见同上书,第369页。

④ 见同上书,第361页。

如果我依靠与科学的目前状况相适应的方法,根据得到科学承认的事实,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未知事物,那么我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产物都属于科学,至于这一未知事物是在地球之外,还是在史前时期,还是属于未来,这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有人根据今天已知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对社会生活今后的发展作出推论,那么他在这样做时是按照科学行动的,正像医生作出预后一样,正像勒维烈^①根据太阳系的扰乱推论出它一定还有一个那时还属未知的行星一样,正像达尔文根据他已知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事实推论出从前曾存在过人的猿类祖先一样。

预言的正确性当然只是在它应验的时候才得到证明。只有在发现了被寻求的那一行星时,才证明勒维烈的计算是正确的;达尔文的假设只是在我们的猿类祖先的遗迹真正找到的日子才成为确定的科学成就;马克思的预后也只是在它已成为事实时才能被认为是事实。但是这丝毫不是否认这些预言具有科学性。

从原始的中国科学的观点看来固然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它是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它不能仅仅把自己束缚于已经确定的事物上。与此相反,这并不妨碍它在现代意义上是科学的。

伯恩施坦认为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第二个障碍是,它具有一种倾向,它代表着利益。“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②。这种反对意见太陈腐了,不值得多加驳斥。

每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特有的困难之处。社会科学的困难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自己是他们需要研究的机体的一个部分,他们不是处于这一机体之外,而是处于它之内,每一个人在这一机体中都有自己的一定地位(他只能从这一地位来考察这一机体),自己

^① 乌尔班·让·约瑟夫·勒维烈(Urbain Jean Joseph Leverrier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原编者注

^②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69页。

的一定职能,他对于这一机体的其他部分也有依存性,而这一机体的各个肢体是彼此处于矛盾之中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说这一困难真的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任何科学都成为不可能的,那就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而且任何一种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了。那么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话同样也就适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

那时我们就要把国民经济学排除出科学之列。伯恩施坦的批评为什么仅仅针对社会主义呢?也许他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者代表确定的利益、确定的倾向,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而代表“纯粹科学”吗?要不就是,他认为除了具体的理论家的理论和学说之外还存在一种纯粹科学吗?这种科学也许存在于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的彼岸,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不存在的。

按照这种哪里都不存在的纯粹科学的意义来说以及按照中国的意义来说,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只有按照现代的、欧洲的科学的意义来说,它才可能是科学的。

这样我们就回答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讨论:要成为一种科学的那种社会主义必需是什么样子的?

伯恩施坦问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第 19 页)他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我们的探讨来说,只有那些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回答才是可以考虑的。……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观念、概念和学说。人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运动。”^①

接着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句关于“彼岸”的话,然后论述了这一问题: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 361 页。

是把社会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当作社会主义的语源更好，还是把合作制这一概念当作语源更好，最后是这样说的：

目前的工人政党“的要求是没有任何一个不适合‘合作制的’这一概念的。我曾经从这一意义上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这里也要继续按这一意义来使用它。”^①

乍一看，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这一定义至少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来说是不够的。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它太肤浅了。合作制始终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们不是为了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描述为走向合作制的运动，那就同样也能把医药科学描述为开药方和制造药物的技术。但是它是认识和治疗疾病的科学。

如果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可以说，它在起初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我们还将看到，这一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努力后来变成了解放无产阶级的努力。但是单是这一努力还不能造成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努力消除群众性贫困，但是他们中间只有那些人才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怀疑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因而企图达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代替现存社会制度，在这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群众性贫困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两个因素：消除群众性贫困或者说消除无产阶级的意图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开辟一个新的社会状态，因为现存社会状态必然是同群众性贫困或者说同没有资财的无产者的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因素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里必须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它们不像“合作制”那样仅仅包含“一种彼岸的东西。……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群众性贫困、无产阶级和反对群众性贫困的斗争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 362 页。

是此岸的非常现实的因素，正是这一领域的非常确实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政治经济学一旦成为科学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就只有科学地获得和检验过的经验才是有效的。因此社会主义早就包含科学的因素，从托马斯·莫尔起，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总是表现出一种杰出的经济的、往往也是历史的洞察力。

但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当然包含一个非科学的因素：科学的领域所达到的范围只像可认识的必然性的领域一样。必然性不再存在的地方，科学也就不再存在。它们的疆界每天都在扩大，但是我们毕竟还没有达到可以科学地探讨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这样的地步，也就是说，还不能把个人的活动当作必然性来认识。只有社会的群众现象是我们能够科学地加以研究的。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上一世纪 40 年代还没有形成社会的群众现象，而只是一些个别人的意图，运动的目的——消除群众性贫困——的实现，只能设想为在个别人、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居民等级中富于同情心的、大胆而有远见的人们的行动的结果。我们不能科学地论证为什么这一或那一慈善行为必然要发生，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对乞丐施舍，这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同样，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取决于这样的偶然性，即人们是否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手段和合适的人。

社会主义是一项建议、一个计划，必须说服人们去相信它是合适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精心制作这一建议或计划，从而使反对者的一切可能的反对意见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

因此，绝对有必要设计一幅人们力求获得的社会形态的图画，而由于莫尔的“乌托邦”是近代的这类图画的第一个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据此把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①

伯恩施坦不仅把原始的社会主义的这一空想的方面，也就是它关于一种今后应当实现的新的、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

① 现在通常译为“空想社会主义”。——原编者注

唯一标志而加以强调,而且也承认它是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克服了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的方面。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完成这一功绩,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前,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不能完成它,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一种群众现象并且从而能接受科学的研究。

30年代末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到了40年代这一因素已经引起一切人的注意,这就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看到受苦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必然是今天无知的低级批判家硬栽在马克思名下的那种意义的贫困化理论。

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展,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新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

这一基础是纯粹科学的,甚至那些认为这一基础是错误的人和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那里科学性必然消失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纯粹的科学。但是它应当犯一种罪行(伯恩施坦公开认为这是它的堕落),它应该成为应用科学;它应当被应用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如果要理解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并且对之作出预断,那就必须首先探讨现存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做了这件事并且在剩余价值学说中发现了说明这一问题的钥匙。这时才有可能科学地理解和证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在这以前,对这一使命仅仅是凭直觉去理解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但是无产阶级也必然随着资本一同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日益占人口的多数,而无产阶级是同资本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的。它反对资

本的阶级斗争是自然必然的。但是这一斗争不可能始终是经济斗争。由于国家的本质,这一斗争必然要成为资本和劳动为掌握国家权力而彼此搏斗的政治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是要成为居民中最强大和最重要的阶级,胜利最后一定属于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力求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图画我们今天还没有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能够根据今天的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无产阶级今天的社会和精神需要推论出它的大致轮廓。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路的概括。连认为这一思路是错误的人也必须承认,它从头到尾是科学的,它处处是立足于经验的,它所推论出来的未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

这种社会主义同在它以前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由于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是具有深刻的科学洞察力的人,由于他们的目的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样,都是消除无产阶级,基础也是一样,都是现行的生产方式,因此如果说空想主义者的建议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尽管方法不同,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朝同一方向运动,也就是朝着取消(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私人生产并且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来代替它的方向运动,或者用伯恩斯坦的话来说,朝着“合作制”的方向运动,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的全部动力在于它的特殊建议的合宜性和优越性,也就是在于“彼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却是在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在于此岸。科学社会主义者一定要力求认识最终目的,这不是为了借此使他的运动获得特别迷人的吸引力,而是为了使这一运动能够获得一致性和直线性,能够避免歧路和弯路,避免无益的牺牲。只要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洞察力在增加,并且它同资本的矛盾没有减少,那么不管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研究的结果会是怎样,社会主义

运动的力量绝不会因此受到削弱。由此可见，他不是把科学当作达到一个预先设想的目标并且为这一目标辩护的辅助手段，而是只把它用于一个目的，即认识什么是必然的事物。这一新的立场使他能不偏不倚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探讨社会现象时一般能达到的程度。

这一切都不是新东西。但遗憾的是，伯恩施坦给我们的最新的东西还要比这更旧。他当作“社会主义”拿来给我们的实际上无非是老的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新版本。

据说(第 24 页)“(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仅仅由理论预先描述的、或多或少注定要发生的行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要进行斗争。然而，由于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未来图景当作目的，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在目前的行动取决于对这一目的的考虑，社会主义就势必相应地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①

伯恩施坦在这里完全撇开了人们提出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不谈；但这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空想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正是在于它们提出自己的目的时所采用的方法。如果说提出一种必须经过斗争来实现的目的就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就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因为要实现听之任之 and 自由贸易，是必须进行斗争的。伯恩施坦认为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势必包含着**一部分空想主义**”，恰恰是这一点表明他忘记了空想主义的本质所在。

伯恩施坦关于剩余价值的阐述表明，他已经多大程度忘记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恩格斯已经宣称，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②。

①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 36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366 页。

伯恩施坦说：“根据这一点，人们有可能被诱使认为，在剩余价值的科学证据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即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引申出来的。”（第9页）从下面引述的话可以看出，伯恩施坦把这一点理解成似乎工人被剥削是从剩余价值的事实产生的，而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必然性又是从工人受剥削这一事实产生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反对过这种观点，因此伯恩施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设法解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如下的答案：

“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事实直接证明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而是群众对剩余价值的非难，即他们把剩余价值当作剥削来非难，证明了现存制度是不可容忍的。”

他扬扬得意地说，但是这毕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据，是的，它“甚至不能算作反对现存社会的科学证据。就像发现在奴隶劳动中奴隶所创造的肯定比他们所消费的多，也不会成为反对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科学证据一样”。后面这几句话是无可辩驳的。他接着还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证明工人受剥削来说是多余的，人们不必这么费事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些话也是无可辩驳的。

当然，我们的一致之处到此就为止了。

空想主义者不能在社会本身中看到任何最后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只是说服一切善良的人，使后者相信资本主义是罪恶深重的，他们把斯密和李嘉图阐述的价值理论看成合乎心意的助手，他们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从这一理论引申出工人受剥削的事实，以便根据它来推论出今天的生产方式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伯恩施坦在这里以及门格尔^①在他以前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40年代几个空想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到要根据工人受剥削的事实直接地或者按照伯恩施坦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那种方式间接地为社会主

^① 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 1841—1906），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原编者注

义或者哪怕只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制造出一个“科学的证据”来。他的观点不是那么幼稚的。恩格斯在那里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是由于“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变成了科学的。如果有人从恩格斯的话里看出其中所没有的内容，那么他一定是已经完全忘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所在，一定是已经完全陷在空想主义的思想方式里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简单地从剥削的事实推论出来的。只不过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非熟练劳动的作用，机器的作用，资本积聚的作用等等，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这些认识产生出来。对于空想主义者来说，工人提供剩余产品这一得到经验确认的事实也许足够了。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因此它不能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发展和运动规律，而只有根据这些规律才能对我们正在走向的那种超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解答。单凭这一点，这一事实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是不够的。

伯恩斯坦没有能力理解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他倒退到原始的空想主义观点有多么远。他在补遗（四）中的表现也不亚于此。他在那里认为迫使人们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正义性和合宜性而确定下来的意志”（第 77 页）。在他看来，在实践中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想望性和可能性的证明。社会主义的宣传迄今总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它的吸引力也是从此而来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社会主义宣传的吸引力是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自对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的科学证明。如果我们与此相反，打算在伯恩斯坦提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如果我们在这样做时打算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合宜性，那么如上所述，我们就不得不设计一幅这一制度的详尽的图画。但是我们也就必须负责担保在未来国家中事情真的会像我们许诺的那样合适。可见我们必须承担义务实现一个今天已经在一切基本特征上完整的计划——总

之,我们必须重新成为空想主义者并且谈论未来国家,而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时就曾经是这样做的。

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的成就使我们没有理由退回到我们党幼年时代的这种方法上去。我们一如既往,不愿意从证明虔诚愿望的合宜性来汲取我们的力量,而是愿意从对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认识,以及对无产阶级胜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的认识汲取力量。人们可以否认这些认识的正确性,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些认识要取决于我们面临的未知事物的合宜性的证明。我们不能通过我们今天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绞尽脑汁来保证这一合宜性本身,而只能通过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认识和有条理的思想来保证。认识,认识,始终还是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愿意在任何方面都保持我们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

科学社会主义是必需的,它也是可能的。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科学,即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科学。我们现在看到,它也不可能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伯恩施坦今天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对他作为他的演讲题目提出来的那一问题的回答。

因此,如果伯恩施坦拒绝把“科学的”名称用于他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那么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理由援引康德和拉布里奥拉来把它称为“批判的”。在《前进报》上批评他的人已经指出,对于康德来说,科学和批判精神是意义相同的。而拉布里奥拉正是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叫作“批判的共产主义”的那本书(《关于唯物史观的探讨》)中非常明确和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

伯恩施坦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从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那一组论文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就仅仅在于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它一个也没有解决,它愈来愈远地迷失在问题的迷宫里,找不到任何出路,而它的目标本身也愈来愈成为问题。难道人们把这

种社会主义称为疑问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要不就是，由于它纯粹是由怀疑构成的，并且不能摆脱这些怀疑，把它称为怀疑的社会主义不是最恰当吗？

这当然不是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一年以后开始提出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给自己规定的目标。他威风凛凛地骑马出发去对社会民主党内非科学的拳匪进行修正主义的远征，他想把一种更高的文化带给他们。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域发现了空想主义的一些残余。必须把这些残余驱逐出去。

他在他的《前提》(1899年)中就已经问他的批评者：“问题究竟是在于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不如说是在于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呢？我们必须在这些残余中寻找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的根源。”①(第179页)他还宣称：“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②

今天这位联合起来的修正主义者们的世界统帅宣称自己不仅没有能力制服这种所谓的空想主义的最后残余，而且不如说他在空想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并且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王国中的合法的统治者。

如果伯恩斯坦在这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身份，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选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
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0—383页。由中央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根据《新时代》第19年卷(1900—
1901年)第2册第38期德文版译出。)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56—257页。——原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65—66页。——原编者注

斯拉夫人和革命

(1902年3月)

从“三月起义”^①这一革命斗争时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段时间在社会生活中是不算长的，——然而，整个世界却把我们从这个时代划分开来。那时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可以用斯拉夫人对革命的态度来最清楚地加以说明。

1848年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斯拉夫人还是“反动的一帮”。如果撇开波兰的小贵族和知识分子不谈，那么可以说，斯拉夫人的一部分曾经抱着不关痛痒的态度观望争取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而另一部分则为了挫败自由事业而投入这个斗争。斯拉夫人极其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革命的命运早在“六月起义”^②时期的巴黎就被决定了。但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所以被那样彻底粉碎和消灭，奥地利的专制制度所以能完全恢复自己的统治，则应归罪于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罗斯军队的干涉。1848年10月维也纳的陷落和匈牙利军队在维拉豪斯附近(1849年8月13日)向俄国将军帕斯凯维奇的投降，对东方的革命说来，是和西方的六月屠杀一样的决定性失败。

① “三月起义”——指德国1848年的革命，尤指1848年3月革命群众在柏林街垒的武装斗争。——原编者注

② “六月起义”——法国1848年革命的最高点。6月23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在街垒上同反革命的正规军和别动队进行英勇的搏斗。考茨基这里指的是陆军部长卡文·雅克将军以空前残酷的手段对巴黎工人起义所进行的镇压。——原编者注

不管德国革命家具有如何强烈的国际团结的思想，他们却不能抑制对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极大仇恨，把他们看做是各族人民中的败类。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必须战胜这些败类。斯拉夫人被认为是奴隶民族，被认为是天生要被奴役的民族。

但是，斯拉夫人从事反革命行动的原因不在于神秘的、天生的奴隶性，而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除了捷克人以外，他们全是根本不能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纯农民民族。固然，在波希米亚已经有发达的城市生活和资本主义大工业，但是捷克民族却是由农民、小市民和没有阶级觉悟并且就思想眼界说来跟着小市民的尾巴跑的无产者构成的。的确，小资产阶级在 1848 年时还是个革命阶级，但早在那个时候它已经到处暴露出自己是不可靠的了。半资产者、半无产者、小资产者，时而把自己想成这个，时而把自己想成那个；时而投身革命，时而投身反动；时而卷入革命的怒潮，时而流于奴颜婢膝，丝毫没有有一个稳固的立场。捷克的小市民就是这样：他们最初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方面，而后来则表现出自己的反动方面；他们在七月曾起来反对文迪施格雷茨^①（他因此曾炮轰布拉格城），而在十月，当这同一个文迪施格雷茨去对付他们所仇恨的维也纳时，他们又对他表示同情。

当然，这种行径，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不可靠性以外，还取决于民族的对立。在捷克的农民、小市民和无产者看来，德国人是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在波希米亚，不仅资本是德国的，而且官僚、僧侣和军队的上层以及大部分贵族也都是德国的。同时，在波希米亚，革命也是德国的产品，革命的代表者是德国人，而革命的目的则是统一和加强德意志民族！捷克人民在短时期的革命陶醉之后投入反革命的怀抱，这是不足为怪的。

现在，这一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从 1848 年起，资本主义不仅

^①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1787—1862）——奥地利将军，革命的恶名昭著的敌人。1848 年 6 月 12 日爆发的布拉格城居民的起义，被他指挥下的奥地利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根据他的命令，奥地利军队以非常野蛮的手段镇压了 1848 年维也纳居民的革命的十月起义。——原编者注

在德国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而且在斯拉夫民族那里也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征服了大部分斯拉夫世界,并且不仅在德国和波兰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在俄国以及斯洛文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那里得到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到处制造无产者,造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从这种对抗关系中早晚要发展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必然就是革命的政策。

因此,斯拉夫夫人被认为是奴隶性的化身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们现在已经跨进拥有革命阶级的民族的行列,在他们内部现在正为解放工人阶级、同时也为解放全人类进行着伟大的文化斗争。

不仅如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斯拉夫民族的改造,几乎在 25 年以前便已为举世所公认。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夫人不仅已经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

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19 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 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 this 行列。从 1870 年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开始失去它的最后一点点革命性。从那时起,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了德国。

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早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俄国革命家^①的英勇斗争便曾一度震惊整个欧洲,并对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除了巴黎公社的起义和它的英勇灭亡以外,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① 考茨基称革命的民粹派、秘密的“民意”社的成员、“黑分派”等等为 80 年代的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对历史和俄国的发展抱着不正确的观点,拥护个人英雄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理论,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作用,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认为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动力,放弃组织群众的工作,选择了个人恐怖这种错误的、有害的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策略。但是在人民日益不满沙皇制度的条件下,80 年代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斗争,曾是国内政治局势中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并且在俄国国外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原编者注

在它反对“伟大的”俾斯麦的斗争中的那种神速壮大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少数俄国革命家反对专制恐怖力量的那种无畏的、有时是极其成功的殊死斗争那样，给予 70 和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如此有益的影响，并且如此地鼓起它的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阶级做后盾，这场殊死的斗争终于以战士的枯竭而告终。

但是从那时以来，新一代英雄人物已经在俄罗斯民族中成长起来，并且现在已经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在沙皇帝国中，强大的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它本身产生着英雄人物并且给予来自其他人民阶层的革命英雄以支持，这种支持是他们从前所没有的。因此，我们正在面临着俄国革命斗争的新时代；这个斗争是在比 25 年前更广泛的基础上爆发的，但是在战斗的激烈性上，在压迫者的野兽般的残忍性和卑鄙性上，在革命家的英勇精神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上，都较之以往时期俄国革命运动的斗争毫无逊色。

但是，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俄国的武力对武力的斗争。不，同拳头的革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还正在进行着头脑的革命。觉醒的各人民阶层都热烈地渴望知识，力求弄清楚自己的历史任务，借以着手解决最复杂、最大胆的问题，并且站在日常斗争的细微末节之上，高瞻远瞩这一斗争所追求的伟大历史目的。

我们可以指望，这种智慧的高涨将产生出必然要影响到西欧的丰功伟业。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热火朝天的俄国革命运动，看来可能成为清除那种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谨小慎微的政客伎俩的最强大手段，从而迫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

对西欧说来，俄国早就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简单支柱了。现在的情况无宁说恰恰相反。西欧正在成为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支柱。朽烂的沙皇宝座正在摇摇欲坠，如果不是西欧资产阶级不

断用成百万的金钱来重新加固这个宝座^①，恐怕它早就崩溃了。1848年，沙皇曾经向欧洲派送强大的援军来镇压欧洲资产阶级的起义；现在，这同一个资产阶级又在给予俄国以强有力的支持，帮助沙皇镇压国内的一切爱好自由的运动。俄国的革命家如果不是必须同时跟沙皇的盟友——欧洲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或许早就取得了战胜沙皇的胜利。

我们希望，他们这次能够战胜自己的敌人，而新的“神圣同盟”^②将比它的前身更快地崩溃。不管俄国当前斗争的结局如何，在这一斗争中死难的烈士（遗憾的是，这种死难者的数目是过于多了）所牺牲的鲜血和幸福是不会归于泡影的。他们的鲜血滋润着整个文明世界的社会变革的幼苗，促使它茁壮地、迅速地成长。

在1848年时，斯拉夫人曾经是摧残人民之春的花朵的严寒。现在则可能成为融解反动冰层、给人民带来新的幸福春天的暴风雨。

（选自《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8—132页。由刘磊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译出。）

① 考茨基指的是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银行给予沙皇政府的巨额贷款。——原编者注

② “神圣同盟”——俄国、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根据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签订的条约所结成的同盟。同盟的目的是这些国家的君主为了保卫现状，特别是为了对付一切革命运动（不管在何地发生）而互相援助。1815年11月法国参加了这个同盟，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参加了这个同盟。

同盟在很长时期内曾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原编者注

社会革命

(1902年6月)

一、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的概念

在社会革命的概念上发生纷纭的争执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由于：任何概念都不像社会革命的概念那样与现存的利益和偏见完全背道而驰；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像社会革命那样含义多样化的概念本来是为数不多的。

事态过程通常不能像有些事物(尤其是非社会过程)那样可以鲜明地划定一个界限，而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社会愈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愈多种多样，事态过程就愈加错综复杂。在最为错综复杂的事态过程中就包括有社会革命这种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协作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的过程。

人人都使用着社会革命这个词，却各有其不同的含义，而且使用的时期不同，含义也有所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把它理解为街垒战、焚毁宫室、断头台、九月屠杀之类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综合。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并不那么锋芒毕露，把它看成是社会在无形之中进行的一种巨大的和平变革，就跟发现美洲或发明蒸汽机所

引起的变革相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各种各样持中立态度的看法。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社会的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称为社会革命，并认为它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坚持这一定义，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社会革命的概念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认定后者是由蒸汽机或发现美洲之类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本身。

但是我不想停留于社会革命的这一定义上，而认为也可以作较狭义的理解，即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并不都是一场广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特殊形式或特殊方法的变革。

任何社会主义者都力求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革命，但毕竟还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革命，只想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正因为有人用社会改良来对抗社会革命，因而出现了今天我们队伍中争论着的矛盾。我在这里只想就狭义的社会革命，即作为特殊方法的社会变革加以论述。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后者使用暴力，而前者不使用暴力。各种法律措施和政治措施都是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暴力措施。特殊的使用暴力的形式，比如巷战或处决，也并不构成不同于改良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不一定同革命有联系，也可能在改良运动中加以使用。第三等级的代表于1789年7月17日组成法国国民议会就是一次没有任何显著暴力行为的出色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在同一个法国，1774年和1775年为了制止面包涨价这个唯一的、绝非革命的目的而爆发了要求面包定价的大暴动。

但是，指出巷战和处决是革命的特征，也就是指明了我们可以从中探讨革命实质的出发点。1789年在法国发生的大革命，已成为一切革命的典范形式，只要谈起革命，就会首先想到它。它是最能供我们用来研究革命的实质和革命与改良之差异的。在这次革命前，曾试图实行

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其中最著名的是杜尔哥^①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的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后来革命所实现的基本相同。那么,杜尔哥的改革又在哪一点上不同于相应的革命措施呢?那就在于后者是由新兴的阶级夺取了政权而实现的。这也就是革命与改革(改良)之间的主要区别。力求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措施就是改革。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迄今一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着社会的诸阶级来实行的,即使这些措施不是出于统治阶级自愿,而是在被统治阶级威逼下迫于情势而实行的,那么它们就是改良。反之,如果这样的措施是由一个迄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直受压迫而现在已夺得政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本着自身的利益,必须利用夺取的权力来或快或慢地彻底变革全部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并且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新形式)来实行的,那么这样的措施就是革命的产物。

因此,不同于社会改革(改良)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谁在原则上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并力图使变革局限于实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措施,那他就是社会改良派,不管他的社会理想与现存的社会形式何等背道而驰。反之,任何力求由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的人都是革命派,即使他想用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取来的改革去准备并加速夺取政权,也仍然没有失去革命派的性质。社会改良派之所以不同于社会革命派,其区别不在于争取社会改革的努力如何,而在于直言不讳地宣布他局限于社会改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治革命如果要称得上社会革命的话,只有由这样一个迄今一直在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来进行,这个阶级不得通过社会解放来完成其政治解放,因为它迄今的社会地位是与它在政治上要居的统治地位相去甚远而且互相矛盾的。诸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即便可能采取内

^① 罗伯尔·杜尔哥(Robert Turgot, 1727—1781)法国男爵,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1758年曾发表《经济表》)的学生。1774—1776年在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企图实行几项改革以挽救财政危机,因受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译者注

战这种最残酷的暴力形式，仍不是社会革命。

下面只论述这里已阐明的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2. 演进与革命

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总要辱骂和谴责革命。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革吹嘘得上了天，却总是不安心把这些改革在地球上的人间付诸实现。

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从各个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中找出各种论据。当基督教义还在人们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把革命谴责为罪孽深重地反抗了上帝所委任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从新约全书中为此找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新约全书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那时对当权的统治者进行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成功的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生活已全被禁止。革命阶级当然就从旧约全书中找出证据来回答他们，因为旧约全书中曾经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农民民主精神。

神学的思想方法终于被法学的思想方法替代之后，有人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用暴力来破坏现存的法律制度。但是，既然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法律，那么革命权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似乎革命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了。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用他们所力求实行的法律，作为永恒的理性法和自然法，也就是以不可转让的人权来对抗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现存的法律。这样一来，重新争取人权（人权显然只能因违法而丧失）就简直不可能是一种违法行动，即使人权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

神学的词句今日已不再起作用了，在革命的人民阶层中间尤其不

起作用。有关历史上的法律的援引，也丧失了效力。由革命产生的今日的法律和政府毕竟还是为时不久的事物，以至有人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但法国的政府，就连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保加利亚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王朝也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这三邦的国王，巴登和黑森这两邦的大公爵，不仅在保持爵位称号方面，而且在获得大片领地方面，都要归功于革命的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霍亨索伦王室是在一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其现在地位的，甚至哈布斯堡王室都要向匈牙利革命屈服。1852年被判以模拟像处绞刑的叛国犯安德拉西^①，不是于1867年成了奥皇的大臣而又不背叛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么。

资产阶级曾亲自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历史上的法律的历次突破，因此在它一旦成了统治阶级之后，就不再能以法律的名义来谴责革命，尽管它千方百计地要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哲学上找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互相一致的依据。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找谴责革命的更有效的论据，他们在新发现的、与资产阶级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论据。例如，认为自然界是以突然的大跃进方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②，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情况下，就总能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居主导地位。当资产阶级不再革命时，灾难改造论就被另一种认为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微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

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自然科学家的每个新理论都是由资产阶级的

^① 久洛·安德拉西 (Julius Andrássy, 1823—1890) 匈牙利伯爵，1848—1849年曾参加匈牙利争取摆脱奥地利统治的独立运动，1867—1871年任匈牙利首相，1871—1879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1879年与俾斯麦缔成德奥同盟。——译者注

^② *Katastrophen-theorie*——灾难改造论，或译灾变论，为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 (Georges Cuvier, 1769—1832) 所创，认为自从地球产生以来，自然灾害曾使生物界经历了10次至15次改造时期。——译者注

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灾难改造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恰恰是非常反动,而绝不倾向于革命的。但是,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受着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阶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且把其中某些思想带到他的科学观点中去。关于达尔文,我们肯定知道,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假设是颇受汤姆·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个坚决反对革命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影响的。赖尔^①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发源于英国,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总善于及时摧折革命初露的锋芒,以致英国的历史上250年来只出现过一些革命的萌芽。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决不能用它所引起的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来衡量,但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果却要取决于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新的发展论之所以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他们绝没有可能性去检验它),那是由于它符合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么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

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对自然界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影响对社会的观点,但这恰恰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决不应该故意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的规律直接移用到另一个领域中去的做法,倒是应该加以制止。诚然,一个领域里的观察方法和认识

^① 查理·赖尔(Sir Charles Lyell, 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有人称他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译者注

上的每一进步确实可以并且定会促进另一领域里的方法和认识,但同样确实的是:每一领域总得服从它那不能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独特规律。

应该把无生命的自然界和有生命的自然界严格地区别开。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单凭外表上的相似,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仅仅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规律移用到其他领域,譬如应用化学上化合物的规律来解决两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到社会中去,譬如援引生存斗争的规律来宣布竞争的天然必要性,或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推论出社会革命应受谴责,甚或推论出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回答:即使自然科学中旧的灾难改造论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最微小的不可觉察的变化的积聚才能产生进化的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发生了矛盾。它助长了把进化论简直降低到极端清静无为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客观事实又证明灾变在自然界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见诸赖尔的地质进化论,而且也见诸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于是出现了一种把旧的灾难改造论同新的进化论二者兼收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的那种二者得兼的情况极为相似。就像马克思主义把缓慢的经济发展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较迅速变革区别开来那样,某些新近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除了承认有微小的和极微小的变化的积聚以外,也承认有从积聚的变化中产生出突然的重大变化——灾变。

这方面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例,就是得甫里斯^①在自然科学研究者汉堡代表大会上所介绍的他的观察。他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虽是长期保持不变的,有些种类如果衰老了而且又不能适应在此期间内发生了变化的生存条件,就会衰亡而灭种,但另一些种类则较为幸运地(照他自己的说法)有所突破,产生了一些新的生存形式,其中有的站住了

^① 得甫里斯(Hugo de Vries, 1848—1935)荷兰生物学家,主张突变说,认为新种的发生是由于偶然变异。此说与自然淘汰说相对立。——译者注

脚并且繁殖下去；有的不能适应生存条件，也会衰亡而灭种。

我并不打算从这些新的观察中得出对革命有利的结论，否则我也会陷入同那些从进化论中推论出革命应受谴责的人所犯的错误的相同的错误。但上述观察至少证明：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身对于灾变在地球发展和有机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要从任何一种科学假设里就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盲目地推断出结论，就是错误的了。

但是，如果有人尽管如此仍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俗例子来回答他。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分娩过程，它显而易见地证明自然界也有跳跃。分娩就是一次跳跃的行动，因为分娩时胎儿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胎儿原是母亲机体的一部分，与母体有共同的血液循环，由母体供给营养，而且胎儿也不会呼吸。但是一旦成了独立的人，则有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呼吸和叫喊，并能自己取得营养，而且通过肠道来排泄。

但是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种过程的跳跃性。如果更仔细加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分娩时的跳跃式变化局限于功能方面。器官原是缓慢地发展着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突然产生新功能的跳跃。如果在达到这个发展程度之前就出现跳跃，那么其结果不是器官新功能的开始，而是一切功能统统终止，新的生机就死亡了。另一方面，器官在母体内的缓慢发育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决不能不通过分娩这一革命行动就直接开始其新功能。器官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分娩的革命行动就一定不可避免。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革命在人类社会中也还是缓慢的、逐渐发展（演进）的结果。在这里，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的，也是社会的器官（即机构），而能够突然一下子发生革命变化的，则是社会的功能。铁路事业的发展就是缓慢的。可是另一方面，可以一下子把一条铁路从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企业，变成一个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专门为公众谋福利的企

业。正如在分娩时婴儿的全部功能——血液循环,呼吸,消化——都同时发生革命那样,铁路的全部功能也将在实现上述变革时一下子发生革命,因为这些功能互相都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把这些功能分阶段地相继实行国有化,譬如今天使司机和司炉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几年之后使养路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再过几年又使出纳和会计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等等。这个道理在铁路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把铁路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那样,把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部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也是同样荒谬的。一个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器官(机构)必须协同合作,其一部分机构的功能在其他各机构的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的。想由社会民主党逐步掌握某一部的各个部门的想法,其荒诞的程度无异于企图把分娩行动分成相继好几个月的若干分娩行动,其中每一行动都把某一特定的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孩童状态,而仍旧把这个小孩联在母体的脐带上,直到他学会走路和讲话为止。

既然一条铁路或一个部不能逐渐地,而是只能一下子在其所有的机构中都同时把资本主义功能改变为社会主义功能,把它们从资本的机构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机构,那么这毕竟只有在社会的全部机构的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有可能办到;这时,在社会中当然不能像在生母有机体内那样,科学地确定什么时候达到了必要的成熟程度。

但另一方面,分娩并不意味着人体器官发育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发育时期的开始。孩子这时就进入了形成新器官的过程,同时现有的器官将朝着特殊的方向进一步完善,比如口里长牙,眼睛学看,手学握,腿学走,嘴学说话等等。同样,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结束,而只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开始。社会革命能一下子把一个工厂从资本家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却只能逐步地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这个工厂由一个单调乏味而令人生厌的强制劳动的场所,变成一个人们乐于积极工作的有吸引力的场所。社会革命也能一下子使现存的农业大企业变成社会财产。至于还盛行着农业小企业的地方,就

必须在那里首先建立起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机构,不过只有通过缓慢的发展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相当不少的。但这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应当用自然现象来论证社会革命是不必要、不合理和不自然的事。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那样,我们无权直接从自然界的事例中得出社会事例的结论。用这样的对比方法不可能走得更远,而只能得出结论说:正如一切动物必须经历一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

3. 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我们只能从研究社会发展的事实中,而不能从它与自然科学的对比中,得出革命是否必要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革命(即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狭义的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回顾一下社会发展的几个较早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早在阶级矛盾和政权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是非常久远的社会发展阶段。当然,在这个阶段里是不可能由被压迫阶级来夺取政权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

即使在阶级矛盾和国家政权已经形成以后,我们无论在古代或在中世纪都还一直看不到任何符合我们所谓社会革命概念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多次激烈的阶级斗争、内战和政治灾难,但是并没有哪一次在所有制方面引起过根本而持久的变革,更没有产生新的社会形式。

其原因我认为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心都在地方基层。每个城市乡镇都形成一个在一切主要方面都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并且以松弛的纽带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各个大国只是这些市镇的集合体而已,它们若不是由一个王朝,就是由其中一个居于统治和剥削地位的市镇来纠合起来的。每个市镇都有与其自身独特条件相适应的特殊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特殊阶级斗争。当时的政治革命主要是地

方性的革命，因此通过一次政治革命来变革整个大地区的社会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社会运动中参加的人数越少，其规模也越小，则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就越少，而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就越占优势。这就必然会使各个地方的阶级斗争更具有复杂的多样性。正是由于这种阶级斗争中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由于偶然现象和个别现象在这里掩盖了合乎规律的普遍现象，所以也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它的社会原因和阶级目的。希腊人虽然在哲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国民经济的概念却是陌生的。亚里士多德只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要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只是提出了一些有关家庭经济或农业经营方面的实际指南，比如色诺芬^①和瓦罗^②所撰写的书就是如此。

引起各阶级不同状况的深刻得多的社会原因既然不为人所知，而是被别人的作用和个别地方的偶然现象所掩盖着，那就很难怪被压迫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也首先要利用其权力来消除个别人和个别地方的设施，而不去进一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但妨碍这种革命意向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经济的发展是极不显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按照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所习惯的方式劳动着。旧的做法、旧的习惯似乎是唯一完美的地道的做法。即使有人争取采用新的做法，也得竭力使别人相信是要恢复已被遗忘的旧传统。技术的改进并不产生对新的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因为它没有使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只不过促使现存的生产方式趋于完善，即日益扩大社会劳动分工，把一个行业分成好几个行业罢了。但是在每一个新行业中，都还像在旧行业中那样用手工操作，谈不上什么生产工具，而手艺技巧依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虽然在古代的

①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前354)希腊学者，写过关于希腊史及哲学的著作。——译者注

②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 公元前116—前72)罗马学者，写过关于罗马史、拉丁语及农业的著作。——译者注

末期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大企业,甚至也有工业的大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是用奴隶来进行生产的,而这些奴隶则是被看做外来人而排斥于地方组织之外的。这些企业只生产奢侈品,因而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力量,只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使农业遭受削弱而奴隶成了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例外的情况。从奴隶经济中是不可能产生较高级的经济形式和新的社会理想的。

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唯一的资本形式,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二者虽然都能暂时引起迅速的经济变化,但是商业资本只能促使旧行业分裂成更大量的新行业,并且用奴隶劳动来促进大企业的进展;高利贷资本也只能发挥使现有生产形式苟延残喘的作用,而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形式。奴隶们反对高利贷资本和农业大企业的斗争曾导致与当代社会革命相似的短暂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目的却始终只是恢复以前的状况,而不是社会革新。梭伦^①为雅典农民所实行的债务偿还制度,以及因格拉古兄弟^②而得名的罗马农民和无产者运动,就是这种情况。

在有典可查的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内,除了经济发展缓慢、缺乏对社会关系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少市镇共同体在政治生活上分崩离析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镇压新兴阶级的权力手段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当时没有官僚机构,至少在还有活跃的政治生活而且阶级斗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地方,是没有官僚机构的。例如在罗马社会,官僚机构在帝政时代才刚刚发展起来。各个市镇内部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通商往来是简单的,不需要特殊的专门知识就很容易通盘了解的。统治阶级可以从本阶级中遴选管理国家所需的人材,而且在统治之余还能有暇从事艺术、哲学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这就是说,统

① 梭伦(Solon,公元前640—前560)雅典法学家,曾改革债法。——译者注

② 格拉古兄弟,即提比里乌斯·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2—前133)和盖尤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前121)罗马平民,倡导增加自由农民土地的运动。——译者注

治阶级不仅行使统治权，还亲手加以治理。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就在有典可查的古代鼎盛时期，民兵制度便很流行，每个公民都有自卫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力量对比稍微有一点改变，就足以使一个新阶级上台，因而阶级矛盾决不会尖锐到两方面相持不下的程度，即一方面彻底变革现存制度的思想在被压迫阶级中深深扎根，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却照样顽固地坚持其种种特权。正如上文所讲的，政治革命大都仅仅以清除个别流弊和更换个别人物为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用妥协的办法来避免发生革命。

在现代大国中，英国就是一个政治形式与中世纪极为类似的国家，只不过在经济上毫无共同之处罢了。在英国，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很不发达，并且至今保存着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从事治理的贵族政治。因此，在英国这样一个现代大国中，被压迫阶级的意向也只局限于清除个别弊害，而不是反对整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中，用妥协来防止革命的做法得到最广泛的运用。

如果说人民普遍具备自卫能力并不会助长大规模社会革命的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却容易使各阶级之间一有机会就发生武装对抗。在古代和中世纪，暴动和内战并非罕见。对峙的双方往往怒不可遏地要把战败者加以驱逐或没收其财产，甚至更多的是加以人身消灭。谁要是认为暴力行动就是社会革命的特征的话，他就会在当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内发现有许多这样的革命。但是，谁只承认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从而使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革才算社会革命，那么他就在那个时期内看不到社会革命。那时，社会发展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的，并不汇聚成重大的灾变，而表现为无数点滴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它们彼此并无联系，往往中断一时又重新发生，并且大都是不自觉地进行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时代里最大的社会变革——欧洲奴隶制的消灭，是在人们不知不觉完成的，以致当代人对这一过程根本没有予以注意，现在不得不对

它作许多推测。

4. 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发展,情况随着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想在这里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及其后果,那就会扯得太远,而且是重弹老调。只消说说下面几点就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现代国家,使地方或区域的共同体失去了政治上的自主性,同时也削弱了它们在经济上的自主性;每个地方和区域的共同体都成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权利和独特的风尚;大家都拉到一个同样的水平,制定同样的法律,缴纳同等的赋税,设立同样的法庭,服从同一个政府。这样一来,现代国家就必然要求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除了各方面的平等之外,还要求语言上的平等。

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现在已完全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了。现代国家中任何一桩重大的政治变化都会立即极深刻地影响着广大的社会领域。因此也可以肯定,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的夺取政权,现在必然会引起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另外,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也扩大到武器技术方面。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作战武器越来越完善,但造价也越来越高,因而成了国家政权的专利品。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军队脱离人民而独立存在,即使在盛行征兵制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否则就得由全民武装来补充,但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一国,军队的指挥员都是与人民相脱离的职业军人,他们构成与人民相对立的特权阶级。

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上的威力,较之以往的国家也是非常强大的。它集中了广大地区的财富,而这些地区的生产技术手段,使古代最高度的文化都大有逊色。

同时,现代国家还拥有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现代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没有精密的

分工和高深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胜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夺去了统治阶级从前曾有过的闲暇。他们虽不从事生产，而只靠剥削生产阶级来过活，但毕竟不是悠闲懒散的剥削者。竞争成了推动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剥削者彼此之间为了竞争而无休止地进行竭尽全力的斗争，而竞争的失败者往往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

因此，资本家既没有时间和宁静，也没有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所必需的基本修养；他们甚至缺乏正式参加政府活动的资格。不仅艺术和科学领域，就连国家行政部门，统治阶级现在已不可能插足其间了。他们把国家行政交给雇员和豢养的官僚们去办。资本家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却不直接治理，只要操纵政府就行了。过去，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也是通过宫廷贵族来这样做的。不过，封建贵族阶级之所以放弃他们的社会职能，是他们腐朽没落的结果，而资本家阶级放弃其职能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职能有限，即由其本质决定的。

即使一个阶级已成为多余，甚至是社会的赘瘤，它还可以凭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苟延一段长时期。国家权力越强大，统治阶级就越依靠国家权力，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特权，而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维持其统治的时间越久，阶级矛盾必然就越尖锐，政治崩溃之势必然就越明显（如果终于会出现崩溃的话），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就一定越深刻，被压迫阶级夺取政权就越容易转入社会革命。

同时，投入战斗的阶级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其政治斗争的社会后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加快了。机器在工业中的应用，又继续推进了肇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经济变革。从此以后，我们的经济关系就不断在变化，不仅旧事物迅速瓦解，而且新事物又迅速形成。对旧事物的传统的概念不再相当于经过考验的、值得尊重的、不可触犯的概念，而与不完善的、不充分的、陈旧过时的概念有了相同的含义。这种看法已从经济生活蔓延到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领域中。如果说以前人们对旧事物总是不加检验地迷恋着，那么现在人们却仅仅因其陈旧而不加检验就抛弃它。而且，使一台机器、一项设

施、一条理论、一种艺术鉴赏变得陈旧过时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如果说人们从前是为了创业守成而苦心经营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就只图眼前的暂时效果而掉以轻心。因此,今日的产品往往不仅追求时髦,而且很快就不能使用和过时了。

新事物正是人们最爱观察、评论和仔细探讨的事物,而传统的和日常的事物则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确实,人类对日食原因的思索比对日出和日落原因的思索要早得多。只要社会现象是传统的、理所当然或“自然而然”的现象,要研究其规律的急迫性就很小。反之,只要新的、闻所未闻的事物在社会上一出现,研究它的急迫性立刻就会大起来。在17世纪初,首先引起科学观察的不是陈旧的传统的封建经济,而是在与封建经济并存状态下新近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

经济科学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更大的促进,即资本主义生产是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类型是大国型。现代经济正如现代政治一样,都必须与大量现象打交道。人们观察到的同样现象越多,就越注意到它们的普遍性,用它们来揭示社会的规律,而越不去追究个别性和偶然性,就越容易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对社会现象作数学上的大量观察的统计学,以及从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并在唯物史观中达到其高峰的社会科学,只有在生产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可能出现。只有这时候,各个阶级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其斗争的社会意义,才第一次为自己提出了伟大的社会目标;这种目标决不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必然破灭的任意梦想和虔诚愿望,而是对经济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深入的科学考察的结果。诚然,这种科学认识也可能发生错误,其某些结论可能证明是幻想。但是,无论其错误有时可能多么大,总抹煞不了真正科学的特征,那就是力求把一切现象统一地归结为一个不会自相矛盾的完整概念。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上,要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中的个别部分是不能任意地单独加以改变的。社会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阶级要从理论上加以批判的,已不再是个别的人和个别的设施,而是整个现存的社会;至于已经夺得了政权

的被压迫阶级，则应当去变革整个社会基础。

从 1789 年革命及其连带引起的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轮廓，事先就已被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的追随者设想到了。

根据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古代和中世纪组织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其发展形式上的如下差异：后者大都是不自觉地、在发展程度高低不等的无数小邦小国之间经常发生局部和个人纷争和叛乱的情况下分裂出来的；而前者则是越来越自觉地在追求一个既定的、并通过大量科学批判工作加以阐明的伟大社会目标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革命更稀少了，但更广泛了，其社会后果更巨大了。

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内战过渡到上述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这一过程就是由一半属于中世纪而一半已进入现代的宗教改革来完成的。17 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就已经是更高级的了；直到法国大革命，终于提供了社会革命的典范形式；至于 1830 年和 1848 年的起义，仅仅是法国大革命微弱的余音而已。

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不会有这种社会革命的，因为那时的政治范围还太狭小，社会意识还很不发达。社会革命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社会阶级中最低的阶级，必然利用它的统治去消除一切阶级统治和全部阶级，从而也将消除任何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使我们今日感受极深，因为它对我们当前的实际行动有极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革命的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政治条件，使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不经政治革命，不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能完成；或者我们仍须期待着一个争夺政权的决战时代，也就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呢？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否属于已经过时的思想，只有那些不假思索地抱住传统观念人云亦云的人或者哗众取宠博得无知群众热烈鼓掌的投机家才会抱着不放，而一切不带偏见地观察今日社会事实

的现代正派人物都一定会加以驳斥的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确实也是一个绝非一两句空话所能搪塞了事的重要问题。

我们已揭示出，社会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产生不仅要以高度紧张的阶级矛盾，而且要以一个大的民族国家为其前提，这个国家必须消除一切外省和地方自治政体的特殊法律，并且是在足以对抗任何小邦割据势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还要有一个靠官僚机构和军国主义而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以及高速度的经济进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上述这些社会革命的因素中，没有一个被削弱过，毋宁说其中大多数因素都有所增长。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来没有比这几十年更快过。由于新闻事业的发展，科学的经济学至少在广度上取得了进展，即使不说在深度上取得进展的话。经济学上的见识从来也没有像今日这样广泛地普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去估计其行动和意向的遥远后果。这一切就足以表明，我们将不再是不自觉地完成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过渡，我们不可能在剥削阶级已经意识到我们要推翻其统治的情况下慢吞吞地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会进行反抗，并且使用其全部权力手段来压制在力量 and 影响方面正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

但是，如果说对社会关系的了解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普遍，那么国家政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有力，其军事力量、官僚行政和经济力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就会立即使用这一权力实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也可以推断，今日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他们在经济上存在的必要性之后，还能靠这些权力来继续保持其存在，并对劳动人民继续掠夺。但统治阶级越是依赖国家机器，越是滥用它来从事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愤恨就必然越强烈，阶级仇恨就会越增长，夺取国家机器的劲头就会越强大。

有人曾对此提出异议说，这种对最新的社会现象的理解没有注意

到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情况也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在加剧，而是在减弱；在每一个现代国家里，都有足够的民主措施，来保证无产阶级即使不取得政权，也能慢慢地逐步取得并迅速扩大其权力。以致社会革命已不再有必要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异议究竟有多少道理。

5. 阶级矛盾的缓和

我们首先来考虑前一种异议：似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正在缓和。我在这里姑且撇开工业危机问题不谈；那是几年前就有人断言其已趋缓和的。从那以后，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对这一看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以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它再作讨论；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也不想对那已经使人厌烦的所谓贫困化理论的辩论再补充任何进一步的论述，因为这场辩论只要你愿意的话，是满可以运用一点技巧就把它无穷无尽拖延下去的，而且辩论的劲头与其说是为了确认既成的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如何理解“贫困”一词上绕圈子。我们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若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物质贫困的加剧。但是我们同样认为，在今日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足以遏止这种贫困。我们最终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日益消沉下去，而必须日益强大起来，才有希望获得解放。

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跟贫困化完全是两码事。它根本上是剥削日益加剧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已证明了剥削的确是在日益加剧，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反驳过他。谁对无产阶级遭受日益加剧的剥削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谁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反驳。

这时，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那纯粹是死板的理论罢了；对我们来说，仿佛只有我们能用手抓住的事物才算是真实的。据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出的不是经济规律，只是一些统计数字。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却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因为至今还不曾有人愿意在统计表格中既提

出工资数字,也提出利润数字;这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资本家们总是把他们的防火保险箱当作一个堡垒,哪怕他们当中最胆小最和善的人,都会像狮子一样守住这个堡垒,不受当局的任何侵犯。

但是,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数字。至少在我所知道的一些显然不是有关德国,而看来是有关英国的最近的统计中,就有这么一份。它是由 A. L. 包莱编制的,并在 1895 年 3 月伦敦统计协会上作报告时引用过,后来转载于该协会 1895 年 6 月的《公报》第 224 至 285 页上。我们从其中摘出下列表格:

年度	全年工资收入总额		非工资收入			
	单位: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应交纳所得税者		不交纳所得税者	
			单位: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
1860	392	47	376	45 $\frac{1}{3}$	64	7 $\frac{2}{3}$
1866	464	45	485	47	81	8
1870	486	44 $\frac{1}{2}$	521	48	85	7 $\frac{1}{2}$
1874	609	45 $\frac{1}{4}$	635	47 $\frac{1}{4}$	100	7 $\frac{1}{2}$
1877	591	43	652	47 $\frac{1}{3}$	130	9 $\frac{1}{2}$
1880	567	42	652	48 $\frac{1}{3}$	126	9 $\frac{1}{2}$
1883	609	42 $\frac{2}{3}$	696	49	122	8 $\frac{1}{3}$
1886	605	42	715	49 $\frac{1}{2}$	125	8 $\frac{1}{2}$
1891	699	43 $\frac{1}{2}$	782	48 $\frac{1}{2}$	130	8

对这张统计表,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个统计太乐观了,工资数额的增长似乎比实际情况快得多。

在计算工资时,统计人并不考虑到失业情况;除此之外,统计人假定:在他不能确切认定已发生变化的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重要因素就算照旧未变。不待说,作为统计人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发生变化的往往恰恰就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因素。譬如,女工和男工的比例,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就是这种因素。

但最成问题的是,这个统计仅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所有这些行业,除了农业工人之外,都已有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工会组织。于是统计人便不假思索地一律认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提高到了与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同等的水平;其实,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即使在英国也至多只占工人总数的1/5。看看各类工人的工资变动情况,也不无趣味。以1860年的工资为100,其变动情况如下:

	1860	1866	1870	1874	1877	1880	1883	1886	1891
农业工人	100	105	107	130	132	122	117	111	118
建筑工人	100	116	116	126	128	125	125	126	128
棉织业工人	100	125	125	148	148	134	146	155	176
毛织业工人	100	106	112	121	130	126	120	115	115
钢铁工人	100	127	127	143	112	112	110	100	124
机器制造工人	100	108	110	124	123	120	127	126	126
煤气工人	100	115	120	125	128	128	130	130	149
海员	100	113	103	129	123	102	118	110	143
矿工	100	?	100	150	115	100	115	100	150
平均	100	113	113	138	132	124	130	125	140

我们看出,从1860至1891年,工人的工资增加了40%;包莱对英国整个工人阶级所做的这种统计,甚至不能适用于整个工人贵族。除了棉织业工人之外(棉织业工人不愧是英国的稳健派和一切“社会和平”梦想家的模范儿童),超过1891年工资平均数的只有煤气工人、海员和矿工。煤气工人工资的增加,至少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政治家们的活动,而非单纯得力于工会的活动,因为有了政治家们的活动才使大城市的市政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于煤气工人来说,纳入市政以后是简直用不着考虑到私人资本的竞争和剥削的。1891年煤气工人工资的增长,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新工会主义”的突然出现;“新工会主义”曾令人产生如此过分的希望,以致嗣后不久希望完全落空。1891年海员和矿工的工资增长,比煤气工人的还更显得突如其来,而且是暂时性的。1886年矿工的

工资还同 1860 年的一样, 而到 1891 年则增长了 50% ! 不能认为这种增长是确有保证的进展。但是, 对于建筑工人、毛织业工人和钢铁工人来说, 1860 年以来的工资增长仍然还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包莱硬要我们相信, 在这个期间内, 英国整个无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增加了 40%, 而组织良好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 25% !

但是, 我们不妨就依据这样一张表格。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即使按照这个十分异乎寻常地乐观的统计, 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小了。从 1860 到 1874 年, 工资平均增长额占国民收入的 45%; 从 1877 到 1891 年, 它只占 42 $\frac{2}{3}$ %。如果我们在缺乏更有根据的数字情况下, 不妨把应交纳所得税的非工资收入数额算作剩余价值数额, 那么这个数额在 1860 年还比工资总额少 3.3 亿马克。但到 1891 年时, 剩余价值数额就已大大超过工资总额, 竟不下于 16 亿马克。

这毕竟说明了剥削量的相当迅速的增加。依此, 在上述期间内, 剩余价值率, 亦即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从 96% 增加到 112%。即使根据包莱的数字来看, 甚至对组织得最好的工人的剥削, 也实际上至少加剧到上述的程度。对于无组织的工人的剥削, 势必还要厉害得多。

包莱的统计表只计算到 1891 年为止。激进的国会议员齐奥查·麦奈在随后的十年里调查所得的数字, 补充了包莱的数字。麦奈的数字是记载在他所著《财富和贫穷》一书中的。该书于 1908 年在伦敦出版, 据第 8 版第 98 页所载英国应交纳所得税的收入为:

年 度	收入总额 单位: 百万英镑	土地收入 单位: 百万英镑	工商业收入 单位: 百万英镑
1893—1894	673.7	206.7	356.6
1894—1895	657.1	208.1	340.6
1895—1896	677.8	210.6	356.6
1896—1897	704.7	214.2	377.1
1897—1898	734.5	216.5	401.3
1898—1899	762.7	223.8	416.5
1899—1900	791.7	228.4	436.2

续表

1900—1901	833.3	232.8	466.2
1901—1902	867.0	238.2	487.7
1902—1903	879.6	241.9	491.6

如果我们把这些收入的消长算作剩余价值的消长,那么在1893到1902这十年里,剩余价值增加了30%,工商业利润甚至增加了40%。

工资的增长则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譬如,伦敦木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小时9½便士(75芬尼),在1903年是10½便士(85芬尼),即增加了13%。瓦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6½便士(55芬尼),在1903年是7便士(57芬尼),即增加了8%。排字工人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星期38先令,在1903年是39先令,即增加了3%,等等。

齐奥查列出了如下的利润和工资增长对比表(表中把1900年的数字定为100。1893年则表示1893至1894会计年度,其余照此类推。):

年度	利 润		工 资					总计
	应交纳 所得税 的收入	工商业 收 入	建筑 工人	煤矿 工人	金属 工人	纺织 工人	农业 工人	
1893	80.91	76.60	90.00	80.44	92.60	94.97	92.08	90.02
1894	78.99	73.17	91.11	76.13	92.56	94.97	91.50	89.25
1895	81.39	76.60	92.22	72.54	93.18	94.97	90.91	88.76
1896	84.63	80.90	93.33	71.90	96.75	94.97	90.91	89.57
1897	88.11	86.05	94.45	72.60	98.18	94.97	92.08	90.46
1898	91.59	89.27	97.78	78.60	99.19	94.97	93.83	92.87
1899	95.07	93.56	98.89	83.53	99.61	98.22	94.99	95.05
19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01	104.08	104.72	100.00	93.95	100.25	100.00	100.70	98.98
1902	105.64	105.58	100.00	87.53	100.25	100.00	100.70	97.70
1903	108.40	107.72	100.00	84.92	99.93	100.00	100.97	97.16
1893— 1903 增加	27.49	31.12	10.00	4.48	7.33	5.03	8.89	7.14

可以看出,齐奥查·麦奈所称为利润的,也包括地租和利息在内,这也就是剩余价值;它们在 1893 至 1903 年的十年里,也同 1860 至 1891 年期间一样,增加得比工资快得多。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矛盾显著地发展着。自那以后,工资的增加越来越陷于停滞状态,而剩余价值的数额则进一步迅速增长。

如果说,从英国的统计中最能看出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话,那么美国的统计则提供了有关失业的最广泛的资料。

在美国,失业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这些调查数字虽不总是完全可靠的,但我们毕竟能据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从其中算出如下的百分比增长数。

美国的失业情况是:

年度	失 业 期					
	男 子					
	1 至 3 个月		4 至 6 个月		7 至 12 个月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绝对数	百分比
1890	1,553,759	51.6	1,179,426	39.1	279,932	9.3
1900	2,593,136	49.6	2,069,546	39.6	564,790	10.8
增 加	66%		76%		101%	
妇 女						
1890	265,106	51.9	188,992	37.0	56,515	11.1
1900	584,617	47.1	485,379	39.1	171,496	13.8
增 加	120%		156%		203%	

由此可见,在男子和妇女失业者中间,短期失业者的百分比有所下降,至于较长期失业者,则不仅绝对数增加了,相对数(百分比)也增加了。失业一至三个月的男工“仅仅”增加了 66%——与此同时,人口只增加 21%,就业人数增加 24%!但是,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则从 1890 至 1900 年增加了 76%;失业半年以上者甚至增加到两倍。

妇女失业者的人数增加得还要快:失业一至三个月者增加了 120%,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增加了 156%,失业半年以上者则增加到三倍。

根据 1901 年对 24402 个工人家庭的调查，这一年有多达 12154 个家长(也就是半数)失业，而且每人平均失业达九个半星期之久！

所有这一切数字都只会坚决支持而不会反对关于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的论断，这一论断是由马克思以其他途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得出的，直到今日还没有人驳倒过它。有些人当然会说：应该承认，剥削是加剧了，可是工资毕竟也在增加，即使没有增加得像剩余价值那么快。既然剥削的加剧不会公开暴露出来，而只能通过长期调查显示出来，那么工人究竟能从哪里感觉到剥削的加剧呢？工人群众是既不研究统计资料，也不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论的。

这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有一个途径能使工人们感觉到剥削的加剧。随着利润额的提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并没有一堵不通风的大墙把彼此隔开。上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久而久之也传染到下层阶级，在下层阶级中间引起新的需要和要求，而增长缓慢的工资是不敷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资产阶级大骂下层阶级不再安分守己，欲望增多；他们忘记了，下层阶级要求的提高仅仅是上层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而已，惹起下层阶级欲望的正是他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出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无产阶级的提高得快。50 年以来，工人的住房并没有多大改善；反之，今日资产阶级的住房，比起 50 年前资产阶级的住房水平来，则堪称豪华讲究了。今日铁路上的三等客车，与 50 年前相比虽有改善，但其内部设备仍悬殊不大。而 19 世纪中叶的头等车厢又怎能与现代化列车上的豪华车厢相比呢！我不相信，远洋轮船上的海员今日的住宿条件会比起 50 年前有多大改善，但是现代化客轮头等舱里的奢华富丽，甚至与 50 年前的皇家游艇相比，也是堪称闻所未闻的。

此外，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物价腾涨，工人的状况已经绝对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不需理论上的考虑，就能认识到对他们的剥削已加剧到什么程度；种种关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夸夸其谈，都是一派胡言乱

语。

关于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就讲到这里。但是,阶级之间在政治上的日益接近,会不会抵消这一经济因素呢?工人会不会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愈来愈被资产阶级承认为同等人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正在迅速赢得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提高落后于资产阶级,从而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欲望和不满,那么,无产阶级在道义上和思想上迅速而不断的提高,也许是近5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几十年前,无产阶级的处境还如此恶劣,以至连有些社会主义者也预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对文化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洛贝尔图斯^①在1850年还写道:“目前存在着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会再出现一次新的野蛮人的风暴;这次风暴将来自社会本身的内部,它将把文明和财富之国夷为废墟。”

几乎与此同时,亨里希·海涅宣称,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我是以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的口气承认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唉,这决不是故作惊恐!实际上,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只有不寒而栗和毛骨悚然。那时,愚昧无知的圣像捣毁者们将取得政权,他们将用胼胝的双手,干出砸碎美人的大理石雕像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大家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威胁着现代文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正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今日已成为艺术和科学最可靠的保护人,他们一贯是最坚决地提倡艺术和科学的。

于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支配过整个资产阶级的那种恐惧也迅速消失了。在那以前,整个资产阶级都相信,获胜的无产阶级将像民族大迁移时期的汪达尔人那样大肆蹂躏我们的文化,他们将在废墟上建立一个野蛮的苦行派的王国。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的消失,才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强

^① 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Jagetzow,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译者注

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情。

同雇用无产阶级一样，也雇用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统治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闲暇能像雅典的贵族或天主教全盛时期的僧侣那样，去关心国家的行政事务或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他们把那种从前是统治阶级特权的整个高级精神活动，都交给雇用的劳动者去做，因而专职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官吏的人数就迅速增加了。

把他们作为整体来看，就组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中间等级”；但是，他们由于缺乏任何特殊的阶级意识而与旧日的中间等级不同。他们当中的个别阶层有一种特殊的等级意识，往往还有一种特殊的等级自豪感，但是其各阶层的利益太独特了，以至无法发展成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他们的成员参加了各个阶级和政党，从而为各阶级和各政党提供了大批精神战士。其中有一部分人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许多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另外一些人则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迄今还一直陷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圈子之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等级”的社会地位是同小资产阶级那种介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缘故。

上文所讲到的那些越来越同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且由于其职业活动最容易具备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他们必然会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破产，并且看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感觉到，其他阶级总是在竭力进一步贬低艺术和科学的成果。其他许多人士也终于被社会民主党正在不可阻挡地日益发展这一事实所感动，特别是当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无法挽救的日益腐朽加以对比之后。因此在知识阶层中普遍产生了

对工人的友好态度，以至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沙龙不在大胆地议论着某个或更多的“社会主义者”了。

如果这些知识阶层能够起到与资产阶级同等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当然就能稳操胜券，而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同这个阶层讨论问题是容易的；从他们那里也不会遇到对稳定而逐步的发展给予强制性的阻拦。

但是，可惜他们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这样的一部分：他们虽然代表资产阶级写作和讲话，但并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行动。人所共知，对人的评价只能根据其行为，而不能根据其言论，对阶级也必须这样。

同时必须记住，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正在增长，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中最无战斗力又最缺乏斗志的部分而已。

以前，当社会主义在知识阶层中被斥为犯罪或神经错乱时，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要在当时从资产阶级圈子里冲出来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就必须为此有比一个无产者更大得多的毅力、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构成了最激进和最革命的一支力量。

今日，社会主义已在上流社会里时髦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想要获得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已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毅力，不再需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社会主义者不能摆脱其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知识分子的斗争方法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不同的。无产阶级要用其人数上的优势及其阶级组织的团结一致来对抗财富和武力。知识分子在人数上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任何阶级组织。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言词和文字来进行劝说，即用“精神武器”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来进行斗争；“沙龙社会主义者”还想用这些武器来决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他们宣布愿意把他们的道义武器赋予无产阶级，但要在如下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不仅在暴力毫无取胜希望的国家里

放弃使用暴力，而且在暴力确有取胜希望的国家里也放弃使用暴力。因此，他们尽力使人不相信革命思想，把革命思想说成是不中用的手段。他们想从革命无产阶级中分出一翼社会改良派，因此力求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

迄今为止，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开始信奉社会主义的唯一效果。

除了“新的中间等级”之外，旧的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还在勉强度日。从前，这个中间等级曾是历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颇有斗志，善于斗争，在条件有利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勃然奋起反抗上层的一切奴役和剥削，反对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建和僧侣的特权。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队伍。正如今日一部分“新的中间等级”那样，这个旧的中间等级有时也对无产阶级颇表同情，同无产阶级协力合作，向无产阶级提供和从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力量。但是，无论新旧中间等级，都永远是不可靠的盟友，这正是由于他们处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小资产阶级分子既不完全是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他们按情况不同而有时觉得自己是资产阶级，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

于是，从这种双重地位中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与无产阶级一致，另一些部分则与无产阶级的敌人一致。

小企业是注定要没落衰亡的，这个过程正在无法阻挡地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在小企业数目减少上表现得很缓慢，而在小企业衰败上则表现得很迅速。有些小企业所有主已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他们简直成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为企业主干活的劳动者和雇用劳动者。另一些小企业所有主，特别是小商人和小酒店老板，他们还能独立存在，但是他们的顾客都是工人，因此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境况的好坏。这部分人愈来愈与战斗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反之，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他们还没有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但在走向这种境地或走向毁灭；还有一些

小业主是不在无产阶级圈子中寻找顾客的。他们不敢相信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兴旺起来，而指望一切转机来自上面，即来自上层阶级和政府的救助。而且因为一切进步都在威胁着他们，他们就愈来愈反对任何领域里的进步。奴颜婢膝和卖身投靠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帮凶，甚至成为君主政体、教会和贵族的狂热维护者。但是，他们同时又依然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只有通过民主，他们才能发挥其政治影响，才能获得公众势力的支持。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没落，主要就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一部分分化出来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则转向反动的民主派，在其中披着五光十色的外衣，如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民主派——其实都是保守党和中央党的一些小宗派，但它们的社会成分始终是一样的。

反动的民主派的某些观点和论据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剽窃来的，因而某些人在开始时认为，它们是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过渡形式。今日已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社会主义最誓不两立的敌人，莫过于这种反动的民主派了。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文化上的一切进步——无论这种进步是否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则在其整个本性驱使下，要阻挡一切文化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并不直接威胁小业主的利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党是最进步的政党，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就是最倒退的政党，因为他们对进步事业除了有与其他反动政党相同的仇恨之外，还对他们狭隘的思想圈子以外的一切事物极度无知。而且，小资产者只有靠惨无人道地榨压最弱小和最无力反抗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才能继续保持其剥削者的地位。他们这样做，当然首先会遇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组织力量和强制性立法来废除这种践踏人类生命的野蛮行为。

这样，那些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从盟友和置身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分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凶恶的敌人。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是阶级矛盾发生了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无法调和的尖锐化，而且正在迅速地达到其顶点，因为这种尖锐化是在几年前才明显暴露出来的。

对小有产者情况的估计，稍加修改也适用于农民。农民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小农组成的无产者阵营，另一个是资本家性质的有产者阵营。我们的任务在于加速这种分裂过程，以便我们能够向前者说明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分裂过程，不用阶级观点而对整个农村居民一律看待，那么我们会妨碍这一分裂过程。农村里的反动的民主派，按其本质是同城里的反动的民主派一样敌视我们的，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农民团结只是农民从旧政党（尤其是中央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过渡阶段，其错误就跟那些指望城市里的反犹太主义也会促成这种过渡的人一样。中农和富农则憎恨社会民主党，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争取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成了农业工人流入城市和农民找不到人干活的重要原因。

在农村，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

大地主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更甚于农民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雇工在农业大企业里，比在一般农民那里起着更重要得多的作用。但是对雇工来说，食品价格的抬高就不像对自己消费其大部分产品的农民那样没有多大影响。食品生产者与食品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当然不像工人与其剥削者之间的那种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城市里，无产者今日是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斗志的阶级，因此，食品出售者在城市里也遭遇到无产者作为其最强有力的敌人。

因而也用不着奇怪，大地主今日对产业工人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他们对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在资本家面前往往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甚至对无产者表示某

些同情。当时，无产者并不碍他们的事，而资本家则在他们需要自由贸易的地方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另一方面，资本家则认为地租妨碍了利润，并且力图从地主手里把军队和政府中高级职位的垄断权夺过去。

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保守党和贵族地主——迪斯累里^①、洛贝尔图斯、福格芬——对工人友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同小资产阶级和中农富农阶级一样，大地主也愈来愈敌视工人。

但是资产阶级呢？它今日是举足轻重的阶级。至少它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对工人较为友好些吧？

我很遗憾，也看不出这种情况。

当然，资产阶级也在发生变化，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什么是它最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们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组合减弱了、有时完全消除了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兴起，国际竞争尖锐化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消除了企业主彼此间在面临产品买主时的竞争，而且还消除了他们彼此间在面临工人时的竞争。现在，工人只面临独一无二的劳动力收买者，而不是许多收买者。但是，无论企业主的优越地位因此提高了多少，他们对工人的矛盾因而也就更尖锐化了，这是毋需进一步阐明的。

企业主联合组织一方面限制工资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产品价格。对于最近几年物价的不断飞涨，企业主联合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物价在美国上涨最快，美国的托拉斯制度也最发达。在德国，物价高涨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农产品保护关税和地主的垄断。

但是，外国的激烈竞争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物价高涨的结果，既不利于消费者，也不利于工人。除了实行保护关税引起物价上涨之外（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成立企业主联合组织），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

^① 迪斯累里(Disraeli, 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曾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译者注

资本家力图用加剧剥削来对付外国的竞争。因此，他们加紧反对工人建立斗争组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因为这样的组织将阻止资本家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在这方面，阶级矛盾也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此外，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工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金融巨头的日益结合，工业资本家是在生产(广义上讲，包括运输业)领域里拥有一定企业的企业主，他在其企业中剥削那些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并且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反之，金融资本则是旧式高利贷的现代化形式。金融资本家从他们贷给别人的金钱中获得利息收入。在当代，他们不仅像从前那样贷给手头拮据的私人，而且还贷给资本主义企业主、地方当局和国家等等。

在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大矛盾，这种矛盾与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相似。贷款的利息也像地租(典价和租金)那样，是要从企业主收益中扣除的。因此在这点上，这两种资本的利益就发生了矛盾。现在，大地主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最好是君主政体的国家政权(因为只要他们本人是宫廷贵族，就能影响君主，从而操纵国家政权)，同时还热衷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将给他们的子孙在军官生涯中打开晋升之途，而资产阶级的子孙则不配当军官)，并且永远赞成对内和对外实行横暴政策。而金融巨头也正如大地主一样，非常赞成政府实行军国主义，并且对内和对外实行强有力的横暴政策。金融资本的上层人物不必畏惧这种强有力的、不听命于人民和议会的国家政权，因为他们作为债权人，并且通过个人在宫廷里的影响，就能支配这种政权。而他们既作为债权人，又作为国家的供货人，在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和剥削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财产，都会由于参与上述几方面的活动而增长起来。

工业资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都意味着提高税收，而税收的绝大部分是要由工业资本来承担的，因此必然要使

生产成本更加昂贵。此外，战争还会使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陷于停滞状态，给经营上带来重重困难，往往导致破产。如果说，金融巨头是敢闯敢干，挥霍无度和专横暴虐的，则工业企业家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政权一旦强大有力，工业企业家就惴惴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它。他们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因此，与大地主和金融巨头正好相反，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妥协性也反映出工业资本家的妥协性。一方面，他们受到地租、利息及其产品税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又威胁着他们整个经济的利润。但是，在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还显得不太大的场合，他们宁可对无产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和平手段，用福利设施等等来进行腐蚀和约束，而不采取暴力镇压办法。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的时候，工业资本家十分愿意利用他们充当带头羊或盲从投票的群众，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似乎比以企业主利润为一方，以地租和资本利息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小些。他们把废除利息和地租看成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金融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消减，因为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金融就愈来愈支配了工业。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用股份公司来不断排挤私人企业主。好心肠的乐观论者把这种手段看成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将使资本“民主化”，从而不知不觉地通过和平途径使资本渐渐变成人民财产。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手段：它把中层和下层阶级不用于立即消费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再把它提供给金融资本家，增加他们向工业企业主收买企业的资金，从而使他们得以把工业集中在寥寥几个金融资本家手里。没有股份制度，金融巨头只能支配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来的企业。由于有了股份制度，他们用不着有必要的资金来收买，就能使许多企业依附于他们，从而加速占有这些企业的过程。没有股份制度，就不可能有皮尔蓬·摩根公司整个不可思议的大权（这个公司在几年之内把美国许多铁路、矿山、大多数钢铁厂都集中在

自己手里),就不可能飞跃式地攫取对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支配权。

根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J.D.洛克菲勒、C.H.哈里曼、皮尔蓬·摩根、W.M.范德比尔特和G.D.古尔德这五个人总共拥有30亿马克。但是他们总共支配了300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投入美国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资本总额为700亿马克。由此可见,因为有了股份制度,他们几乎支配了这种资本的半数,而美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又都依赖于这种资本。

这一次美国也未能幸免的经济危机也像每次那样,把小股东的资产剥夺掉了,却扩大和加强了大股东的资产。

但是,金融资本对工业的支配愈加甚,工业资本就愈来愈采用金融资本的方法。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工人近旁的私人企业主来说,工人毕竟是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铁石心肠的话,他们就不能对工人景况的好坏完全漠不关心。而对股东来说,便只存在着红利;在股东心目中,工人只是一道算术题中的数字而已,他极度关心的是这道算术题的答数,看这答数是决定他更享福和更有权力,还是受到限制和社会地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主尚且还怀有的那种对工人的体恤心情,也正在消失中。

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这样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但英国呢?有人会马上这样反问我。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英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减弱吗?马克思难道没有说过,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典国家,从而向我们显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吗?难道英国的现状不正是我们正在步入的状况吗?

热衷于社会和平的人总是要我们看一看英国,而值得注意的是,正

是他们大声疾呼地指责我们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顽强坚持马克思的每一句话，却企图用上述马克思的那句话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写成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已不再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正在愈来愈陷入停滞，愈来愈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所超过，以致可作一个相反的对照。英国的状况不再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未来，倒可能是我们的状况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英国的未来。这个论断是我们这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际情况的调查而作出的，可见我们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复述马克思的话，而是应用他的方法来理解当代情况。

英国曾是资本主义开宗创典之乡，是工业资本最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英国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不仅在本国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外国都执了经济上的牛耳。因而它就能最自由地发扬我在上文里提到的那些工业资本独具的特点。它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宁可设法去“和平地”分化瓦解他们。为此，它对工人阶级里有较强大组织的那部分人给予政治特权，力图用友善的迁就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阶级这部分人的领袖，而这种手段往往是很能得逞的。它对国外也放弃了强暴的做法，打出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口号。它与布尔人和睦修好，甚至对爱尔兰也终于作出了高姿态，要弥补百年以来爱尔兰所受创伤而给予国内自治权。

但是在此期间，外国的竞争激烈起来了，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外国的竞争迫使资本家们对内要消除一切对剥削的反抗，对外又力图用强暴措施来确保其市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巨头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全部生产过程中。从此以后，英国的面貌便完全改观了。韦伯夫妇^①在《社会实践》杂志（1902年3月20日）上认定，“过去十年里，‘时代精神’已背离了一代人以前还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盛行的‘社团自

^① 悉尼·韦伯(Sidney(Lord Passfield) Webb, 1859—1947)为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重要理论家，常与其妻(Beatrice Webb, 1858—1943)合作撰文，著有多种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稿。——译者注

助’。实际上，富人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的公众舆论确实比一代人以前更敌视工会和罢工了。”

由于这种骤然变化，法庭十分怕事，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自由贸易受到关税的阻挠，以致生活费用上涨了。征服殖民地的政策又重新出现，因而再度制定了强迫爱尔兰接受的法令。除了按普鲁士模式改组军队的主张尚未实行外，英国正在完全步入德国政策的轨道，在波兰问题上，在贸易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和军事政策上，都将与德国亦步亦趋。

保守党的倒台、自由党的胜利，表面上遏止了这种趋势。但是，自由党和新的工人政党之间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已开始了。这难道不显然表明，可以在德国（也在美国）研究英国的未来，而英国的状况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未来？“阶级矛盾缓和”和打开“社会和平”局面的阶段曾一直只局限于英国，而今在英国也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我愿意坦率承认，我从前也对英国寄以很大的希望。虽然我并不指望英国的激进主义竟会传播到德国，但我毕竟希望，在英国，由于其特殊情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不通过社会革命，而通过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所作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让步而和平地实现。最近这几年的经验，已使我对英国所抱的希望破灭。英国的对内政策已开始按照其德国竞争者的模式来制定。但愿英国的无产阶级会对它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现已看得出，关于阶级矛盾日益缓和以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接近的假定究竟有多少道理。虽然不能证明这种假定完全出于凭空捏造，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它的错误毕竟在于：它把这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的事实假定为普遍性的事实，把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与整个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并且把英国过去那种特殊的社会趋势看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增长的普遍趋势。

6. 民主

但是，只要我们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所预见，难道我们不可以用

民主来为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一个基础，而不用与现有制度强行决裂吗？

有不少政治家断言，只有处于一个阶级的专制统治下，才有必要发动革命；有了民主，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据说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已经有了实现和平革命所必需的那么多的民主。据说，已经有了到处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可能，而随着消费合作社的日益普及和自己从事生产，就能缓慢而坚持不断地在一个个部门里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排挤掉。据说，到处都有可能组织工会，来限制本企业内的资本家的权力，并在工厂里实行立宪制度，以代替专制制度，从而准备向共和制工厂缓慢过渡。据说，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都能进入地方政府，去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干预公共事务，扩大市政设施的范围，用不断扩充地方生产来压缩私人生产。据说，社会民主党终于能够进入议会，在议会里取得愈来愈大的影响，实行接二连三的社会改革，用劳工保护法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并且将使大垄断企业国有化，使国营生产日益扩大。就这样，在今日已有的基础上利用民主权利，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引起任何震动；无产阶级用革命夺取政权的做法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革命运动反而会起直接的危害作用，因为它采取的方式不会是别的，只会是对这种虽然缓慢但却可靠的进步过程进行干扰。

以上就是反对革命发展的人的主张。

这是他们在我们面前描绘出的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景色。在这里，也不能说它完全是空中楼阁，而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真理，在这里也只是一半真理。稍微用点辩证的思想方法，就能向他们提出全部真理来。

这样的田园景色只有在作为矛盾一方的无产阶级日益茁壮成长，而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资产阶级仍然原地踏步不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这时，无产阶级即使不进行革命，也肯定会逐渐超过资产阶级，并不太引人注目地把他们的财产剥夺掉。

但是，当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而无产阶级的任何进展都导致资产阶级发展新的力量并想出和采用新的抵抗手段和压迫方法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先前片面地看问题时认为有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时就会认为有必要去组织越来越多的战斗群众，改进和采用越来越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并不断扩大斗争的领域。这也就是说，不应再用蚕食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赢得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应当越来越扩大不断斗争的规模，并使我方的每次胜利和敌方的每次失败得以加深后果。

最不起作用的就是合作社。在合作社中，人们今日实际上只考虑到消费合作社。由于合作社的温和性质，一切反对革命发展的人都对合作社估价很高。毫无疑问，合作社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系列重大的好处，但若指望靠合作社来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把资本收归公有，那就荒唐可笑了。就合作社今日正在剥夺某一阶级而言，这个阶级就是迄今还能勉力维生的小店主和面包师之类的手工业者阶层。能适合上述情况的还有这样一种现象：虽然合作社据说是要与大资本家作对的，可是到处都没有大资本家反对合作社。恰好相反，忿然起而反对合作社的，却是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那些依靠工人顾客，因而也最容易把他们争取过来支持无产阶级政策的阶层。如果说，工人消费合作社会给某些工人阶层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加强这些阶层，那么它却又使某些本来接近无产阶级的阶层脱离无产阶级运动。赖以实现和平吸收资本主义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这一手段，却成了阶级斗争中引起新的阶级仇恨的新的焦点。与此同时，资本的权力却丝毫未被触动。迄今为止，合作社只在对小店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消费合作社还面临着一场对百货公司的斗争。对消费合作社来说，这场斗争就不那么容易取胜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消费合作社的红利如果不加以分配而聚集起来，就能比资本积累还增长得快，以致超过资本的积累，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活动领域起到限制作用。这种看法也是完全荒诞无稽的。

消费合作社只有在如下情况下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一定的意义，

即用消费合作社来进行强有力的阶级斗争，把它交给战斗的无产者作为获得更大力量和权力的手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力量也将完全取决于立法的程度和国家政权的态度。因此，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赢得政权，消费合作社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只能是微不足道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比消费合作社重要得多的是工会。但工会是作为斗争组织，而不是作为社会和平组织才如此重要的。在工会同企业主订立了私人名义的或组织名义的合同时，工会也只有靠它的斗争能力，才能使合同得到保证和贯彻执行。

但是，虽然工会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如此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怎样，工会都应当估计到，迟早会出现其对立面——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当这种组织采取了卡特尔，甚至托拉斯这种紧密的经营共同体形式时，它们在工会面前就很容易成为不可抵挡的了。

但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还不是对工会的唯一威胁，更大的威胁仍来自国家政权。在我们德国，这种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可是即使在民主的英国，几年前人所共知的法庭裁定就已说明，工会是克服不了各种困难的；法庭的裁定有使工会完全陷于瘫痪的危险。

上文已经提到的韦伯夫妇在《社会实践》杂志上的文章，也为此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证据，这些证据尤其能说明工会的前途。文章指出，英国的工会发展得何等地不平衡。“一般说来，强大的工会变得更强大了，而那些以前就弱小的工会，现在则比以前更弱小了”。煤矿工人、棉织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的工会壮大了。农业工人、海员、缝纫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工会则变弱了。但是，有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反对威胁着整个工会界。英国的法律尤其适合于镇压不称其心意的组织；现在用法律来反对工会的危险已增大了，而且“人们担心，这种危险会随着对工会和罢工反感的日益增长而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法官和陪审官以及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中地位比较稳定的那部分都有那种反感”。现行的法律就足以“把工人两手紧缚，听任企业主摆布”，因此韦伯夫妇

认为很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那时“法官就法律所作的解释，将使集体合同及其附带规定的有利条件，如关于集体停工和工业临时停产的规定，无法实现，或实现起来毕竟代价甚高和颇为困难。”

这种情况使工会在对付资本家时一直碍手碍脚，根本谈不上真正限制剥削。可以设想，即使在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工会理想国的英国，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

即使在实行基层普选制的国家里，要在其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实现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也同样会受到限制。市政社会主义的实现势必受到总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不能独立发展，越出限界。诚然，在个别的工业市镇，无产者可能在有力量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先掌握市镇的行政权，从而至少能使这些市镇的行政工作失去那种敌视无产者的色彩，并且实行一些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实行的个别改进。但是，这样的市镇行政当局不久就会不仅受到国家政权的约束，而且在经济困难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最先能被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大多是那些几乎完全由无产者居住的贫穷市镇。这些市镇该从哪里获得为实行较大的改革所需的资金呢？它们在向市镇居民征税方面，照例要受国家立法的限制；即使不受这种限制，也不能过度地向当地的富裕者和富豪们征税，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出市镇，而唯有从他们那里才能弄到像样的钱。任何断然的改革措施，有时都需要靠新的税收来实现，而这种新税收不仅在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广大居民中都会令人感觉不快。曾由社会主义者或接近他们的改革家所争取到的某些市镇的行政权，就是由于税收问题而又被别人夺去的，尽管他们当时治理得相当好。譬如在伦敦，在鲁贝，最近在德国的米尔豪森，都是如此。

再看看政治方面吧！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了！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劳工保护方面不断获得进展么？国会的每次会议难道没有给我们工人带来对资本主义新的限制吗？每次选举难道没有增加我们工人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吗？我们在国家里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政府的影响，

难道没有相应地在缓慢却无法阻挡地不断增长吗？资本对无产阶级的依赖性难道不也相应地正在增长吗？

确实，劳工保护法规的数目在一年年地增加。但是如果细看一下，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法规几乎总是意味着把业已存在的保护扩展到新的领域里去，比如遣散童工，对商业雇员、餐馆伙计、家庭工业者、海员实行保护等等。这种扩展大多带有非常缩手缩脚和犹豫不定的性质，而不是把业已实行劳工保护领域里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如果细想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多么惊人的速度扩展其领域，多么迅速地掌握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一国又一国，那么就会发现，劳工保护的扩展速度就慢得多了，始终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扩展，而只是十分吃力地在后面跛行。一旦资本主义扩展的速度更快起来，劳工保护的扩展便更加陷于停滞状态。

如果说劳工保护在实行的广度上已经是很不够的，那么在深度上则几乎等于零。1847年在英国，由于宪章运动和纺织工人的迅速贫困化，曾争取到女工和青年工人的十小时工作日制，但严格说来，也只是全体纺织工人受到这种益处。而直到今日，我们在十小时工作日制方面有多大进展呢？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规定，巴黎工人全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而法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则实行十一小时工作日制。几年前，当米勒兰^①使议会通过了关于有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子一起劳动的企业（即不是一切企业）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制（仅是一纸空文，有许多比这更恶化的情况）的提案时，这件事被吹捧为只有社会党的部长才能做出的值得惊叹的成绩。而他所给的毕竟比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立法所给的还少，因为他使十小时工作日制也适用于童工，而英国早在1844年就规定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六个半小时。

^①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法国政治家，1885年起为法国议员，1899年起在资产阶级内阁中任第一位社会党部长，嗣后逐渐右倾，1904年被开除出党，1920年任总理，1920—1924年任总统，1924年被迫辞职。——译者注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早在 1866 年就要求把八小时工作日制作为衡量社会改革成果的先决条件。但是 36 年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图尔代表大会上，竟有一位代表反对把八小时工作日制列为我们最近的要求之一。他只希望要求“采取措施，以准备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而这位先生竟没有被人嘲笑，甚至还能在巴黎参加竞选！

由此可见，社会改革获得迅速进展的唯一结果，就是社会改革家们的谦逊。

但是，在代议机构里社会主义者议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很简单，只要不光看到事物的这一面，还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就自然明白。社会党议员的人数诚然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派却衰落了。这种现象充分暴露在选举时其得票数字下降，而且每次选举结果都一蹶不振上。他们越来越胆小怕事和没有骨气，在对付反动势力时，只知道表示他们愿意一旦上台，就立即为推行反动政策开放绿灯。这就是今日自由主义觅取政权的方法。

但是，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而相应地减弱，就连议会也因其内部社会民主党势力的日益扩大而愈益丧失其影响。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出现的，但两者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反之，没有或只有寥寥几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议会，譬如普鲁士议会，在影响和创造力方面则比别国议会削弱得更厉害。

议会的没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议会里属于技术性的问题看成是导致没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改进议会的议事制度或职权范围而加以消除的；议会没落的主要原因取决于那些通过议会制度来对政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诸阶级的性质。

如果议会制度要兴旺发达，那么它就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要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多数派，其二是要有一个由多数派坚决要求实现并督促政府加以实现的伟大社会目标。在议会制度的全盛时期，这两个先决条件曾是具备的。只要资本主义还代表着民族的未来，则在议会中有重要地位的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众，都主张发展

资本主义；而多数小资产者，甚至工人，也都追随资产阶级的领导。

于是，自由主义就作为一个怀有伟大目标的团结的政党而兴起。自由主义为建立议会制度及其在议会中所作的斗争，使自由主义获得了重要意义。

从那以后，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说到的新的发展情况。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中滋长起来，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小有产者和小农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而小有产者和农民中的其余部分则成了十足的反动派。与此同时，工业资本中最有实力的分子则与金融巨头相结合；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议会制度，虽然有时也利用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请看巴拿马案件^①。

自由党于是四分五裂了，而统治阶级中并没有产生另一个具有统一性质的议会大党，以代替原来的自由党。有产阶级愈反动，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愈分裂成各个小派别，也就愈难于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议会多数派。只有一个办法把形形色色的派别结合成暂时的多数派，那就是要它们各自放弃要在议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野心。这样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的联盟，因为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而只是出于表面上权宜之计的考虑；这样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毫无成果的，因为其成分是如此复杂，以致不要它们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等于不要它们生存。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参加到这种联盟里去，就能够缓慢地逐步进入政权，那就是异乎寻常地误解了这种联盟的实质——这种联盟是从议会制度的没落中产生的，它本身便意味着议会制度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

但是，社会发展不仅导致议会里的统一大党瓦解成许多同床异梦、甚至互相敌视的派别，而且还导致议会多数派往往比政府更反动，更敌视工人。政府虽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可是它毕竟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关系了解得更清楚。对政府来说，国家官僚机构虽然也仅仅是

^① 指 1892 年揭发的有关巴拿马运河公司问题的议员受贿案。该案曾牵连许多法国议员。——译者注

听命于它的顺从奴仆，但官僚机构却能以其一贯的作风和倾向对政府施加影响。而官僚机构是从知识分子中间收罗其工作人员的；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重要意义的了解，即使相当审慎而缓慢，毕竟是在逐步加深的。

这一切的结果是：政府虽然怀有敌视工人的反动思想，但往往毕竟不像站在政府背后的统治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尾巴那样盲目蛮干。从前曾经是迫使政府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议会，现在却愈来愈成为破坏政府有时由于情势所迫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点点进步措施的工具了。随着这些靠议会制度来实行统治的阶级日益成为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议会制度也在丧失其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说对无产阶级选民群众情绪的照顾有时毕竟会迫使一个代议机构采取对工人友善和民主的做法，并且在这方面显得比政府高明，那么政府也能找到足够多的办法来撇开议会而独立行事。

在美国，反对工会的斗争与其说是由代议机构来进行，还不如说是由法院来进行的；在英国，对工会发动进攻的，也是上院颁布的法令，而不是由选民选出的下院的立法；已被否决了的颠覆问题提案的精神，在德国法庭上又死灰复燃了；德国工人对此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于是，议会制度在两方面的压力下受到了夹击；统治阶级的政党和政府都愈来愈使议会制度无法取得成果。议会制度愈来愈没有能力去朝着某一方向推行一种坚定的政策。它已愈来愈显得老态龙钟和软弱无力了。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议会制度远远不能阻止革命的进行或者抹煞革命的意义，毋宁说，议会制度甚至还需要革命来使其重新具备生命力。

但是不能因而就误解我，仿佛我认为民主制是多余的，仿佛我认为合作社也好，工会也好，社会民主党争取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也好，争取各种民主改革也好，都是毫无价值的。再也没有比这种误解更

荒谬的事了。恰恰相反，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只有作为制止革命，也即制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时，才是毫无意义的。

民主制有产生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形式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就已经具有极高的价值了。这种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决不会再像1789年甚至1848年那样，是一场无组织的群众斗争，那时群众缺乏政治教育，对斗争着的诸因素的力量对比毫无认识，对斗争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方法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谣言声中和遇到突然事件时便人心惶惶，陷入思想混乱。相反地，这个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将是一场有组织、有觉悟的群众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群众是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的，他们不会被任何刺激所触怒，不会因受委屈而大发雷霆，因而也不会在遭受挫折时灰心丧气。

另一方面，通过竞选斗争可以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清楚了解各阶级和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的进展和挫折，从而避免由于过早地开展行动而招致失败。但是通过竞选斗争，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这样一来，斗争的规模就不至于那么残酷，那么需要重大牺牲，也不再盲目地受偶然事件的支配了。

但是，也不能把民主和行使自由权利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估计过高。实际上它还不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促进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可是，即使最微小的改革或组织性，也可能对无产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再生有极大的意义。如果不要求改革或不搞组织活动，无产阶级就会毫无保障地断送给资本主义，而早就沉沦在时时刻刻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贫困之中了。但是，无产阶级议员之所以必须在议会和地方代理机构中从事活动，以及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发挥组织的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使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使无产阶级在精神上趋于成熟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日益切实熟悉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行政工作，以及经济部门中大企业的各项任务和办法，

因为它一旦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是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的。

由此可见，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民主不能用来阻止这种革命。民主之于无产阶级，犹如空气和阳光之于有机体那样，缺少了就不能发挥其力量。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个阶级的成长而忽视敌人的同时成长。民主并不妨碍资本的发展；资本的组织程度及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是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增长着的。应当看到，消费合作社固然在成长，但资本的积累却同时增长得还更快些；虽然工会在成长，但资本的集中和转变为庞大垄断资本的组织程度也在更快地增长。还有一些在这里尚未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事物不妨略略提一提：社会主义报刊诚然在成长，但无党派的、无骨气的报刊也同时在成长，它们正在麻醉和毒化着广大人民群众；工资固然在增加，但利润额增加得还更快；议会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人数虽然在增加，但议会的作用和意义却越来越减小，而与此同时，议会多数派和政府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巨头的势力。

因而，在无产阶级发展其权力手段的同时，资本也在发展其权力手段，其结局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两者之间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大决战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是不会告终的。

资本家阶级既成为多余的，无产阶级便相反地成为社会上最必不可缺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已处在既不能征服又不能根除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即使在每次失败之后，也必然会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具有威胁性；反之，无产阶级只要取得打倒资本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就能夺得政权，并使其政权不作别用，只用之于消灭资本关系。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假定，资本主义结束的方式会不同于它开始的方式。无论经济发展

或政治发展都没有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革命时代已告结束。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它们更多地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只能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分子,从而使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从争取初步生存条件的斗争,变成夺取政权的斗争。

7. 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但是,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将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能预料决战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吗?无产阶级在决战时将使用什么武器呢?

对这些问题,很难给以确定的答复。我们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事物发展的方向,却不能推测出事物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在探讨发展的方向时,只需要相应的注意到一些简单的规律,因而可以把那些虽然错综复杂但却不是我们认为合乎规律的或必要的现象撇开,甚至撇开我们认为纯属偶然的现象。但是,偶然现象却在确定运动的形式和速度时起着很大的作用。譬如说,在上世纪的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每个国家里,其形式和速度则是大不相同的。地理特点,种族特性,邻国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人物的阻挠或促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因素是无法预先认识到的,而这些无法认识的因素又互相给予对方以巨大的影响,以致情况会变得极度复杂,按迄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是不可能事先预见的。因而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能对我们文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彻底而广泛的了解,能在研究工作上以其前后一贯和富有成果的方法而比同时代人远为高明的人,虽然能预先断定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并被事态的发展过程出色地证明其预断是正确的,但有时在研究今后几个月情况发展的形式和速度上还可能发生重大的差错。

我相信,关于未来的革命,只有一件事是今天已经能有把握讲的,

即未来的革命形式将与以前的革命完全不同。革命者和反对革命的人常常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按照以前的革命模式来设想未来的革命。而且因为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论证这种革命已不再可能发生，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的概念似乎根本就是陈旧的概念。在世界史上我们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是由一个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组织，在利用民主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所反对的首先是企业主联合组织这样一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在这个权力面前，甚至专制君主都会屈服，而且它的力量还被现代大国从专制主义那里承袭下来的权力手段——官僚机构和军队所加强。

正如前面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当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在某些国家里，对我们进行最激烈抵抗的，已不再是政府了。以前的革命是反对专制制度的。在专制制度下，政府的力量占优势，阶级矛盾不能明显地展现出来；政府不仅阻止被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而且还阻止剥削阶级自由地维护其利益。只有一部分剥削阶级是站在政府那一边的，更大的另一部分剥削者，尤其是工业资本家，是站在反对派阵营里的；在反对派阵营里的还有全体劳动阶级，包括无产者，小有产者和农民（某些落后地区不在此列）。因此，政府在人民中是孤立的，得不到广大人民阶层的支持。它代表着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一举而推翻之。

在民主制度下，不仅被剥削阶级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也能更自由地成立其组织；剥削阶级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们想保卫自己以对付日益强大的对手的话。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力量，都比它们在专制制度下更强大了；它们都能比政府本身更毫无顾忌和更毫不妥协地运用其权力手段；政府已不再凌驾于它们，而是对之甘拜下风了。

因此，革命者们不仅要对付政府，而且还要对付各种强大的剥削者组织。革命者们已不再像在以前的革命中那样代表人民的绝大多数反对一小撮剥削者。他们今日基本上只代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对面的，不仅有整个剥削阶级，还有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和农

民,以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小农和某些小资产阶级(后者实际上是雇佣劳动者,或者是依靠工人顾客的)能同无产阶级联合。但是他们有时是非常不可靠的盟友。他们恰恰缺少无产阶级那种借以发挥其全部力量的武器——组织。

因此,如果说以前的革命是人民奋起反对政府,那么未来的革命(也许俄国不在此列)可能更多地带有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斗争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但仅仅在这一点上,它将不大像法兰西革命型,而接近宗教改革战争型。我几乎想说,它将不大像一场突然奋起反对当局的暴动,而更像一场长期的内战,如果不把这个词与真正的战争和厮杀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带有街垒战和类似战况的武装起义,在今日的西欧还能像从前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俄国的经验证明,街垒战能有效地使军心涣散的军队在瓦解时产生其本身的觉悟,从而使纪律完全涣散。

除了街垒战之外,财政困难也是以前的革命最重要的依据。它今日在俄国还起作用。但是在西欧,财政方面的形势与1789和1848年完全不同了。当时,资本主义还很弱小,资本的积累甚少,获得资本是罕见和困难的。同时,资本对专制制度的态度有一部分是敌对的,有一部分至少是不信任的。政府也毕竟不依赖资本,尤其不依赖工业资本,甚至有时(即使大多不是故意的)还大大阻碍资本的发展。但是,垂死的封建主义导致了一切物资财富的枯竭,于是政府能从全国榨取的金钱愈来愈少,愈来愈依靠借债度日。这必然导致财政崩溃或向新兴的阶级让步,而让步和财政崩溃的结果,必然引起政治崩溃。

今日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并不像封建主义那样导致生产不足,而是导致生产过剩,并将在其自己的脂膏中闷死。现有的资本也不是不足,而是过剩,只有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才没有过剩现象。因此,资本充斥于市,力求投资以图盈利,并且竟不怕风险。政府既要完全依赖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也有种种原因要保护和支政府。这时国债

的增加只有达到如下限度才能成为革命因素：它加重了税收的负担，从而激起了下层阶级的愤然反抗；但是它几乎不能（如上文所讲，俄国例外）使政府直接面临财政崩溃，甚至不能使政府哪怕只遭到财政上的严重困难。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施加压力和进行斗争的手段是有组织地拒绝干活，即罢工。它具有比财政困难或武装起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发达，资本愈集中，罢工的规模就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排挤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整个社会就愈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严重扰乱，都会变成民族灾难，从而酿成政治事变。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很容易产生利用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想法。它已经在法国和比利时，在意大利，尤其在俄国，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了，并且在这些国家应用得很成功。它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肯定会起重大的作用。

这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我的看法。在我论述 1891 年新党纲的文章里（《新时代》1890—1891 年卷，第 50 期，第 757 页），我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如果暴力事件极深刻地唤醒了工人群众，那么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

我的话当然不想表达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运动者所怀有的那类总罢工思想。他们是要用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议会活动；要使总罢工成为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手段。

这是无稽之谈。在这个意义上的总罢工——一国的全体工人得到某一信号之后统统停止工作——要以工人的团结一致和组织起来为其前提条件，这在今日的社会里是几乎办不到的；如果一旦真能达到这种地步，那就势必有了如此不可抗衡的力量，以致也就不需要总罢工了。这样的罢工将不仅一举而使现存的社会不可能存在，而且使现存社会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从而使无产者早在资本家之前就不可能存在；这就必定会使无产者在恰恰正要开始发挥其革命作用的时刻不得不陷于

崩溃。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罢工，几乎永远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肯定不会）采取一国的全体工人统统罢工的形式；罢工也不能负起代替无产阶级其他政治斗争手段的任务，而只能负起补充和加强它们的任务。我们正走向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在企业主组织的优势之下，孤立的非政治性罢工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正如在资本家控制的国家政权的压力下，工人政党孤立的议会活动是没有成功希望那样。因此越来越有必要把罢工和议会活动都推动起来，并使这二者互相配合而发挥新的力量。

使用政治罢工也同使用任何新武器一样，必须首先学习。它不仅不像无政府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是万应良药式的手段，而且也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信赖的手段。

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出我们今日还无法梦想的其他的斗争手段和方法。在对斗争方法和斗争组织的认识与社会斗争方向的认识之间，确实也有这样的区别：后者是在理论上可以事先研究出来的，而前者则从实践中创造出来、事后才由理论家加以观察并且探讨其对于今后局势发展的意义。工会、罢工、股份公司、托拉斯等等，都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还可能出现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斗争方法和组织。

战争也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和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战争曾常常证明是一种很革命的因素。历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形势：革命已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必要的了，但是革命阶级还太弱小，还不能推翻统治势力。有了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就等于新兴的阶级恰好在那时获得恰够的力量。可惜，世界上决没有这么合适的事情。倒是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已有绝对必要由一个新统治阶级来替换旧统治阶级的形势下，旧统治阶级却仍有办法来压制其新的对手。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太久，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沉沦没落和腐败瓦解。但是在这种形势下，战争常常会完成新兴阶级还无力完成的这一任务。

这时，战争只有在充分调动了全部人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民族发生深刻分歧，战争就会迫使统治阶级向新兴阶级让步，而统治阶级便不得不以国家民族为重，让新兴阶级获得其平时决不可能获得的巨大力量。

如果统治阶级不能作出这种牺牲，或者作得太迟，战争就很容易导致对外的失败，从而引起国内的崩溃。因为，只要军队失败了，以军队为主要支柱的政权也就完蛋了。

这样，在其他手段都失灵的某种情况下，战争便显然是导致进步的有效手段，哪怕它具有残忍粗暴和极大的毁灭性。

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便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诸国，并且由于三十年战争及其后果而被削弱得太厉害，以致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封建专制政体的。后来靠拿破仑战争以及其后俾斯麦时代的几次战争，德国资产阶级才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1848年法国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也主要是靠以前早就建立起来的反革命军队的几次战争来实现的。最近，日俄战争同样也十分有助于迫使俄国走上革命的道路。西欧的情况也绝不是保险能免于一次战争的，而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今日已处于一种类似 50 年代和 60 年代那样的对内和对外政治矛盾的时期。现在又到处安上大量的政治导火线了。悬而未决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和政党敢于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若不引起巨大的震动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他们由于领教过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便总是提防着这种震动，生怕任何较大的震动都有引发无产阶级巨大力量的危险。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国内政治生活的恶化，这种恶化在议会制度日益衰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与它伴随而来的，还有外交政策上的恶化。有人担心强有力的政策会引起国际冲突；这不是从道德上反对战争，而是由于害怕革命，害怕战争成为革命的先导。因此，我们的摄政王在治国艺术上，便把内政外交方面的一切问题长期搁置起来，让

未获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还有不少国家，如土耳其和奥地利，也是靠这种办法残存着的，这些国家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把那种较有实干精神的一代革命者置于死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理由，资产阶级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民族国家的兴趣已完全没有了。

但是这些危机温床并没有熄火，无论哪一天它们都能像马丹尼克岛^①上的贝莱火山那样重新燃烧起来，并点燃那种摧毁一切的战争之火。经济发展在统治阶级中唤起了要垄断市场、要征服海外属地的贪欲，并且用金融巨头的强暴观点代替了工业资本家的倾向于保持和平的观点，从而经济发展本身就创造了新的危机温床和危机原因、新的摩擦面和战争纠葛的新缘由。

今日，和平的唯一保证就在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惧怕。在冲突的原因不能增多的情况下，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还有待于看看再说。现在有一些完全由肆无忌惮和残酷凶暴的贵族地主和金融巨头集团统治着的国家。这些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正以最大的危险威胁着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估计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从而也估计到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这种动荡若不直接以无产阶级的奋起发难而告终，就至少毕竟能为这种奋起发难开辟道路。

但愿不会误解我。我这里是在探讨，我不是在预言，更不是在这里表示希望。我是在探讨什么事可能会发生，而不是宣称什么事必定会发生，尤其根本不是在要求什么事应该发生。如果我在这里把战争作为一种革命手段来讲，那么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有战争。战争的恐怖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以致今日也许只有军事狂热分子还执迷不悟地有勇气去冷酷无情地要求战争。但是，即使革命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代价，哪怕是最血腥的代价都不算太昂贵的话，也仍然不应该希望利用战争来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因为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缺乏理性的手段。敌国的入侵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破

① 西印度群岛中的小安的列群岛的第二大岛。——译者注

坏,会对受害国提出大量的苛求,从而导致受害国爆发革命;而革命遇到的是本不归它承担却强加给它的一些最沉重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把革命的全部手段和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于战争而引起的革命,有时会恰好发生在革命阶级正处于无能为力时刻,因为战争让革命阶级过早地负起了它当时还弱小得无力解决的那些任务。由于战争会造成人员的牺牲,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精神和道德上的衰退,战争本身也可能使革命阶级进一步遭到削弱。因此,革命政权在任务上加重了负担,而在力量上却被削弱了。因此,由战争引起的革命往往更容易失败,或者过早地丧失其动力,如果产生动力的基础不甚牢固的话。由一次人民起义而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靠一连串战争而输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其成果何等地完全不同啊!另外,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不是由1870—1871年战争过早地强加给巴黎无产阶级,而是在较迟的时机才发生的话,巴黎人就会获得足够的力量,可以不经战争而推翻路易·拿破仑及其匪帮,这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将有多么大的贡献啊!

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希望用战争来人为地加速我们的进展。

但是,一切事情不会总是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虽然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但是人类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事事都会顺应我们的希望而来到的话,我们中间谁不宁愿要和平的途径,而不要暴力的手段。我们的个人力量也许还不足以应付暴力,却让暴力把我们吞噬掉。但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表示虔诚的愿望并且要求世界顺应我们的愿望,而在于认识现有的任务、条件和手段,以便利用这些条件和手段来适当地解决这些任务。

研究实际情况,这是合理的政策的基础。正是研究了实际情况,我才获得了我在本书第一版里所讲过的这一信念:我们又在走向一个革命时期;这个信念已如我所料地被俄国革命的爆发证实了。

反对这种“革命浪漫思想”的,也仅仅只有一种常常有人提出的异

议,这就是:对于在西欧的我们来说,俄国的情况不会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据说西欧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当然不是不知道其间的区别,虽然我们也不能夸大其区别。俄国工人阶级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落后。正如英国工人必须改掉他们把德国无产阶级藐视为落后者的通病那样,我们在德国的人也必须纠正我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看成落后者的偏见。

但是,西欧与俄国的区别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很大。这里主要讲两点区别。第一,在俄国,革命作为推翻统治政权的斗争几乎是一切阶级的事,尤其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事。俄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不仅代表其本阶级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的群众利益。但这时,推翻俄国统治政权是无产阶级从贫困中谋求翻身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赖以坚持阵地的伟大武器,就是群众组织。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结社权和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这种组织就不能发展;但是,除了工会组织之外,无产阶级还迫切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以便能在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实现其阶级利益。而且,为此还必须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无产阶级需要这些权利,正如需要面包、需要空气那样。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迫切需要这些权利。因此,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对任何拒绝给它这些基本权利的政权进行决死斗争,也就是更需要反对专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革命化。

西欧无产阶级的处境就不同了。在西欧,资产阶级已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因而基本上已争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或者只对一些小事情心怀不满,而用不着为这些小事情发动革命;或者像某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那样,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遇到苦难,那么他们只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谋求改善,但也只限于在现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恢复昔日光景为限度和通过支持反动政党来实现。

面对着无产阶级,他们结成了一个愈来愈紧密的作战方阵。在这

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成为民族的广大群众时才能指望获得胜利。今日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事实。在德国,雇佣劳动者已占就业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在革命事业上可加以考虑的这些德国居民阶层,按所占比例来算也许同俄国的差不多,但作为有共同利益的统一阶级,则人数比俄国的多得多。这一区别并不足以说明德国的革命比俄国革命更困难。

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比俄国无产阶级轻些。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遭到的剥削愈来愈厉害了。如果说,德国工人的状况比俄国工人好得多,那么这是因为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得多,而且按国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说,德国工人的需要也多得多,因此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更痛心得多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枷锁。

但是,德国工人有一点比俄国工人强,那就是有较高度的政治自由,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依靠强大的组织而获得更大的力量。这是西欧工人比起俄国工人来最大的有利条件;西欧无产者的革命条件之所以与俄国无产者完全不同,其原因也就在此。

恩格斯早就认定,我们目前靠利用现有的合法基础就最能兴起;如果我们铲除这些合法基础,那么我们就是傻瓜。但正是从这一认识中,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愈强大,我们的敌人就愈觉得有必要采取暴力手段,使我们不可能走合法途径,因而他们就成了逼迫西欧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了。

但愿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民主形式的存在会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似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更乐于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超过他们。近年来,除了沙皇当局之外,恰恰是一些民主共和国,如瑞士、美国和法国,使用暴力对付罢工者的次数是最多的。在选举上弄虚作假以及在法庭和警察恐怖主义方面,美国现在已打破纪录;另一方面,企业主组织已愈来愈懂得要实际上废除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结社权,从而把无产阶级逼得走投无路。

当然,用法令来废除选举权和结社权,这在一个非民主国家里,譬如在德意志帝国里,就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容易,因而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更大。但这时,无产阶级无疑地会被迫进行生死决战,而这一决战可能仅仅以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开始,从而扩大成反对整个统治政权的斗争,即扩大成革命。

由此可见,政治自由在西欧的存在,并不排除发动革命的可能性,但是这场革命当然会具有与俄国革命不同的出发点。如果说,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一开始时就采取进攻性的革命行动(因为推翻现存制度是无产阶级任何成功的行动的先决条件),那么西欧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要保持和利用他们业已获得的那一点点政治自由;因此可以说,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首先是要保卫现有的权利。但是,胜利的行动是不能用单纯防御方式来完成的。敌人愈蹂躏现存的自由并且愈限制无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就会更快地被迫转入进攻,革命斗争的时刻就会更快地到来。

我们西欧无产阶级绝不能高枕无忧,满以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最大的困难业已过去,满以为现有的政治自由就向我们提供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保证。虽然想到这些是可喜的,但可惜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夺取政权——这个最重大和最艰巨的斗争还在我们的前面,只有在长期艰苦的搏斗中才能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我们必须在这场搏斗中,尽可能地动员出我们的全部力量。

最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莫过于劝告无产阶级立即解除武装,以便争取得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让步与和解。在目前形势下,这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只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任其摆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赖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意志衰退和蜕化变质,没有能力去担当它的伟大历史任务。

英国工人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样说并非夸张。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更发达的经济组织,更大的政治自由。可是没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英国无产阶级迄今在政治上更毫无权力了。

在最近以前，英国无产阶级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一切独立性，甚至已不再能维护其最切身的利益。

在这方面，也可以由上文已一再提到过的韦伯夫妇来提供证词，他们肯定不会是有革命思想嫌疑的消息来源。上面已提到过的那篇文章说：“在过去十年的繁荣时期内，英国工人对‘劳工政策’的兴趣逐渐减少了。工人们在思想上渐渐不再关心八小时工作日制，并且对 1890—1893 年间工会曾那样热情追求过的费边式的建设性社会主义也不再向往了。同时，下院的工人议员人数也并没有增加”。

甚至不久前挨到敌人的皮鞭，也未能使英国无产阶级振作起来。英国无产阶级对摧残工会的行为默不作声，对提高工人的面包价格也不发一言。只是到了最近，英国工人才激动起来，有了较强烈的要求改变这些现实主义政策的倾向。工会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以便对抗自由主义。

但在推行现实主义政策时，无产者随着政治力量的丧失，道德上和思想上同时也在日益退化。

我在上文曾讲到无产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再生，即无产者已从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变成了保持和发展我们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在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处于最尖锐对立状态的国家里，无产者才能如此奋发振作；在这种国家里，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能使无产者随时随地意识到，他们负有使整个社会随着无产者一起上升到更高阶段的使命。在这方面，英国却又一次向我们表明工人阶级已陷入什么境地；他们放弃了革命，只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嘻皮笑脸地抛弃了自己的理想，拒绝一切不能以英镑和先令来体现的斗争目标。连资产阶级都亲口抱怨英国工人上层分子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堕落。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亦步亦趋地效法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今日几乎已不是什么别的，而只是小小的资产阶级，只是在较为不斯文这一点上，才与其他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他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效法其主人，摹仿他们伪善的装腔作势的样子，羡慕他们能捞到财富，过着行尸走肉似的消闲生活。在他们看来，

自己阶级的解放显得是荒唐可笑梦想；反之，足球、拳击、赛马、赌博，却深深打动他们的心弦，占用了他们整个的空闲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

想要用道德说教来向英国工人灌输更高尚的人生观和奔赴崇高理想的观念，这是徒劳无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只能产生于革命的愿望；有了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就会更加坚强和高尚。正是革命的愿望才使无产阶级从最深沉的屈辱地位中惊人地振奋起来，而成为 19 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事件。

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革命的理想主义，才能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下都承受得了最沉重的担子，完成最崇高的事业，不辜负有待我们去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 任务的限度

在我论及这里探讨的对象本身之前，我必须首先澄清一下由于我的论文标题中有“革命后的日子”而使某人心目中产生出的严重的疑团。“革命后的日子”！这岂不证明，我们“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无非是变相的布朗基主义者而已么？布朗基主义者是指望有朝一日能以暴力行动夺取社会专政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考虑和设想这样的日子，而这样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来到，我们还毫无所知，这岂不是重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方法的覆辙吗？

的确，如果文章的题目果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有种种理由对那篇文章表示极大的不信任。因此，我要即刻说明：我认为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或多或少地要在艰苦斗争中延续达数十年之久；而我深信，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为未来的菜馆设想出一些烹调术。为此，只举一个例，说明我是不大赞成这种做法的。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5 年以前讨论新纲领时，有人建议纲领中应

要求采取一些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措施。当时我是属于反对把这种要求列入纲领的那一派的，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党不应当在情况还根本无法知道，而我们只能对它作一些模模糊糊的设想，并且还有可能遇到许多意外而与设想不合时，就为自己规定一条确定的途径。

但是我却认为，为了锻炼思考能力，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不妨允许我们尽可能事先估计我们努力的后果，并且事先研究一下我们夺取政权以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样做在宣传上也是颇有价值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敌人硬说我们将由于胜利而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也就能培养出一些人才，不至于对我们胜利的后果全然无知，把未来说得一团漆黑。据说，对我们来讲，胜利之日也就内在地孕育着失败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以及有多少道理，毕竟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想在这种思想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结果，并且不至于陷入争执不休，那么就必须要将出现的问题放在一个最简单的形式中来加以探讨，而事物的这种简单的形式实际上是绝不会现成成的，必须从一切复杂的情况中抽象出来才能找到。这是一种在科学上惯用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大概始终都意识到：实际上，事物并不是像在抽象的情况下那样简单和那样顺利地发展着的。我已经说过，社会革命是一个要经历许多年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想把它还原到其最简单的形式，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假定，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好的日子能一举而毫无限制地获得全部政权；同时，无产阶级在行使政权时能完全只从阶级利益出发，并且会十分适当地运用政权。前一种假定是肯定不会成立的，后一种假定也未必会成为始终如一的情况。对此，无产阶级本身还团结得不够，不足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所周知，无产阶级还分裂为不同的阶层，其发展历程不同，其传统不同，其思想上和经济上的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但是，其他与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接近的阶层，如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的某些部分，也很可能与无产阶级同时兴

起；他们的想法与无产阶级的想法不完全相同，从而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和错误主张，因此我们不会永远都称心如意，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也不可能永远坚持做那些在一定情况下对无产阶级持久解放最适当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不去考虑这些干扰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这种探讨时，必须从人所共知的前提条件出发，不能把将来可能出现的情景作为基础，否则就会使我们陷入异想天开或故弄玄虚的狂想。我们不可能在今日的情况下取得统治地位，这毕竟是不言而喻的。革命本身，必须以长期深入的斗争为前提；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才会改变我们今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将会出现一些我们今天还不可能认识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正在考虑的某些问题，也要到那时才能最终解决。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把我们今天不再怀疑的各种问题加以重新解决的新的办法。

正如物理学家在真空中而不在流动的空气中研究落体定律那样，我们在这里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的形势，也是把它置于本来绝不会十分单纯的前提下来考虑的，也就是在假定无产阶级明天一举而取得完全统治的同时，对它那时所能掌握的解决其任务的手段则只看到今天现有的。这样做，可能使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未来事态的实际进程之间的差别，有如落体定律与物体实际坠落之间的差别那样相去甚远。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偏差，落体定律还是实际存在着，而且适用于各种具体物体的坠落；人们只有首先懂得了这个定律，才能了解这种现象。

因此，我们只要遵循一个能保证我们运用正确方法的探讨途径，就能为胜利的无产阶级揭示出他们的前景和可能遇到的障碍；这样做，对于他们进行社会革命和取得革命成果，无疑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即使将来实际的情况与这里揭示的情况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而且毕竟只有遵循这一途径，人们才能对社会革命的前景作出符合科学的判断。谁要认为这一途径还太不可靠，不可能看出社会革命的征兆，那么他就只好在人们谈起社会革命时完全保持缄默，或者只消简单地说一句：“谁经历过，谁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这无可否认地永远是最稳妥的途径。

属于可供讨论之列的社会革命问题，只限于那些可以用这里提供的途径来加以认识的问题。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既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所能作出判断的。

2. 剥削者的被剥夺

现在让我们假定，有朝一日大好的日子来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天一举而取得了全部权力。那么，开始该做什么呢？当然不能根据这样那样的理论或情绪想要怎样开始，而要由它本阶级的利益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必须怎样开始。

首先，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是补做那些资产阶级忽略的事。它将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资产阶级一度主张过的民主纲领付诸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切阶级中地位最低的阶级，也是一切阶级中最民主的阶级。它将在一切机构中实行普选制，实现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使国家不依赖教会而独立，并将取消一切世袭特权。无产阶级将帮助各市镇地方实现完全自治，并用人民武装和裁军方式消除军国主义。人民武装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裁军则出于财政上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费用可能与常备军的费用相当，但它对巩固民主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以便从政府手里把对付人民的最重要的实力手段剥夺掉。裁军的宗旨首先是削减军事预算。裁军有时也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来实现，即只消用听任摆布的游民无产者的小军队来代替普遍兵役制的大军队就行；因为游民无产者是只要有钱拿就什么事都愿意干的。无产阶级政权则必须力求使人民武装同裁军配合起来，既要武装人民，又要不再继续重整军备，不再制造新的步枪大炮、装甲军舰和构筑要塞。为此要缔结国际协定，消除一切资产阶级竞争引起的国际冲突的根源。

不待说，获胜的无产阶级还要对税收制度实行彻底的改革。无产阶级要废除一切今日由劳动人民承担的税收，也就是首先废除那些使食物涨价的间接税。为此，要用累进所得税或累进财产税来使大收入

和大财产更多地担负国家的开支。我在下文还要回过头来论述这一点，因此这里提一提就够了。

但对我们来讲，教育事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无产阶级政党一向都关心国民教育事业。早在中世纪的旧公社教派里，国民教育事业就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从有产阶级手里把教育事业的垄断权夺过来，也必须永远是无产阶级思想界的一个愿望。新政权应当义不容辞地增设和改进学校，并给教员以优厚待遇。但还要走得更远些，多做一些。诚然，获胜的无产阶级即使在思想上如此激进，仍不能一下子就消灭阶级差别，因为阶级差别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的产生的，不能像用海绵刷在黑板上把粉笔字擦掉那样简简单单地就把阶级差别及其后果擦掉。但是，学校可以朝这个方向闯出新路，并对消灭阶级差别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比方说，让全体儿童都同样吃得好，穿得好；受同样的教育，在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上都获得同样的可能性。

不能过高估计学校教育的影响。实际生活比学校教育更强有力；凡是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之处，学校教育总是甘拜下风的。譬如说，如果我们试图在今天就用学校来消灭阶级差别，那么我们这样走不多远就会碰壁。但是，只要学校能在实际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它就能十分强有力地促进和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在使社会朝着消灭阶级差别的方向发展中，学校也是能起先锋作用的，至少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正在学校里成长着的一代人，去认识那些已经在整个社会里随着这一代人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

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激进派早已提出过而未能加以实现的目标，因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实际力量，并且丝毫不为资本着想，这是任何资产阶级也无法做到的。举例说，根据我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所作的计算，在德国要实行一种这里所设想的新学制，每年将需要 15 亿，甚至 20 亿的巨款。这几乎是目前军费预算的两倍！只有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才有能力为学校教育毫不迟疑地拿出这么庞大的巨款。

但是，革命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改革上。我们要进行的不是单纯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上面已经讲过,我们现在不想探讨无产阶级根据这种或那种理论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真不知道还可能出现一些什么理论,以及革命将在什么情况和影响下贯彻下去。我们只想探讨:获胜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情况的逼迫之下将被迫做些什么,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做得正确无误的话。

这里有一个凌驾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首先处理的。无产阶级,无论如何应当使失业者的苦难问题得到解决。对工人来说,失业是最邪恶的晦气事,因为失业使得工人贫困、屈辱和犯罪。工人是只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如果他们找不到劳动力的买主,他们就要挨饿。即使在他们有了工作时,失业也在威胁着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一天能保证不因失业而陷于贫困。无产阶级政权无论如何必须结束这种状况,即使无产者在思想上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自由派,就像在今天的英国那样。我们这里不去探讨怎样解决失业问题;对此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不少社会政策家提出过各式各样的建议。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中也有人试图对付失业的苦难,并且设计了失业保险制度,其中有一部分制度业已建立。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只能在这方面小手小脚地点缀一下,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像锯树人锯掉自己所坐的树枝那样,自己也从树上掉下来。只有无产阶级,只有获胜的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必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一切失业的苦难,无论是由于疾病或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业的。对失业者给予真正充分的支援,必然会完全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使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如果说工人今日要把自己出卖给企业主,如果说他们不得不要受企业主剥削和奴役,那是失业的幽灵和饥饿的皮鞭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反之,如果工人有了生存的保证,即使他们没有工作,他们要对资方将一军,就再容易不过了。这时,工人就不再需要资本家了,而资本家若没有工人就不能再办工厂。如果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每逢企业主与工人发生冲突时,企业主就会认输,被迫让步。资本家诚然还能继续担任工厂的领导人,但已不再是工厂的主

人和剥削者了。但是，资本家一旦认识到，他们的权利仅仅是承担风险和负起资本主义事业的重担，这些先生们就会成为首先放弃继续资本主义生产的人，并且力求有人来收买他们那些确已不再能从经营中盈利的企业。我们看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举个实例：在爱尔兰，当佃农运动达到高潮时，地主无法收取地租，于是主动要求国家收购一切土地。我们可以预料，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即使这个政权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出发，一开始就想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资本家仍会要求收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是彼此不相容的。谁承认前者存在的可能性，谁就必须承认后者消失的可能性。

这时可能出卖其企业的资本家们，会找到什么买主呢？有一部分工厂、矿山等等，可以卖给在其中干活的工人，以合作社的方式来继续经营。另一部分企业可以卖给消费合作社，其余的可以卖给地方或国家。显而易见，资方大多会去找最有支付能力和最殷实可靠的买主——国家和地方，因而大多数企业就会变成国家所有或地方所有。人所共知，社会民主党一旦执政，是会一开始就力求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的无产阶级^①也会主张一开始就把那些由于自然因素（譬如矿山）或组织方式（譬如托拉斯）的缘故而垄断化的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因为垄断企业今日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来说，而且对企业界以外的社会各阶级来说，都已经是无法容忍的了。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面前软弱无力，因而不敢去收拾垄断企业。无产阶级革命却必然要废除垄断事业的私有制。垄断企业今日已很强大，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了支配地位，而且正在迅速发展。其国有化和地方化本身就意味着由社会及其机构——国家和地方来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最适宜于国有化的，是全国性的交通工具（铁路）以及原料和生产

^① 指英国工党。——译者注

资料的生产(矿山、森林、冶金、机器制造等等)。这些部门是大企业和托拉斯组织高度发展的场所。供个人消费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以及零售贸易,主要带有地方性,而且还非常分散。在这些行业里,地方和合作社占据主要地位,国营企业则起次要作用。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发展,个人直接消费品的生产相对地将愈来愈退居到次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地位,从而国营生产的领域也会日益扩大。同时,由于交通和大企业的发展使一些行业相继排除地方市场的障碍而具有全国性,国营生产的领域便更加扩大了。举例说,煤气照明当然是一种地方事业。但是,由于山区电气照明和电力输送的发展,有必要实行水力的国有化。这就导致照明事业由地方事业变成了国营事业。又如,从前制鞋业是依赖地方市场的。但当制鞋工厂的产品不仅供应一个市镇,并且供应全国时,这类工厂就不宜于地方化,而宜于国有化。制糖厂、啤酒厂等等的情况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情况的发展会有这种趋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会愈来愈使国营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形式。

关于大企业(农业大企业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暂时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金融资本和土地所有制应该怎样处理呢?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它采取放债收取利息的形式。金融资本家并不在经济生活中履行任何个人职务,他们是多余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把他们一笔勾销,予以剥夺。人们尤其愿意采取这种步骤,因为恰恰就是资本家阶级中的这一多余部分,这些金融资本家,愈来愈夺得了对整个经济生活的统治权。他们往往也是私营大垄断企业、托拉斯等等的主人。要剥夺工业资本,而不把金融资本包括在内,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化(或直接称为向国家、地方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本身,就会伴随着发生大部分金融资本社会化的过程。例如,使一个工厂或一个农场国有化,它的债务也国有化了,即从私人债务变成了国债。如果它是股份公司,则股东就成了国家的债权人。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当对土地所有制加以探讨。我这里指的是地产,不是农业企业。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大企业,将自行经历一个与其他大企业相同的转变过程。它们将丧失雇佣劳动者,并被迫申请出卖其本身的地产给国家或地方,而完成其社会化。但小农的企业则仍将保持私有制。我将在下文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因此,这里讲的不是农业企业,而是不属于企业的私人地产。这种地产,无论是城市地产或农村地产,都是以典价、租金或抵押利息的形式让其所有者取得土地收益的。

上述对金融资本家的处置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地主。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也是不履行任何个人职务的,因此很容易被人撇在一边。对私人地产,正如对上面提到的私人垄断企业那样,甚至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今日也已经有了要求使其社会化的呼声。因为私人地产,尤其是城市中的私人地产,已成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和贻害无穷的了。在这方面要实现社会化,已经不需要别的什么,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就行了,而获胜的无产阶级将提供这种权力。

剥夺剥削阶级显然只是一个权力问题。它是出于无产阶级的经济需要而提出来的,也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然成果。

3. 没收还是赎买?

我们不能像回答关于剥夺剥削阶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那样,有把握地回答一个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剥夺是采用赎买还是没收方式来实现?对原来的所有主是否应给以补偿?这是一个今天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负有完成这一发展使命的人。现在也还不具备可以决定必须采取哪种答案的任何条件。尽管如此,仍有一系列理由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选择赎买的办法,选择向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办法。在各种理由中,我只想提及两个;在我看来,这两个理由是最主要的。上面已经讲过,金融资本已变成了失去个人权力的东西;今日可以把任何数额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而金钱的主人却

不用亲自执行其资本家的职能。我们知道，节省下一个马克的人，可以把这个马克拿去生利，而并不就成为资本家。人所共知，现存制度的乐观维护者充分利用了这种现象。他们得出结论说，剥夺资本家的最简途径，莫过于让一切工人把他们的全部积蓄都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这样他们就在资本中占去了一定份额。这些乐观论者有时还借口说，在当代我们要没收资本的话，就会不仅没收了富人的资本，而且没收了工人的资本，甚至把穷人、寡妇和孤儿的零星存款也没收了。据说，我们这样做就会在工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从而增加了一条煽动工人起来推翻工人自己的统治的理由；这些歌颂现存制度的先生们肯定在盼望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不需要进一步谈论前一种假定。它太荒唐可笑了。那些想用增加存款来剥夺资本的人，恰恰看不到大资本的迅速得多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普遍实行没收的话，无产阶级政权也会把普通百姓的存款都没收去，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工人决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不要自己的统治（谁要满意这种假定，谁就是存心抓住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反对社会革命）。不过，这确实是获胜的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不实行简单没收的理由所在。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可以问，无产阶级能从剥夺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它的后果只能是把一切资本都变成了货币资本，变成了国家、地方和合作社的债务；以前由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取得的剩余价值，现在则由国家、地方和合作社从工人身上取得再交给资本家。但是这样做，工人的景况会有所改变吗？

这个问题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无产阶级政权还把资本家原先所得的利润额给予资本家，然而在无产阶级统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剥夺毕竟能带来这样的好处：从今以后，剥削将不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加。任何新的投资和资本的增殖，都毫无可能了；同样，也不可能地租的增殖。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无产阶级变革的巨大成就。从今以后，社会财富的任何进一步增殖，都将造福于整个社会。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好处。一旦全部资本家的财产都采取了国家和地方公债或合作社证券的形式,那么立即就可以把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提高到以前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诚然,我们今日已有人要求用这种税则来代替其他一切税收,特别是代替间接税。但是,即使我们能获得实行这种税收的力量——譬如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这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愿意那样做),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人们都知道,税额愈高,瞒产漏税的企图就愈厉害。但是,即使有了防止任何隐瞒收入和财产的办法,仍不能把所得税和财产税任意提高。因为,如果税收额高到与收入额和财产额相差无几了,资本就会干脆向国外转移;国家就只好望洋兴叹而无办法对付。这时,国家就只空有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名,而没有实际收入和财产。因此,即使已拥有了权力,在实行税收时仍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如果资本家的全部财产都变了公债或证券的形式,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今天无法确切查明的资本家的财产,到那时就了如指掌了。那时,只需规定一切证券都必须注明持有人,就能精确地知道每笔大财产和每个资本家的收入,并且也能在提高税率时不至发生瞒产漏税的事。那时也不可能用资金外逃的办法来逃避税收,因为那时是由公共机构,首先是国家来支付利息的,国家可以在支付利息之前先把税额从利息中扣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提到多高,就可以提到多高。必要时,可以提到近乎或等于对大资产实行没收的高度。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大资产不直接没收而间接剥夺的办法有什么好处呢?先对资本按价赎买,然后又用税收立法来加以剥夺,这岂不只是为了避免剥夺得太露骨了而采取的虚饰手法吗?看来,它与直接没收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已。

不,区别不是那么微小的。直接没收一切资本就会不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包括小资本和大资本、无工作能力者和有工作能力者的资本。这种办法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企业里把大资产和与小资产一起投入的小额货币资本区别开来。直接没收,其势迅猛,往往是一举而

完成的；通过税收来实行剥夺则使废除资本家财产的过程拉长起来，以便与新制度的日益巩固及其良好影响的日益扩大过程相适应。这个剥夺过程可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以便造就新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不习惯与资本和利息打交道。这样一来剥夺就不再是严酷无情的事，而是可以适应得了和不至痛心的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愈和平，愈组织得好，愈宣传教育得好，我们就愈能指望采取稳健的而不是原始的剥夺形式。

我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得稍长一些，因为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借口之一，而不是因为我们执行起来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毋宁说，巨大的困难要在上述一切过程之后才开始发生。在社会革命的各种重大变革中，生产资料的剥夺比较起来是最简单的过程了。它只需要有必要的权力，而且在我们整个探讨中，它只是属于那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困难不在所有制方面，而在生产方面。

4. 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动经济上的攻势，因为后者是阻碍着它的发展的。但是，生产必须继续进行，不能停顿；哪怕只停顿几个星期，就会使整个社会毁灭。因此，获胜的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不顾一切干扰，确保生产继续进行，把那些离开工厂或其他劳动场所的工人召集回来，并使他们坚守劳动岗位，以便毫无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

新的政权有什么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呢？用饥饿来鞭策是肯定不行的，实行人身强制更行不通。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胜利以后将实施监狱式的统治，每个人都由其上级指派工作，那么他就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因为这时能自己制定法律的无产阶级，怀有比破口大骂未来国家具有监狱性质的那些奴颜婢膝的迂腐教授们强烈得多的自由感。

获胜的无产阶级决不会容忍监狱式或兵营式的制度。它有其他办

法来使工人继续进行劳动,因而不需要任何这种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习惯的巨大力量。资本已使现代工人习惯于成天劳动;如果没有工作,就根本受不了。甚至有的人已如此习惯于劳动,以至不干活就不知道怎样消磨闲暇,无事可干对他们来说是件苦恼的事情。他们中间长期无所事事而心情愉快的人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深信,如果能使劳动失去那种过度劳累的可厌性,如果能把劳动时间压缩到合理的程度,只消劳动习惯就足以使大量工人在工厂和矿山里经常坚持劳动。

但是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单靠这种动力,因为它是十分软弱的。一个更强大得多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纪律性。我们知道,只要无产阶级的工会宣布罢工,有组织的工人的纪律性就强大得足以使工人们自愿承担一切失业的危险和恐慌,情愿挨上几个月的饿,也要让共同的事业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认为,既然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离开工作岗位,那就也能用纪律的力量使工人留在工厂里。只要工会一经确认有坚持正常工作的必要,我深信,在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下是很少有个别工会会员擅离职守现象的。无产阶级今日作为斗争手段来扰乱生产的同一威力,到那时就成了确保社会劳动继续正常进行的有效手段。工会组织今日的发展程度愈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生产的可能性就愈大。

但是,无产阶级养成的纪律性决不是军事纪律性。它并不意味着盲目服从上级所树立的权威。它是民主的纪律,即自愿服从自己选出的领导,服从大多数同志的决议。要在工厂里执行民主的纪律,就必须首先建立民主的劳动组织,以民主的工厂代替今日专制的工厂。不消说,社会主义政权从一开始就力求以民主方式来组织生产。但是,即使获胜的无产阶级起初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确保生产继续进行的必要性也会促使他们这样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工会的纪律,才能使社会劳动纪律得到可靠的保证。

当然,这不能处处都以同样方式来实现,因为各厂都有其特点,必

须按照各自的特点来组织各厂的工人。譬如说,有些企业没有一套专职机构是不行的,铁路就是这样。那就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设立民主机构:工人选出代表,代表们组成一种类似议会的机构来制定劳动规章并监督专职机构的管理工作。另一些企业可以直接由工会来管理,还有一些企业可以用合作社方式来经营。因此,企业的民主机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不能指望一切企业的组织统统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家和地方的所有制,也有合作社的所有制。除此之外,某些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也可以让它继续存在;我们在下文将讲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又讲到了,企业的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

但是,民主的纪律和劳动的习惯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动力,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全体工人继续参加生产。我们不能指望在今日的社会里,工会组织和纪律能随时约束工人阶级的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能组织起来的大概还只是工人阶级的少数成员。因此,必须为劳动寻找其他动力。这里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可资利用的特殊动力,即劳动的吸引力。必须使现在成为一种负担的劳动,变成一种乐趣。这样,劳动就会成为一件愉快的事,工人就会乐于从事生产劳动。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无产阶级在开始其统治时,至少可以从立即缩短劳动时间着手。除此之外,还要尽量使劳动场所更清洁卫生一些,更讨人喜欢一些,把劳动过程中令人生厌的陈规陋习尽可能废除掉。这一切无非只是现今已在全部劳动保护法中争取到的某些改进的继续而已。要使这方面有更大的进展,就必须进行建筑上和技术设备上的更新,但这不是一两天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把工厂和矿山里的劳动很快就变成非常吸引人的劳动,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除了劳动的吸引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必须发挥力量的力量,这就是劳动工资的吸引力。

我这里谈到劳动工资。有人会问,在新社会里还会有劳动工资吗?

我们不是要废除工资劳动和货币吗？那么怎么还提到劳动工资呢？如果社会革命果真要立即废除货币的话，这些反对意见也许就是中肯的了。然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货币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它能在一个像现代生产过程那样复杂，而且还有千差万别的劳动分工的社会机体中，促成产品的周转并把它们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它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按其爱好（当然要在各自的经济力量限度内）满足其需要的手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仍将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当然，货币将丧失其某些功能，特别是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至少在国内交换方面。在这里略提一下价值问题可能不是不相宜的，因为它对弄清我以后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

再也没有比如下的见解更谬误的了：仿佛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力求使交换都是等价的。应当说，价值规律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所特有的规律。

商品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分工发达的情况下，各不相属的生产者都各为别人而进行生产。但是，任何生产方式，如果在生产上没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所拥有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要满足生产的需要并使生产继续下去，就得使每个生产部门拥有适应其现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是有计划地进行调节的，劳动力是按照一定的计划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调节却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的。每种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费用，而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利润而发生的改变，因为它只会使争论陷入不必要的复杂化，而不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获得新的认识。每个劳动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各该社会里已达到的技术水平，以及在该生产部门中通常的劳动强度等等，简言之，即各个工人的平均生产力；其次是社会需要向有关生产部门所要求的产品数量；最后是社会所能使用的劳动力总数。由于自由竞争，每一产品的价格，也即用以交换

这个产品所付出的货币量，便不断接近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于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虽然没有某一个中央机构在加以调节，每个劳动部门里生产的扩大永远也不至太远和太久地离开其现有的水平。在商品生产中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下，如果没有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就会很快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而告终。

举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不妨举个尽量简单的例子。为说明社会生产的结果，我们只需举任何两种商品为例，我看就举裤子和吊裤带为例吧。

我们假定，在某一社会里，在随便某一期间内，裤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1 万个劳动日，吊裤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1000 个劳动日。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社会对裤子和吊裤带的需要，就现有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来说，这些劳动日是必要的。如果每一劳动日的产品值 10 马克，那么裤子的价值是 10 万马克，吊裤带的价值是 1 万马克。

如果某一个工人在生产中偏离了社会的定额，他在一个劳动日内生产了大约只有其他工人产量的一半，那么他一个劳动日产品的价格也只有其他工人一个劳动日产品价格的一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劳动的比例失调，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譬如说，从事吊裤带生产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必要的劳动力，其超过部分必然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的；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就相应减少了，因为社会所能获得的劳动力人数是有限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都是从缝衣业吸引来的。于是，用于缝制裤子的实际劳动日只是 8000，而不是 1 万，生产吊裤带的实际劳动日却是 3000，而不是 1000；以至吊裤带充斥市场，而人们却没有足够的裤子穿。这样，结果会怎样呢？吊裤带的价格下跌，裤子的价格上涨。生产吊裤带所用的 3000 个实际劳动日，只代表 1000 个社会必要劳动日的价值，每副吊裤带的价值就下跌到其原有价值值的 $1/3$ 。同时，价格也将下跌，大约还低于 $1/3$ 。但是，裤子的价值还照旧是由 1 万个社会必要劳动日决定的，不是由实际所用的 8000 个劳动日决定的，每条裤子的价值将是其原有价值值的 $5/4$ 。结果，吊裤带的生产就无

利可图,从事该业的劳动力就会减少,而重新流入现已盈利非常多的裤子生产中。

这样,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就调节着生产。它虽不是可设想的调节生产的最好办法,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下,它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下,对生产的社会调节将取代价值规律。这时,靠等价交换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了,从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对象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可以用某一种货币标志来代替金属货币。这时,可以不依赖价值而确定产品本身的价格。但是,隐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对于衡量产品价值来说,将永远保持其决定意义,而且很可能与历来的价格相联系。

既然劳动赋予了产品以价值和价格,那么劳动也必须用货币来偿付,因而就出现了工资。

尽管如此,谁要是也像费边派那样主张保留现存的工资制度,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费边派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废除工资制度,而是要使工资制度普遍化。这种说法仅仅在表面上看来是对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工资是与资本主义政权下的工资完全不同的。在今日,工资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工资是由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来决定的;工资的上下波动,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反之,在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情况不再存在了。工人不再被迫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它的价格不再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来决定的,而且也不再依赖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了。这时,最终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将是可供工人阶级进行分配的现有产品数量的多寡。产品愈多,工资的一般水平就愈高。当然,在各个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仍将继续起一定的作用。因为毕竟不能像分配兵力那样,不征求工人本人同意就分配给各个企业。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想到某些工业部门去的工人太多,而其他一些企业则缺乏工人。这时就可以用下述办法来加以平衡,即把前一种企业的工资降低,而把后一种企业的工资提高,直到各部门、各企业都有适当的工人数目为

止。至于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工资水平，则不再由劳动力供求关系来决定，而由现有的产品数量来决定。这样，就不再发生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工资普遍下降的现象了。相反地，生产得愈多，工资一般地就愈高。

于是又产生了如下的问题：要确保生产继续发展，就有必要用普遍提高工资的办法来使工人留在生产岗位上。但是，增加的工资用什么来支付，必要的产品数量又从哪里得来呢？

如果采取我们没有采纳的对新政权最方便的办法，即把全部财产统统加以没收，把资本家的全部收入都分发给工人，那当然会一下子就把工资提得很高。我在写前面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那一章时，引用过一个统计。根据这一统计，1891年英国工人的收入总额约为7亿英镑，资本家的收入总额约为8亿英镑。我还进一步说明，在我看来，这个统计被粉饰得太乐观了。我有理由相信，它把工资算得太高，而把资本家的收入算得太低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妨就用1891年的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如果把资本家的收入交给工人，则每人的工资都能加倍。但可惜，事情不能就这么简单对待。我们在剥夺资本的同时，也必须连带地把资本家的社会职能也接受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并不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统统消费掉，而要拨出一部分投回工厂，以扩大生产。无产阶级政权既要扩大生产，也必须这样做。因此，就凭这一理由，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对资本采取激进的剥夺办法，也不能把资本家原先的全部收入统统交给工人。何况资本家还必须从他们所搜刮的剩余价值中，提取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交给国家。只要国家和地方当局靠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作为唯一税收的话，资本家要付出的这一部分就会很快增加。而事实上，税收的负担是不会减轻的。因为，我在上面已指出过，单单重新安排学制一项就需要支出多么大的经费。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开支浩繁的医疗保证制度，以及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给予残疾和老年退休金等等。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索性剥夺了资本，从资本家现在的收入中也不

可能剩下太多的钱来提高工资。如果我们还要给资本家一定的补偿，那就剩得更少了。因此，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就必须扩大生产，使其超过原有的规模。

社会革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单要继续进行生产，而且还要提高生产。获胜的无产阶级必须尽快提高生产，才能符合对新政权提出的要求。

5. 提高生产

要迅速提高生产，有各式各样的办法；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办法今日已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的托拉斯成功地应用了这两种办法，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便用来解决社会革命的方法问题。他们向我们指明了怎样把全部生产都集中在最完善的企业里，而让其他经营得较差的企业统统停产，就能一下子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几年前糖业托拉斯只利用了它所拥有的全部企业的 1/4，而达到的产量却相当于其全部企业原产量的总和。威士忌酒托拉斯也将其 80 个大酒厂停闭 68 个，只继续经营的 12 个酒厂的产量不久就超过了以前 80 个酒厂的产量。无产阶级政权不妨也这样做，而且做起来更容易，因为它不会因此遭到私有制的阻碍。在企业属于私有财产的国家里，要淘汰其中经营不善的企业，只能通过自由竞争慢慢进行。即使是托拉斯，也只能取代那些亏损企业的私人所有权，把它们都合并到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既然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掉，它就应当把托拉斯只能在较小的生产领域内实行的方法，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整个领域去。但是，无产阶级在运用淘汰次等企业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时，与今日托拉斯所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还不仅仅在于应用范围上的不同；它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和用于其他目的。新政权实行这种改变，首先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托拉斯的做法是不顾工人的。它把闲置企业里的工人干脆解雇，至多也只利用他们来威胁那些就业的工人，压低他们的工资，使他们更服服帖帖。获胜的工人阶级当然不能这样做。它将把闲置企业

里的工人调到正在继续经营的其他企业里去。托拉斯宁可使工人投闲置散,因为它们并没有大规模扩大生产的打算。产品增加得愈多,产品的供应量就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就会愈低。而托拉斯总是竭力阻止价格下降的。因此,它们宁可限制生产,而不扩大生产。托拉斯只让最佳工厂生产,仅仅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价格不变甚至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利润,而决不是为了扩大生产。反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为了扩大生产,因为它所要的不是提高利润,而是提高工资。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将尽量增加最佳工厂里的工人数目,以使用多班轮换制来提高生产。我想举一个例来说明其可能性和它对生产会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个例子里的数字当然是随便设想的,并不见得符合实际情况,但决不是毫无根据,而是个别企业已经办到了的。譬如我们以德国纺织工业为例。它目前拥有约 100 万工人(1907 年是 1088280 人),其中大半(1907 年是 597412 人)是在百人以上的工厂里干活的。现在我们首先假定,较大的、业务较广的工厂一般都是技术较完善的工厂。当然,不会普遍都是这样;一个 20 人的工厂也可能在技术设备上比同行业的一个 80 人的工厂好得多。但是一般说来,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在这里就不妨这样假定吧,因为这只是一个用以说明问题的例子,不是一个要求明天就要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建议。我们假定,100 人以下的工厂是最不完善的工厂。这些工厂都关闭了,把工人都调到 100 人以上的工厂里去干活。这时,就可以把他们分成两班轮换劳动。如果目前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十小时,那么轮换后每班的工作时间大约可减少到八小时。这样一来,这个企业的生产时间便多了六小时,其机器的利用时间就更长得多,虽然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已减少了两小时。我们可以假定,每个工人的产量并不相应减少,因为已有许多实例说明,缩短劳动时间的优点一般至少能弥补其缺点。现在我再假定,目前在较次的工厂里,每个工人每年生产价值 2000 马克的产品,而大厂里工人的生产率比小厂高出 100% (辛茨海莫所作的同类估计与此相近),那么大厂里每个工人的产值便为 4000 马克。这样,目前有 50 万

纺织工人在小厂里干活,其产值为 10 亿马克,另有 50 万纺织工人在大厂里,其产值为 20 亿马克。结果,这 100 万工人共生产价值 30 亿马克的产品。

但是如果在新政权下,工人都是集中在 100 人以上的大厂里的,因而都能生产 4000 马克的价值,则 100 万纺织工人所生产的价值达 40 亿马克,比以前多出 10 亿马克。为了比较起见,我假定这里还照旧生产着价值。

但是,还可以更进一步,不仅使 100 人以下的小厂停产,还使 100 人至 200 人的中厂停产,而把全部纺织业生产都集中到 200 人以上的大厂里去。这种大厂的工人数目在 1907 年是 368612 人,即大约为纺织工人总数的 1/3。这样,就必须分成三班轮换劳动,才能使大厂里的全体工人都有活干。我们假定,为了避免上夜班,每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到五小时,也即目前的一半。这时,一个工人在大厂里也许比在小厂里多生产到四倍,也即按照我们以上所作的随便的假定,每年约生产 8000 马克。这是按照减少劳动时间并不同样减少其产量的原理来计算的,因为休息较充分的工人比过度劳累的工人的工作效率高。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工人在八小时里生产的产品同他们目前在十小时里生产的一样多。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劳动时间从八小时减到五小时后,工人产品即使减少也不会高于 25%,肯定要低于 37%,这样假定就不会是过分乐观的了;那么,每个工人这时至少每年仍能生产 5000 马克,也许 6000 马克,全体工人合计则生产 50 亿至 60 亿马克。由此可见,比起目前的产量来,总产量加倍,工资也能相应地加倍(还根本不谈剥夺资本的话哩),这还是在同时把劳动时间减少一半的情况下做到的。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有时甚至比这里所提供的数字多些。我们不妨假定,在我估计的目前纺织业 30 亿马克全年产量中,有 10 亿用于支付工资,10 亿用来添购原料、机器等等,10 亿作为资本的利润。而在新政权下,它将生产 60 亿马克,其中 20 亿用于原料、机器等等,10 亿用于资本家被剥夺后的补偿和充作迄今所实行的社会事

业的经费。这时,还剩下 30 亿马克可用于支付工资。这样,工资就能提高到三倍。而且这是不用添置任何新设备、新机器,只消停止小厂生产而把小厂工人调到大厂去就能办到的。因此,我们只需把托拉斯小规模地向我们示范的做法,大规模地去实施就行。阻碍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只不过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罢了。

然而,这种办法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批评我们的人喜欢向我们提出异议说:似乎长远看来是不可能实行生产国有化的,因为目前的工厂数目实在太多了,要等竞争把小企业都淘汰掉,才有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但这毕竟还要历时很久。在德意志帝国内,全部工业企业的总数竟有 200 万左右;单单纺织企业就有 13.6 万个(1895 年还超过 20 万),国家怎么经营得了这么多的企业呢?

当然,这项任务看来是大得可怕的,但是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托拉斯的方法,虽然把企业统统收归国有,但只经营较完善的大企业,则这项任务就减轻了许多。在 13.6 万个纺织企业中,百人以上的企业只有 2297 个。显而易见,把纺织工业集中在这 2000 多个企业里,就大大减轻了社会调节生产的任务。我们假定新政权进一步把 200 人以下的企业统统关闭,则更简单得多;这时,在 13.6 万个企业中,只剩下 1000 个了。管理和监督这么一个数量的企业,决不会是无法办到的事。

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队伍中的悲观论者在衡量我们的现社会是否具备了实行社会生产的成熟条件时,总是拿我们社会随身拖着而无法迅即摆脱的旧包袱的数量来作借口的。他们得意洋洋地一再向我提起目前还存在的大量小企业。但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并不取决于现存小企业的数目,而取决于已有大企业的数目。没有发达的大企业,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反之,在大企业大规模存在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容易集中生产,并且迅速摆脱小企业。这群诅咒社会主义的乌鸦很会用它们那不祥的聒噪宣告未来的不幸。他们固执地宣称,德意志帝国的小企业总

数从1882年的2882768个增加到1907年的3124198个。但是,这种增加完全限于商业;工业部门的小企业则在减少:从1882年的2175857个减少到1907年的1870261个。在这个期间内,拥有50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总数则从9974个增加到32007个;即增加到三倍以上。这一增加说明,已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小企业的绝对数没有同时减少,那只能说明,无产阶级需要甩掉的旧包袱数量还很大。在这方面,托拉斯可以给我们做不少准备工作。

在其他方面,托拉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今日的托拉斯不仅靠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且采取多种手段厉行节约来增加其利润。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更高度实行节约,包括合理使用机器、利用副产品和减少运输费用等等。还是举纺织业为例:把原料和副产物运给13.6万个企业,与运给1000个企业,其所需的费用是大不相同的。企业的管理费也如此。在这13.6万个企业中,最小的企业当然不需要特别的监督,可以把管理人员裁减到五人以下,让厂长也参加干活。除了这些最小的企业外,还有1.4万个中等企业。这些企业所需要的管理人员,肯定比那1000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多得多。但是,托拉斯可以取消企业之间招徕顾客的竞争,因此还能节省出其他许多开支。自从托拉斯在美国出现以来,企业所雇用的外出推销员的数目减少了;最明显的是J.W.詹克斯在一篇论文中所引用的事例:有一个托拉斯一成立就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至在它所属企业中雇用的非熟练工人数目增加了51%,熟练工人的数目只增加了14%,而在同一时期内,推销员人数则减少了75%。詹克斯还介绍说:根据某些托拉斯自己发表的数字,它们花在广告和招贴上的费用节省了40%到80%以上。

只要工业部门增加工资,就会最终地把目前在居间贸易中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劳动力调动出来。这些人正在他们的小店铺里过着仅够温饱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非守住店铺不可,而是因为这些店铺老板没有信心另谋生路,或者觉得所挣的钱不够养家糊口,还得找一个副业。

当工业中把工资提到够高的水平并且有足够大的对劳动力的需求

时,从目前全德意志帝国在贸易、交通(除邮政和铁路外)和饮食业中就业的 300 多万人中,也许就能调动出 200 万人来,使他们脱离寄生状态而参加生产活动。

因此,提高工人阶级生产能力的两个方法是:取消寄生性的就业以及把企业集中到最完善的企业中去。采取了这两个办法,无产阶级政权就能立即把生产提高到足以大幅度增加工资并同时缩短劳动时间的一个高水平。每一次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都必然会增加劳动的吸引力,从而调动那些原先在服务行业中受雇佣和从事小店主等寄生活动的人参加生产。工资愈高,劳动者就愈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把这种说法改为:劳动者愈多,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就愈少,产品也就愈丰富,工资也就愈高。这个规律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是不能成立的。在那里,提供的工人愈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就下降得愈厉害。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工资规律。

6. 再生产过程的组织

即使把以上所论述的托拉斯的两个方法应用于生产,也还没有充分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在增加生产方面可资利用的手段。生产过程要不断更替下去,要进行再生产,就需要不受干扰地不仅继续进行生产,还要继续进行周转。要不间断地继续进行生产,就不仅需要制造产品的工人,还有必须使原料、材料(煤)、必备的工具和机器、工人的食品等等的供应不致中断,使制成品也能找到销路。

周转的停顿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周转发生停顿,有时是由于同一种商品生产得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出产这种商品的工厂可以因为产品销路不好而不完全继续开工。它因为销路不好而没有钱,结果就缺乏资金去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等。但是,也可能由于某些商品生产太少而发生危机,譬如英国棉织业就曾发生过由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棉花大幅度减产而带来的危机。

危机是对现代化生产方式最严厉的批评。无产阶级政权最重要的

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危机。但是,这只有通过生产和周转,以及再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做到。

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但是,这一任务有一部分已由资本加以解决了,其方法是用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大企业的生产来代替许许多多独立的小企业。托拉斯甚至能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但是有一个唯独无产阶级政权才能解决的任务,即有计划地调节产品的周转,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在这里,消费者这个概念是指最广义的而言。它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也包括生产性消费。譬如说,纺织工人在生产性消费中消费棉纱,而他所吃的面包,则属于个人消费。

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企业的私有制,才能实现其对产品周转的调节。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它,而且必须实现它,才能领导生产过程,才能使其政权存在下去。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根据对现有生产力(工人和生产资料)和现有需要的计算,来确定每个社会生产场所的生产量;它必须设法使每个劳动场所不仅获得必要的工人,而且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并把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而这种任务在现代大国里不是很难完成吗?譬如,有人设想:在德国,国家必须成为200万生产场所的生产领导者及其产品周转的调节者,这些产品有一部分是作为生产资料彼此供应的,有一部分是作为消费资料销售给消费者的,而在消费者中,每人都有其时时改变的特殊需要。这项任务显然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否则就得按照一个简单公式自上而下地调节人们的需要;像过兵营生活那样,让每个人只分得其最低的份额,从而把现代化的文明生活降到何等低下的水平!难道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兵营式的或监狱式的国家吗?

确实,这项任务是不简单的。它是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会给它带来许多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但是也不能夸大困难。

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所谈的并不是非得在一夜之间凭空建立起一套调节生产和周转的全新的体系不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系已经

有了,否则今日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迄今人们一直不自觉地、在倾轧、破产和危机的痛苦经历中靠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复实践出来的无意识的体系变成有意识的体系;在这新体系中,将用预先测算各种主要因素的办法来改变那种由供求关系事后调整的局面。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既已有了虽不太完善和不太稳定的比例关系,就不必从头做起,只须使其完善和稳定就行。正如对待货币和价格那样,在这方面也应该承袭历史上的传统作法,不宜一切推倒重来,而仅仅在某些方面加以扩大,在另一些方面加以限制,使原来松弛的关系更趋紧密即可。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把生产集中于最完善的企业就能使企业的数目大大减少,因而在改变体制时,问题就简单多了。德意志帝国在1907年所有的2086368个企业中,只有13250个是有1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其拥有的工人总数在1100万产业工人总数中占400万人。我当然并不断言,将来只有这些大企业才开工。就未来的情况提出确切的数字,这样做是可笑的。援引以上的数字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不足以确切描述未来事物的实际情况。这里只是用200万个工业企业与1.3万个大企业这个比例来表明,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企业的数目将大大减少。

除了减少企业的数目外,还有其他办法来减轻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的困难。

生产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为消费而生产以及为生产而生产。由于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资料的生产在今日已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并且不断迅速增长。至于消费资料,则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全从一个生产者手里制造出来的,而要经过许多生产场所的手。因此,使消费品能使用的人,只是生产者长队中的最后一个。但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生产各有其完全不同的性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大规模企业(如钢铁业、采矿业等等)活动的领域。这些企业今日已在卡特尔、托拉斯等企业主联合组织中高度组织起来。同时,在生产资料的购买者中

间,也普遍发展起了企业主联合组织。今日在这些行业里,已不是一个企业与一个企业打交道,而主要是企业主联合组织与企业主联合组织、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打交道的了。在企业主联合组织不大发达的那些地方,生产资料的生产者总是较少的,与它有关联的消费者也少。因为在这方面,消费者并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企业。例如,在纺织机器制造业中,1907年有1177个企业,共有31072名工人,但其中却有702个企业总共只有1364名工人,因此几乎用不着加以考虑。100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57个,共有工人18742名。它们的买主是13.6万个纺织企业(不单是纺厂和织厂)。但在建立社会主义企业时,纺织企业的数目可能减少到几千个,甚至几百个。因此,在实现了集中生产于最完善企业之后,生产者一方还剩下50个机器制造厂,消费者一方还剩下2000个纺织厂。于是,双方就供应机器达成协议,以便有计划地调节机器的生产,这难道不可能做到吗?

由此可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较少的情况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来说,这时为公开市场的生产就会减少,为定货而生产,也即有计划有调节的生产和周转就会增加。

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也有大企业(制糖厂、酿酒厂),但还是以小企业为主。这是因为这类企业,主要应该适应顾客的个人需要,而小企业比大企业容易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企业的数目是很大的,而且也不能像对待生产资料的生产那样使它减少。它们主要是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的。在消费者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要对公开市场作通盘估计,就比为生产而生产时难得多。在这个领域内,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数目较少,因此比起生产资料来,消费资料在生产和周转的组织工作上,就存在着更大的困难。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区分两个门类: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波动比较小,因而比较稳定。比如,人们每天只需要同样数量的面粉、面包、肉类、蔬菜;对皮靴和换洗衣着的需求量每年也变化不大。反之,消费资料愈具有非必需的奢侈品的性

质,其需求量的变动就愈大。这是因为人们虽然乐于占有奢侈品,但没有它们也过得去。因此,其消费量就更加变幻莫测,得视情绪而定。但是,只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情绪变化与其说来自买主个人,还不如说来自工业界。比如,大家都知道,时装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公众审美观的改变,不如说是由于生产者要使已出售的旧商品显得不适于继续使用,从而促使消费者另买新商品。因此,时髦的新商品必须与旧商品有显著的区别。这里除了现代生产方式本质上就具有的不可停滞性外,生产者的竞争欲也是时装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他们总是先生产出新时装,再把它强加于公众。

但是消费资料,尤其是奢侈品,在销售量上的波动,与其归因于消费者趣味的变化,还不如归因于消费者收入的变化。收入的变化只要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社会上较普遍的情况,就能明显地影响社会的消费。它的变化幅度是随着繁荣与危机的消长而波动的,是根据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即失业人数的增减而起落的。只要我们调查一下产生波动的源泉,便会发现它总是先出现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现今特别容易出现危机的是钢铁工业,这是众所周知而且普遍公认的了。

由此可见,繁荣与危机的消长及其引起的消费资料供求关系的重大波动,都是发生在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的。我们又看到,这一领域的企业集中和生产组织今日已发展到最能将其生产和周转完全组织起来的程度。生产资料生产的稳定也会促成消费资料需求的稳定,因而可以不经调节消费,就能很容易地用统计方式确定消费资料的需求。

但是,在生产所引起的周转失调中,只有一种情况可能最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那就是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过剩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今日最大的困难是出卖,即销售产品。反之,购买,即取得产品,通常不大令人忧虑,至少对于那些在口袋里有所需零钱的幸运儿是如此。可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下,上述情况就倒转过来了。这时用不着担心产品的销售。因为它不是某个私人为了

卖给另一个私人而生产的，而是社会为其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只有当某些产品（不管它是供生产上消费的或个人消费的）生产得不够，不敷所需时才会发生危机。反之，如果在某处或处处都生产得太多，虽然意味着劳动力的浪费，会使社会蒙受损失，但这并不妨碍生产和消费的继续。新政权主要关心的事必须是：使任何生产部门都不会生产得太少。这时，新政权当然要力求不在不必要的生产上浪费劳动力，因为任何这种浪费都意味着从其他各部门抽取了劳动力和不必要的延长劳动时间。

7.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在工业或居间贸易中，无产阶级政权都应当迅速结束那些以小规模经营为特征的落后的小企业部门。

上面刚才谈到的那些在组织周转方面的办法，也将导致尽快排除小的居间贸易。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消费合作社来代替，一部分用市政设施来排挤。如果生产过程的主管机构不是同无数的购买者打交道，而只同少数几个组织打交道，那么它对生产过程的通盘了解和组织领导就必定容易得多。

除了居间商业之外，供地方需要的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例如面包房、牛奶场、蔬菜生产、住宅建筑等，也将交给消费合作社和地方去进行。

但是不能指望，一切私营小企业就会因此全部消失。农业上尤其不会如此。诚然，今日已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农业企业将不实行雇工制度，而变成国营的、地方的或合作社的企业。此外，许多今日的小农也将不再存在，而到工业的或农业的大企业里去当工人；这些企业将保证他们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可以假定，还有这样的农民继续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继续经营他们的小企业，或者至多还有一名也可算作家人的长工或侍女。在我们的农民有目前这种保守性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照目前的方式继续经营下去，这是十分可能

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根本没有要接管这种小企业的意图。还没有哪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曾主张对这种农民予以剥夺，或者甚至没收他们的农庄。倒有很大可能是许可这些农民都仍然照他们迄今的做法继续经营下去。对于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政权是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种农民经济甚至很可能由于新政权的存在而得到加强，因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如下好处：取缔军国主义，减轻税收，实行自治，学校公办和把道路捐收归国有，取消贫民救济捐而由国家救济，也许还有降低抵押贷款的利率等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获胜的无产阶级有种种理由要求增加产品的数量，并认定农产品是需求量首先会增加的产品。尽管有人对贫困化增长的理论进行种种反驳，但今日还是有许多挨饿的人有待给以饭吃；单单这一事实就使我们我们有理由假定，由于工资的提高，将首先出现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应十分关心提高农民的生产，并为此目的而大力帮助农民。无产阶级政权为着最切身的利益，必须用牲畜、机器、肥料、改良土壤等办法，把农民的落后经营大大提高。它必须用这种方式来促进农产品的增长，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成为合作社企业的农民企业也应如此。

但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像在其他方面那样，简化周转过程，即建立少数几个为经济目的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以代替许许多多彼此交换其产品的私人。国家也应当更多地向农民村镇和合作社，而不向个体农民供应牲畜、机器、肥料。向这些村镇和合作社收购产品的也不再是私营的居间商业，而应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及地方和国营的企业（面粉厂、糖厂、酿酒厂等）。于是在这方面，私营企业将逐渐退居到次于社会企业的地位；社会企业最终将改变农民企业本身，促使由几个农民企业组成的合作社组合或村镇组合变成社会性的大企业。农民将把他们的土地合并起来共同经营，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不再属于私人的合作社大企业经营方式是何等优越时更会如此。因为事实说明，这种方式能在支出同样劳力的情况下生产出比小企业多得多的产品，能在

产品数量相同的情况下保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农业小企业今日之所以还能维持其存在，在颇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对其雇工的榨取比大企业还厉害。同时，农民干的活无疑比大地主的雇工所干的多得多。农民几乎从来没有空闲时间，甚至在他们片刻的空闲时间内，他们也要思索怎样改进他们的经营。对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的企业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难于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老的一代。年轻一代就感受不同了。他们强烈地渴望娱乐消遣，渴望轻松愉快，同时也渴望获得更高的文化。在农村里无法满足这种愿望，他们就流入城市，使乡村人口减少。但是如果农民看到，他们依然从事农业也能获得空闲和文化，他们就不再摆脱农业，而仅仅从小企业过渡到大企业。私有制的最后一个堡垒就会这样消失。

获胜的无产阶级是根本不考虑用暴力来促进这种发展的，其充分的理由就是它不想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因此，它决不能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农民而自食其恶果。无论我们估计无产阶级有多么高的斗志和大无畏精神，它也不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这些自身就遭受过剥削的小老百姓，而应当指向大剥削者！

谈了农业之后，这里再来探讨一下工业中的小企业。它们也不宜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完全加以消灭。诚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凡有经营不善的企业同较完善的企业进行竞争的部门内，新政权都力求使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停办，并把它们的工人集中到经营良好的大企业里去；而且只要使工人在大企业里得到较优厚的工资，就能很容易地办到而不必使用暴力。但是总还有这样的工业部门，在那里机器敌不过手工，或者说机器干不了手工干的活。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我在查阅德意志帝国工商业统计时，却找不到任何一个还完全以小企业为主的行业。据我所知，在下列工业部门里（见下表），1895年还几乎完全以小企业为主（占企业总数的97%以上），还根本没有超过50名工人的大企

业。但是,在这些行业里,大企业也已取得了进展。

	企业数目				超过50名工人的企业数目	
	有1—5名工人者		有6—50名工人者		1895	1907
	1895	1907	1895	1907		
磨刀石制造业	77	27	2	8	—	—
小提琴制造业	1037	1257	24	21	—	1
解剖器材制造业	126	247	3	17	—	—
橡胶玩具制造业	4	2	—	—	—	1
理发业、假发制造业	60035	45853	470	537	—	2
洗衣业、擦靴业	744	665	4	15	—	—
烟囱清扫业	3860	4119	26	15	—	—
绘画业、雕刻业	5630	7303	84	195	—	4

由此可见,1895年时,小企业还简直遇不到任何竞争的行业;1895年以后,大企业就相继出现了,而且还在发展。在1895年时,也只有这些行业还主要由小企业居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在某些直接供人消费的工业部门内,小企业还有其一定的前途。因为众所周知,机器只能制造大量定型的产品,而许多顾客仍希望生产者照顾其个人的趣味和爱好。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业小企业的数目甚至有少许增加的可能。因为这有助于增进群众的幸福生活,从而使手工业产品的供销更为兴旺;工艺美术品的手工业因而可能获得新的推动力。诚然,我们不能指望,威廉·莫里斯^①向我们所描述过的未来景象会出现;在他那可爱的空想世界里,机器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机器仍将是生产过程中的统治者。它永远也不会把这个统治地位交还给手工劳动。但是,不能排除手工劳动在各艺术行业里又会增多的可能性,它也许会占领某些新的领域。然而,如果说它目前还主要作为极度贫困的产物,作为家庭工业而勉强存在,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

^①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作家和美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赞美古希腊及中世纪生活,号召建立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译者注

里,它将只作为昂贵的奢侈品而存在;在生活普遍幸福的情况下,它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但是,生产过程的基础,将依然是使用机器的大企业。上述的小企业至多作为社会大企业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而保存着。

这些小企业本身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产品的销售形式。它们可以成为国营大企业或地方大企业的附属单位,从这些大企业那里得到原料和工具,并向这些大企业供应其产品;它们可以为私人顾客或为公开市场而生产等等。也可以像目前这样,一个工人可以前前后后在各种形式的企业里干活。譬如说,一位女裁缝可以一度在国营工厂里工作,随后又在家里为私人女顾客做一件衣服,后来又到一个女顾客家里去做衣服,最后同几位女同事合办一个生产合作社,为定货或为库存而生产服装。

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可以有最大的多样性和变动可能性。最谬误莫过于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成一部简单而呆板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它的轮盘联动装置就只能按同一方式不断运转。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有好几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地方所有制,消费合作社所有制,生产合作社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企业形式——公办企业,联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营企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工人报酬形式——固定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原材料、机器用具等的节约提成奖,加班、超产奖;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周转形式——按合同批发,或向国家和地方商业网点、消费合作社以及生产者本人购买等等。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完全可能有像目前这样的经济机体的多样性的。它仅仅排除掉目前竞争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等等,同时也排除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8. 精神生产

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然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

方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不可能再按照上文那种方式去继续探讨经济管理、国际交流、城乡关系等问题,否则就会离题太远,陷入歧途;这些问题固然都会因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极深刻的影响,而且都是不能用原来的办法来继续处理的。但是我并不考虑在这里来论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已在另处论述过我在这方面可论述的最主要方面(我在为阿特兰梯库斯的《未来国家一瞥》所写的序言(第 19 页)中以及我的《土地问题》一书中《个人小家庭的未来》一章(第 447 页)里论述过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世界贸易的态度)。我只想在这方面探讨一个有许多模糊认识的问题:精神生产的未来。

我们在上面只探讨了最根本的物质生产问题。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将建起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对于现代的文明人类来说,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使它不可能按以前的方法继续进行。用什么方式代替呢?

我在前面论述《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时已提到: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再也不会害怕获胜的无产阶级会像古代野蛮人那样,把艺术和科学当作多余的旧货扔进破烂堆里;与此正相反,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恰恰是无产阶级对艺术和科学最感兴趣,甚至最为尊重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整个探讨确实不是要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想要做什么,而是要研究它按照事物的逻辑能够而且必须做什么。

那时,艺术和科学将不会缺少必要的物质资料。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正是要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办法,来最迅速地甩掉过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的旧包袱,因为它们妨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私有制统治下,是只能随着竞争而缓慢和不彻底地加以除掉的。这样,社会财富必然会立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水平而继续增多。

但是,光靠物质资料还保证不了艺术和科学的提高。单凭财富是不可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理想生活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

生产是否满足得了高度发展精神生产的需要。我们的敌人常常对此提出异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精神生产的方式如何。它采取三种形式：首先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的，其次是由个体企业承担的，最后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

整个教育事业，从国民学校一直到高等学府，都属于第一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如果我们撇开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不谈，那么整个教育事业今日已完全是由社会经办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润或其他收益。这首先是指现代的国立和地方创办的学校，也包括那些大多作为中世纪遗迹而留存下来的教会和公益事业开办的学校；后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最为常见。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性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科学的技术已如此高度发达，以至（姑且撇开某些百万富翁不谈）只有国家才拥有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科研机构所必须的财力。而社会科学的某些专业，如人种学、考古学等等，也需要设立愈来愈包罗万象而开支浩大的科研机构。同时，科学已愈来愈成为一种耗费精力和财力的职业，谁也不能靠这种职业来维持生活。如果要完全献身于这一门职业的话，就得接受国家的大力资助，否则他在选择双亲或配偶方面就应十分留神，必须遇到富有的双亲或富有的配偶才行。而要获得用之于有成果的科学活动的基础知识，又需要愈来愈多的巨额费用。因此，科学就愈来愈被国家或被有产阶级所垄断。

无产阶级政权一定要设法消除这种情况给科学活动带来的一切限制。正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安排教育事业时，要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凡是社会教育机构所能传授的一切

知识。无产阶级政权将越来越需要大量的科学教育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它将最终用消除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尽量使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自由些。只要还有阶级矛盾，对社会的看法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最大的伪善或自欺之谈莫过于侈谈科学可以超脱于阶级矛盾之外而存在。科学只存在于研究人员的头脑里，他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不能脱离或超越于社会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仍将取决于社会条件，不过那时的社会条件至少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罢了。

但是，比这种对社会条件的内心依赖性（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更有害的，是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对国家政权或对其他统治机构（譬如宗教机构）在行动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迫使他们迎合统治阶级的观点，不能独立自由地从事研究，而是企图通过某种科学途径去寻找论据，以便为现存的制度进行辩护并驳难新兴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正在直接对科学起着败坏作用。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解除了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对学校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科学就有种种原因会兴旺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与教育事业有关的精神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害怕，却能给人以出现最美好前景的希望。

但到那时，精神产品的生产将会如何呢？

我们就在这方面先探讨一下个体生产吧。这里将主要考虑到画家和雕刻家，以及一部分作家。

正如不会使物质生产方面的私营小企业无法办下去那样，无产阶级政权同样不会使这种形式的商品生产无法进行。缝衣针和顶针箍既然不会算作无论如何必须国有化的生产资料，那么绘画笔和调色板、墨水和钢笔也同样不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迄今在个体生产的艺术品市场上具有很大支付能力的买主将销声匿迹。这对艺术生产当然不会依然毫无影响，但也不会使其无法进行，而只改变其性质罢了。比方说绘画和雕像，它可以改变其陈列地点和所有主，想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因此它在艺术商品生产中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形式。

这种形式的艺术品最容易商品化，可以像金条那样收集和贮存起来，不管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把它们再出卖也好，或把它们当作珍品而收藏也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以出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有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但是，必然会有艺术生产的其他形式来代替上述的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将异乎寻常地增加公共建筑物的数量，并力求把人民常去之处——无论是工作的、会议的、娱乐的场所——统统加以美化，使它们装饰得引人入胜。画家和雕刻家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像将不再被投入商品周转过程，以致最后竟为了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而陈列在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地；画家和雕刻家将有计划地与建筑师协力合作，就像在艺术的全盛时期，例如伯里克利^①的雅典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艺术与艺术彼此间将互相支持和促进；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目的，因而其效果、环境和观众将不再是偶然决定的，而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另一方面，以出售为目的而把艺术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了。这主要是因为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为赚钱或者为挣工资，即为了商品生产而从事精神劳动了。

我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这从工资劳动者的观点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曾说明，为此目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只要停办那些不完善的劳动场所，而充分利用那些完善的企业就能立即做到。我们认为有可能即使工资增加一倍，同时使劳动时间比目前缩短一半，这种假定根本不是异想天开的了。现今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已足以保证在这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所取得的进展愈大，愈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从事那种并不直接带来物

^① 伯里克利(Pericles, 约公元前495—前429)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的领袖，历史上把他执政的公元前450—前430年称为伯里克利时代。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吸收了希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帕德伦神殿、雅典卫城正门等卓越的建筑艺术品。——译者注

质收益,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报偿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有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单纯的精神享受;而有才干的人们将能开展其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就能使物质生产与艺术、文学以及科学的生产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我们已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努力使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但是,如果按目前的方式来普及教育,那么其结果就会很快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不适于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础。今日的社会分工已发展到使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几乎完全分离的地步。目前是在只有少数得天独厚或条件优越的人能够从事较高级的精神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物质生产的。而目前能够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又没有能力或者不乐意去从事体力劳动。如果人人都受到教育,这在目前情况下就会使一切物质生产都不可能进行,因为这样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和能够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因此,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

为了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使精神生产不再受到目前不愿从事物质生产的限制,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居民群众中实行这样两种措施:一方面要不断缩短所谓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能腾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这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办到。另一方面要增加受教育者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受教育者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但很可能: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一种职业劳动,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精神劳动则成为一种摆脱了任何社会强制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为比起体力劳动来,精神劳动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得多。无产阶级所实行的这种解放精神劳动的做法,

并不是空想主义者虔诚的愿望，而是无产阶级胜利在经济上的必然后果。

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下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精神生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生产的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主要包括科学，第二种形式主要包括造型艺术，那么第三种形式就涉及精神活动的各方面，但主要是作家和演员，他们的对立面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版商、报馆老板和剧院经理。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这种精神生产只有靠巨款购置的技术设备和大量人力的合作才能适应公众的需要。在这方面，靠某一个人独自的力量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但这岂不是说，这里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又只是国营企业么？如果这样的话，把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给国家集中管理，岂不会使这种精神生活必然面临它可能遇到的最恶劣的情况，面临千篇一律和停顿不前的危险么？国家政权果真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机构，但岂非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机构么？能否使精神生活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呢？任何新的真理、新的观点和感受，难道最初不都是仅仅由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领会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吗？实行这种新办法难道不会使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头脑的文化战士与无产阶级政权处于经常对立的状态中吗？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当它把人们的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的财力才能举办的事业中时，岂不把它所提供的自由完全抵消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么？这里诚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决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在社会必需的精神生产中，也像在整个生产中一样，不仅由国家来提供资金并加以领导，而且可以由地方来进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防止任何千篇一律，防止中央政权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何况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取代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企业的其他组织。这些自由组合的社团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以种种不同的

方式促进或直接从事这些领域里的生产。今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社团在演出戏剧,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等。物质生产的时间愈缩得短,工资愈提得高,自由组合的社团就必然会更加繁荣兴旺。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在成员的热心程度和技术水平上必然有所增长,而且知识界的捐赠和对其共同事业的支持也必然日益增多。我预料,这种自由组合的社团将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些自由组合将取代资本去组织和领导精神生产,因为这种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统治这些领域,决不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束缚,只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把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个人从繁重的单纯体力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用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代替社会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在精神生产方面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生产领域里的问题是带有矛盾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務一方面是要把社会生产过程安排成一个有统一步调的体系,从而使个人处于固定的生产秩序中并受到其约束。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性,能够独立自主,不受社会的限制。人们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获得个性发展的自由,并且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敏感和自私,便在待人接物方面力求取得充分的自主权,特别是对待婚姻关系,而艺术家和思想家则更包括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谋求社会稳定和个体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摆在社会面前的两项历史任务。这两者看起来互相矛盾,却可能同时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各自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当然,谁想用一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方面,谁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无政府主义就是这样失败的。无政府主义本是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限制和压迫的产物。习惯于按自己的心意来安排工作的小手工业者,曾起而反抗工厂的纪律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他们的理想依然是个体劳动的自由。在已不可能从事自由

劳动的情况下，他们设法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从事独立自主的共同劳动。

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这个“新中间等级”按其社会地位来说，仅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的精华和更有自觉表现的部分而已。他们的工作态度正是把小资产阶级同样对劳动自由的渴望和对纪律与单调乏味工作的反感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即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尽管他们的这种理想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在仍然受到没落的手工业生产条件限制的物质生产领域里却显然是反动的。

在现阶段生产中就生产量而言，只有两种可能存在的物质生产形式（当然还有某些残余，但大多是罕见的）：其一是共产主义的，它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中央机构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为标志；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物质生产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由组合的社团如果不进行集中的物质生产，就必须把商品生产转移到自由竞争所决定的价值规律上来，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我们在上文已看到，在各个企业进行自由生产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价值规律能调节各个生产部门彼此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从而防止诸如钮扣充斥市场而又苦于面包奇缺之类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必然继续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正如许多生产合作社所证明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想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充其量是干息息法斯^①那种徒劳无功的重活儿。

精神生产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而以物质生产方面能提供多余的产品和劳动力为保证的。精神生产只有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时候才会繁荣起来。如果物质生活陷于混乱，那么我们的生存也就根本受到了威胁。反之，现有的多余产品和劳动力按什

^① 息息法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柯林特王，因待人狡猾诡谲而被罚在冥府推运巨石到山顶，但巨石每次推上都重新滚下来。——译者注

么比例流向自由创造精神财富的各个部门,对于我们的生存却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只有教育事业属于例外,而有其特殊的规律,甚至在现今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也完全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而由社会加以调节。如果大家都去从事某一种商品(比方说钮扣)的生产,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向那里,以致没有剩下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其他商品(比方说面包)的生产,那么社会就会陷入问题严重的情况。反之,抒情诗和悲剧、亚述学著作和植物学著作的生产比例则不是一定的,既没有最小极限,也没有最大极限;如果今天写的剧本比昨天多一倍,今天写的抒情诗却只有昨天的一半;如果今天出版了20部亚述学著作,只出版了10部植物学著作,而昨天的比例却又正相反,则社会的兴旺发达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表明,尽管有种种心理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精神生产领域。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至于变成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

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讲,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

9. 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

某些读者也许感到诧异:我在这里探讨时总是只谈经济条件。我并没有探讨新社会的道德基础应该是什么;它应该以康德的伦理学为依据呢,还是以边沁的伦理学为依据,即它的基本准则应该是绝对命令呢,还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也没有探讨新社会的最高法学原则必须是什么:它必须是全部劳动收益权呢,还是生存权,或如某些法学社会主义者所揭示的其他经济基本权利之一。毫无疑问,在社会革命中,法律和道德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始终是

经济方面的要求。

不过,除了法律和道德之外,还要探讨一下心理学。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难道不会从心理学上也产生一些问题,而且是意义极为重大的问题吗?比如,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首先要有不平凡的人——那些大公无私而温和善良的、热爱劳动而颇有才智的真正的天使吗?对于有自私心和残暴性的目前这一代人来说,社会革命岂不是一个争夺果实和大肆破坏的信号,或者都打偷懒主意从而导致这一代人堕落沉沦的信号吗?只要人们一天没有变成高尚的人,经济基础的种种变革似乎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腔调和这种词句都不是新的。早在一百年以前,当鼠目寸光的庸人发表议论时,就有过这种说法了。据说神圣同盟里文雅的君主本来很乐意给他的庶民们以种种可能的自由,但是这些庶民必须先具备配享自由的“成熟性”!

我并不想否认,任何生产制度都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前提,而且需要一定的心理前提,否则便不能奏效。某一特定生产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前提,是由它本身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性质决定的。

谁也不会断言,在我的论述中已经规定了人的前提是首先要有天使般的角色。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首先要有才智、纪律和组织才能。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心理前提,而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已恰好造就了这些前提。资本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使工人遵守纪律和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精神视野超越了工厂的场地和教堂的塔尖。

在手工业企业或农民企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生产,这不仅由于这类企业生产率太低和在经济上站不住脚,而且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所以都是行不通的。我已经指出过,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何等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何等地与社会企业的纪律背道而驰。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资本所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因为它的第一批工人毕竟是来自手工业和农民的。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不得不对这个难题进行斗争;这个难题目前还妨碍美国南部各州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而那里由于

接近重要的原料产地,对大工业的发展本是很有利的。

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身上,不仅纪律性难于培养,而且组织才能也不容易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大批的人能联合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协作。在这个经济阶段,只有军队才有可能组织成大的群体。伟大的统帅也就是伟大的组织家。资本主义生产把组织大批人群的任务移植到工业中去。众所周知,资本家成了当然的头目和统帅;他手下的杰出人物就成了各部门出色的组织者。同样地,他们的雇员中有组织才能的人就特别受到资本家的器重和优待。于是,许多有组织才能的人迅速成长起来;无产阶级政权也可以使用他们,这样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会使工厂经理和托拉斯领导人投闲置散,无所事事。

但是资本也需要有文化素养的劳动力;于是我们看到,竞争随时随地都在大大促进职业教育的改善。另一方面,交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增进了工人的精神视野的扩大。

但是,构成社会主义生产的心理前提的,不仅有资本家要剥削大批工人的欲望,还有无产阶级反对剥削的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与资本家所强加的纪律不同的纪律,同时也发展了组织才能。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靠广大群众同心同德的通力合作,才能够在反对资本及其国家机器的斗争中自保。而组织工作则是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武器,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同时都是伟大的组织人才。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上的必不可缺性和进行组织工作之外,就没有别的武器来对抗资本家的金钱和军事国家的枪炮了。无产阶级的文化素养也是在斗争中使用它的这两种武器而增长起来的,这不需要任何证明。

无产阶级不仅一般来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严格的纪律及其广大群众的完善的组织工作,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也必须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力量击败如此可怕的敌人。我们可以肯定,无产阶级只有在高度发挥它的上述各种特长的情况下,才能克敌制胜。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心理前提都未充分具备之前,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人人成

为天使；也不是说，我们还得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心理上的成熟。

既然现代无产阶级本身并不需要大大地改变就能使自己成熟到足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指望，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性格。这里就为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办到的，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先决条件，那就是造就出比现代人更高级类型的人。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成果。社会主义将给人类带来安定、舒适和闲暇，将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因为人们已不再天天想着从哪里弄到明天吃的面包。社会主义将使各人的个性不取决于别人的个性，因而也不再有奴性和对人的鄙视。同时，也将消灭城乡差别，使人们都能享有和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并恢复人的天性，使其能从生活的力量和乐趣中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在铲除悲观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同时，也会铲除悲观主义的社会根源，从而把一些人贫穷潦倒（他们虽处境困难却有起码的情操）而另一些人脑满肠肥（他们养尊处优而纵欲行乐于灯红酒绿之中）的不合理现象消灭掉。社会主义将消除贫富不均和伤天害理，使人们乐以忘忧，赏心悦目，饱享幸福，从而保证每一个人都充分获得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的自由。

难道我们不可以指望，在这种条件下将会造就出一代新人，而远远胜过传统文化所培养的最高超的人么？这才是超人，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但不是特殊的超人，而是一般的超人，即比他们的前辈高超，而不是比他们的同志高超的超人。他们是高尚的人，不以超群出众而自满，但以共同提高，共同幸福为己愿。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应来自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应参与志同道合者中，共同汲取战胜最大困难的勇气。

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力和美的王国将会出现；我们将不辜负我们最优秀、最崇高的思想家们的这一伟大理想。

（选自《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23页。由何江、孙小青根据柏林前进书店1911年德文版译出。）

取得政权的道路

(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

(1909年)

一、夺取政权

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遗憾的是,人们对革命这个概念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关于我们党的革命性质的意见也是极为分歧的。它的不少敌人把革命仅仅理解为骚乱、流血、掠夺和纵火。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正在追求的社会革命,不外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但终将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东西,就像蒸汽机所曾经做过的那样。

有一点是明显的,——这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不到满意的生存条件。要解放无产阶级,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政权借以实现统治的手段,建立公有制,并且用公共生产来代替私人生产。无产阶级只有在根本不同于现存制度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满足。

但是,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革命的,还因为它承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

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证的这条原理,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上一世纪前半期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欧文和傅立叶的拥护者;也有别于蒲鲁东的信徒。这些人都轻视甚至否定政治斗争,认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经济改造仅仅借助于纯经济措施便可以实现,而无须改变政权和夺取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须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和布朗基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布朗基认为,通过极少数人的阴谋、暴动,就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并使它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革命不能单靠主观愿望;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则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既通晓本阶级的状况,又洞悉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

这些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创造起来;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一样,终将对抗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

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遏止,是因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是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要组织到工会、合作社和政治团体里面去,是因为它必然要极力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更大的政治影响。不管无产阶级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它总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在于把无产阶级的各种反对剥削的行动,汇聚成为有目的的统一行动,而夺取政权的伟大决战则是这一行动的顶峰。

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观,现在已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我们时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上面的。

但是这个世界观在它胜利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受到社会民主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

尽管如此,实际上事情却是按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道路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胜利地、一往直前地前进,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且首先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斗争的条件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们错了,这就是他们把革命看得过于迫近。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末)上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宣言》完全正确地预言了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它指出这个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点则是错了。

188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关于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小册子的第三版序言中所做的另一个预言,在时间上说来是较近的。他在那里说道,下一次欧洲震动“即将来临……(各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18年)”。^②

这个预言也没有实现,当时所预期的革命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据以做出这些革命预言的马克思的方法不正确呢?绝对不是的。但是在这些估计中有一个因素是不正确的,它的意义被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年以前曾经写道:“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6页。

的革命反对派的力量两次都被过高地估计了。”（《新时代》第7年卷第2期第45页）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计在德国将发生像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伟大事变那样的大规模革命。实际上却不过发生了一次可怜的起义，这次起义立即吓坏了几乎整个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退到自己政府的卵翼之下，以致重新加强了这些政府，使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受到阻遏。从此，资产阶级重新把继续进行革命的重任委托给各国政府（因为资产阶级还是需要革命的），而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统一了德国（尽管是局部地），推翻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诸侯，帮助意大利实现了统一，把教皇推下了宝座，消灭了法兰西帝国，促进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预言而直到1870年才完成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演变。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在1885年预料将发生“政治动荡”，并且估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仍然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这次动荡之后“必将”在德国“第一个掌握政权”。

恩格斯这一次关于发生“政治动荡”的预言也实现了；但是他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期望却再度落空了。当事情发展到俾斯麦政权崩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完全屈膝投降了。因此，宰相的倒台并没有超出王朝斗争的范围，也没有造成任何革命的后果。

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而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和团结到足以把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任何现存政权的倒台，不管这种倒台带有道德的、财政的还是军事的性质，都意味着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因为这些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对这个政权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是能够代替现存政权的唯一政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从预期的革命尚未到来这一事实做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未来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已经不同于那些根据过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推想出来的条件和形式。相反地,他们却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革命已经根本不可指望;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业已获得的成就——保护劳动、工会和合作社的法律——的进一步发展,足以把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排挤出去,并且不知不觉地剥夺他们,而无须乎进行政治革命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这种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不通过革命,亦即不通过国家政权的急剧移手,而只借助于同靠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参加这个政府的政党都无力单独建立这样的政府)这种明智的策略,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

他们认为可以这样来避过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所谓已经过了时的、野蛮的手段,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道德和博爱的文明世纪不适于采用的。

这种观点,如果让它占了上风,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就将被尽行推翻。这种观点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相容的。当然,没有理由预先认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很明显地,任何一个做过仔细推敲的人都会承认这种观点的错误,并将积极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于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在讨论这些分歧的时候,如果不充分准确地划清争论问题的界限,那就很容易偏到岔路上去。

因此,正像前面已经一再做过的那样,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问题决不在于工会、合作社、保护劳动的法律和其他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法

律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没有分歧。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能够容许这一切因素发展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程度，而剥削阶级并不事先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政权手段，来进行那种只有通过决战才能消灭的抵抗。

其次，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反对“反动的一帮”这种提法，认为这种提法过分抹杀了有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功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是工人立法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扩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归功于这种矛盾。

争论的只是在一般条件下是否有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或联合执政党的问题，而提出的问题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会因此而陷入那种必将使它归于灭亡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国家政权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却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同任何有产阶级分掌国家政权。有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总是要求而且必定要求国家政权继续镇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总是要求它自己的党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利用国家政权来支持它反对资本的斗争。这种情况最后必将导致任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政府陷于崩溃。

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共同参加者。这种情况将引起无产阶级对它的蔑视。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行动，都将受到它的资产阶级盟友的不信任，而这是会阻碍它进行任何顺利的活动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政权会加强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容许做到这一点；这只会败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麻痹无产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

从1848年起直至今今天发动了历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退化，完全排除了为夺取政权和共同执掌政权而同它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并且一贯反对“反动的一帮”这种提法。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恩格斯在1891年,即逝世前不久,还极力维护这个定义,肯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唯一形式。

即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不能成为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手段,即使无产阶级在这种政权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加强自己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也没有丝毫理由认为,既然政治革命还未到来,就说明这样的革命只能在过去发生,而今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怀疑革命的人们当中,有一些人的论调是不那么武断的。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还会发生革命,但那只是极其遥远的事情,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实际政策可以不把它估计在内。根据他们的意见,我们在最近几十年内应该坚持和平长入的策略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

但是,正是在现时,有一些事实应该迫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认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革命的预言

有些人为了败坏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未来革命的预言,常常责备我们,说我们虽然喜欢预言,却表现出是一些蹩脚的预言家。

我们已经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直到现在还未到来的原因。但是,只要我们撇开那些没有实现的期望,那么我们应该惊奇的就将不是他们的预言没有全部实现,而是他们的预言实现得那么多。

例如,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还在1847年11月就预告了1848年的革命。而这个预告正是在蒲鲁东证明革命时代已经永远结束的时候做出的。

马克思是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1846年)中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意义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早在60年代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就预见到现代的股份公司和卡特尔制度。在1870—1871年战争时期,他预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今以后将从法国移往德国。1873年1月,他预言了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的危机,等等。

关于恩格斯也可以这样说。

甚至在他们估计错误的那些情况下,在他们的错误中也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真理的内核。上面已经提到的、恩格斯在1885年所做的关于在最近年代将发生政治动荡的预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这里反驳一篇妨害人们确信理智的谬论将是适宜的。柏林教授海克涅尔在他不久前发行第五版的《工人问题》一书中,对汉诺威党代表大会(1899年)做了一番描述。他写道:

“在热烈的争论中考茨基非常激动,竟致痛斥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的大变革即将到来的预言,把这种预言毫不客气地叫做蠢话。这就是说,他要比伯恩斯坦本人所做的远为过火。考茨基说,如果恩格斯真地曾经预言1898年将发生大变革,那么他就将不是他实际上是的那种伟大思想家,而将是任何选区都不会把他选做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白痴。恩格斯只不过是说:在1898年,普鲁士的现时政治制度的崩溃可能到来。

恩格斯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依然是个悬案。但是,倍倍尔^①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席话,即只有这个大会的少数参加者不能活到终极目的的实现,是不容许做任何牵强附会的解释的。用考茨基在1899年所用的那种表达法来说,这些话也是蠢话。这段情节十分明显地表明,甚至在那些旧策略拥护者的头脑中也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最好根本不存任何希

^①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杰出活动家之一。——原编者注

望。”(第 379 页)

遗憾的是,教授先生的叙述的明确性,使人不能再希望他写出多少更好的东西来。我根本没有把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1)的大变革即将到来的预言”叫做蠢话。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不存在大变革的问题。但是,我完全有权把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的”大变革的预言称为蠢话。我是对这样一种提法使用“蠢话”这个词的,即仿佛恩格斯曾给革命的爆发规定了一个确定的时日——1898年。我的确认为这一类的预言是白痴的蠢话。但恩格斯对这一点是根本不负责的。倍倍尔也是一样。倍倍尔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确切指出革命爆发的年头。

早在当时就有人嘲笑他的“预言”。他对于这点曾经答复说:

“可以嘲笑和挖苦预言;但是有头脑的人却是离不开预言的。福尔马尔^①现在所特具的那种悲观论者的冷漠的理智性,几年以前对他说来还是格格不入的。他所攻击的恩格斯在1844年就完全正确地预言了1848年的革命。公社起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在地关于欧洲未来形势所做的那个预言^②,难道不是以极度的准确性实现了吗?(完全正确!)同样曾经对我微含嘲笑的李卜克内西^③本人也常常在做着预言哩。(活跃)1870年他和我在议会中所做的预言已经完全实现了。读一读他和我在1870—1871年所做的演说,你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但是福尔马尔却出来大喊大叫地说:不要提这些旧历史了,别再来这套预言了。但是他自己也常常预言呢。他和我之间的区别就在

① 福尔马尔,乔治·亨利(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右翼领袖之一,改良主义的思想家。福尔马尔要求党抛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放弃党纲的宣传,把党的活动仅仅限制在争取微小改良的议会斗争范围内。——原编者注

② 倍倍尔指的是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原编者注

③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经积极地参加1848年的革命。流亡伦敦期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成为社会主义者。——原编者注

于,他对我们的敌人抱着一片光明的乐观主义,而对党的坚定的努力和未来则抱着极其危险的悲观主义。”(《议事录》第 283 页)

倍倍尔的一些已经实现了的最重要的预言之一是在 1873 年做出的。他当时说:中央党不久便将在议会中从 60 个议席增加到 100 席;俾斯麦的“文化斗争”^①将悲惨地结束并将促进俾斯麦的倒台。

不久前我被荣幸地列入“预言家”的行列。对我说来,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称号。

有人指责我,说我在《新时代》上连载的《Allerhand Revolutionäres》(《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一文里,以及在我的《伦理学》一书序言中关于俄国革命所说的话,都为历史进程所完全推翻了。

是这样吗?

我在《伦理学》一书序言中曾经写道: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谁也不知道这个时期有多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将不再有安静工作的可能性,而我们的活动将变为连续不断的斗争……现在,那些替沙皇制度效劳的刽子手,狂热地想同 16 和 17 世纪宗教战争中的阿尔巴和梯利^②媲美,——但不是用军事功勋,而是用屠杀和纵火。西欧的文化、秩序和人类其他最神圣财富的维护者都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对法律秩序的恢复。但是,正像哈布斯堡王朝^③的雇佣兵,尽管获得暂时的成功,却不能在北德意志和荷兰复兴天主教一样,罗曼诺夫王朝^④的哥萨克也将不能恢复专制

① 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这是对 19 世纪 70 年代俾斯麦反对德国天主教党(“中央党”)的斗争的称呼。斗争的方法是:警察迫害,把耶稣会教团暂时驱逐出德国,限制教会的某些权利,等等。——原编者注

② 阿尔巴和梯利——以异常残酷的手段镇压农民起义的贵族国事活动家。曾任西班牙国王驻尼德兰全权代表的西班牙公爵阿尔巴(1507—1582),在国内实行血腥的恐怖政策,对积极的革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原编者注

③ 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皇族,最后一个皇帝查理一世(1887—1922)为 1918 年的革命所推翻。——原编者注

④ 罗曼诺夫王朝——自 1613 年至 1917 年统治俄国的沙皇皇族。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为 1917 年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原编者注

制度。这个政权虽然还有足够的力量蹂躏自己的国家,却已经没有力量统治这个国家了。”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还远没有结束,——在俄国的农民还没有得到满足以前它也是不可能结束的。但是,这个革命拖延得越久,西欧无产阶级群众就将越觉醒,财政大崩溃的危险就将越临近,而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也就越有可能在西欧开始。”

在这些写作于1906年1月的话语里,难道有什么值得我引以为耻的东西吗?难道能够认为,俄国已经为今后的平静的和有秩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吗?难道自从我写了上引的那几句话之后,整个世界已经真正进入了天下太平的状态吗?

现在来谈谈我的《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一文中所做的“失败的预言”。我当时曾和卢斯尼亚论战。他不认为由朝鲜所引起的战争会导致俄国的革命。他把我所说的俄国工人是比英国工人远为现实的政治因素这些话,叫作是一种过高的估价。我在1904年2月初日俄战争爆发时对此做了如下的回答:

“毫无疑问,俄国就其经济发展来说远远落后于德国或英国,它的无产阶级也不如,例如,德国或英国的无产阶级强大和成熟。但一切都是相对的,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是相对的。”

接着,我肯定了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拥有极大的革命力量。然后写道:

“西欧越是给它以强有力的援助,斗争的结局便越将不利于专制制度。尽可能促进沙皇制度的崩溃,——这是现时国际社会主义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同时,尽管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在西欧有着对他说来有价值的友好关系,他的处境却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日本的战争可能大大加速俄国革命的胜利……俄土战争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次可能以更大的力量重演,也就是说,将采取革命运动猛烈爆发的形式。”我在论证了这一点之后继续写道:

“俄国的革命将不可能立即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它首先只能实现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奋勇直前的、正为自己争取巨大让步的无产阶级所支持的。”

“这种制度将对俄国的邻国发生强有力的影响。首先,它将使这些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趋于活跃和加强,并在受到最强有力的推动之后,主动冲击横在真正民主道路上的各种政治障碍,——而在普鲁士则将首先进攻三级选举制^①。其次,它将促进东欧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的解决。”

我在1904年2月就是这样写的。1905年10月,俄国的革命成为现实,而无产阶级则是这次革命的先锋战士,并且这次革命立即对邻近各国发生了影响。在奥地利,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以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起来,并且迅即以胜利宣告结束。匈牙利濒临真正起义的边缘,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举行总罢工,并且以自己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在普鲁士,投入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个斗争在1908年1月导致了柏林自1848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街头示威。而1907年则曾经发生过轰动一时的霍屯督选举^②,暴露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完全破产。如果说,除此而外我还曾经预料东欧民族运动的全面展开,那么由于整个东方、中国、印度、埃及、摩洛哥、波斯和土耳其的迅速觉醒,我的预料是被大大地超过了,特别是在波斯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甚至发生了胜利的革命起

^① 1848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普鲁士实行了建立在所谓三级制之上的宪法。全体居民都按照所纳税额分成三类即三“级”,分担总税额三分之一的最大额税款的人列为第一类,分担第二个三分之一的大额税款的人列为第二类;分担最后一个三分之一的小额税款的人列为第三类。每一类都选出同等数目的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议院的议员。这样就可以保证第一类和第二类的代表,亦即富有的居民阶层在议院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个制度在普鲁士一直实行到1918年。——原编者注

^② 霍屯督选举——对1907年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讽刺称呼。这次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较上届选举减少了36个议席。选举进行时,恰值反动政党正在争取增加拨款来加强殖民政策,镇压西南非洲德国殖民地的起义。从1904年坚持到1907年的霍屯督部族的起义,被非常残酷地镇压下去。——原编者注

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矛盾的不断尖锐化。这些矛盾首先是由于摩洛哥,其次是由于土耳其^①,已经加倍紧迫地使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

如果说有过什么“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愿意用这种提法的话)曾经实现,那么这就是关于那个引起了政治觉悟提高及一切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俄国革命到来的预言。

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我没有预言俄国革命的暂时失败。但是,难道能够说,那个在1846年预言了1848年革命到来的人,因为这个革命在1849年被镇压下去就算是错了吗?

不消说,对于任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和起义,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失败的可能性。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斗争,只有傻瓜才会确信自己已经稳操胜券。我们所能够研究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将迎接大规模革命战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确切地判明的。至于说到这个战斗的结局,我们不能做出任何预言。但是,如果我们预先便确信失败的不可避免,而不考虑胜利的可能,那么我们便将扮演一个可耻的角色,甚至将成为我们事业的直接背叛者,而不能适应任何斗争。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希望都能实现。那些自封为言无不中的预言家,或者是那些要求别人做出毫无错误的预言的人,想必是在假定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估计到他的预言可能落空。虽然如此,“预言”仍然不是一种无谓的游戏。只要慎重地、周密地对待它,——它仍

^① 摩洛哥危机——法国帝国主义者力图侵略摩洛哥。英国政府对此加以赞助,但德国帝国主义则反对法国的计划,提出了对摩洛哥的权利要求。1906年在西班牙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会议的决议更加加剧了国际局势并且加强了军备竞赛。

德国、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土耳其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很长时期。到了20世纪,由于德国建设横贯土耳其直到巴格达的铁路(后来又延长到波斯湾)而尖锐化。这个斗争几次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原编者注

然是每一个深思熟虑的和有远见的政治家所必要的。倍倍尔便曾指出过这一点。

只有没有头脑的保守派才会当真地相信一切将按老样子存在下去。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的人,在每一次发生新的事件的时候,都要估量这一事件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性,并且周密考虑这些可能性的最深远的后果。的确,社会中的习惯势力还是极其强大的。因此,那些不考虑新的形势和可能性而继续走自己老路的保守派,倒十之八九被人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足以克服习惯势力的巨大事变总有一天要爆发,因为习惯势力虽然表面上依然如旧,却早已为一切业已发生的东西从内部破坏了。那时候,发展将突然采取使一切保守派为之惊慌失措、而只有那些对新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心中有数政治家才能镇定如恒的新道路。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在事情的通常发展的情况下,没有头脑的保守派会比考虑未来并“预言”未来的政治家略胜一筹。只有当政治家把他思考过其后果的可能性当做现实,并据以指导自己的日常实际活动的时候,上述情况才是可能的。但是未必有谁敢于断言,恩格斯、倍倍尔或这里涉及的其他某个“善做预言的”政治家,曾经认为自己的预言具有这样的妙用。

没有头脑的保守派任何时候都感觉不到有研究现实的必要。因为在这种人看来,现实不过是他们过去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些熟悉的情况的简单重复。相反地,那些习惯于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考虑它的一切可能性和后果的人,则只有靠研究当前的力量对比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所首先关切的是新生的、还很少被人研究的因素。

被某些庸人视为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的东西,实际上是缜密研究现实的结果,因而总是同深刻认识现实分不开的。如果恩格斯和倍倍尔表现出是一些脱离生活的幻想家,那么攻击他们的“预言”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不曾像这两位“预言家”那样,在每一次发生困难的关头,给予无产阶级以如此中肯和如此正确的忠告。他们所以能做

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们善于“预言”。截至现在为止,经常使新兴阶级走上错误道路的,不是那些一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再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眼光短浅的“现实主义政治家”。这些人认为,只有他们的鼻子碰到过的东西才是现实的;他们把一切曾经一度碰得他们鼻破血流的阻碍,都宣称为复杂的和不可克服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与上述“预言”不同的“预言”。任何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都决定于它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现在,我们对于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已经非常熟悉,足以相当有把握地判断社会必然发展的趋向,并据以做出有关政治发展必然进程的结论。

人们常常把这种“预言”,同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根本有别于这种“预言”的东西混为一谈。其实,其中一者谈的是某一特殊事件或某一特殊形势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的各种可能的后果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另一者则谈的是我们也力求判明的那种唯一可能的必然发展趋向。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涉及的是确定的、具体的事实;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知道一般的趋向,对于这种趋向将要采取的形式则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在两者所得出的结论初看起来似乎相同的时候,也不应当把两种判断混淆起来。

例如,如果某一个人说,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将导致革命,而另一个人说,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将导致革命,那么后一个论断也和前者一样是对革命的预言,并且二者的意义也都是是一样的。当我说到法德之间的战争的时候,这个战争并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可以确切预言其到来的事件。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战争——这只是可能实现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个。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从战争引发的革命则是同一定的形式联系着的。很可能,交战国中较弱的一国为了对付外敌而要求动员全民力量的愿望,会使最无情、最坚决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这一国家的领袖。恩格斯便曾经认为这种情况在1891年的德国可能出现,如果德国除了同当时在人口数量上还不甚落后的法国交战以外,还同时跟尚未为革命所战胜和震撼的俄国交战的话。

当军队已经被击溃并且对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穷困感到厌倦，当政府已经被推翻，并且不是为了继续坚持战争，而是为了结束无目的的、毁灭性的战争，为了和同样丧失斗志的敌方缔结和平，那么作为战争的结果，也可能从人民群众的起义演变为革命。

最后，作为战争的结果的革命，也可能由于人民对签订可耻的不利和约的普遍愤怒而爆发起来，因为这种愤怒将使人民和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府。

对于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说来，革命的一定的形式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但是，如果把革命作为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的结果来看，那么它的情况就变得绝对不清楚了。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战争带来的革命不是在战时爆发，就是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爆发。但是当我谈到作为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的结果的革命的时候，我就决不能像上面那样指出革命到来的时机。在谈到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的时候，我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它是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但是在谈到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所产生的革命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就一无可谈。它可能演变为旷日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只能起插曲的作用。关于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不能事先确切地肯定它是否将获得成功。相反地，由阶级矛盾尖锐化而来的革命运动，则只能遭到暂时的失败，而最后终将取得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前一种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战争，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可能到来，也可能不到来。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武断。相反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决定的。因此，如果说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那么作为阶级斗争结果的革命则是不可避免的。

从而，这两种“预言”都要求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独特的研究；在那些对这种研究一窍不通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无聊幻想的“预言”，它的价值也就决定于这种研究的深度。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才进行“预言”，那就大错特

错了。甚至那些只顾眼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少不得要瞻顾一下遥远的未来。例如,殖民政策的全部力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今天所推行的殖民政策,那么这种政策会是极容易抛弃的。除了英国以外,殖民政策对于一切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油水不大的事业。然而,它却是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对未来怀抱巨大的(尽管是虚幻的)希望的唯一领域。不是悲惨的现实,而正是对我们的殖民政策狂信者所预言的那种光辉未来的指望,足以说明殖民政策对一切不相信社会主义到来的人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有人认为:在政治方面只有眼前利益是起决定作用的;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我们的竞选宣传中,我们越是“实际些”,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头脑冷静和谨小慎微,我们越是仅限于谈谈赋课和关税、警察的刁难、医院的出纳等等,我们越是把我们的伟大目标当作早已消逝的青春之恋,与其公开讲说,无宁在内心深处时时回味,那么我们获得重大胜利的机会也就越有保证。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三、长入未来的国家

在政治方面没有预言是不行的。那些说什么一切仍将长期照老样子存在下去的人,并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也是在做着预言。

当然,满足于现状并且不想根本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没有的。任何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不管他属于哪一派,只要他肯于稍微抛弃成见,那么他就一定会认为这样一种假设是荒谬的,即社会的经济改造虽然今后仍将像现在一样以飞快的速度继续下去,但政治状况却将在长时期内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政治家根本不想理解政治革命,也就是说,根本不想理解国内力量对比的決定性的改变,那么他就必然要去寻找那种不通过伟大决战,而只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地消除阶级矛盾的形式。

自由派幻想不消灭剥削,而只通过各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某种自

制,通过自愿放弃所谓“过火行为”与“过高要求”,就可以建立阶级之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社会和平。也有人认为,单个的工人和单个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有组织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按照这种人的意见,集体合同应该能够为社会和平奠定基础。实际上,组织只能加深矛盾的暴露。两军对战要比过去单个人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更为残酷,而且对社会的震荡也远为强烈。对立利益之间的矛盾本身,将通过组织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且使人更加清楚地感觉到这不是个别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整个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阶级协调和社会和平的幻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不同意这种幻想。社会主义者懂得,不是异想天开的阶级协调,而是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在社会中建立和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失掉了对革命的信心,那么他就只能盼望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把其他阶级逐步吸入自身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和平地、不知不觉地消灭阶级。

这也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这个理论包含着极其现实的内核。这个理论所依据的事实将为现实的发展所证实,同时证明着我们正在实际上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描述过这个过程,并且论证了它的合规律性。

我们同时通过两条道路长入社会主义。一条是通过资本的积聚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优越性,竞争将使大资本威胁小资本、压迫小资本,并最终完全排挤小资本。不消说贪得无厌的发财欲望,仅仅这一点便足以使每个资本家极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和扩大自己的企业。企业的规模正在越来越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并入少数人手中。现在,银行和企业主联盟已经掌握了各个不同国家的大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并且把它们组织起来。因此,生产的社会组织正在日益完备。

随着企业的集中,大资本也正在日益增长,而股份公司的形式丝毫

不能遏止这种增长。相反地,股份公司现在不仅保证着少数银行和企业主联盟对生产的统治,而且是使小额和极小额资金变为资本、从而使之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手段。

借助于股份公司,普通人的积蓄也为资本家所支配。资本家把这些积蓄作为自己的资本来利用,从而更加加强了属于资本家的大资产的集中力。

由于股份公司制度,作为个人的资本家本身,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说来已经成为完全不必要的了。从经济生活中消除资本家的活动,已经不再是经济上是否可能或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了。

但是,资本的积聚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这一事实,不过是长入未来国家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中无产者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无产者正在成为社会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的组织也在日益发展。工人正在创办合作社来消除商业中介,组织满足自己消费的生产;建立工会来限制企业主的专横独断,加强自己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向公社自治机关和议会选送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自治机关和议会中争取实行各种改革,争取通过保护劳动的立法把国营企业和公社企业变为模范企业,并不断增加这种企业的数目。

这个运动正在一往直前地发展着。用我们的改良主义者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甚至,按照某些人的意见,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需要的只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需要任何大变革,因为这只能妨碍长入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放弃一切有关大变革的思想,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到“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上去。

这种前景当然是极其诱人的,只有具有真正恶魔性格的人才会拥护那种将要破坏如此美妙的“渐进的改良主义高涨”的大变革。假如愿望会是我们的思想的基础,那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为这种长入的理论同声欢呼鼓舞。

但是,在这个理论中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这就是这个理论所谈的发

展,不是单一因素的发展,而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发展。被“改良主义者”看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只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抗阶级力量的发展,这就是说,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原来只是国内一小部分人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趋向的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由此可见,长入社会主义不外就是长入那个将动摇国家一切基础的伟大战斗,这个战斗将不可避免地日益激化,并且只能以推翻和剥夺资本家阶级告终。无产阶级是社会所必不可缺少的;它可能遭受暂时的失败,但是它永远不会被消灭。相反地,资本家阶级则已经成为多余的阶级;它在争取保持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所遭受的第一次失败,便足以使它走向完全彻底的灭亡。只有看不见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个我们社会的基本因素的瞎子,才不愿意承认我们必然长入社会主义这个结论。长入社会主义,这只是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和长入伟大阶级决战(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决战称为社会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说法。

当然,修正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从来不曾提出过任何反对这种观点的有力论据。他们用来进行反驳的事实,即使是重要的和有说服力的,也并不能证明“长入”社会主义,而只是证明社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例如,关于资本不是在集中而是在分散的说法就是如此。这种逻辑矛盾根源于修正主义的实质本身:如果它想证明长入社会主义,它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如果它要使人相信,社会将沿着和平道路继续发展和阶级矛盾将日趋缓和,那么它又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

但是,修正主义者以及在看法上同他们接近的人仍然开始觉察到,和平长入未来国家的思想并不是无隙可击的。

诺曼^①最初发表在1908年10月号《Neue Rundschau》(《新观察》)

^① 诺曼,弗里德里希——柏林出版的研究政治、文学和艺术问题的周刊《Hilfe》(《援助》)和自1889年起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Neue Rundschau》(《新观察》)的出版人。——原编者注

上,后来又发表在《Hilfe》(《援助》)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文,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这位“国家社会党”的前领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做了十分混乱的论述。他认为,资本的积聚和企业主联盟的建立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所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情况使我们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另一方面他又硬说,工会运动的修正主义活动家,同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首先强调了保护劳动的立法和工人工会组织的意义。这个可怜虫没有想到,正是马克思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宣传这两条原理的人;马克思在其他社会主义者以前很久就承认这两条原理的重要性,以及企业主联盟的意义。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先生们在这类问题上的无知已经司空见惯了,因此甚至无须加以理会。相反地,值得注意的是,诺曼发现了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导向“拥有空前强大经济手段的新封建主义”。诺曼说,在企业主联盟面前,合作社和工会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最近期内,工业的领导权将掌握到同银行合作的辛迪加手里。依靠辛迪加而加强起来的老爷们,在失业和饥饿的苦难时代还没有激起只知盲目破坏而不能进行建设的群众仇恨以前,是任何社会革命都不能彻底消灭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实质上已经寿终正寝。这种情况对于所有旧式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同样地也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工人能够迅速获得成功的社会思想家说来,是极其沉痛的;但是自我欺骗并不能帮助我们,——最近的将来是属于企业主联盟的。”

这同长入社会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尤其同和平长入毫无相似之处。除了破坏一切的“群众仇恨”即革命以外,诺曼本人也不能提出推翻新封建主义的其他办法。在这里,诺曼突然完成了一个逻辑的飞跃。他先是承认,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消灭企业主联盟。然后又拒绝有关这种革命的思想,硬说革命应该是“盲目破坏一切而不能进行建设”的饥饿暴动。为什么事情正应该是这样呢?为什么事先就假定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呢?这仍然是诺曼的秘密。

但是，他在毫无根据地一笔抹杀了革命思想以后，并没有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而是精神抖擞，充满了乐观主义。他发现，企业主联盟只是对于那些承认经济必然性而否认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意志，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付企业主联盟，而“新封建主义”的“空前强大的手段”也将失去不可战胜的力量。

群众的愤怒所不能完成的东西，通过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个人”就可以达到。这个办法也算得是“实际的”、“现实的政策”哩！

诺曼告诉我们：

“马克思不重视诉诸自由意志，因为他把一切都看作是事件的自然必然性。至少他的理论是这样说的。诚然，就他的为人说来，他是一个具有巨大意志力量的人物，他善于鼓舞别人的斗志。现在，在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些人正在从自然科学学说回到关于意志的学说，亦即回到作为一切自由主义运动的基础的学说。爱德华·伯恩斯坦比其他人更加明确地主张应当重新拜倒在康德的足下。甚至在接近于社会民主党的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有人抛弃对经济生活中盲目起作用的宿命的信仰，而确信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事物的面貌。回到‘意志说’，这是工业的新的统治已经巩固的结果。事情越来越明显，工业的这种统治不会自行倒台，而只有通过意志活动才能争取到它的让步。”

那些直到现在才明白了这一点的人们，都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信徒。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启示。对于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旁支说来，这的确是个巨大的发现。他们这些善于从任何花朵吸取蜜汁的蜜蜂，也像他们的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同行一样，把这个发现看作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驳斥。他们一致谴责马克思，说他只承认“盲目起作用的”、“自动的”经济发展，而根本抹杀人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意见，发扬人的意志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不仅诺曼这样说,而且弗利德堡也这样说;不仅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像钟摆一样摇摆于诺曼和弗利德堡之间的分子如艾斯涅尔和摩连布莱赫尔之流这样说,而且那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①之流也这样说:

“《资本论》的作者夸大历史过程的自发方面的意义,而不理解活生生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全部巨大的创造作用。”

这一切都证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必须用个人的巨大创造作用和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加以添补。但是,这个应该补充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由意志,实际上不外就是长入理论的寿终正寝。如果诺曼所说的意志是自由的、它能够“决定事物的面貌”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意志也就应该能够“决定”经济发展的趋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地肯定,我们是否有必然长入社会主义的保证。那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认识社会将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也不可能有任何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

四、经济发展和意志

修正主义者也许要反驳上述意见说,在马克思本人身上表现出一个更大的矛盾: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不承认自由意志,而完全信赖作为自动过程的必然经济发展;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又总是表现出最高度的意志,并且寄托希望于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修正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异口同声地正告我们,卡尔·马克思在这里有着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这样的矛盾的。这不过是他的批评家们的头脑混乱、他们的无法摆脱的不可救药的昏聩的结果。所以

^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65—1919)——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后为立宪民主党员,1917—1918年是乌克兰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积极活动家。——原编者注

说他们昏聩，首先是因为他们把意志和自由意志混为一谈。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意志的重要性和“个人”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他否认的只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自由意志。关于这一点人们过去已经谈论得够多了，用不着再在这里多费唇舌。

此外，这种昏聩还基因于对经济和经济发展的—种别开生面的观点。这些学者先生们认为，既然经济发展受—定规律的支配，那么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的过程。因此，他们硬说，人的意志作为与经济并列并且超越经济之上的—个特别的因素，可以补充经济之不足，并且有助于“决定”为经济所制约的现象的“面貌”。只有那些完全用经院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经济的人，只有那些光靠书本汲取知识并且极其抽象地玩弄这些知识、而对现实经济过程—窍不通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无产者至少在这方面要比这班先生们强胜多多。因此，同摩连布莱赫尔和艾斯涅尔相反，无产者要比资产阶级理论家或者资产阶级实践家更善于理解当前的过程及其历史作用，因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经济实践—窍不通，而资产阶级实践家则根本没有任何理论兴趣，他们在顺利榨取利润所必要的范围以外，根本不感到认识经济的任何需要。

坚持人的意志是任何经济过程的动力这种看法的人，把—切经济理论都看作是空洞的概念游戏。当然，这里说的不是自由意志，不是愿望自身，而是—定的愿望。归根结底，同具有活动和认识能力的生命—起产生的生活意志，是整个经济的基础。意志的任何表现形式，归根结底都不外是生活意志。

生物的生活意志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取决于生物的生存条件；而“条件”这个概念，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不仅包含着保存生命的手段，而且也包含着生活道路上所遭遇的危险和障碍。生活条件决定着愿望的性质、活动的形式和活动的成功与否。这个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不消说，可以这样来加以解说的关系，只有在最简单的生物那里才是单纯的；在已经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生

物那里,在简单的生活意志和意志的各种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

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任务。但是我还是愿意就这个问题略谈一二。

生物的生活条件有两种:一种是在许多世代的生活过程中经常重复和一直不变的。适应这些条件的合理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为遗传的习性,并且通过自然选择而加强起来;这种意向变为本能、即变为不可克服的倾向性;终于,个体在一切环境条件下,甚至在服从这种本能不仅无助于生存、不能保存生命、而且有害于生命、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异常条件下,也不能不服从这种本能。生活意志始终是这种意向的始因。

除了经常重复的生活条件以外,还有一种只是偶尔地或极不经常地出现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本能不再起作用,而生命的保存基本上取决于生物的认识能力,亦即取决于生物能不能认识业已形成的形势并且使自己的习性适应于这种形势。某个动物种在迅速变化的生活条件中生活得越久,它的智力也就发展得越快。这一方面是由于思维向器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是由于智力较不发达的个体都很快地灭亡。

最后,人的智能则已经发展到能够创造人工器官即武器和工具的程度。这样,他就能够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下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但是因此他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他必须适应的新的生活条件,以至作为智力高度发达结果的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促进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刺激物。

技术的发展也是生活意志的结果,但是它却使生活意志发生很大的改变。动物只是希望按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此外再无更大的要求。新的工具或武器的发明,使人能够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有更丰裕的食物、更多的余暇和更大的安全,最后,也使人能够满足过去所没有过的新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生活意志越来越变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意

志。

这种意志是文明人的特点。

但是技术不仅改变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的生活条件不容许他孤立地生活，而要求他联合为社会。生活意志在这里采取了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生活并为了他们而生活的意志形式。技术的发展，首先借助于它提供给人的体外器官，不仅改变了一般的生活条件，而且也改变了社会中集体的、共同的生活和活动的条件。自然的武器和自然的工具——爪、牙和角等等，是属于同一个种的同一年龄和同一性别的一切个体所同样具有的。相反地，人工的武器和人工的工具则可能只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而其余一切人都得不到它们。那些独占这些武器和工具的人，较之被剥夺了这些东西的人，是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条件中。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阶级，而每一个阶级的生活意志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形式。

例如，如果资本家得不到利润，那么他就不能生存在他所生活的那些条件中。生活意志唤起他获得利润，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意志则唤起他追求更大利润。仅仅这一点便足以迫使他增加自己的资本。迫使资本家不断增加资本，否则便使资本家有灭亡危险的自由竞争，也是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而且是以更大的力量起作用的。资本的积聚不是同当事者的意志和意识无关的自动过程。没有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战胜自己较弱对手的强烈意志，就根本不会有资本的积聚。只有作为这种愿望和意向的结果而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才是不以资本家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因为资本家决不希望出现这种结果。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过程排斥人的意志和“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巨大作用”。

推动资本家的那种生活意志，在工人身上也同样表现出来。但是由于生活条件的不同，这种生活意志在他们身上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工人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争取较高的劳动力价格

和较低的食品价格。因此,他们要求组织合作社和工会,要求保护劳动的法律;结果就在资本竞争的趋向之外,产生出人们称之为长入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趋向。但是,甚至在这里,这种情况也并不意味着人们通常称之为“长入”的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实现的不自觉的过程。

最后,在谈到社会过程的时候,必须注意生活意志的另一个特点。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体或社会的生活意志只有通过克服其他个体的生活意志才能表现出来。猛兽只有消灭其他野兽才能生活。它的生活意志也往往要求它排斥与它同一种类的那些争抢它的猎获物或减少它应得的食物个体。这种排斥所要求的不是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肌肉或神经的优势力量迫使它们的意志服从于自己。

人与人之间也往往发生这样的冲突,但主要地不是在个别人之间,而是在整个集体与集体之间。其原因则在于争夺生存资料:从争夺狩猎区和捕渔区起,直至争夺市场和殖民地止。这种冲突通常或者以一方的被消灭告终,或者(这是较多的一种情况)以一方的意志被摧毁或被压服告终。但后者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除此而外,人还经常为了保持长期的剥削关系而压制别人的意志。

阶级矛盾是意志倾向的矛盾。资本家的生活意志,总是同那些唤起他们摧毁和压制工人意志的条件发生冲突。没有这种对工人意志的压制,就不会有任何资本主义利润,资本家也不可能存在。而工人的生活意志也唤起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意志。由此就产生了阶级斗争。

总之,我们看到,意志是整个经济过程的动力。意志是经济过程的出发点;经济过程的任何表现都贯穿着意志。再没有把意志和经济看作是两个彼此无关的因素更荒谬的了。在这种看法后面,隐藏着把经济(亦即人及其彼此对抗的活动的社会合作形式)同经济活动的物质对象、即原料和工具混为一谈的拜物教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正像人利用原料和工具来按照自己的意思生产一定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创造的个人”也可以利用经济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拜物教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工人可以站在工具和原料

之外来控制它们和支配它们，那么人也可以站在经济之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控制它和支配它。他们根据原料和工具没有意志和意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在经济中一切都是自动地发生的，是没有意志和意识参加的余地的。

再没有比这更可笑的错误了。

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经济必然性来自人的生活意志的必然性和人利用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不可避免性。这也就是—定的意志倾向的必然性。

因此，再没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见更错误的了：认识经济必然性就等于削弱意志；需要利用将军或其他意志坚强人物的传记和有关意志自由的报告在工人身上唤起这种意志。仿佛只要向人们开导说，有个什么东西存在着，那么这个东西就立即开始存在着并且成为这些人的所有物。只要一个人相信意志自由，那么这个人也就有了意志，并且是自由的意志！就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教授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看看他们经过康德的教育，经过崇拜意志坚强的霍亨索伦王室这种阅历，具有了何等丰富的不屈意志。

如果作为一切经济必然性的基础的生活意志不是在工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强而有力，如果必须用人为的方法在工人身上唤起这种意志，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我们决不愿意因此就说，人的意志是同人的意识无关的，是不决定于人的意识的。不消说，生活意志的力量不取决于我们的意识，但是意识却决定着这种意志在这一或那一情况下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着意志在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形式上所用的力量。我们确信，除了本能而外，意识也支配意志，而意志的形式则取决于意识对生活条件认识到何种程度。既然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认识能力，所以他们的同样的生活意志也就可能对同样的生活条件发生不同的反应；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意志自由的假象，使人觉得个人愿望的性质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条件，而取决于他的意志。

不是关于意志自由的教训性的奇谈和思辨性的议论,而只有更深刻地揭示社会条件,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影响无产阶级的意志的形式和它用在每一种意志形式上的力量。

生活意志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以这个事实为我们的出发点,并且必须把它看作是早就给我们规定了的。生活意志所可以采取的形式,以及它的表现的强度,都取决于各个个人、阶级和民族等等对一定的生活条件的认识;凡是这种条件使两个阶级产生出相互矛盾的意志的地方,这种条件就同时也是斗争的条件。

在这里,我们只来谈一谈斗争的条件。

作为斗争的愿望的意志,决定于:

(1)吸引斗争双方的那个斗争的价值;(2)力量感;(3)实力。

斗争的酬报越高,意志也就越坚强,勇气也就越大,斗争者也就是以更大的决心鼓起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争取得到这个酬报。但是,这也只是在对夺取酬报所必需的力量和才能具有信心的时候才是如此。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必要的信心,那么不管斗争的目的如何诱人,它仍然不会鼓舞意志,而只能引起一种想望,这种想望可能是极其强烈的,但决不会产生任何行动,而且在实践上也将是完全无益的。

力量感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实际了解上,而只是建立在空洞的幻想上,那么它也同样是无益的。没有力量感的力量是僵死的力量,它不会产生奋勇直前的意志。没有实力的力量感,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奇袭敌人或震惊敌人以及摧毁或麻痹敌人意志的行动。但是没有实力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不是依靠实力,而只是依靠敌方对己方实力的错误估计而取得的胜利,迟早总要遭到彻底的破产,而且最初的胜利越是辉煌,士气的消沉也越是来得严重。

如果把上面所说的话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想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共同斗争并且愿意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究竟负有哪些任务,也就十分清楚了,而社会民主党应该对无产阶级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最重要

的任务。当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随意加强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一种状态下,都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不能够随意加强的。但是现有力量的作用可以通过对这种力量的不合理消耗的反作用而加强。自然界中的不自觉的过程,如果从我们的目的的观点看来,就不外是一种力量的无限消耗。因为自然界没有它所要追求的目的。人的自觉愿望不仅给人提出目的,而且也给人指出避免力量的多余浪费、而以最低限度的力量消耗来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

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可以这样说。当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能离开这一斗争参加者的自觉。但是开始时,自觉的意志还只是涉及这些斗争参加者的最切近的个人需要。最初,斗争参加者还不能理解从阶级斗争推演出来的社会改造。因此,阶级斗争,作为一个社会的过程,长期以来始终是个不自觉的过程,并且作为这种不自觉的过程,具有着一切不自觉的过程所固有的浪费力量的特点。只有认识了社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趋向和目的,才能结束这种浪费现象,使无产阶级的力量积聚起来,集中在大规模的组织中。这些组织是为伟大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的,它们有计划地使个人行动和为时机所决定的有组织行动,服从于确定的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也是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事业服务的。

换句话说,理论是促进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因素,因为它教导无产阶级合理地运用这些为经济发展所制约的力量,并且反对对这些力量的无目的的浪费。

而且,理论不仅仅增强无产阶级的实力,它还提高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的自觉。而这也是同样必要的。

我们知道,意志不仅决定于自觉,而且还决定于习惯和本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间不断重复的条件,产生习惯和本能。这些习惯和本能在产生它们的物质基础消失以后,仍然继续起作用。在这个期间,以前靠力量的优势占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能早就衰弱下去,而以前软弱并

因而屈服于剥削阶级的那个受统治阶级剥削的阶级,则可能变得强大起来。但是过去在这两个阶级身上所形成的对自己力量的自觉,却在这种力量的考验(例如,暴露统治阶级软弱性的战争)还没有到来以前,仍然长期地继续起作用。但是一旦这种时候到来,被压迫阶级便会突然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可能发展到革命和出人意料的大变革。

同样地,无产阶级也长期地继续保持着自己最初的软弱感,相信资本是不可战胜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的时期,无产者群众还是软弱无力的,对社会说来他们还是一个寄生的、完全多余的成分。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效劳的资本家,曾经是他们的“救主”、“养育者”,或者如当今流行的一种叫法(虽然也并不怎么更好听):“雇主”。无产者的生活意志迫使他们出卖自己,除此而外,他们再找不到其他生活出路,正像他们看不到反抗资本家的可能性一样。但是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资本家出于怜悯而给予工作的那些讨厌的穷人即无产者,变成为社会赖以生存的工人阶级;相反地,单个的资本家则对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日益成为多余的。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雇佣关系日益由经济的必然性变为依靠国家政权支持的单纯力量对比关系。而无产阶级则变为国家中以及国家政权所依靠的军队中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甚至在现时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无产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

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还缺乏足够的自觉。只是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具有这种自觉,而就整个无产阶级说来则缺少这种自觉。社会民主党正在千方百计提高无产阶级的这种自觉。为了这个目的,它不仅从理论方面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且也利用其他办法。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说来,实践在任何时候都比一切理论更有效果。社会民主党以自己在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最清楚不过地向无产阶级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从而也最有效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感。但

是，社会民主党仍然把这些成就归功于理论的指导，因为理论可以使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部分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使工会运动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国界之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除了这些成就以外，议会竞选和议会斗争的胜利，也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感和力量本身的显著增长。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个别阶层取得了物质利益，而且也因为穷苦的、一直忍气吞声的、绝望的人民群众，看到了敢于起来同一切当权者作斗争并且一再取得胜利的新力量的出现，而且这个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最劳苦的人的组织本身。

这也就是五一节的庆祝、竞选期的斗争以及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原因。这种斗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给无产阶级带来显著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甚至往往不能同遭受的牺牲相比。尽管如此，当斗争以胜利结束的时候，这个胜利总是造成无产阶级能动力量的巨大增长，因为胜利会大大地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感，并从而加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毅力和意志。

再没有比这种力量感的增长更使我们的敌人害怕的了。他们知道，巨人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前是并不可怕的。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压抑无产阶级的力量感；他们宁愿做物质上的让步，也不愿意使工人阶级得到足以提高他们的自觉的精神胜利。因此，他们在争取工厂的无限专断权即“当家作主”权方面，往往要比反对提高工资表现得远为顽强；因此，他们极端反对在五一节停止工作，并且当普遍平等选举权成为社会民主党向人民直接显示自己的不可遏止的胜利前进运动的手段的时候，力图扼杀普遍平等选举权。他们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这方面，他们还可以安心地等待往后的不止一次的选举，——而是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不断胜利，会使无产阶级产生力量感，而使无产阶级的敌人产生如下的畏惧：无产阶级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国家政权手段将不再起作

用,而国内的力量对比将完全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应付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选举中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将要引起的对现存议会选举制度的进攻。我决不是说,这个进攻会得到成功。毋宁说,这个进攻所挑起的斗争,最后将使这个世界的强者遭到比我们的选举胜利更为沉重和更为危险的失败。

当然,我们的党不仅估计到胜利,而且也估计到失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克服地域的局限性和时间的局限性,而能从各国人民的运动的全局,从两代生活的长期间,来考察我们的运动,那么这些失败就不会使我们感到灰心丧气。那时候,即使有个别极其惨重的失败,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可遏止的蓬勃前进还是将变得极其明显,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我们必胜的信心。

但是,我们越是联系着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待我们的斗争,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终极目的,——从一切阶级统治下解放工人阶级、从而也解放全人类,——就越是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无产阶级的生活意志所无时无刻地、不可避免地要求于我们的那些日常细小工作就越是可贵;争取实现伟大终极目的的愿望也越将最大限度地加强无产阶级的意志,鼓舞革命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轻举妄动,而是明确的认识的产物。

社会民主党截至现在为止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影响无产阶级的意志,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致毫无理由来改变自己的策略。

五、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 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

一方面,有人谴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从政治中排除了意志,把意志变成了自动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批评家又提出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论调:说我们的愿望超越了对现实的认识;说对现实的认识只应该使我们确信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却

出于一种狂信，便死抓住革命的思想并陶醉于这种思想；说我们甚至在利用现存法律基础可以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只是为了革命本身而不惜任何代价来追求政治革命。

例如，有人拿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立起来，硬说他有个时候也曾经极富于革命情绪，但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改恶从善了，意识到甚至承认了自己革命观点的错误。

的确，1895年时恩格斯曾经在他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革命斗争的条件已较1848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说，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把“已经懂得应该怎么办”的广大群众带领起来；说我们“革命者”、“颠覆者”采用合法手段，要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变革办法，更能获得远为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忘记，恩格斯这里只是说的当时的形势。要想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些话，必须拿这些话同我不久前在《新时代》（第27年卷第1期第7页）上引用的那些恩格斯的信里所说的话加以比较。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坚决反对把他说成“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来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的企图。关于这一点，我在《新时代》上曾经这样写道：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注明写于1895年3月6日。这本书在几个星期以后才问世。我曾请求恩格斯允许我在该书出版以前把这篇《导言》在《新时代》上加以刊载。

关于这个问题他在3月25日答复我说：

“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25—426页。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记起那个建议大大加强现存法律严厉性以便阻止社会主义宣传的所谓《反对阴谋推翻现存制度法案》;这个法案于1894年12月5日提交德意志帝国议会,而于翌年1月14日交付小组委员会审议,审议时间长达三个多月之久(直到4月25日)。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时候写作他的《导言》的。

这封信的另一段话表明,恩格斯是多么认真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在那里写道:

“我认为,只要没有一个普遍反动的时期突然来临,选举改革在奥地利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个改革将使我们进入议会。显然,在柏林,只要全力以赴也可以争取到这一点。可惜,柏林人总是不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1月3日,即还在开始写作《导言》以前,恩格斯曾经给我写信说道:

“看来,你们在德国面临着十分活跃的一年。如果冯·克勒尔先生今后继续这样干下去,那什么都可能发生:冲突、解散、钦赐、政变。当然,人们也会乐于接受小恩小惠。容克地主会完全满足于扩大恩赐,但是要达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满足个人统治欲的某些要求,并要放纵这些要求到一定时刻;那时,反抗的因素将发生作用,而后不可预见和估计不到的情况也会出现。要保证自己得到恩赐,就要以冲突相威胁,但是只要再多走一步,首要的目的——恩赐,就会变成次要的,王位将起来反对帝国国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那时就会发生许多麻烦。我正好在看加德纳的《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许多地方常常和现代的德国完全相同,令人好笑。例如,关于议员在议会中的活动不受侵犯的论据,就是如此。如果德国是一个拉丁语系国家,革命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如肖利迈^①所说,任何确实的情况都无法肯定。”^②

修正主义者硬说,恩格斯曾经宣告无条件合法的和平发展时代已

^① 肖利迈是卡·肖莱马的带亲昵意味的绰号。——原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5页。

经到来并将永远保持下去，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预见到了这样严重的、孕育着冲突的形势。

十分显然，恩格斯在对形势做这样的估计时，曾极力回避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危害党的东西；他在有关革命事业的一切问题上都仍然是绝对坚定不移的，不过在表述上力求含蓄一些罢了。

《Vorwärts》（《前进报》）显然为了对审议《反对阴谋推翻现存制度法案》的小组委员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只是发表了他的《导言》的某些片断。这些从全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出的片断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有着后来修正主义者所强加给他的那种想法。这使恩格斯非常恼火。他在4月1日的信里写道：

“明信片收到了。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①

恩格斯没有想到，过了不多时候，甚至那些理应率先维护他的观点免遭歪曲的亲近友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仿佛这个被歪曲了的观点确实是属于他的，而他认为是可耻的那个东西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功绩；仿佛这个革命战士以“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终结了自己的道路。

如果这些摘录还不足以确定恩格斯对革命的观点，那么可以再援引他在1892年、即写作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前几年曾经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页。

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 200 万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①

这段引文,也和有关的信件一样,值得每一个想正确理解恩格斯《导言》中关于我们借助于法制可以获得很大成功的话的人加以注意。这些话丝毫没有表明他放弃了革命思想。

但是,不言而喻,这些话却表明他彻底摒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该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做孤注一掷,而这次革命应该按照 1830 年和 1848 年的革命的形式重演。认为我在这里的观点同恩格斯的观点有矛盾的人是错了。实际上,我还在恩格斯的《导言》之前,便从另一种角度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发挥了我们在恩格斯那里所看到的那同一个思想。

1893 年 12 月,我在《新时代》第 12 年卷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的信条》一文。这篇文章详尽地考察了革命的问题。那里写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92 页。

“我们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蒸汽机的革命那种意义下的革命。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而共和国，而且是最通常的意义下的共和国、即民主共和国，乃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国家形式。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革命，所以我们也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到它借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政权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知道，这个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的人数以及它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将越来越增长；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只能模糊地预测这场社会战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何时发生和怎样发生。在这一切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既然我们对于这场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这场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武力将在决战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只有借助于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强制才能决定胜负？

但是有一切理由设想，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中，后一种手段将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所用的实力即武力更为优越。

未来革命战斗之所以显然将更少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经一再指出的，是现时政府军的装备较之‘公民’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总是预先决定着公民的任何反抗的失败。

但是，革命阶层现在却比 18 世纪时拥有更为优越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义的反抗武器。在这方面只有俄国是例外。

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遍选举权(而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普遍兵役义务),不仅仅是保证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优越于那些曾经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战斗的阶级的武器,而且还使各个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那些鼓舞各个政党和阶级的思想,都能够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是在专制主义时期所未曾有过的。

在专制主义时期,无论统治阶级或革命阶级都只能在暗中摸索。由于根本不容许表现反对立场,因而无论是政府或革命者都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每一方,当它还没有同对方较量力量以前,都有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危险;而在初次交锋之后又都有过低估计自己力量以至终于放弃斗争的危险。显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以有一举把叛乱镇压下去或一举把政府推翻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在这里。显然,革命和反革命此起彼伏的现象,其原因也在这里。

现在,至少在那些有着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把这种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瓣。如果人们想借此说明,民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已满足于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和诉说自己的痛苦,因而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就错了。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防止这种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推翻这个社会。民主只能做到一点:不是防止革命,而是防止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多余的。民主使各个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清楚地暴露出来;它不是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转移它们的终极目标,而是一方面阻止新兴阶级去着手解决那些他们还无力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迫使统治阶级做出他们已无力拒绝的那些让步。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发展的趋向,而只能使发展的进程更加顺畅、更加平稳。在有着稍许民主的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的特点,既不是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获得的那种惊人的胜利,也不是它所遭受的那种惨重的失

败。从现代的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在 60 年代勃兴时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就只遭受过一次大的失败——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还苦于帝国所遗留下来的灾难,帝国没有给予人民以真正民主的制度,法国无产阶级还只有不大一部分人觉悟起来,而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是出于被迫的。

无产阶级的民主斗争方法看起来可能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方法较为枯燥;无疑地,这种方法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少。或许,这对于那些抱着欣赏体育竞技的趣味和为了搜集引人入胜的材料而唱社会主义高调的文人墨客说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那些实地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①。

只限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如议会斗争、罢工、示威、报刊以及诸如此类影响手段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和平方法,越是在那些民主制度行之有效、人民的政治眼界和经济眼界宽广、人民的意志坚定的国家里,它的前途也就越是广大。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敌对双方中那个感觉自己优胜于对方的一方,将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相反地,那个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的一方,则将过于轻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静。

在现代的一切文明国家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阶级。它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沉溺于幻想;它只要研究前一代的历史就足以理解它是在不断地前进着,而只要研究现时的发展就足以确信自己的必然胜利。因此,不应该认为某一个国家已经达到

^①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 18 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588 页)。当然,1852 年时马克思在拿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比较时,还没有能够把民主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估计在内。——考茨基注

较高发展的无产阶级,会轻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静而采取冒险主义的政策。工人阶级的教养和眼光越高,这个国家越是民主,那么做这种估计也就越少根据。

但是对于统治阶级却不能表示这种信心。他们感觉到并且看到自己是在日益削弱,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和神经过敏,因此逐渐失去把握自己行动的能力。他们的情绪越来越使人担心他们的疯狂的发作。那时候,他们将在盲目狂怒的支配下猛扑敌人,消灭敌人,而不考虑这将给整个社会和本身带来的损害,也不关心将要造成的可怕破坏。

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使人可以设想,它将力求采取上述‘合法的’方法。破坏这种意愿的危险,首先就在于统治阶级的神经质。

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照例总是希望这种疯狂的发作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进行抵抗以前尽早地发生,而且不仅仅希望统治阶级如此,最好局外的群众也能如此。这是他们延缓(哪怕几年也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的确,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因为如果资产阶级不能把无产阶级镇压下去,它就将因为精疲力竭而提早倒台,而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将更快地实现。但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大都认为孤注一掷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他们由于害怕革命而希望挑起内战。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则没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绝望的政策;毋宁说它有一切理由尽可能延缓统治阶级疯狂的发作,而如果这种发作已经成为不可避免,那就尽可能使它在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战胜和制服疯狂敌人的时候发生,以便使这种发作成为最后一次的发作,使这种发作所造成的破坏和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避免甚至反对一切可能变成对统治阶级的无谓挑衅的东西,反对一切可能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利用来煽动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疯狂仇恨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说举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认为力图掀起革命的做法是无益的甚

至有害的，并且遵循这一方针来决定我们的行动的时候，这决不是为了讨好德意志的检察官，而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致的。由于这个方针，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直到现在还未能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还不够强大，但它在现代国家中已经成为一支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必须正视的巨大力量。采取微不足道的行政手段已经不能使他们有任何收获；这种手段只能激怒它所损害的那些人，但并不能吓倒他们和削弱他们的斗争能力。实行旨在摧毁无产阶级斗争能力的决定性措施的任何企图，都有引起国内战争的危险；而国内战争，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必将招致惊人的破坏。每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人现在都了解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政治家有一切理由希望社会民主党尽早受到它所力不胜任的实力考验，资产阶级生意人却压根儿不愿去做那种可能使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破产的冒险尝试，至少当他们还处于正常状态，还没有陷于疯狂的发作时是如此。而一旦陷于疯狂的发作，资产者当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而且他们越是恐惧，他们也就越是绝望地嗜血。

现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决地避免一切可能无谓地挑起统治阶级采取实力政策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就应当从这里着眼。

但是，现在有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派或社会革命派的派别，它认为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外，挑起统治阶级的实力政策，是它的最主要的任务。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所幻想的那个唯一能够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东西，成了这个受到普特卡默^①之流青睐的派别的代表们的主要目标。这个派别的信徒不是力求削弱资产阶

^① 普特卡默，罗伯特(1828—1900)——普鲁士显贵，曾任许多高级官职；1881年任内政部长，对工人运动和一切反对党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原编者注

级,而是力图激怒资产阶级。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失败。自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利用上面提到的那种方法,在多数国家中获得了不断的进展。固然,这种进展要比我们希望的缓慢得多,但是却比以往任何一种革命运动更加充满了信心。

1871年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几次遭受过较大的失败,而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个别人物的插手造成的;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手段,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可以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符合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以行动宣传’的策略。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给‘国际’和1873年西班牙革命起义所带来的损害^①。这次起义之后五年,被称为海德尔和诺比林谋杀事件的普遍疯狂发作爆发了;如果没有这些谋杀事件,俾斯麦未必能够强行通过反社会主义者的法令;这个法令也无论如何不会像它实行初期那样雷厉风行;德国无产阶级将可以避免巨大的牺牲,而它的胜利前进也不致受到片刻的阻遏。

库梅列尔和施泰里玛赫尔之辈的欺诈和暴行,造成了1884年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又一次失败^②。奥地利的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任何抵抗地便被一举击溃,而且不是被政权击溃,而是被居民的普遍愤怒击溃,因为居民把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归罪于社会主义。

另一次失败发生在1886年的美国。当时,工人运动在那里得

^① 考茨基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西班牙于1873年建立了共和国。领导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阻碍了共和国的巩固,他们阻挠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妨碍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发挥。各地起义被粉碎和工人阶级被镇压以后,君主制度又恢复起来。——原编者注

^② 奥地利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一些恐怖行动,结果奥地利政府于1884年发布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的专门法令。根据这个法令,警察封闭了工会和工人报刊。但是工人运动仍然继续发展起来,在1889年1月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原编者注

到蓬勃的发展,其进展的迅猛,使某些观察家认为它可能很快就超过并领导欧洲的工人运动。1886年春天,美国的工人阶级决心加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组织有了极大规模的发展。罢工一个接着一个,工人意气风发,社会主义者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总是热情洋溢地走在前面,并且已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就在一次警察与工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时候,5月4日在芝加哥发生了投弹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查明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11月11日,因为这个案件而被处死刑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伙伴,成了法庭谋杀的牺牲者。但是这次举动是与无政府主义者所长期鼓吹的策略相符合的。这次举动激怒了美国的整个资产阶级,造成了工人的思想混乱,败坏了那些不善于而且往往也不愿意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的社会主义者的声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工人运动遭到了破坏,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则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现在,社会民主党正在开始重新巩固自己在美国的阵地。

近20年来工人运动所受到的少数几次重大打击,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本身的行动,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的那个策略所鼓舞的行动引起的。正是因为这种行动,德国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奥地利的紧急状态,芝加哥的法庭谋杀,以及这种行动的其他一切后果,才成为可能的。

但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相信,无政府主义会在某个地方重新掌握群众。

群众轻信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群众的眼界不够宽广,二是他们的绝望情绪:以为单靠政治斗争,甚至连微小的改良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80年代前半期,当奥地利和美国的工人群众为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所迷惑的时候,两国的工人运动都有过极其蓬勃的发展,虽然几乎完全处于无领袖的状态。工人队伍完全是由未受训练的新

兵组成的,既缺少经验,又没有军官。此外,工人群众还毫无理由地不相信通过政治斗争可以动摇资本的统治。那时,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并且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在最近期内得到这种权利。美国的工人则不想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消灭政府的贪污腐化现象^①。并且不仅仅在这两国,而且在 80 年代初期的其他国家,都开始工人运动中出现一种悲观情绪。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普遍有所好转。

在奥地利还有一种情况促进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抬头: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信任。当德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手段——组织和报刊——已经成为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牺牲品的时候,当时刚刚登上舞台的无政府主义便趁机向奥地利工人大肆宣传,说什么被人利用来钳制言论的党,已经放下了武器,并且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原则。起来维护自己的德国同志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不但没有能够恢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奥地利工人心目中的声誉,反而使自己的声望受到损害。带着轻蔑的口吻说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的检察官拉梅灿伯爵,便曾经帮助过在他看来比较可亲的无政府主义者。

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向工人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说在德国曾经有个时候有过产生相当大规模无政府主义

^① 在我们的美国兄弟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最近一期上,刊载了不久前从监狱获释的米海尔·施瓦布的一篇演说的摘要。他是 1886 年炸弹案的牺牲者之一。他承认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是错误的和冒失的。他还解释了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 80 年代的芝加哥获得传播的原因:“必须尽量反复地说,只是当一个法官裁决可以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者而伪造选举证以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才在芝加哥传播开来。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弗朗克·施陶贝尔先生再度当选国会议员的那次选举的情形。选举的结果是两位监选员最无耻地伪造出来的。这件事情已经在警察和其他证人的宣誓下证实了。可是在百般拖延举行的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却只根据被告的单方面的供词进行了裁决。法官还替伪造者辩护呢!工人普遍感到愤怒,他们对过去那老一套的方法再也听不进去了。后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明白过来,在政治上是不能单凭感情用事的。”——考茨基注

运动的可能,这也不是‘独立派’^①进行鼓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发动进攻的结果(因为这种进攻给工人群众造成了绝望感,并且阻碍了他们的觉悟的提高),或者是我们队伍中那种使人觉得仿佛我们已经放弃了革命原则的论调的结果。我们越是变得‘温和’,也就越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者的声势,从而也越会促进那种把用最最激烈斗争方式代替文明斗争方式当作自己基本目标的运动。可以说,现在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无产阶级群众自愿放弃上述‘和平’斗争方法,这就是:对自己政党的革命性质失去信心。我们和平得过头,只能给和平的发展带来损害。

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追求妥协的倾向一般说来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有产者的政权并不会因此而缓和它的敌对态度,而用这种办法也将得不到可靠的朋友。但是,这种做法却将给我们自己的队伍造成思想混乱,使消极者更加消极,而坚定者离我们而去。

革命热情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动力。今后,这种热情对我们说来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最大的困难还摆在我们前面,还有待我们去克服。一切可能削弱这种力量的东西都将是耍不得的。

但是现时形势的危险,就在于轻易地承认我们比我们的实际情况更加‘温和’。我们越是变得强大,实践任务也就越是变得重要,我们就越是必须在产业无产阶级之外进行广泛的鼓动,我们就越是应该节制不必要的挑衅,特别是虚声的恫吓。在这中间,掌握必要的分寸是极其困难的:既要给现在以应有的地位,又要不忽略将来;既要考虑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又要不放弃无产阶级

^① “独立派”或“青年派”——席佩尔、康普夫麦尔等人——9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他们在议会斗争可以使社会民主党大大扩大对群众的影响,并且是工会运动以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极重要形式的时期否定议会斗争。“独立派”集团后来被开除出党。——原编者注

的观点；既要尽可能避免一切挑衅行动，又要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是对整个现存社会制度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战斗的党。”

这就是我在1893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一个后来实现了的预言。我在1893年所担心的那个东西，过了几年就发生了。我们的同志在法国一时成了执政党。这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原则。他们失去了对党的信任，因此有不少人为无政府主义的最新变种即工团主义所迷惑。工团主义也和鼓吹实际行动的旧无政府主义一样，与其说力求加强无产阶级，无宁说只是徒劳无益地恫吓资产阶级，激怒资产阶级，不合时宜地挑起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尚难于胜任的实力较量。

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正是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像反对内阁主义一样坚决地反对工团主义，认为两者是同样有害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恩格斯和我在上面所援引的那些写作于1892—1895年间的文章中所发挥的观点。

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

我在90年代初曾经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组织和无产阶级斗争在现存国家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稳步发展，将最能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推向前进。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过分热中于革命和过激主义，即使我基于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从90年代初起，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个斗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甚至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起自己的专政。

我在下面将简单地叙述一下我的这种观点的根据。

六、革命因素的增长

我们已经看见，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并不像人们所喜欢形容的那样是一些蹩脚的预言家。虽然如此，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过去总是在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这就是确定伟大革命搏战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政治变革到来的时机。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能够设想，那个盼望已久的时机现在终于日益临近，政治停滞的僵局将被打破，充满斗争欢悦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挺进的进军将要开始呢？

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已经正确地指出：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只有已经懂得自己应该怎么办的大众，才能赢得伟大革命战斗的胜利。靠一小撮人出其不意的果断行动就能推翻国家政权并以另一种政权来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国家中政治生活都集中于支配全国的首都，而在彼此不相联系的乡村和小城市则根本没有政治生活。凡是能够使首都的军队和官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或者把它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人，就都能够夺取国家政权；而如果总的形势要求社会革命，那么也同样可以按照这种办法进行革命。

在我们的时代，在铁路和电报、报纸和集会、连发枪和机关枪的时代，在已经建立起许多工业中心城市的时代，只要首都的军队不是事先已经完全解体，那么少数人是不能使它陷于瘫痪状态的。同样地，只在首都进行政治斗争也完全不可能了。现在，一国的政治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已经形成这种形势的地方，足以推翻敌视人民的政权的巨大政治震荡，只在具备下述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指望其出现：

(1)政权是坚决敌视人民群众的。

(2)存在着坚决反对这个政权并且得到有组织群众支持的大党。

(3)这个党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且受到他们的信任。

(4)这个政权的工具即官僚和军队对政权的信任、对它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信心已经动摇。

最近几十年来,至少在西欧,还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形成同时具备上述全部条件的形势。长时期来,无产阶级始终不占人口的多数,而社会民主党也不是最强大的党。如果说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盼望革命迅速爆发,那么这也并不仅仅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而且也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寄希望于革命的群众政党,而且也寄希望于拥护这个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辜负了这种期望。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反对党了。

另一方面,从1870年起,在欧洲的各大国中(其中也包括俄国)曾经存在过的不稳定状态已经停止。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已经使自己的人民相信:它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因此,在经常性的和独立的工人运动产生以后最初几十年间,亦即从上一世纪的60年代起,政治革命的可能性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地缩小,尽管无产阶级日益感到政治革命的需要,并且根据70年来的经验相信政治革命已经迫近。

但是,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逐渐变化。无产阶级的组织正在日益发展。这一点大概要算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12年来,这种发展特别迅速。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人数已经增加到50万,而思想上接近它的工会组织的人数则达到200万。与此同时,不是作为私人企业,而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事业的报刊也已经加强;各种政治日报的发行数已经增加到将近100万份;工会的定期出版物(大都是周刊)的发行份数则增加得更多。

被剥削的工人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力量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优势过去一直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即剥削者拥有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的手段,而被剥削阶级则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组织,至少没有全国规模的组织。当然,劳动阶级没有组织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以前,这种组织只是联合了个别行业的代表,或者只是在个别地方进行活动;这就是行会组织或公社组织,以及地方的协社。其中,公社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反对国家政权斗争的强大支柱。有人毫无保留地把公社和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公社是不折不扣的阶级统治组织。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公社可以是这样的组织并且往往就是这样的组织。而且,如果被剥削阶级在公社中占多数并居于领导地位,那么公社也可能代表国内的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近几个世纪来,公社的这种作用在巴黎公社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公社有时也可以成为社会的下层阶级的组织。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公社已经不能单独地在现代强大国家及其政权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了。下层阶级所联合组成的包括全国范围各行各业的巨大组织,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这一点在德国做得最为成功。在法国以及拥有旧式工联的英国,无论工会组织还是政治组织都还是极为分散的。但是不管无产阶级的组织如何蓬勃发展,它在平常的、非革命的时期总是不能包括国内的全体劳动群众,而总是只能联合劳动群众中因职业和地区条件或个人特点而超越于一般群众的优秀部分。相反地,在革命时期,当最软弱的人也感觉到自己能够斗争并且渴望斗争的时候,阶级组织的吸引力就仅仅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人数了。

因此,指出这样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德国雇佣工人现在已经不仅占居民的大部分,而且占选民的大部分了。

我们还没有 1907 年普查时关于工人人口成分的确切统计数字,而只有 1895 年普查时的数字。我们把这些数字拿来同 1893 年选民成分的材料加以比较,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情况:

1893 年的选民数达 10 628 292 人,而有独立工资收入的男人在 1895 年达 15 506 482 人。如果从这个数字中扣除未满 20 岁的人数以

及20到30岁的人数的一半,那么有独立工资收入的、达到选举年龄的男人数则将近10 742 989人。这个数目几乎等于1893年的选民数。

在达到选举年龄的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男人当中,按照同一计算方法来计算,有4 172 269个独立业主,有5 590 743个雇佣工人和职员。如果考虑到3 144 977个工商企业中有一半以上(1 714 351)是小企业(它的业主大都在自己的利益方面接近于无产阶级),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认为,在1895年的选民当中,每有350万个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独立业主,就有要求消灭这种私有制的无产者600万人以上。

可以认为,那些虽然应该加以注意,但是没有特别意义的其余一切居民阶层,也保持着这样的百分比。这里指的是,例如,没有职业的“独立者”。富有的资本家——食利者,以及领残疾抚恤金和养老金的贫民,就都属于这一类。

但是,无产阶级在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居民当中,要远比在选民当中更占优势。因为有独立工资收入而没有选举权的选举适龄人口,几乎全部是无产阶级。

因此,在德国计有:

年 龄	“独立者”	工人和职员
从18岁到20岁	42 711	1 335 016
从20岁到30岁	613 045	3 935 592
从30岁到40岁	1 319 201	3 111 115
从40岁到50岁	1 368 261	1 489 317
50岁以上	2 102 814	1 648 085

1895年,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每有5 474 046个“独立者”,就有13 438 377个工人和职员。如果从前一个数字中再扣除那些家庭劳动者和自认为是“独立者”而实际上是伪装的无产者的人,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还在1895年,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居民阶层就至多不过占有独立工资收入的人口的1/4,虽然他们仍然足足占选民人数的1/3。

13年前,即1882年,情况还不是这样有利的。如果我们拿1882年的工会统计数字同1881年的选民数字加以比较,并且对1895年进行同样的核算,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选民总数	“独立者” 选民数	工人选民数
1882年	9 090 381	3 947 192	4 744 021
1895年	10 628 292	4 172 269	5 590 743
增长数	1 537 911	225 077	846 722

1882年小企业的数目大致与1895年小企业的数目相等,即1 877 872个。但是,1882年“独立者”中非无产者成分的数目却绝对高于1895年。因此,可以认为,1882年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民人数,接近于1895年的数目,即约有350万人,而无产阶级成分的数目则近500万人。因此,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拥护私有制的人数没有变动,而反对私有制的人数则在选民中增加了100万。

在这一期间,投社会民主党人票的选民数增加得还要多,即从311 901人增加到1 780 989人。固然,1881年社会民主党人所得的选票数是被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人为地降低了的。

1895年以后,资本主义当然还是继续发展,而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同时继续增长。可惜,我们没有1907年德国的更完全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是会证实这一点的。

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独立业主(男人)的数目从1895年到1907年增加了33 084人,就是说,几乎等于没有增加;而职员和雇佣工人(男人)即无产者的数目则增加了2 891 228人,就是说,几乎增加为100倍。

由此可见,早在1895年即已占居民和选民的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成分,后来又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假定说,独立业主和工人的数目中男选民的百分数现在仍和1895

年时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前表作如下的补充:

	选民总数	“独立者” 选民数	工人选民数
1895	10 628 292	4 172 269	5 590 743
1907	13 352 900	4 202 903	7 275 944
增长数	2 724 608	30 634	1 685 201

无产阶级在选民增长数中占了极大部分,而且比从 1882 年到 1895 年期间增长得更多。

但是,对于工业发展说来,1905 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材料是值得注意的。

城市通常总是比乡村更有利于政治生活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学说的传播。因此,乡村人口数比城市人口数缩减这一事实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下面所引的表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在如何迅速地进行着。在这里,乡村人口是指不足 2000 居民的公社人口,而城市人口是指不少于 2000 居民的公社人口。

年 份	乡村人口		城市人口	
	绝对数	百分数	绝对数	百分数
1871	26 219 352	63.9	14 790 798	36.1
1880	26 513 531	58.6	18 720 530	41.4
1890	26 185 241	53.0	23 243 229	47.0
1900	25 734 103	45.7	30 633 075	54.3
1905	25 822 481	42.6	34 818 797	57.4

由此可见,在 30 年中间,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乡村人口则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同一时期,城市人口增加了 2000 万,而乡村人口则几乎减少了 100 万。德意志帝国建立时,乡村人

口还几乎占人口总数的 $\frac{2}{3}$ ，而现在则只占人口总数的 $\frac{2}{5}$ 稍强。

如果考察一下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各邦，那么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邦的人口也增加得比较快些。在按帝国现在疆域计算的人口总数中，各个邦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1816	1855	1871	1905
普鲁士	55.2	59.0	60.1	61.5
萨克森	4.8	5.6	6.2	7.4
总计	60.0	64.6	66.3	68.9
巴伐利亚	14.5	12.5	11.8	10.8
符腾堡	5.7	4.6	4.4	3.8
巴登	4.1	3.7	3.6	3.3
黑森	2.3	2.2	2.1	2.0
阿尔萨斯—洛林	5.2	4.3	3.8	3.0
总计	31.8	27.3	25.7	22.9

这样，1816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现在所占有的领土上居住着当时人口总数的60%，而在1905年则已经几乎占人口总数的70%。相反地，1816年南德意志的人口数占现在属于普鲁士和萨克森的那些地区的人口数的半数以上，而在1905年则只占 $\frac{1}{3}$ 。1816年在现在的普鲁士和萨克森的领土上共居住1500万居民，而在四个南德意志邦和阿尔萨斯—洛林则只居住800万人。1905年，前两个邦共有4200万居民，而在上表所列的其余各邦中则共有1400万居民。换言之，在前两个邦中人口数几乎增加了两倍，而其余各邦却甚至增加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任何时候都有助于人民中革命成分的增长，而不利于保守成分；有助于革命成分在国家中所占优势的巩固。这里所说的革命成分，是指要求改变现存国家制度和所有制的分子而言。

但是这种革命成分的革命性最初只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存在的。革命成分是革命从中吸收自己的新兵的后备队，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兵都能立即成为“革命战士”。

很多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出身的无产者,大都长时期保持着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胎记;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无产者而渴望拥有财产。他们攒钱,想买一小块土地,开一家小店铺或有两个不幸的学徒的小作坊,以便以“独立业主”自居。有些人对这一点失去了希望,或者理解到这样的道路会给他们注定如何悲惨的生活。但是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无能,而不想同自己的伙伴一起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他们以为,出卖自己的同伴也许会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变成了工贼或黄色工会的会员。也有一些人站得高些,承认同自己的敌人——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但是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来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宣战。他们向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寻求援助。

但是,甚至在那些承认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人们中间,也还有不少人不愿意超出现存社会的范围,并且对无产阶级的胜利表示怀疑或者完全失去信心。

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居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进行得越快,从乡村涌向城市、从东方涌向西方、从小私有者下降为无产者的人数越多,那么在无产阶级本身中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子还不理解社会革命的意义,甚至还不懂得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

把这些人变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这是一个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条件下极其困难的、需要极大的忠诚和智慧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管你怎样全力以赴,总是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兵源现在大概包括人口的 $\frac{3}{4}$,可能还要多些;投我们的票的人数还不到投票者总数的 $\frac{1}{3}$ ——约等于选民总数的 $\frac{1}{4}$ 。

但是,当革命动荡的时期一经到来,运动前进的速度便会立即变得极为迅速。那时候,人民群众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学会很多东西,并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在他们身上不仅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激发起斗争的勇气和渴望,而且还将激发起政治上的兴趣,因为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挣脱黑暗奔向光明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时候,甚至最懒惰的人也将变成最积极的人,最怯懦的人也将变成最勇敢的人,而眼光

最狭小的人也将大开眼界。那时候，群众将在几年之内就受到在平常条件下需要几代的时间才能受到的政治教育。

如果这样的形势业已形成，如果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政权眼看就要垮台，如果在国家内部有一个要求夺取政权并具有为此所需的力量的阶级，那么为了把奋起的阶级引导到胜利，就需要有一个受到这个阶级信任的党，它对摇摇欲坠的制度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并且对业已形成的形势具有明确的认识。

社会民主党始终就是这样的党。构成国民多数的革命阶级也存在着。但是能不能够指望现存的制度发生道义的崩溃呢？

七、阶级矛盾的缓和

前面已经说过，恩格斯曾在 1885 年指出，从法国革命（这个革命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从 1789 年一直延续到 1815 年）时起，大约每经过 15 年至 18 年便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或重大的政治变革，如 1815 年、1830 年、1848—52 年、1870—71 年。因此，他预料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将发生下一次的革命。不出所料，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政治转变：俾斯麦的政权倒台了，民主的政治运动在全欧洲重新活跃起来。但是，高潮的规模不大而且为时甚短；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将近 20 年了，可是真正的革命，至少在西欧，却一直没有爆发。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从 1789 年到 1871 年欧洲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而其后却能保持政治形势的稳定，并且最近又为完全的政治停滞所代替呢？

在 19 世纪的整个前半期，即 1848 年以前，对于那个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居民阶层，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作为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有时对这些阶层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有时则采取公然敌对的态度。德意志和意大利之分裂为许多小邦，阻碍了任何的经济的发展。从 1846 年到 1870 年期

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首先在英国战胜了土地占有者阶级。英国在 1846 年废除了粮食进口税,开始了贸易的繁荣;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业资本,也至少获得了与土地占有者阶级平等的权利。知识分子获得了出版自由和转业自由,而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则获得了选举权。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满足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的最迫切的希望。的确,这是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发生的,而且不是这两个国家内部的人民运动的结果,而是对外战争的结果。1854—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消灭了俄国的农奴制,并且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正视工业资产阶级。1859、1866 和 1870 年,意大利实现了统一;1866 和 1870 年,德意志实现了统一(虽然是不完全的);1866 年,奥地利开始了自由主义的纪元,而在德国则为实行普选权、某种程度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创造了前提。1870 年,法国完成了这一切工作,并且建立起民主共和国。1867 年,英国实行了选举改革,给予过去一直没有享受过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上层和小资产阶级下层以选举权。因此,在欧洲,除了无产阶级以外,一切阶级都有了今后可据以建设自己生活的国家基础。这些阶级,尽管还不是完全地,但终究获得大革命以来所一直向往的那个东西。如果说它们的愿望所以没有完全实现并且不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有产阶级各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尖锐矛盾,那么那些一直被蒙骗的阶层则不感觉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取独揽一国的政权,而它们所缺少的东西也没有大到足以使它们因此而甘冒革命的危險。

在欧洲各国中,无产阶级,首先是城市无产阶级,仍然是唯一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仍然充满了革命精神。尽管上述转变根本改变了政治形势,无产阶级却基于 1789 年至 1871 年这一期间、即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经验,仍然对新的革命的迅速到来怀着希望,当然,他们所希望的还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的业已增长的重要性,必将由无产阶级担当起来。不仅是某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和倍倍

尔,而且那些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如俾斯麦,也预料到这样的革命。如果说俾斯麦还在 1878 年时就认为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是必要的,虽然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没有在选举中得到 50 万张选票(就是说,还不到投票人总数的 10%,不到选民总数的 6%);如果说他在当时就抱着一种绝望的想法,想趁着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取得优势的时候就挑起街巷的战斗,那么这就只能用这样一个原因来说明,即他认为无产阶级一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已经极其迫近了。

的确,这样的观点是为许多情况所确证的了的,更不要说前一个世纪的教训了。

70 年代,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来势之猛、期间之长和规模之大,是欧洲所从来没有过的;它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后半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这次危机所引起的资本家集团的灰心丧志,由于食用商品方面的竞争(首先是来自美国和俄国方面的竞争)的影响而更加尖锐化了。这种竞争使西欧农业的整个商品生产都受到威胁。

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普遍贫困,资产阶级对自己力量之日益失去信心,以及 1871 年在法国、1878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开始的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迫害,都表明在最近期间便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1848 年到 1871 年时期所创立的国家制度的基础曾经符合于当时广大居民阶层的要求,所以它还不可能在那些年代中被摧毁。相反地,当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危險愈迫近,有产阶级便愈是围绕着自己的政府紧密团结起来。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通过新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获得了影响政府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可以用来从政府方面争取各种物质方面的让步。他们过去的政治斗争的同盟者对他们说来越是变得可怕,他们便越是想通过政治方面的效劳来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

总之,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在广大居民阶层中所引起的不满,仅仅演变为一个声势微弱的运动;这个运动,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以

俾斯麦的倒台(1890年)达到了自己的顶点;此外,还可以举出法国(1889年)为强力修改宪法开辟了道路的布朗热主义^①。但是,革命形势的一切假象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为期极长的工业萧条也正是在这个政治转变时期结束的。极为生气勃勃的经济繁荣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除了为时不长的几次间断以外,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资本家及其思想家、教授、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又重新扬眉吐气。手工业者从这个繁荣中分沾了利益;农业的状况也有所好转。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使农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特别是肉类和乳类这些在食用商品方面最少受外国竞争影响的产品。拯救了欧洲农业的并不是农产品的保护关税,——无关税贸易各国,如英国、荷兰和丹麦的农业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而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工业的迅速高涨。

但是,工业高涨又是世界市场迅速扩大的结果;这种市场扩大本身使得食用商品从遥远国家流入欧洲,从而引起了农业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西欧以外地区铁路网的发展。

按公里计算的铁路长度如下: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1880—1907 年增长 百分比
德 国	33 634	42 869	58 040	72
法 国	25 932	36 895	47 823	84
英 国	28 854	32 297	37 150	29

与此相比较,下列各国的铁路长度如下:

^①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1837—1891)——法国将军,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他一方面同反动的保皇派进行勾结,一方面企图借助于笼络人心的宣传来为自己树立民主派的声望。他曾在一段时期里利用了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威信。——原编者注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1880—1907 年增长 百分比
俄 国	22 664	32 390	72 020	218
英属印度	14 772	27 316	48 106	226
中 国	11	200	6 698	60 800
日 本	121	2 333	8 067	6 666
美 洲	171 669	331 559	487 506	183
非 洲	4 607	9 386	29 798	547

由此可见,从1880年起,特别是从1890年起,在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铁路建设要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迅速。

同时,海上运输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海运船只的载重量按吨数计算如下:

	1882年	1893年	1907年
德 国	249 000	783 000	2 256 783 (1908年)
英 国	3 700 000	6 183 000	10 838 531
挪威和瑞典	140 000	392 000	1 347 533
丹 麦	67 000	123 000	404 946
法 国	342 000	622 000	739 819
美 国	617 000	826 000	2 077 477
日 本	40 000	108 000	1 115 880

这些数字说明了近20年来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的扩大,以致使得它能够在一个时期里吞吐如此巨量的商品。所有的工业国都因此而对世界市场,从而也对作为扩大对外贸易市场的手段的殖民政策,表现了最大的兴趣。当然,海外领地的占领,从80年代开始,几乎是跟扩大世界市场毫无关系的。从这时开始的殖民政策,几乎仅仅推行于非洲,因为只有非洲,按照欧洲列强的意见,还留存着许多“自由的”土地,亦即尚未被任何一个强国攫取的土地。但是,只要看一看上面的铁路长度表

就可以知道,非洲在这个表中所占的数字是不大的。固然,非洲铁路网的长度从1880年起到1907年从4 600公里增加到将近30 000公里,但是这个数字同亚洲、尤其同美洲比较起来是不大的,因为亚洲铁路网的长度从16 000公里增加到90 000公里,而美洲铁路长度则从171 000公里增加到487 000公里。在非洲,铁路线的极大部分不是在80年代后被侵略的新殖民地,而是在旧殖民地和独立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按公里计算的铁路线长度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阿尔及尔	1 405	3 104	4 906
埃 及	1 449	1 547	5 544
阿比西尼亚	—	—	309
好望角洲	1 457	2 922	6 123
纳 塔 尔	158	546	1 571
德兰士瓦	—	120	2 191
奥伦治共和国	—	237	1 425
非洲其余地方	438	919	7 729
总 计	4 607	9 356	29 798

可见,那些在欧洲列强的新殖民政策下被侵占了大部分的地区,只有7700公里铁路,亦即只占非洲铁路总长的1/4,不到全世界铁路总长的1%(0.8%)。这说明,殖民政策对近20年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复苏是影响极微的。

这次复苏同国外市场的开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国外市场的开辟同80年代起所推行的新殖民政策在时间上是恰相一致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殖民政策同经济繁荣联系起来。同时,欧洲列强的资产者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理想,他们从90年代起就开始用这个新理想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家早在80年代便已甘拜下风的社会主义。这个理想便是要把海外国家并入欧洲的宗主

国,这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外就是一种侵略政策。这种政策造成了想在同一些海外国家推行同样的侵略政策的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没有强大的武装,没有庞大的常备军,没有能够在远洋进行战斗的舰队,是不能够实行帝国主义的。

截至 60 年代止,资产阶级一般都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因为资产阶级当时还采取反对政府的敌对立场。它讨厌常备军,因为常备军所需的军费数目极大,而常备军本身又是敌视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巩固支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常备军是多余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只限于国内,因而不愿意进行侵略战争。

从 70 年代起,资产阶级开始对军队越来越发生好感,而且不仅是在 1870 年的战争中为军阀树立了声望的德国和法国(在德国是由于军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在法国则是由于人们把军队看作是保护国家免于刚过去的战争所带来的那种破坏的手段),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也开始对军队感到兴趣,认为军队是镇压国内敌人和征服国外敌人的手段。有产阶级同政府的关系越是改善,它就越是表示好感。尽管利害矛盾分裂着它们,它们——从最急进的民主派起,到最保守的封建主止——却一致愿意为军国主义付出牺牲。只有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构成反对派。

因此,最近几十年来,政府是无限地加强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却被推到无限遥远的将来。

不应当把急进的反对派同那不参加政府、但却渴望掌握政权的反动集团对政府的敌对关系混为一谈。只有无产阶级才构成急进的反对派。但是在 1890 年的政治转变之后,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失去了自己的革命倾向。

这次转变在德国和奥地利消除了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镇压的最极端的表现。在法国,公社起义以后时期所开始的迫害也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最后停止下来。

固然,在社会改革、工人立法方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获得的,那时候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居民健康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虽然已经达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地步,但是工业资本还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力量,而小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和部分知识分子还对它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那时候还可以指望用微不足道的工人立法就能够满足日益变为强大力量的无产阶级。英国还在上一世纪40年代便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形势。英国在工人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措施——通过关于妇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便正是在这一时期(1847年)实现的。

大陆欧洲远远落在了后面。直到1877年,瑞士才通过了规定男工的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11小时的工厂法。奥地利在1885年也实行了这种最大限度的工作日长度。德国和法国在俾斯麦倒台后的政治高涨时期也获得了某些成就。1891年,德国通过了规定妇女的工作日为11小时的法律,而这在过去是没有法律保障的。1892年,法国也通过了同样的法令。

不过如此而已。从那时以来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德国在近17年来只实行了女工的10小时工作制。男工的权利仍然缺乏法律的保障。

无论是工人立法还是任何其他社会改革都陷于完全停滞的状态。

但是,8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繁荣,使得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依靠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能够无须立法的帮助,而只通过工会的“直接行动”,便改善了自己的状况。德国向国外移民人数的减少便证明了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德国向国外移民的人数如下:

1881年	220 902
1887年	104 787
1891年	120 089
1894年	40 964

1900年 22 309

1908年 19 883

劳动力需求的这种迅速的增长,使工人阶级的许多阶层对资本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在新时代的最初两个十年中间,亦即从1870年起,由于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而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发展得极为缓慢的工会,现在开始非常迅速地成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最为蓬勃的德国。这些国家的工会赶上甚至超过了工人阶级事业的老战士——英国的工会,并且在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例如,奥地利工会会员人数在1892—1907年期间从46 606人增加到501 094人;德国中心工会会员人数在1893—1907年期间从223 530人增加到1 865 506人。在同一时期,亦即从1892年到1907年,英国工联会员人数仅仅从150万多人增加到2 406 746人。可见,英国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90万人,而德国则增加了160万人。

但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会不仅在自己队伍的迅速增长方面超过了英国工会,而且还是工会运动的一种较高的形式。英国的工联完全是自发地形成的,产生它的只是实践;德国的工会则是社会民主党人创立的,他们领导着工会,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依据着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因此,德国的工会运动能够采取更为合理的形式。与按地区和职业分散组织的英国工联不同,在德国建立了大规模的、集中化的产业工会;在这里,比英国的工联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各个工会有关它们的管辖范围的争论,并且避免行会习气和贵族化。德国的工会活动家比英国人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代表,而不仅仅是组织到工会里面来的某一行业的劳动者的代表。英国人只是逐渐地摆脱了世代相传的这种局限性。国际工会运动的领导地位日益转到德国工会,因为德国工会一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比它们的英国同志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大的影响之下。

社会改革的实行越是在议会中受到阻挠,工人阶级通过政治途径

所获得的实际成就越少,工会、特别是德国工会的这种辉煌的发展便越是对广大无产阶级发生深刻的影响。

看来,工会以及合作社的使命,似乎就在于不经过任何政治动荡,而只是利用现有的立法基础,来争取工人阶级地位的日益提高和资本活动范围的日益缩小,用“立宪的工厂”来代替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并且通过这个过渡阶段,不经过任何急剧的破坏和重大的变革而逐渐达到“工业民主”。

但是,就在阶级矛盾似乎日益缓和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将重新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因素。

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除了工会组织以外,同时还建立起另一种日益威胁工会组织的强有力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企业主联盟。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股份公司。最初,只有银行和商业企业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但是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股份公司形式开始日益扩展到工业方面。我们已经指出过,股份公司促进了以生产的日益扩大为基础的、企业向少数所有者手中的集中。股份公司帮助了大金融资本家剥夺投入股份的小额资产;大金融资本家要比小额“储蓄者”远为熟悉现代经济生活的危险航路,有时他们甚至在经济生活中人为地制造波澜和暗礁。由于股份公司制度,投入股份的小额资产也变成政权的工具,为领导股份公司的金融界巨头所完全控制。最后,股份公司也使个别的大金融资本家、个别的十亿富翁和大银行能够在许多同类企业还没有完全为他们所占有之前就受他们的支配,从而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组织。

因此,从90年代起,企业主的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而且,根据现有的立法,它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它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为提高利润建立人为的垄断。这个

目的一部分靠提高产品价格、即加紧剥削消费者来达到，一部分则靠降低生产费用来达到。降低生产费用的办法有种种，但是不管哪种办法，最后不是解雇工人，就是加紧剥削工人，而且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企业主为了镇压工人而结成联盟，要比联合到旨在维持高额价格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更为容易。在这里，企业主彼此之间既无竞争又无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方面，不仅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企业主作为买主和卖主不管在商品市场上彼此如何互相敌对，作为同一种商品即劳动力的买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彼此亲密团结的。

企业主的这种组织给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阻碍。诺曼在上面所引的那篇文章中夸大了这种组织的力量。工会对这种组织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的。但是近些年来，工会的胜利进展受到越来越大的阻挠，它们被迫到处转为守势；企业主越来越多地并且越来越成功地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工会可以进行胜利斗争的有利时机正在越来越少。

工资要求极低的外国工人的日益大批入境，更加加深了这种状况。这是工业繁荣的自然结果；而工业繁荣，由于铁路的修建和航运的发达使资本主义产品能够远销地球的最遥远角落，因而又是世界市场扩大的结果。在新开辟的销售地区，这些产品代替了当地的、主要是农民的手工业品；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居民那里便发展起新的需求并且产生了对货币的需要。同时，在这些落后地区，由于当地工业的衰落，又造成了劳动力的过剩。人们在本国找不到工作、尤其是能够保障工资收入的工作。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运销工业品的新的交通工具、即铁路和轮船，却使他们能够借回程之便作为活的货物涌到这些可以找到有利工作的工业国家。

人和商品的交流，是资本主义工业市场扩大的必然结果。最初，资本主义工业在本国范围内从城市向乡村供应工业品，而从乡村不仅获得原料和食品，而且获得劳动力。当工业国变成输出商品的国

就立即变成输入人口的国家。英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上一世纪初,大批工人流入英国,特别是从爱尔兰。

当然,这些落后成分的流入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造成严重的障碍,但这种流入是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不应该像侈谈社会主义的现代“现实主义政治家”那样,把工业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歌颂为无产阶级的幸福,而把外国人的流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益处的可诅咒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经济进步,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某种可诅咒的东西。如果美国工人不满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流入该国,那么他们就应该反对美国轮船把美国商品运往日本和中国,反对用美国的金钱在这两个国家建设铁路。这两者间是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的。

外国人的流入,正和采用机器,用女工代替男工,用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一样,是压制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不应该因为这种流入的消极结果就反对外国工人,而应该反对资本的统治,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可以保证工人得到稳定利益的幻想。这种利益总是暂时的。最后到来的总是悲惨的失望。这一点甚至在现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上面已经指出过,最近 20 年来德国向国外的移民显著减少。但是同时,移居德国的外国人的数目却增加了。其数目如下:

1880 年	276 057
1890 年	433 254
1900 年	778 698
1905 年	1 007 179

这些数字都是在各该年 12 月 1 日统计的,也就是说,是在农业和建筑业停止工作的时候统计的。这里没有计算那些只是夏季在德国做工,而秋季回归本国的大量外国工人。

企业主联盟的存在,以及工资要求不高的、无组织的、无保护的外国工人的流入所造成的工会斗争的困难,当食用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

就变得加倍的尖锐。

对于维持欧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说来，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个自 70 年代开始的食用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食用商品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工人工资的购买力，缓和了危机时期工资下降的消极后果，并且在危机克服之后使实际工资比名义工资提高得更快（只要农产品进口税没有影响到食用商品价格的低廉）。

但是，近些年来食用商品价格又重新开始提高了。

研究一下英国物价变动的情况是最适宜的，因为英国没有农产品关税对物价的影响。根据康拉德所制的统计表，英国一吨（即 1000 公斤）小麦的价格如下：

1871—75 年	246.4 马克
1876—80 年	206.8 马克
1881—85 年	180.4 马克
1886—90 年	142.8 马克
1891—95 年	128.2 马克
1896 年	123.0 马克

根据德国统计季刊（1908 年第 4 期）的统计数字，最近几年的价格发生了如下的变动。在利物浦，拉巴拉塔小麦从 7 月到 9 月每吨价格如下：

1901 年	129.1 马克
1902 年	——
1903 年	139.3 马克
1904 年	152.1 马克
1905 年	144.8 马克
1906 年	138.0 马克
1907 年	160.0 马克
1908 年	176.0 马克

当然，不同年份的价格的涨落决定于收成的好坏。但是仍然可以

认为,食用商品价格的上涨在现时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

俄国农业经济的破产和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人可以设想,廉价食用商品大量流入欧洲的现象将逐步停止。

例如,在美国,小麦的生产近些年来已经不再增长了。

美国小麦生产情况列表如下:

年 份	耕地面积 (单位:百万英亩*)	收获量(单位: 百万蒲式耳**)	12月1日每蒲式 耳的平均价格
1901	49.9	748	62.4分
1902	46.2	670	63.0分
1903	49.5	638	69.5分
1904	44.1	552	92.4分
1905	48.9	693	74.8分
1906	47.3	735	66.7分
1907	45.2	634	87.4分
1908	47.6	664	92.8分

由此可见,小麦生产与其说在增长,无宁说在减少。而价格则表现出完全确定的增长趋势。

除了食用商品进口额的缩减以外,人为地提高一切物价和运输费用的企业主联盟也促进了价格的上涨。这里更不消说农产品关税。这种关税更加加重了压在劳动者肩上的重担,因为它使国家能够提高食用商品的价格。

除了这一切之外,再加上1907年末开始的带来大批失业的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就变得像现时这样悲惨了。但是不能指望,危机的结束会给无产阶级带来1895年到1907年时期曾经出现的那种繁荣。高

* 英亩——4047平方米。

** 蒲式耳——英国容量单位,等于36.36公升(美国每1蒲式耳等于35.23公升)——原编者注。

昂的食品价格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且更加提高；国外廉价劳动力的流入也不会停止；相反地，随着更加有利的市场情况的来临，国外劳动力将更加大规模地重新流入。此外，企业主联盟将用更加坚固的铁环勒紧工人，而单靠工会斗争是不能打破这个铁环的。

不管工会过去和现在是如何重要甚至必需，我们也不应该指望它会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重新给予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以近12年来所曾经给予的那种强有力的推动。而且，我们应当估计到，我们的敌人能够强大到足以暂时迫使无产阶级实行退却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繁荣年代，当工业已经充分开工并且不断抱怨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工人却不能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即不是用纸币，而是用食品表示的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甚至无宁说降低了。在德国，通过私人所进行的调查，已经判明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存在着这种情况。而在美国，官方承认这种情况涉及整个工人阶级。

从1890年起，华盛顿的劳工委员会就每年对美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某些企业的劳动条件进行调查。近年来劳工委员会调查了4169个工厂和作坊的工资和工作日长度，以及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和主要消费品及其价格。然后就调查所得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判明工人生活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

下面表中的每一栏都是以1890年到1899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为100。因此，101这个数字表示比1890年到1899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提高1%，而99则表示降低1%。

劳工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如下：

年 份	完全就业 工人的周工资	工人所消费的 食品的零售价格	周工资的 购买力
1890	101.0	102.4	98.6
1891	100.8	103.8	97.1
1892	100.3	101.9	99.4
1893	101.2	104.4	96.9

续表

1894	97.7	99.7	98.0
1895	98.4	97.8	100.6
1896	99.5	95.5	104.2
1897	99.2	96.3	103.0
1898	99.9	98.7	101.2
1899	101.2	99.5	101.7
1900	104.1	101.1	103.0
1901	105.9	105.2	100.7
1902	109.2	110.9	98.5
1903	112.3	110.3	101.8
1904	112.2	111.7	100.4
1905	114.0	112.4	101.4
1906	118.5	115.7	102.4
1907	122.4	120.6	101.5

这个统计表首先告诉我们,所谓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高涨”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最近17年来,对工人阶级说来是非常有利的时期。这是美国经济极其繁荣的年代,这种繁荣可能是今后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的。大家知道,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没有享受到美国工人阶级所享受到的那种自由,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像它那样奉行更为现实的政策,这种政策摒弃了任何可能使工人阶级离开旨在改善自身状况的琐细日常工作的革命思想。尽管如此,在经济高涨的1907年,货币工资虽然比前一年提高4%,实际工资却比经济情况极不景气的1890年提高得极少。当然,失业和对明天缺乏信心,是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之间的重大区别;但是,1907年完全就业工人的周工资的购买力却只比1890年有微少的改变。

的确,名义工资是大大地提高了。它在1890—1894年萧条时期,曾经从101.0降低到97.7,也就是说,降低了3%,但是其后便不断提高,到了1907年达到了122.4,也就是说,几乎增加了25%。

相反地,在从1890年到1896年期间,食品价格却比名义工资降低

得更快,也就是说,从 102.4 降低到 95.5,几乎降低了 7%,以致周工资的购买力并不像名义工资降低得那样厉害。1890 年到 1894 年期间,实际工资从 98.6 降低到 98.0,也就是说,只降低了 0.6%,而名义工资则降低了 3%。从 1894 年到 1896 年,名义工资从 97.7 提高到 99.5,而食品价格则继续下降。因此,1896 年工人名义工资的购买力达到 104.2。

从那时起,工人的名义工资就不再有那么大的购买力了。就是在繁荣时期,在十多年中间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一直低于 1896 年。但是却有人把这叫做工人状况的缓慢的然而确实可靠的改善哩。

下述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即甚至在资本家大发横财的工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未能保持业已达到的水平,而且开始下降了。固然,从 1906 年到 1907 年,名义工资从 118.5 提高到 122.4,即几乎提高 4%,但食品价格也同时从 115.7 跳到 120.6,即几乎陡涨 5%,以致甚至在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也降低了 1%。实际上,今天的状况显然还要坏些。不能责备美国的统计家,说他们喜欢把眼前形势看得过于一片漆黑。

这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就是在危机结束和新的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不能指望重新出现不久前的工会斗争的光辉时代。

但是,再说一遍,我们这里决不是说,工会因此已经变成无能为力的或者甚至是多余的东西。工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群众性组织,没有它,无产阶级便将毫无保障,便将注定彻底的贫困化。形势的改变并没有减少工会的重要性,而只是要求它采取其他的斗争方法。凡是工会要同企业主的巨大组织打交道的地方,工会就难以直接从它那里争取到任何东西;但是,因为它们同这种组织的斗争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如果企业主拒绝做任何让步,那么它们的斗争就能够震撼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并且给予政府和议会以影响。

在那些受企业主联盟支配并且对整个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部门里,罢工越来越带有政治性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条件,可以在纯政治斗争,例如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成功地利用群众性罢工作为

武器。

由此可见,工会越来越面临着政治的任务;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工会都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这是拉丁语系国家的工团主义的十足健全的内核;但是由于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根性,遗憾地,它使这个内核干瘪在反议会主义的外壳里面了。虽然如此,工会的“直接行动”仍然只能作为合理的补充和加强,而不能代替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

现在,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比最近 20 年来更加转到政治方面。自然,无产阶级又重新开始对社会改革、工人立法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但是,在这里它正在遇到普遍的停滞,而在当前的力量对比下,在现时的国家制度下,这种停滞是无法克服的。

不应当把停滞理解为绝对的沉寂(在像我们这样不安的社会里这是不可能有的),而应当理解为正在转变为沉寂甚至退化的那种缓慢的发展速度(这是同技术和经济变革的速度及剥削增长的速度比较起来说的)。就是这种极其缓慢的发展也越来越必须通过严重的斗争(主要是工会斗争)来准备和争取,而这种斗争所招致的迅速增长的痛苦和牺牲,日益超过了它最后所能获得的积极结果。

但是不应忘记,正是我们的“实际的”、“改良主义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无产阶级,而且也促使我们的敌人采取日益强有力的反抗。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越是重新转变为政治斗争,企业主联盟便越是极力“唆使”议会和政府进攻工人及其组织,把工人的政治权利化为乌有。

于是,在政治生活中,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又提到首要地位,而宪法问题和涉及国家生活基础的问题也重新具有决定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敌人越来越力图重新削弱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在德国,每当无产阶级获得重大胜利之后,选举时用复票选举权^①来代替普遍平等选举权的威胁总是要增加。在法国和瑞士,军阀残酷地迫害罢

^① 复票选举权——选举时进行几次投票的权利,例如,可以同时居住在居住地点以及企业和科学机关等所在地投票。这种权利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得到额外的选票。——原编者注

工工人；在英国和美国，法院限制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因为议会和国会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种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仅限于反对钳制言论的斗争。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争取建立新的国家基础，使得国家机器永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那么它的处境便将越来越困难。如果撇开俄国不说，那么德意志帝国现在便是最需要这一点的国家。议会选举制度本身越来越不利于城市无产阶级。1871年议会选举时的划分选区的办法，现在仍然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是我们知道，从那时以来城乡之间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871年时有2/3的居民住在乡村，而有1/3的居民住在城市，那么现在的比例则完全不同了，尽管选区的划分依然未变。乡村地区越来越比城市更占优势。在最近的几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共得选票总数的29%，而仅得议席10.8%。相反地，中央党得选票总数的19.4%和议席的26.4%，而保守党人则得选票总数的9.4%和议席的15.7%。

这两个党所得选票总数少于社会民主党，但是却得议席42.1%，即比社会民主党多三倍。在比例选举制下，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所得的议席不是43个，而是116个；保守党和中央党则总共得议席115个，而不是164个。

继续保持目前的选区划分，对于最落后的居民阶层说来实质上意味着复票选举权，而这种选举权的不平等随着城市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而逐年加强。

同时，我们现行的投票制度也充分说明，无论在乡村或小城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几乎像在经济上一样受着有产阶级控制，因为现时所采用的选票封筒还不如过去的制度能够保持选举的秘密。

当然，仅仅消灭这些缺点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议会本身既无威信又无权力，那么仅仅扩大我们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力量又有什么用处呢？首先应该为议会争取到这种权力，确立起真正的议会制度；帝国政府应当成为帝国议会的委员会。

但是,帝国议会的不幸不仅在于帝国政府不听从它的意旨,而且同样地也在于帝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国议会的职权范围是极受限制的,它处处都要同各邦及其政府和议会的主权发生冲突,同它们的狭隘的分立主义发生冲突。当然,各小邦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但是在帝国议会的道路上横阻着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普鲁士及其议会的三级选举制。首先必须粉碎普鲁士的分立主义。普鲁士邦议会必须不再成为各种各样的反动派的支柱。争取北德意志各邦议会、首先是普鲁士邦议会选举的秘密平等选举权,以及把帝国议会变为国家的决定力量,也是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

如果通过这种办法能够把德国变为民主国家,那么这也还不足以无产阶级开辟道路。现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德国无产阶级,可以由此取得解决工人立法问题的钥匙;但是如果国家缺少实现社会改革所必要的足够资金,那么仅仅这一点对无产阶级说来还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国家的全部资金都用于加强陆海军备。陆海军军费的不断增加,使得现代国家甚至忽视那些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也有利于全体居民的文化方面的任务,如改革国民教育、改善交通(运河和公路)等等;这些措施会大大提高国家的生产及其竞争能力,因此也是以资本主义的纯业务利益为转移的。

但是,由于全部资金都为陆海军所占用,而且只要存在着现时的制度则今后也仍将为陆海军所占用,因此不可能拨出大笔款项来实行这些措施。

废除常备军和裁减军备——这是国家实行重大的社会改革的必要前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也日益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能创造这个前提条件。苏特涅式^①的和平空谈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分子向这个目的前进一步。

现时的军备竞赛首先是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结果;只要你参与

^① 考茨基显然指的是女作家苏特涅·贝尔莎(旧姓金斯基,世袭伯爵)——资产阶级的国际反战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原编者注

这个政策，那么宣传和平便是没有意义的。谁赞同殖民政策，谁也就应当赞同军国主义和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因为给自己提出一定的目的而又拒绝达到这个目的所必要的手段是荒谬的。我们朋友中那些幻想世界和平和裁军，参加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国际性会议，同时又认为殖民政策（当然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但仍然是殖民政策）势在必行的人，应当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们很像 60 年代普鲁士的进步党人；进步党人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害怕革命，力求借助于无往不胜的霍亨索伦王朝达到德国的统一，而不去采取革命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作为民主派的政治家，又力图限制军国主义，尽可能不把实现这个任务所必需的军费交到霍亨索伦王朝手中。这种矛盾终于断送了他们。

在当前的形势下，这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最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无产阶级必须付诸实现的“实际的”政策。在这些任务还没有解决以前，由于企业主联盟的发展、食品价格的腾贵、落后工人阶层的流入工业，以及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实行某种社会改革和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国税的增加，因而无产阶级就不能指望有任何稍微重大的“改良主义的”高涨。

改革帝国议会的选举制度，争取在秘密投票条件下实现邦议会选举（特别是在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平等选举权，争取帝国议会能够驾御各邦的政府和议会——这仅仅是首先必须争取完全民主和国家统一的德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则是全体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

有些人可能认为，解决这些任务也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东西。难道瑞士不就是符合上述一切要求——完备的民主制，民兵制，没有任何殖民政策——的国家吗？然而在瑞士，社会政策的发展也并不十分顺利，企业主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剥削和奴役着无产阶级。

因此，应该首先着重指出，瑞士并没有置身于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军备竞赛之外，相反地，它也在花费不少金钱来热心于军备。军费支出的

一部分虽然是由各州来支付的,但是联邦的支出却在飞快地增长。下列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单位:百万法郎)

1875年	39
1885年	41
1895年	79
1906年	117
1906年	129
1907年	139
1908年	151

军费支出也像关税收入一样特别迅速地增长。其数字如下:

	联邦军费支出	财政关税部收入
	(单位:百万法郎)	(单位:百万法郎)

1895年	23	4
1905年	31	64
1906年	35	62
1907年	42	73
1908年	40	70

如果把几乎彼此相抵的邮政和电报的收支(支出为 6300 万,收入为 6600 万)抛开,那么 1908 年的收入为 8100 万,其中关税收入占 7000 万,而支出为 8800 万,其中军费支出占 4000 万、国债利息占 600 万。

由此可见,甚至在瑞士,军事化也占用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而它的开支还在继续迅速增长着。

此外,权利是继承的、恩赐的还是在顽强的忘我斗争中争取的,在这中间也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地认为,我们不必经过斗争就可以不知不觉地从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转到民主制,从好战的帝国主义“长入”自由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只有当人们认为,今后的全部发展将只在经济基础上进行,而无须乎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任何变化的时

候,才会产生这种“长入”的思想。而当人们发觉,只要无产阶级想继续沿经济高涨的道路前进,那么这种变化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迫切必要的,那时候,政治斗争、政治动荡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也就产生了。

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必然要大大加强起来;无产阶级如果不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它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确立民主制和消灭军国主义。

因此,在现代的大国中,确立民主制和消灭军国主义,必将造成与瑞士久已存在的、传统的民兵制和共和制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种改造工作越是仅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个结果也就越加明显。无产阶级不用指望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找到忠实的盟友。过去我们曾经指望在资产阶级阵营中,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找到盟友。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长期希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革命,至少是在初期,如在 1848 年、甚至在 1871 年的巴黎所曾经发生的那样。当民主派的政党和政治家越来越让自己的阵地的时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仍然希望把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让他们关心我们的革命目的。这种希望反映在我写于 1893 年的上引文章中,而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恩格斯 1895 年所写的《导言》中: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①

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这再一次证明,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高估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时侯,我们就在自己的估计和“预言”方面犯了错误。但是同时这也证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狂热从党内驱逐了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指责,究竟有多少根据。如果说恩格斯曾在 1894 年反对法国的土地纲领,而我在一年之后反对德国的土地纲领,那么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把吸引农民到自己方面来看作是多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第 523 页。

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人们建议给我们的那种吸引农民的特殊方法是不正确的。在过去这段时期里,我们的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党的同志曾经企图用这种方法从农民那里获得成就,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对于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中等居民阶层的广大群众中间可以说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宣传,但是今天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这种观点并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我们知道,与其责备马克思主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无宁应该责备它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从这一点上来说,上述观点是近年来惨痛经验的结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狂热”,只是帮助我们承认这个经验并且理解这个经验,也就是说,帮助我们揭示它的原因,弄清楚究竟什么东西是实行成功的“现实政策”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确信,当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时候,这种工作也使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我们中间有些人希望,资本家的卡特尔和瑞恩^①,也会像使中等居民阶层吃苦头的关税政策一样,把这部分居民引导到我们队伍中来。实际上恰恰相反。农产品关税和企业主联盟是总工会同时出现的。结果,手工业者从各方面受到压制。关税和企业主联盟引起了食品和原料价格的上涨,而工会则在同时争得了工资的提高。当然,提高的照例只是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因为物价比工资增长得更快。虽然如此,围绕着工资的斗争却引起小手工业者的恼恨;他们把企业主联盟和主张提高关税的政党,看作是反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斗争的盟友。他们认为,是工人,而不是关税和卡特尔,不仅应该对工资的提高负责,而且应该对原料和住宅价格的上涨负责,因为在他们看来,原料和住宅价格

① 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某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关于规定商品统一价格和划定销售地区的协定。

瑞恩——资本家间关于通过市场收购或仓库囤积的办法来提高某些商品价格的临时协定。——原编者注

的上涨是工资提高的结果。

物价的上涨也对小商人的状况发生不良的影响，因为他们的顾客（大部分是工人）的购买力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但是，他们的愤怒不是发泄在关税政策和企业主联盟上面，而是发泄在工人身上。而且，随着工人为了避免物价上涨的后果而组织起消费合作社，他们的这种愤怒也日益加强，因为消费合作社排除了商业的中介。

物价的上涨总要加剧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矛盾，因而加强了作为食品的买主的无产者同作为食品的卖主的农民之间的矛盾。

不应忘记，工人在商品市场上起着特别的作用。除了工人以外，其余一切人在商品市场上都不仅是商品的买主，而且是商品的卖主。在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这些卖主作为其他商品的买主所损失掉的东西，还可以依靠他们自己的商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赢取回来。只有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主，而不是作为商品的卖主出现在商品市场上。他们的劳动力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决定于它自己的独特的规律，因而它的价格的改变并不立即引起工资的改变。要知道，劳动力并不是脱离人而独立的产品，它同人的整个生命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对其他商品说来并无任何意义的生理条件、心理条件和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使货币工资比其他产品的价格具有较为稳定的性质。工资只是非常缓慢地并且只是在某种程度内随着物价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在物价低落时，工人要比其他商品购买者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在物价上涨时则吃亏最大。工人在商品市场上的地位是同卖主的地位直接对立的，尽管他生产一切东西，而只消费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他是处于消费者的地位，而不是处于生产者的地位。因为他所生产的产品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剥削他的资本家。正是资本家，作为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和卖主，随同这些产品出现在商品市场上。而工人则只是作为食品的购买者出现在市场上。

这也就决定了工人同这些产品的卖主、从而也同对他来说是卖主的农民，发生对抗的关系。不仅在农产品关税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情

况下(例如在企图提高牛奶价格时),反对农民最坚决的也正是工人。

但工业中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也同样在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民中间引起愤怒。工业繁荣、工会势力强盛和工会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农业中劳动力不足的时期。不仅是男女雇农,甚至农民的子女也越来越向往工业,逃避农村中野蛮的劳动条件。当然,该诅咒的“社会”^①,被认为是因此而发生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罪魁祸首。

因此,最初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核心并且是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而后来虽然不大积极,但仍然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盟友的那些阶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情况在“被马克思主义毒化了的”德国要较为好些,而在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则远为严重。

在各大国中,中等居民阶层同无产阶级的敌对关系,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问题上的正相反对的立场而更加恶化。凡是不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并且否定社会主义的人,如果他不愿意陷于绝望,他就只得信仰殖民政策。这是资本主义还能够向它的拥护者展示的唯一前景。但是殖民政策是同承认军国主义和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在利益上同手工业、中间商业和食品生产漠不相关的中等阶层的代表、即知识分子,如果不走向社会主义,便会因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同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分道扬镳。布伦坦诺^②和诺曼之流,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以及它的民主趋向表示好感,另一方面又都是海军和世界政策的热烈崇拜者;他们只是在事情还不触及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时候才是社会民主

① “社会”一词俄文为“Соци”,显系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或社会主义(социализм)这两个词的以讹传讹的说法或蔑称。——译者注

②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只承认不革命的“阶级”斗争,号召建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和平。认为通过建立改良主义工会和实行自由主义的工厂立法,就能够消除阶级矛盾。——原编者注

党的朋友。

因此,这种政策似乎旨在孤立无产阶级,并且在无产阶级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扩展自己的政治力量的时候,用这种办法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陷于一筹莫展。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政策却仍然只能成为摧毁统治制度的支点。

九、革命的新时代

我们已经知道,瑞士的军费支出是在如何迅速地增长。然而,这不过是军国主义大国的情况的一种微弱的反映罢了。以德意志帝国为例,按照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所发表的数字,其军费支出如下(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1873年	1880/ 81年	1891/ 92年	1900年	1909年
陆军	308	370	488	666	814
海军	26	40	85	152	409
殖民地管理费	—	—	—	21	32
抚恤金	21	18	41	68	115
国债利息	—	9	54	78	171
总计	355	437	668	985	1541
每年增长额	12	21	35	62	
国家支出总额	404	550	1118	2056 或 1640①	2850
每年增长额	21	52	58	88	

我们看见,支出在不断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帝国成立的最初十年,每年平均增长 2100 万,而在最近十年则每年平均增长 8800 万。在最后几年中,这个增长额每年已经达到几亿(1905 年——

① 从 1900 年起,邮政、铁路和国家印刷所的支出被列入支出栏内,而过去这些开支是不在该栏内列示的。1900 年,这些开支达 4.16 亿马克。——考茨基注

2195 亿;1906 年——2392 亿;1907 年——2810 亿;1908 年——2791 亿;1909 年——2850 亿),也就是说,在四年中间总共增加 7 亿。

这个增长额主要是用于军备方面的支出,并且首先是用于海军方面,而不是用于陆军方面。从 1891 年到 1909 年,帝国的人口从 5000 万增加到 6400 万,亦即增加了 1/4;而在同一时期,陆军方面的支出几乎增加一倍,抚恤金和国债利息几乎增加两倍,海军支出则几乎增加四倍。这种疯狂的增长在现存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是不会停止的。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化和自然科学成就在生产中的利用相联系的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影响到军事方面,造成这方面围绕新发明的不断竞争,使业已达到的成就相继失去价值,使国家政权手段日益加强。但是与工业方面的情况不同,这种情况在军事方面并没有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而只是不断扩大战争时期的破坏,不断提高和平时期的非生产性支出。

不仅是技术的发展,而且旨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至少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列强的世界政策,也使列强必须不断加强它们借以实现其统治的手段。只要存在着争取世界霸权的政策,疯狂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地要日益加剧,直到弄得精疲力竭为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帝国主义是现存社会所仅余的唯一希望和唯一前途。除此而外便只有一条出路——社会主义。因此,在无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政策、克服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以前,这种疯狂行为是只能有增无己的。军备竞赛越是继续下去,它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就越大。而且,每个阶级都将日益顽强地力图把这种重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军备竞赛将越来越加剧一切阶级矛盾。

在德意志帝国,基本的负担当然是压在工人肩上的。这个负担在工业繁荣、食品价格低廉和工会运动顺利的年代已经足够沉重了。而在危机、物价腾贵和企业主联盟力量占优势的时期,这个担子便将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而且,日益增长的赋税重担不仅减少工人的收入和降低他们工资

的购买力,而且还严重威胁工业进步本身,而据说世界政策原是应该有助于这种进步的。

美国是德国工业的最危险的竞争者。由于德国现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德国的工业较之美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固然,美国也实行着更高的保护关税,但只是对工业品,而不是对农产品。美国拥有最低廉的食品,并且自己生产着几乎一切原料。同时,美国还具有在自己的比邻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这种优越性。美国不必每年从生产中抽出 50 万人来做毫无用处的玩偶兵游戏。

随着欧洲军国主义的加强,美国在工业方面的优势日益增长,而欧洲的经济发展则日益缓慢,欧洲工人的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加快,正在要求工人做出最重大的牺牲。

当然,美国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从而也走上了加紧武装的道路。从美西战争^①时起,美国的陆海军支出便日益增长。但是,这一点给美国造成的损害要比欧洲列强为少,因为它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在美国的整个国土上只有 7 万士兵。无论在工业竞争方面还是在军备竞赛方面,美国都能比其他一切国家坚持得更久。

关于美国,我们拥有如下的材料:

年度	人口 (单位: 百万人)	国债 (单位:百 万美元)	陆军支出 (单位:百 万美元)	海军支出 (单位:百 万美元)	出口额		
					粮食	原料	工业品
对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1880	50	1724	38	14	56	29	15
1890	63	725	45	22	42	36	21
1900	76	1023	138	56	40	24	35
1907	86	894	125	98	28	32	40
1908	87	897	140	119	28	30	42

^① 这里指的是 1898 年的战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掠夺了过去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夏威夷,确立了对古巴的控制。——原编者注

我们看见,国债整个说来没有增加。截至 1890 年,它有了显著的减少。从 1890 年起,由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国债也像陆军支出一样开始增长。但是到了 1907 年,尽管陆海军的支出增长了,国债却重新减少。

上面的表告诉我们,美国的工业品出口额是在如何迅速地增长,美国如何日益作为工业国而不是作为农业国出现在世界市场上。

德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在 1908 年达 70 亿马克,其中工业品占 43 亿马克(即 62%)。在美国的国产商品出口总额 80 亿马克(18.35 亿美元)中,工业品占 30 亿马克(7.5 亿美元)以上。在 1890 年,德国的工业品出口额为 21.47 亿马克,而美国的工业品出口额只有 8 亿马克(1.79 亿美元)左右。因此,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出口额增加了 150%,而美国则增加了 300%。

由此可见,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已经开始紧紧地追上我们。

美国在 1900 年到 1908 年期间,国债额减少了 1.3 亿美元(5 亿马克),而德国则在同一时期增加了 15 亿马克。从那时以后,支出和赋税又有了增加(增加了 5 亿),但是仍然填不满战神的欲壑。

这个重担首先压在工人阶级的肩上,对工业也发生着有害的影响,使竞争发生困难;而这又反过来打击了工人,因为在竞争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工人。但是对工人的压迫也有它的不能超越的一定界限,因此军备竞赛归根到底必将使工业的发展陷于瘫痪状态。

同时,军备竞赛也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且加强战争的危险,虽然据说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不断的、疯狂的扩军备战,对各国政府说来越来越变得不能忍受了,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把它们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看作是扩军备战的原因。要它们这样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策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支柱。因此,各国的统治阶级都极力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德国人把罪过推到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则把罪过推到德国人身上。因此,普遍的神经过敏和相互猜疑日益加剧,而这反过来又促进更加疯狂的军备竞赛,直到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惨

痛的结局胜过没有结局的惨痛。

如果不是革命的抉择较之在武装和平之后更有可能在战争之后发生,这种形势早就要导致战争了,因为除了革命以外,只有战争才是各国从疯狂地虚费国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出路。近 30 年来,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阻碍了任何战争在欧洲的爆发,而现在更迫使各国政府顾忌战争。但是各国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枪炮终将自行开火。

另外一个因素也在这方面起着作用;这个因素比军备竞赛更加使世界政策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失去发展的最后可能性。

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文明各国的人民才能独立发展的观念,是殖民政策或帝国主义的基础。他们按照对待自己持友好态度的程度,把其他种族的人分别看做幼儿、白痴或驮畜,但总归是可以任凭自己支配的下等生物。甚至社会主义者,只要一开始执行殖民政策(当然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便也抱着这种看法。但是事实很快就告诉他们,我们党关于一切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不是空洞的辞句,而是极其现实的力量。

固然,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民族,近几百年来几乎处于无防御的状态,并且不能进行长期的抵抗。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地落后,像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在我们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的鬼话中得到科学的表现——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民族只不过是欧洲技术的优势以及归根到底仍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欧洲天才的优势所压倒罢了。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民族,除了只有万余人口的少数最落后部族外,完全能够接受欧洲的文明,但是迄今为止他们一直缺乏必需的物质前提。

资本主义的传播,长时期来几乎没有给现存的情况带来任何变化。资本主义输出业者最初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输出到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地区(当然,现在的美洲和澳洲也是在欧洲文明之内的)。同时,这种地区主要地限于毗连水路干

线、海岸和几个大河沿岸的地区。但是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对海外领地的政策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工业国对落后国的产品输出,这些年来也变为现代工业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输出。

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特别是在东方(包括俄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此外,纺织业、冶金业和矿业这样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在那里也得到了同样迅速的发展。矿业使南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上一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生产资料的输出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新繁荣。在80年代前半期,工业品出口方面的实际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已经不能进一步发展了。但是,生产工具的输出使资本主义工业得到新的、完全出乎预料的、辉煌的发展。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输出,保证了处于欧洲文明范围之外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且迅速地消灭了那里从过去保存下来的旧的经济关系。但是同时,这也使东方传统的思想方式宣告终结。随着从欧洲传来新的生产方式,迄今处于野蛮状态的各族人民的精神能力也突然发展起来,并且达到了欧洲的水平。但是不能够说,那里风起云涌的新思潮是充满着对欧洲的热爱的。新的国家成了旧的国家的竞争者,而竞争者总是敌人。欧洲精神在东方国家的传播,不是使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朋友,而是成为欧洲的平权的敌人。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我们从上文中已经知道,对力量的自觉在社会生活中是起着很大作用的;那些虽然拥有足够的独立自主能力,但仍然没有自觉到自身力量的新兴阶级或民族,势将长期受人支配。这种情况甚至在目前也得到证实。由于欧洲民族常常战胜东方民族,使得后者认为对欧洲民族的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欧洲人也抱着这种看法。他们的殖民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看法上面的。这种殖民政策使他们能够支配其他民族,像牲畜一样贩卖和交换这些民族的人民。

但是一旦日本人首先打破僵局,便马上影响到整个东方。整个东亚和伊斯兰世界都已经奋起,并且开始执行抵抗任何外来统治的独立

政策。

这就使帝国主义的发展受到阻遏。它现在仍然在停步不前。但是帝国主义是必须向前发展的，正像为了使资本主义剥削不致成为完全不可忍受而必须日益扩展资本主义一样。

赤道非洲是可以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硕果仅存的地区。那里的气候是当地人的最好的盟友；欧洲的士兵不能在那里进行战斗，因而欧洲人必须招募当地人作为雇佣军；这就造成了一个因素，以致有朝一日这些雇佣军会掉转枪口对付自己的长官。

在亚洲和非洲，到处充满一种叛逆的精神，欧洲的武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欧洲的剥削的抵抗也日益增长。向任何一个国家移植资本主义剥削，都必然地同时在那里留下反抗这种剥削的火种。

这首先表现为推行殖民政策的日益困难和殖民政策支出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殖民主义狂信者安慰我们说，殖民地现在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会为将来的丰富收入所补偿。实际上，为保持殖民地所必需的军费支出今后还将不断地增长。而且事情还不仅限于此。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日益接近于这样一种时刻，那时候一时的愤怒将转变为公开的、持久的愤怒，并且终将推翻外来的压迫。英国在东印度的领地最接近于这种状况；而失去这些领地，对英国说来就意味着破产。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过，从日俄战争时起，东亚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奋起反击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是在同欧洲无产阶级的那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虽然在跟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却有着他们自己的不同目的。他们起来斗争，不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使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同外来的资本主义相抗衡。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存任何幻想。正像布尔人^①是最凶恶的吸血鬼，而日本的统治者是社会主义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一样，青年土耳其派也认为对付罢工工人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批

^① 南非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译者注

判地对待欧洲资本主义的欧洲以外的敌人。

但是这决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会削弱欧洲的资本主义及其政府，并给世界局势带来政治动荡的因素。

我们知道，从1789年到1871年期间，在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为自己争取到迅速发展所必要的政治条件以前，欧洲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日俄战争时起，亦即从1905年起，东方也进入了这种持续的政治动荡时期。东亚和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以及俄国各族人民的状况，现在在许多方面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欧资产阶级的状况类似。当然，两者的条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差别首先就在于，时间已经差了整整一个世纪。一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内部业已形成的社会条件本身，而且取决于对该国发生影响的整个周围世界的条件。在俄国、日本、印度、中国、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可能存在着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所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关系。但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一时期所已经取得的阶级斗争经验，却会对他们发生影响。此外，他们争取本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有利条件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和外来压迫的斗争，而这个斗争是1789—1871年革命时期西欧各国人民所无须进行的。

这些差别使东方不致简单地重演百年以前在西方所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变。尽管如此，形势的相同点却是如此之大，以致东方现在也正在开始一个类似的革命时期，即密谋、政变、叛乱、反动、新的叛乱和不断的动荡的时期，而在这个地区还未建立起足以保证自由的发展和巩固的民族独立以前，这个时期是会继续下去的。

由于世界政策的推行，东方——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已经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同西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使得东方的政治动荡也会引起西方的不安。各国费了很大力气才争取到的政治均势，现在由于这些国家无力对之发生影响的意外变化而变得不稳定；被认为不可能和平解决因而被束之高阁的那些问题，例如对巴尔干各国的关系问题，现在突然重新发生并且要求限期解决。惊慌不安、互不

信任、普遍的无信心，以及原来就被军备竞赛弄得十分紧张的神经过敏状态，都达到了顶点。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而近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也就意味着革命，它将引起极其重大的政治变革。恩格斯早在 1891 年时曾经认为，即使可能引起革命并且可能使我们取得国家政权的战争爆发起来，对我们说来也不是什么大走红运的事，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一段时期里，无产阶级与其在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上冒险，还不如利用现存的国家基础更能稳步前进。

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更加平静地等待日益迫近的战争了。既然无产阶级已经从现存国家基础吸取了它所能从那里吸取的全部力量，既然这个基础的改造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就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

无产阶级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它要尽一切努力不听任战争情绪的发展。虽然如此，如果战争终于爆发，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可以满怀对未来的希望等待战争的结局了。

从 1891 年起，无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增长了，在组织上巩固了，而且在道义上也取得了巨大的优势。20 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还面对着帝国的统治者在争取创建帝国的斗争中所赢得的巨大威信。现在，这种威信已经烟消云散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思想越是遭到更大的破产，社会民主党便越会成为争取实现伟大思想和伟大目的，并且能把导源于这种思想的能力和忠诚发动起来的唯一政党。

相反地，在敌人的队伍里面，由于意识到他们的领袖为贪污受贿和愚昧无知弄得日益退化，正在弥漫着一种怯懦和消沉的情绪。他们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领袖的正义性，这些领袖正是在形势变得日益困难的现在，越来越表现出而且今后还要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的庸碌无能，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毫无价值。

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的或者是个别人物造成的；原因就在于情势本

身。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要阶级或国家一旦从革命阶段过渡到保守阶段,只要它一旦不再为自己的生存或巩固而斗争,而开始满足于现状,只对现状做微小的改善,它的思想领袖和领导者的精神眼界便会马上变得狭窄起来。他们对重大问题的兴趣消失了,他们的胆略不见了;勇敢的思想家和战士被看做不稳分子并受到冷遇。而勾心斗角和优柔寡断则大为盛行。

此外,那些不需要再为伟大理想而斗争的阶级和国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不再有对于一般阶级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无私关怀,而只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鼓舞那些争夺政权的人的,已经不是为社会创造某种伟大的新事业的愿望,而只是为自己争取荣华富贵的野心。他们的无耻的升官发财思想,还表现在当权人物不愿意那些最能为公共事业服务的人留在自己身边,而只喜欢那些最善于阿谀逢迎自己的个人需要和爱好的人。

除了一切当权者在保守阶段都有的这些道德衰退和智力衰退的一般原因以外,还有来自资本主义的特点的特殊原因。

从前,剥削阶级同时也就是统治阶级。至少,它们也在国家机关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相反地,资本家阶级则由于埋头于自己的龌龊勾当,而把政治交给那些实质上不过是他们的帮办的人;在民主国家交给那些干练的政客、国会议员和新闻业者;在专制国家交给廷臣;而在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则交给这些分子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有时是前者占优势,有时是后者占优势。

当资本主义剥削还为数甚微之时,资本标榜“积累”的口号,而且力图把这一口号强加给国家机关。小资产阶级不管愿意与否总得忠于这一口号;相反地,大资本则随着剥削的加紧而日益挥霍和奢侈,这种挥霍和奢侈终于采取了像军备竞赛那样的疯狂的速度和荒谬的形式。

从前,国家的统治者,就其富有和奢侈来说,是他的全体臣民所望尘莫及的。现在,甚至盘踞最高地位的政治家和国事活动家,在这方面

也日益为金融界的巨头所超过。当权的国事活动家要用国库款项来提高自己的正常收入已经不那么简单,特别是在议会制国家里,因为在那里必须重视呼吁实行节约的选民和纳税人的意见。国家收入的增长额中军备用款越大,要做到这一点也就越加困难。

如果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排场方面落后于花销越来越大的大剥削者,他们就只有在合法的收入来源以外,利用自己在国家中的势力舞弊营私,寻找非法的收入来源。他们利用自己对国家机密的熟悉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来进行市场投机;他们利用大剥削者的好客来过寄生式的生活,要大剥削者替他们支付债款,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径直接受贿赂,出卖自己的政治权力。

这种坏现象是普遍的,它在一切有大剥削者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极为流行。它首先侵入最有势力的政治机关:在民主国家里是国会议员和新闻业者,而在专制国家里则是宫廷集团。它到处引起深刻的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剥削和铺张浪费越是严重,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的欲望越是增长,国家政权越是强大,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越是宽广,这种道德败坏现象便越是迅速地腐蚀周围的一切。

当然,不能认为那些沾染了贪污腐化习气的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也不能认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都是出卖节操的人。如果这样认为,那便是夸大其词。但是,贪污腐化这种歪风邪气正在这些集团中日益增长,以致需要有越来越大的意志力,才能不为这种歪风邪气所熏染;而贪污腐化的风气越是盛行,贪污腐化的手法越是高明和隐蔽,以致沾染这种习气的人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堕落,那么沾染这种习气也就越加容易。

总之,我们知道,随着政治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日益要求国事活动家有渊博的知识、严肃认真的作风、坚毅果断的精神和宽广的眼界。但是,正是在这种时候,在统治阶级中,科学的态度却日益为夸夸其谈所代替,认真作风日益为轻率马虎所代替,争取达到崇高目的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日益为个人的升官发财主义和勾心斗角所代替,沉着果断的坚

毅精神日益为不断地摇摆于公开的残忍和怯懦的退缩之间所代替。同时,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的风气也日益发展;这既表现在巴拿马运河舞弊案的可耻事件上,又表现在当权者同骗子的勾结上,更几乎普遍地表现在军用物资供应者的舞弊上:有的人供应不牢固的装甲板,有的人供应不能使用的大炮,有的人则从本国敲取两倍于外国的价钱。军事供应早就成了许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军事物资供应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政府保持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对决定战时和平时各种问题的政策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现在,这些供应者还是最大的工业家,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剥削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反对国内敌人或国外敌人的残酷战争,并且对于那些由见风使舵分子组成的政府发生最大的影响。

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来自邻国的挑衅或进攻,而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来自本国统治者的挑衅或进攻,而且是可能引起难以弥补的灾难的进攻。这一切都可能影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新的动向。

当然,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是在劳动人民所无从接近的圈子里实现的。为了揭穿制度的全部腐朽性,需要有像日俄战争那样的大灾变。平时,只有当什么事情弄巧成拙的时候,整个黑幕才被羞答答地掀起一角。这种暴露对无产者的阶级觉悟不发生多大的影响。他们早就对统治阶级抱着敌视的态度,并且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品质根本不存任何幻想。

小资产阶级则是另一回事。他们越是背叛自己的民主传统,越是托庇于自己的政府并期待它给予援助,越是信任自己的政府,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当他们知道这些政府的堕落的时候,当这些政府威信扫地的时候,他们的失望也就越大。

同时,大资本主义卡特尔对小资产阶级的迫害越来越加紧,而国家对小资产阶级的钱袋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决不会有助于加强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信任。

但是,当统治者的庸碌无能、敷衍塞责和贪污腐化轻率地导致惨祸、战争和政变,因而使国家遭受无可计量的灾难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最后终将不能遏止自己的愤怒。那时候,小资产阶级的盲目的愤怒将立即指向当时的当权人物,而且他们过去越是觉得自己的统治者尊严和伟大,这时的愤怒也就越是强烈和无情。

近十年来,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憎恨无疑地加强了。因此,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策中应该估计到,它将不得不单独地进行未来的战斗。马克思曾着重指出过,小资产者作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经常摇摆于两者之间,有时靠拢这一方面,有时靠拢那一方面。我们对他们不能寄托任何希望,整个说来他们总是靠不住的;虽然个别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可能成为优秀的党员,但是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敌视可能仍然继续增长。但这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朝一日小资产阶级会由于难以忍受的赋税负担的重压和当权人物的意外的道德崩溃,而整个转到我们方面来,并且或许能够从而清除我们的敌人,保证我们获得胜利。不过,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小资产者将不能做出更合理的举动,因为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大大改善一切非剥削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以及现在在小资产者或小农的地位上苟延残喘的人的生活。

不管小资产阶级目前怎样敌视我们,他们决不愿意成为现存制度的巩固支柱。和社会的其余一切支柱一样,小资产阶级也正处在摇摇欲坠和四分五裂的状态中。

人民越来越对现存制度的巩固性失去信心,而实际上现存制度的巩固性也正在日益削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普遍动摇的时期;而由于这种状况已经继续了整整一代的生活期间,所以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迅速地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目前状况,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一个世纪之久。

但是,在这种普遍动摇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是摆得十分明确的。我们已经揭示了这些任务。无产阶级如果不改变它据以进行斗争的国家基础,就将不可能继续前进。德国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就

在于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争取在整个帝国和个别邦国(如普鲁士和萨克森)确立民主;它的最近的国际任务,就在于反对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

我们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拥有的手段,也和这些任务一样是明确的。除了以前我们曾经采取过的各种手段以外,现在又加上了群众性的罢工;我们还在90年代初期就从理论上承认了这种罢工,而从那时以来它在有利条件下所具有的效果,也一再为实践所证明。如果说自从1905年的那些光荣的日子^①以来,群众性罢工已经多少退居次要地位,那么这只是证明,总罢工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收到效果的,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总罢工将是愚蠢的。

在这方面,形势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谈到未来的战斗时,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在这个战斗中起作用的还将有许多现在完全无法估计的其他因素。

无法事先估计我们的国事活动家的立场;他们迅速地更替,他们的情绪也迅速地发生变化。不应当指望他们有首尾一贯的、目标明确的政策。

也无法事先估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向,他们时时从一方面跑到另一方面,以致我们的秤盘也要随之不停地上下摆动。

更难估计的是千头万绪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涉及许多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对内政策所特有的不稳定性,是要更加强烈地影响到它们的对外政策上面的。

最后,对东方各国所发生的变化也是无法做任何估计的;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新的、过去没有研究过的因素在开始发生作用。

现在,这一切因素在不断地、最紧密地互相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将在今后为我们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但是,在这种普遍动摇的情势下,社会民主党本身越是屹立不动、坚持不渝,那么它也就越会巩固壮大起来。与不稳定的、依情绪为转移

^① 1905年初鲁尔煤矿工人曾举行群众性罢工,同年9月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曾通过总政治罢工的决议。——译者注

的政策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越是能保证它采取首尾一贯的、目标明确的实际活动,它就越能提高工人群众对自己力量的自觉。社会民主党越是在一切权威扫地的时期表现出毫不动摇性,它自己的威信也就提得越高。而且,它对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现象越是采取不调和的反对立场,那么在普遍的腐朽已经浸透了仅仅为讨好政府而完全放弃自己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信任也就会愈益加强。

社会民主党越是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和毫不调和,它就越能更迅速地战胜自己的敌人。

在“反动的一帮”这个概念已经变成现实的现在,要求社会民主党参与联合政策或联盟政策,就等于要求社会民主党实行政治自杀。在资产阶级政党出卖节操和大肆糟蹋自己声誉的现在,希望社会民主党用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政策来束缚自己,希望它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助长这种出卖节操的勾当,那就无异于要求社会民主党实行道德自杀。

热心的朋友们生怕社会民主党可能通过革命过早地取得国家政权。但是依我们看来,只有在革命以前,亦即在不产阶级夺取到真正的政权以前就取得国家政权的假象,才能够算是过早地取得政权。在还没有夺取到真正的政权以前,社会民主党要参加国家政权,就只能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缔结卖身契的议员罢了。

凡是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的人,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党参与这种腐败勾当。如果说有什么手段能够使人民群众中一切正直的人失去对我们的信任,使一切能够参加并决心参加无产阶级各阶层的斗争的人轻视我们,并且能够阻碍我们向前发展,那就是社会民主党采取联盟的政策。

那时候,将只有把我们的党看做是追求个人名利的阶梯的分子,亦

即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的官迷,才会大走红运。我们越是少招揽这样的分子,我们越是对他们敬而远之,对我们的斗争也就越有好处。

除了这里已经谈过的以外,关于这一斗争的细节恐怕未必再能谈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预言未来发展的形式和速度,因为除了无产阶级以外,与未来发展有关的一切因素,现在都是这样地不确定和这样地无法估计。

只有普遍的动摇是确实可信的。可以确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普遍动荡和不断政治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不管它所采取的形式和所延续的时间长短如何,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蓄积起足够的力量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从而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纪元以前,是不会转入较长的稳定时期的。

当然,很难说这个革命时期是否会像从 1789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1871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延续得很久。现在,事业比以前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斗争舞台也空前地扩大。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经认为只有西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现在全世界都成了这种舞台。现在,不仅在施普雷河和塞纳河的两岸,而且在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涅瓦河和达达尼尔海峡、恒河和黄河的两岸^①,都正在进行着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类的解放斗争。

和斗争舞台是宏伟巨大的一样,这一斗争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世界经济的公有组织——也是宏伟巨大的。

而且,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可能延续整整一个世代的革命时代终结的时候,无产阶级同它进入这个时代时相比将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精华在今天已经是联合到最巨大的自由组织

^① 这里指的是位于下面这些河流两岸的国家或首都:施普雷河——柏林;塞纳河——巴黎;涅瓦河——彼得堡。

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在美国,达达尼尔海峡在土耳其,恒河是印度的大河,黄河是中国的大河之一。——原编者注

中的、欧洲各文明民族人民中最坚强、最有远见、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最勇敢的一部分，那么，它在斗争中和由于斗争的结果，将把一切阶级的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最有远见的分子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并在自己的队伍中组织和教育甚至最落后的分子，使他们树立起对本身力量的希望和信心。它将使自己的最优秀的儿女攀登文化的顶峰，使他们能够领导最伟大的经济改造，消灭全世界由于奴役、剥削和愚昧而产生的一切贫困。

那些能够参加这个伟大斗争并分享光荣的胜利的人是幸福的！

（选自《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21—127 页。由刘磊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俄文版译出。）

帝国主义^①

(1914年9月)

一、生产的比例性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词今天随时随地都在应用,可是人们谈得越多,讨论得越多,它就变得越不确定,这当然就使人很难得到任何了解。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都概括到帝国主义的名下。按照这样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但是这种认识只是意味着最乏味的同义反复,除了说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以外,什么也没有说。

如果我们不是按照这种广泛的意义,而是按照这个词的起源于英国的历史确定性来理解它,那么,它所指的就只是那些政治意图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些政治意图固然是由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但是决不等于

① 本文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已经写成。它本应刊登在准备为祝贺计划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出版的那一期上。这次代表大会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由于近日的事变而告取消。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尽管它是纯粹理论性的)却没有因此失去同实践的联系,它是试图对说明实践有所帮助的。我们刊出本文时删去了与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地方,补充了一些对于战争的考虑。——《新时代》编辑部注

现代资本主义。

大约一个世代以来,英国人把帝国主义一方面理解为把巨大殖民国家的所有部分同宗主国合并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理解为越来越扩大这个国家的意图。在“大不列颠”以外的其他国家中,所谓帝国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后一种意图,因为没有别的国家像英国那样拥有独立的殖民地。

但是并不是任何扩张本国领土的意图都可以称作帝国主义。否则我们就必须说帝国主义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样古老了。通过合并由同一民族的成员居住的邻近地区来扩大国家的意图,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此,说什么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也是完全错误的。不能把标志着19世纪的大部分的这一意图看作帝国主义,同样也不能把特别是在18世纪十分强烈的获得极富饶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的意图看作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要理解这种意图,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在下面把处于农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采掘工业——矿业——撇开不谈。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列出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这两大部类,并且对以下问题作了考察:即如果要它们之中的每一部类都获得一切手段以继续生产过程的话,这两大部类之间必须怎样进行交换。

同时他不仅把这一周转过程看成商品的周转过程,而且也看成资本的周转过程。他不仅研究了农业产品怎样同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也研究了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途径。尽管这是天才的表述,但是它的错误在于,魁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是造成剩余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一开始研究资本的周转过程时,就不得不首先把农业同工

业的差别撇开。因为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每一部门的劳动，当它被资本主义式地使用的时候，都同样地造成价值和剩余价值。

但是，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时，也没有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特有的物质形式撇开不管。

为了进行这一考察，他作出了一个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区分，即关于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区分。就像任何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或者更正确些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者也是为了消费的目的而进行生产。只不过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各个生产者不是直接生产自己打算消费的那些消费品，而是为别的生产者生产消费品，以便再从他们那里为自己换来消费品。

如果要社会能够以它向来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它的成员必须有足够的消费资料。这就是说，消费资料要像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掌握的价值所能够交换的那样多。如果消费资料生产得更多，那么它的销售以及从而它的生产也要陷于停顿。

但是如果生产为维持社会所必需的数量消费资料，那么也必须具备必要数量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比制造消费资料所必需的要多，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就会滞销，因而它的生产者就会被剥夺用它换来消费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料生产得太少，消费资料的生产就会陷于停顿。由此可见，如果要整个生产过程毫无阻碍地进行，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就要始终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一比例随着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是确定的。如果实际情况同这一比例不相符合，那么它就要通过价格波动和危机来力求实现。

但是显然不仅是这两大部类之间必须存在应有的比例关系。还可以谈得更详细些，例如在消费资料项下区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分类。但是这往往是多余的工作，因为很难由此得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新的认识。

只有魁奈所已经采用的分成工业和农业的那种分类法才是例外。当然，重农学派把这一区分应用到再生产过程上去的那种特殊方式是同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论相违背的，并且已经被马克思永远摒弃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从这种区分中不能再汲取一些新的知识。

1910年，我在评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时，已经在《工业和农业》这一专章中指出过这一点。这一章的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

“为了认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怎么可能仍旧一再达到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平衡，我们还必须根据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物质特征作进一步的区分。除了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区分以及再把消费资料区分为奢侈品和日用品以外，还要加上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区分。”（《新时代》第29年卷第1册第838页。）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在我论述《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的书的一章（第14章：《农业和资本主义》）中，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目前生产方式中工业同农业的差别。

二、简单商品生产

如果我们首先按工农业关系的最简单的形态即按简单商品生产来观察这一关系，那么我们最容易理解它。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工人是自己的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者，并且把产品当作现成的商品送到市场上去，或者直接为消费者，为顾客制造产品。

最初，还在这一阶段以前，工业活动是农业活动的一部分。工业活动是在农业经营中进行的，或者不如说，单个的经济机体既是工业性的，又是农业性的，它生产食品 and 原料并且把原料加工成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那时已经有可能在经营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分工。一批人能够以照料牲畜为主，另一批人能够以耕作为主，第三批人能够以纺织为主，还有一批人能够以把木材 and 金属加工成工具为主，如此等等。然而在经营不扩大规模 and 不扩充人员的时候，这种分工是局限于它所不能

超越的一定的范围以内的。反之,如果个别的生产者,也就是原料加工者,走出这一项经营,不是仅仅为这一项而是为几项经营进行生产,并且从它们那里取得原料和食品,那么分工可以远为更快地扩大并且发挥经济上的优越性。

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但是再生产过程的不间断的继续因而也就要依赖对工业的必需的农业供应的不断继续。

农业(林业包括在内)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工业活动有可能进行以前,农业必须先提供必需的食品和很大一部分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完全可以(至少是在原始条件下)在一个时期内不需要工业,但是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即使是在工具和农业劳动者的服装不更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按照向来的方式很好地继续一个时期。相反,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只是暂时停止,工业生产过程立刻就要停顿下来。

有两种途径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因此,只有当他们在农民之中找到他们的工业产品的购买者时,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农民必需向工业生产者购买一定价值的工业产品,其大小同工业生产者所需要的农业产品相等。

只有当这两个部类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时,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条给工业输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径,即人们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但是我们打算把研究局限于纯粹经济性因素上。

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但是它经常有被突破的危险。一方面是由于乡村人口外流夺取了农业的劳动力来输送给工业,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知识界和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力易于提

高。可见工业产品有比农业产品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因为生产者的数目和按生产者平均的产品数量在工业中要比在农业中增加得更快。

但是这种趋势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很少采取危险的形式。手工业的发展、它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手工业中还不存在通过过度劳动来提高生产的趋势，因为工业生产者必需自己进行这种劳动。

不过，城市劳动力的数目由于农村人口流入而得到的增加，容易受到在那一时期的城市中往往很普遍的巨大死亡率的抑制。即使在这种死亡率不能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地方，愈来愈大的供应困难也会使它受到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取决于交通道路的状况；后者决定城市人口获得他们的原料和食品的地方的范围。这个地区越小，城市就必需越小。从前的交通道路通常是很糟的，甚至水路在航行技术不足的条件下也常常很少得到利用。因此，为城市工业提供生活泉源的地区是很有限的。

城乡之间商品交换的扩展因此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通过增加手工业者的劳动负担来扩大工业生产的动力是微弱的，通过增加城市工人的数目来扩大这种生产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三、资本主义生产

由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巩固和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工业生产的迅速扩大才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

资本家(作为一个资本家)并不亲自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使独立的手工业者无法过度延长工作时间的那些障碍对资本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手工业繁荣时代的手工业者，他们还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而被迫也极度折磨妻子、儿女和学徒。

资本家使他的工人为他劳动。工人的劳动痛苦他是不以为意的。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延续得愈长，就愈成为他的乐趣，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超过工资数额的剩余价值就愈大，他的利润、因而他的收入也就愈

大。

但是个别的资本家能够不仅靠延长工时来增加生产。这种延长不管多么冷酷无情，总有体力上的限度。反之，工业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却没有类似的限度。是十个，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这只取决于他的钱袋的大小。但是每多一个受雇的工人都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额、也就是他的收入额的增加。

当然，资本家雇用工人工作的方式不是取决于他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如果他剥削一千名工人，那么他也许起初不得不作为包买主使每一个人都作为家庭工人在家里劳动。但是当他一旦同时雇用了许多工人，也就产生了把全体或某些工人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并且使他们集体劳动的可能性。因而产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营的先决条件，这种大经营发展成了手工工场、工厂和现代的巨型企业。而且至少到现在为止，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而一个工厂的生产资料（厂房、机器、原料）规模的发展还要快得多，使用一个工人所要求的资本额增长得愈来愈快。

因此，随着各个资本家的利润总和的增长，在这一总和中资本家（如果他要继续增殖他的利润总和的话）不应当消费掉的、而是必须储蓄和积累起来的那一份额就相应地增长。然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在农业中远没有在工业中那么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微小的积累可能性理解成这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农业家和大地主聚集资本的可能性比工业家要小一些。但是农业家所积累的每一笔资本并不都因而就成为农业资本。它还可以用股票的形式被投放于工业或铁道等等。在一定的地区内把聚集起来的资本用于农业即扩大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要比同一地区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扩展的可能性小一些。原因在于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因素。

农业所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通过增加所花费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加速或扩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反之，工业只要拥有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能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一个经营中增加工人数目要比在工业中困难得多,因为工业摆脱土地束缚的程度比农业大得多。如果一个工业资本家拥有必要的资金,那么他在把一个雇用 10 名工人的企业扩大成雇用 100 名工人的企业时几乎不会感到缺少场地的困难。他所需要的用来扩大工厂或新建更大的工厂的那些土地,通常是随时都能找到的。而农业家就完全不同。如果他打算把所雇用的工人增加到十倍,那么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就必须把拥有的土地扩大十倍。但是,这样做时就要在四面八方同他的邻人的私有财产发生冲突,如果他要扩大自己的经营,就必须排挤他们。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他成功了,那么,在前面所说的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他的邻居所失去的土地以及因而失去的工人同他所得到的是一样多,全国农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并没有增加。在一个土地已被占有的国家里,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扩大个别农业经营的规模,同时增加经营的数目,以及增加整个农业所雇用的工人的数目,是不可能的。反之,在工业中,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平均规模、工厂的数目以及被雇用的工人总数是完全可能同时增长的。

技术发展本身对工业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又是不相同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使工人数目同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比例减少下去。然而在工业中这种减少在多数场合至今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引起工业工人数目的减少,而只是使使用的资本和获得的产品量比被雇用的工人数目更为迅速地增长。

在农业中却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工人数目的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往往也是绝对的。

这些差别的影响由于在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时已指出过的那种情况而更为加强了: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情况下,农业始终是全部经济活动的基础。没有农业不断地供应新产品,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反之,在必要时我们却能在一个时期内忍受缺乏一大批工业品的困难。如果我们不是每天都得到面粉和牛奶、肉和蔬菜的供应,那么我

们在城市里就会生活得很坏。反之，我们不会因为把已经穿戴破了的衣帽继续穿戴一个时期而毁灭。例如棉纺业主在棉花不能源源供应时就不能继续开工；但是如果他的纺机陈旧了，而他又找不到或不想购买新的机器，那么他也许还能再继续用它们一年，当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

但是不仅如此。

农业的大宗产品远不如工业的大宗产品那么多种多样，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变化也要少得多。谷物和牛奶、肉和土豆到处都是最主要的食品；它们不受时尚的影响。反之，如果有人要购置一件新的上衣，那么有多少种衣料可以供他挑选！而衣料的时尚又变化得多快！一个想购置纺机的纺纱业主，也可以在无数种类中挑选，而技术的进步会促使越来越新、越来越好的机器出现。

这一切就使竞争，即各企业彼此之间争夺销路的斗争这个在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中只有微小意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发挥出全部威力。工业家为自己的产品争取销路必然比农业家困难得多。如果农业家遇到销售困难，那么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其他农业家，不如说是在于中间商人。

资本积累得越多，农业越是落后，工业人口越是增长并要求越多的粮食和原料，农业人口相反地越是减少并且因而他们全体对工业品的需要量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对工业也就越不利。

但是在竞争的斗争中较大的和技术较完善的企业同较小的企业比起来，站得住脚的希望更大。竞争的斗争越激烈，每一个工业企业也就更加必须设法发展、扩大并且以最完善的技术装备起来。

我们一向只是从资本积累使个别资本家生活舒适的观点来考察它，资本家通过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自己的利润并从而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我们现在从另一方面来认识它。它不仅为工业资本家提供听凭他自由地加以利用或者不加利用、可以按照他的愿望而放弃的利益。资本积累愈来愈成了资本家所必需的了，资本家没有它就不行。不断

地扩大自己的企业和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产品销路,现在已成了资本家的生存条件。他的产品的增加已不再仅仅是对产品的需求增加的结果。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日益扩大自己的生产,而如果对产品的需求没有自发地相应增加的话,那么他必需用一切力量来人为地提高需求,扩大市场。

工业中竞争的强度是下一情况的结果:在工业中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的欲望和可能性比在农业中大得多;而这一推动力又从一种结果变成扩大工农业之间差别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工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尽快地发展,否则社会就会陷于极大的不幸。农业越来越多地把工人挤出去。即使在农业工人数目保持不变的地方,农业还是要把增加的人口全部推向城市。工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如果工业不迅速发展,结果就是可怕的失业。另一方面,竞争越是疯狂,它也就越加迫使资本家扩大和改善自己的企业。但是如果对于相应地扩大销路稍有疏忽,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破产。

但是工业要得到发展,农业就必须以同样的规模增加自己的产品和人口;它必须以和工业需求的增长相同的规模来增加原料和食品的数量;而且它必须相应地消费更多的用来购买农业产品的工业产品。

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比农业中快得多,这是怎样才有可能的呢?

马尔萨斯所认为的人口自然规律,即人口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前者按 1、2、4、8、16 这样的几何级数增长,后者按 1、2、3、4、5 这样的算术级数增长,这已经被证实是一条资本主义积累的经济规律。但是这并不比下面这一规律更少令人痛苦:一个地区的工业人口按 1、2、4、8、16 增长,而同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却保持稳定或减少。而同时工业中每个工人的产品量比农业中增长得快。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供应者和购买者只限于在它们萌芽时为它们服务的那一地区的话,那么资本积累实际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和被限制在狭小范围之内。只有当工业使作

为供应者和购买者而为其服务的那一农业地区不断扩大(这使交通工具的不断扩大和改善成为必要)的时候,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和自由地发展。

四、积累和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要求以各种生产部门都按恰当的比例生产为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却存在着突破这种比例的经常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使一定的地区内的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得多的趋势。这在一方面成为周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周期性危机经常是工业危机,这时各种生产部门的恰当比例可以一再重新建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能力愈强,要求扩展为工业提供食品和原料而且也提供消费者的农业地区的欲望也就愈强烈。

农业地区对于工业的意义是双重的,因此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是由于工业产品在农业地区的销路不像工业生产增长得那么快,这就表现为生产过剩。还有时是由于农业所提供的食品和原料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所要求的那么多,这就以物价高涨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两种现象看起来似乎互相排斥,却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只要造成它们的是工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调,而不是其他原因,例如黄金生产的变化或是由卡特尔、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引起的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力量对比上的变动。物价高涨和生产过剩这两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如果是由上述比例失调产生的,也就很容易转化为另一种。价格上涨经常形成危机的序幕,这种危机以生产过剩的方式出现并且引起物价暴跌。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民族的在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也可能采取各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证明了这种意

图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还远不足以证明这些形式中的某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它以前有另外一种形式，即自由贸易的形式。自由贸易在半个世纪以前，正像帝国主义在今天一样，被看成资本主义的顶峰。

自由贸易通过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优势取得了统治。大不列颠应该是世界的工场，而世界则应该成为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并且为此向英国输送食品和原料的农业地区。一切参加者都有利可图的自由贸易可算是使这一农业地区一直接英国工业所需要的规模发展的至高无上的手段。事实上，向英国输出产品的那些国家的大地主，正像英国的工业家一样，是顽固的自由贸易派。

虽然如此，这个国际协调的美梦很快就结束了。工业地区通常是胜过并且统治农业地区的。过去城市对乡村是这样，现在工业国对农业国也是这样。一个保持为农业国的国家，会在政治上而且多半也会在经济上逐渐衰退，在两方面都会丧失独立。因此，保持或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主的意图，在国际的资本主义周转的领域内必然到处产生建立自己的大工业的意图，这种大工业在现有的条件下是资本主义的。外国工业产品在农业国的销路的增长本身就为实现上述要求创造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这一增长破坏了本国的资本主义前工业，从而解放出许多劳动力作为雇佣工人供资本使用。这些工人如果在本国用不上，就会跑到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去，但是他们还是宁可留在国内，在那里他们可以使资本主义工业的建设更加容易。外国资本本身起初为了通过修筑铁路来开发农业国而流向那里，后来也为了发展它的原料生产，其中不仅包括农业，而且也包括采掘工业，即矿业。用其他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补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一个国家是否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工业，这主要取决于它的政治力量。

首先是西欧各国和美国东部各州同英国的工业相对立而从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国。它们以保护关税来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它们用大工

业国对于世界上还没有被占领而又无力抵抗的那些农业地区的瓜分来代替英国所追求的、在英国的工业工场同所有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之间的世界分工。英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帝国主义就这样产生了。

帝国主义特别受到了与它同时出现的向农业地区的资本输出制度的促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现在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它们到上一世纪70年代为止采用的扩大市场的那些方法已不再够用了。在那以前，人们满足于利用农业地区现有的原始运输工具，主要是利用水道，食品和原料的大宗运输从前只有通过水道才是可能的。在那以前，几乎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才建筑铁路。到了那时，铁路却成了开发人口稀少的农业地区、使那里的产品能够运往市场、而且也使那里的人口和生产增加的手段。

但是这种地区却没有任何办法自己修筑铁路。所需要的资本和主要劳动力是由工业民族供给的。工业民族出借资本，从而提高了铁路材料的输出，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新开发地区用食品和原料来购买资本主义民族的工业产品的手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物资交换就这样大大地增加了。

为了使荒凉地区的一条铁路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甚至仅仅为了使它成为可能，为了得到筑路所必需的劳动力，为了使铁路的经营和它的要求得到必要的保障，就必需有一个国家政权，它既是足够地强大和残暴，足以保护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同时又对这些利益盲目效忠。这件事由这些资本家自己的国家政权来管当然是最好的。这也适用于凡是有可能开采丰富的矿藏、或者通过修建大型灌溉工程而增加经济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的地方——这些企业同样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才有可能。

这样，随着工业国家扩大向世界农业地区资本输出的欲望的增长，使这些地区服从它们的国家政权的意图也就加强了。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因素：资本输出能够在它趋向的那一农业地

区产生好几方面的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农业国在今天的处境是不好的，为了繁荣，甚至为了独立，它都必须力求成为工业国。那些拥有维护自己的独立所必需的力量的农业国家，不仅利用输入的资本修建铁路，而且还利用它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例如在美国和俄国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仅仅暂时促进了自己的工业出口。它由于在农业地区促成了强烈的工业竞争而很快就使这种出口趋于停顿。对抗竞争的愿望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农业地区直接地当作殖民地或者间接地当作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这是为了阻止农业地区发展自己的工业，为了迫使它们只限于从事农业生产。

这是代替了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源。

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最后可能的表现形式，还是还可能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扩大资本主义内部工农业之间交换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吗？

问题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在农业国家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所必需的了。资本家阶级既然不想自杀，那么它就不会放弃这种做法，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统治农业地区，把那里的居民压迫成无权的奴隶，这同上述要求联系得过分密切，以致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认真地起来反对。只有当这些地区的居民或者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粉碎资本主义枷锁的时候，对这些地区的奴役才会结束。

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被消灭。

但是帝国主义还有另外的一面。占领和奴役农业地区的要求，引起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对立促使从前只在陆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发展成为也在海军军备方面进行的军备竞赛，这些对立是使早就被预言的世界大战现在成为事实的最后根源。难道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所必需的，只能随着资本主义本身一同被消灭吗？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不会存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经济上的必要性了，即使从资本家阶级本身的立场看来也是这样，至多从一些同军备利害相关的人的立场看来还有这种必要性。

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对立的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

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地区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它不仅是威胁着这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威胁着它们全体。东亚和印度的觉醒以及西亚和北非的泛伊斯兰教运动都是这样的。

此外，还有工业国无产阶级反对由新税引起的任何额外负担的日益增长的抵抗。

除了这一切，还要加上在战前就已经出现的一个严重现象：自从巴尔干战争以来，军备竞赛和扩张殖民地的费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资本积累的迅速进展受到了威胁，从而使资本输出，即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身受到了威胁。

国内工业积累靠着技术的进步照旧进行。但是资本不再迫切要求输出了。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情况表示出来，即欧洲各国甚至在和平时期偿还内债已经有了困难。它们所必须承担的利率提高了。

例如下面两种债券的平均市价是：

	三厘德国公债	三厘法国公债
1905年	89	99
1910年	85	97
1912年	80	92
1914年中	77	83

如果军备竞赛及其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在战后继续增长的话，这一情况不会好转，而是要恶化的。

帝国主义就这样为自己挖掘坟墓。它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阻碍资本主义的手段。

资本主义还不一定因此就到了穷途末路。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它能够继续发展，只要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还有可能促成农业生产的相应扩展；当然，这种扩展会随着世界工业每年增长幅度的日益提高和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的不断缩小而越来越困难。

在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以前，它固然可能因为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反抗而垮掉，但是它不一定会由于经济崩溃而毁灭。

反之，继续执行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将过早地引起这种经济破产。

这一帝国主义政策不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了。

当然，如果目前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进行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刚刚提到的那些因素就不能对统治阶级产生深刻的印象，也就不能促使他们给自己的帝国主义意图以另一个方向。但是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即任何资本主义大国在同其他类似国家的对抗中扩大自己的殖民国家的意图，仅仅是促进资本主义扩张的许多手段之一的话。

人们可以用马克思当年关于资本主义说过的话来说帝国主义：垄断产生竞争，竞争又产生垄断。

大企业、大银行和亿万富翁的疯狂竞争使并吞了小财阀的那些大财阀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

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我们当然必须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激烈地反对超帝国主义，不过它的危险不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这一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

这里所作的阐述是在奥国以它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使我们震惊以前写成的。奥国同塞尔维亚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意

图。在东欧，民族主义还起着革命动力的作用，奥国同塞尔维亚目前的冲突既有民族主义的根源，也有帝国主义的根源。奥国试图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它吞并了波斯尼亚并且正打算把阿尔巴尼亚也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奥国就这样激起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反抗，塞尔维亚感受到奥国的威胁，而它自己又成了对奥国生存的威胁。

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对奥国来说是一个必然性，而是因为，奥国由于自己的结构，自己受到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只有内部团结得很紧并且吞并了文化上远比自己落后的农业地区的国家才能实行帝国主义。这里却是一个民族上四分五裂的半斯拉夫族国家想牺牲一个斯拉夫族的邻国来实行帝国主义，而后者的文化同对方的比邻地区的文化是同出一源的。

这一政策当然只有通过帝国主义在其他大国之间造成的对立和恶感才能引起如此意外的惊人的结果。当前的世界大战所孕育着的后果还没有全部表现出来。世界大战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即帝国主义意图和军备竞赛首先加剧——这一来，继战争而来的和平就只是一次短暂的休战。不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已经不再有任何事情妨碍这次强烈的爆炸最后用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来代替帝国主义了。战争持续得愈久，它愈是使一切参战国筋疲力尽并且对武装交锋的迅速重演感到畏缩，我们也就愈加接近后一种解决办法，虽然它现在看来还是很不可能的。

（选自《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19页。由史集根据《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年）第2册第21期德文版译出。）

帝国主义战争(摘录)

(1917年2月)

二、帝国主义的必然性

虽然严格说来“反动的一帮”并不属于本文的论题,我还是比较详细地作了论述。因为有这样的看法,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切政府根本上是彼此等值的,它们全体在对外政策方面所追求的无非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们的冲突无非是为了赃物的斗争,它们的斗争的结果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无所谓的,凡是在它们发生冲突的地方,必须从一开始就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它们全体。这一看法无非是把反动的一帮这个词从对内政策转用到对外政策上。

如果不了解帝国主义,一定不能了解当前的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政策的最近的和最强大的动力,但不是它的唯一动力。即使帝国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然地产生的,但它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在帝国主义中得到贯彻的是一种意图,追求超额利润的意图,这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特征。超额利润当然是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只能随同资本主义一起消失,只能被社会主义消灭。但是帝国主义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堵塞

了资本的这条道路,它会为自己寻找别的道路。

资本从来不满足于平均利润,每一个资本家都不断追求特殊的超额利润。

人们或者通过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时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或者通过生产过程中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来取得超额利润。

商人只能依靠市场上的特惠才能取得超额利润。在商业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态并且能对国家统治者发生影响的时代,个别的大商人和商人团体企图通过他们的国家的权力取得在国内市场上以及在世界市场的个别地方的垄断地位。各国的进行竞争的商人的对立成了国家本身的对立,往往导致战争。

这一情况已经由于商业的发展而改变了,商业感到这种垄断是限制。所谓“重商主义”这一垄断倾向还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繁荣而进一步得到克服。工业资本主义不需要这些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它把它们斥为昂贵的和危险的方法。它在对外政策方面变得爱好和平了。但是同时却对自己的工人残酷无情。

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来说,生产过程中特别有利的条件比市场上特别有利的条件重要得多。

工业资本家获得这种条件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他对工人的剥削超过平均的通常的剥削。这是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或者雇用异常廉价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来达到的。

这种类型的追求超额利润的意图支配着工业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在厂主们为达到廉价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比赛中,这一个企图通过延长工时、实行夜工等等来击败另一个;这种比赛起初来势很猛,大有在短期内毁灭整个工人阶级的危险。它激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唤起了不是直接参加资本主义工业的资产者阶层的抗议,这些阶层看得远一些,它们部分地为了保全受到滥用威胁的本国生产力,部分地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采用了工人保护立法,从而挽救了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本身,使它们不致过早地毁灭自己的劳动力。这也是这样

的一个事例，它揭露了“反动的一帮”这个词是荒谬的，同样揭露，认为任何受经济制约的资本主义意图似乎在经济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能通过优势力量加以阻止的那一意见，也是荒谬的。

争取标准劳动日、争取限制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渴望的斗争，是一个单纯的实力问题。这一斗争是由无产阶级的压力加上资产阶级本身的眼光远大分子的卓见决定的。当然反抗工业资本的力量并不是浮在空中的，它不仅以忧伤的感情为基础，而且也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在《资本论》中针对那些对议会制度和法律上的劳动保护唯恐蔑视得不够的人说明了争取标准劳动日斗争的全部意义。但是，同是这部《资本论》也清楚地指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任何工业劳动保护所受到的限制，指出了尽管进行种种改良，阶级斗争仍旧必然日益加剧，这种斗争的出路是剥夺剥夺者。

马克思就这样在《资本论》中表现为一个地道的“中派分子”。

法律上的劳动保护大大限制了在依靠增加对工人的折磨而取得超额利润方面的比赛，但是并没有完全抑制这一意图。它总能找到一试身手的办法和途径。例如现在就有泰勒制。

资本越是在一条道路上受到限制，它就会在自由竞争中挤到另一条在生产过程中依靠异常有效率或异常廉价的劳动力来捞取超额利润的道路上来：采用能在同样的耗费下提供超过平均通常数量的产品的那些机器和操作方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革命意义，它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就在这里，就在技术改革的领域里。

但是资本家关心的不是进步，而是利润。如果他能够通过退步来扩大利润，那他就宁可要退步。说对于资本家的利润要求的任何支持都有助于“进步”，这是再可笑不过的意见。

技术进步给个别资本家带来的超额利润，只有当这一进步保持为一种例外时才能归他所有。这种进步一被推广，不仅超额利润要消失，甚至一般的利润率也有下降的危险。

只要人们还停留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反之,一旦垄断代替了竞争,情况就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前进的过程中,垄断的时代来到了。这一时代不仅使资本愈来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企业主同盟、股份公司和银行促使资本的管理和支配的集中化比资本的所有权的集中化进行得远为迅速。这样,在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各国就出现了大垄断的统治和大垄断对于国家政权的支配。大垄断发展了一种新的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或者不如说使自由贸易时代以前用来为商人谋利的那些旧方法现代化了。大资本家又一次试图靠国家政权的帮助在市场上取得垄断的特惠地位:一方面通过保护关税,保护关税削弱了国内市场上的外来竞争,减轻企业主组织的负担,并且使它们有力量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倾销竞争。另一方面通过殖民政策,即把农业地区归并于工业国家,作为它们的直接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并且把这些地区作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输出资本的投放场所而加以垄断。

人们称这一政策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它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最大规模的重商主义。它对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业生产的继续进行来说,不是一种必然性,而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之一。反对和限制这种方法,就像标准工作日一样,对于工业并无妨碍。在实行标准工作日时,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曾经宣称,它会毁灭工业和损害工人本身。区别仅仅在于,那时工人认识到这种遁词是空洞的,而现在有名望的工会活动家却在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指导下“证明”,资本主义巨头获得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方法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必然性。

三、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多样性

帝国主义问题同过去的“劳动自由”问题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单纯的实力问题。帝国主义政策是否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国家中得到贯彻,这是那些同帝国主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尤其是那些受

到帝国主义危害的阶级的实力问题,但是最终也是那些阶级的经济见识的问题。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中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帝国主义政策决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同样有力,它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以同样方式出现的。

例如,德国和英国两者都处于同样的资本主义水平,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多大!英国有历史上传下来的议会制度,德国则是凌驾于议会之上的君主制。英国直到战争以前有一小支以自愿应募制为基础的军队,德国则有世界上最强的、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英国没有小农,手工业不多,工业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自由和强大。资本家阶级中的船舶业以及商人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对比,都比德国强大。

在德国的就业者中,工业有 1130 万人,农业有 990 万人;在英国的就业者中,工业有 750 万人,农业有 140 万人。

另一方面,在德国,同 1130 万工业就业者相比,有 350 万商业和交通中的就业者和 300 万吨位的商船队。在英国,同工业中的 750 万人相比,却是商业中的 400 万人和 1200 万吨位的商船队。

在工业资本本身的范围内,在德国占优势的是重工业,在英国是纺织工业。德国 1914 年有 1140 万棉纺锭,英国有 5600 万。反之,德国 1912 年的生铁产量是 1760 万吨,英国是 900 万吨。最后,银行对工业的统治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发达得多。

这一切促使帝国主义在英国采取了同德国完全不同的形式,它的不少重大特征在英国根本没有得到发展,或者只有微弱的发展。

例如英国始终是自由贸易的国家,虽然保护关税属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它容许它的许多殖民地有充分的自治,甚至有自己的关税政策,这种关税政策甚至成为针对宗主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政策则完全相反。

美国帝国主义像英国帝国主义一样,也表现出符合本国的特点和历史的十分独特的特征。1898 年从西班牙夺来的菲律宾,在 1907 年已

已经获得自治,不仅是村社的自治,而且有一个选举出来的立法会议。已经完全自愿地答应给它们以完全的独立。——这是殖民史上从未听到过的行动。而这个诺言可能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海外殖民政策对于美国资本的扩张意图来说可能容易使它脱离那条有希望给它带来最大成就的道路,即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和平渗透”的道路。只不过对于菲律宾可能成为日本扩张意图的牺牲品的担心,成了不让它们自己管自己的强大动因。

美国迄今缺乏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同玩弄放弃殖民地的思想一样,也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征。富足的美国连同它的1亿居民并不具有贫穷的墨西哥连同它的1500万居民所控制的那样一支军队。

强大的军队同保护关税和殖民政策一样,也属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因为帝国主义同自由贸易相反,造成了民族对立。帝国主义获得超额利润,当然一部分是靠牺牲本国部分居民——劳动阶级和没有参加垄断的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一部分是靠牺牲被占领的殖民地区的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靠牺牲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最后一种意图造成了各国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对立,对立表现为激烈的陆上和海上的军备竞赛。

帝国主义就这样取得日益增长的实力手段或者扩大现有的实力手段。这些实力手段根据各国的政治情况、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获得了或多或少的独立生命,于是就有可能引起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固然首先要归之于帝国主义,但决不是一定意味着帝国主义利益的促进,而是可能损害大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

目前的战争的反作用也在美国唤起了追求强大的军事装备的意图。这些军事装备应当只用于防御,它们是这一恐惧的产物:最后的胜利者可能在大规模战斗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它产生了统治世界、也蹂躏美国的欲望。但是尽管新的战争实力只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造成的,它只要一旦存在,就容易在统治阶级中唤起利用它来进行征服的意图。

总而言之，尽管帝国主义使一切大国发展了军国主义倾向，但是军国主义所遇到的历史先决条件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它的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中有很大的不同。

这一点也说明不能把这些国家全部当作“帝国主义的”而混为一谈。

四、帝国主义以前的扩张意图和民族对立

在帝国主义的这些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包括这一点：帝国主义使旧的问题和意图复活了，这些问题和意图是在帝国主义以前久已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它们在现存制度中几乎不会起什么作用。由于帝国主义，它们恢复了生命和运动。

追求国家扩张的欲望不仅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18 世纪的王朝专制主义有过同样的欲望。它把国家看成自己的领地。各族人民丝毫不能过问国家行政，他们的民族籍不起任何作用。扩大和补充自己的国家，是每一个封建主的意图，这一意图只有在遇到其他封建主的优势力量时才受到限制。每一次实力变动都会诱起一次边界变动，但是因此也会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高度发达的交通事业的兴起创造了企图使国家从封建主的领地转变为民族领土的现代民主制和现代民族运动以前，这种军事冲突是无尽无休的。民主制和民族运动认为，每一个民族应当自由地支配自己的领土。这一来，每一个国家就有了确定的边界，越出这一边界的任何意图都被排除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正确手段不应当是战争，而应当是革命。为了解放波兰而进行的反对俄国的战争是例外，俄国那时看来是不可能发生革命的。

这一民族运动不是以各民族的相互憎恨为基础，力争向上的各民族的民主派紧密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封建主。封建主的国际同盟与民主派的国际联系相对立。在这种局面下，从 1815 年到 1848 年没有发

生任何大的欧洲战争。

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不再进行革命,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资产阶级坚持自己的民族理想。但是应当贯彻这一理想的不再是革命,而是个别王朝,人们信任这些王朝的军事力量,它们足够地大胆,能够通过自己的王朝特殊意图来打破神圣同盟时代以来的封建主国际团结,它们在民族目的的后面隐藏着这些意图,并且通过民族目的加强了这些意图。

在克里木战争已经使神圣同盟破裂以后,接着是1859年到1870年的王朝民族战争时期。的确也还可以把1877年的俄土战争算入这类战争。

专制主义时代的王朝征服意图在这些战争中重新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已经足够强大,能在这一意图上打下自己的烙印了。这些战争受民族思想支配,征服意图受到了民族思想的限制。

于是在上一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来到了。帝国主义宣布吞并原始的农业地区,在这些地区里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唤醒任何民族政治生活,因此这些地区可以被并入这个国家而对它毫无损害,正像18世纪时专制主义在不能通过继承或婚姻而得到一个国家时可以将它征服而不必考虑它属于什么民族一样。现代民主的民族思想在19世纪给欧洲各国的征服欲所规定的扩张渴望的限度,对于帝国主义的对象来说失去了效力。民族主义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它从争取民族独立的意图变成了争取民族统治的意图。这一意图过去仅仅在多民族国家中才会发现,现在也移植到民族国家身上了。

但是这一来也给18世纪、甚至17世纪即俄国的彼得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那些意图重新开辟了道路。同时由于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对立,也重新提出了资产阶级进行民族奋斗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使这些问题不至被忘记。例如亚尔萨斯问题,意大利的领土收复运动,波兰问题。如果说它们现在作为实际问题吸引了我们,那么这肯定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给了它们以新的力量。但是不能

称它们为帝国主义的问题，它们可能造成对于帝国主义者完全无所谓的、甚至同他们的意图直接抵触的对立和冲突。

五、对于帝国主义意图的军事抵抗

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在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对抗的意图。这类意图虽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是它们的目的不是促进帝国主义，而是抵抗帝国主义。如果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时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战争，难道人们就能直截了当地说它会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吗？当然也不能一上来就作出相反的断语。因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力图抵抗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意图时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工具。当英国人和法国人 18 世纪在北美洲进行那些殖民战争时，争夺的对象是他们从印第安人夺取的土地。但是双方都懂得争取印第安人做同盟者，印第安人因此从征服的牺牲品变成了征服的工具。在今天的战争中在更大的规模上发生着同样的情况，不仅是野蛮的种族，而且有一些相当发达的国家，它们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却作为工具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效劳。但是这倒不是说，它们自己的利益是帝国主义性的，因而这些国家是否被人践踏对人类的社会发展来说是无所谓的。

六、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差别

不过就国家来说，不仅要区分出高度发达的和落后的，区分出帝国主义的代表者和它的间或也成为工具的牺牲品。必须也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间作出区分。

上面已经说明，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必要性，就是说生产并不是如果没有它就不再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有效地进行，不如说帝国主义政策只是从某些资本家阶层的利润意图产生的，资

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阶层愈来愈强大；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就是它的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它取决于国内的能从帝国主义获利的阶层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强大到什么程度。仅仅由于拥护帝国主义的阶层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上的种种差别，就已经有可能产生国家之间的极大差别，虽然它们按照经济水平对于帝国主义来说都是同样成熟的。

不过帝国主义就其整个本质来说，不仅是对内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而且也是对外政策方面的实力问题。帝国主义的政策正是实力政策，别无其他。但是实力政策只能由强者来执行。在一个国家内，尽管金融资本已经十分强大，但是它也不能找到遵循它所要求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如果它的国家缺乏为此所必需的力量。

因此，帝国主义政策根本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政策（如果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及其工业说来是一种“必然性”，那它就一定会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政策），而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政策。国家愈大，它的军事实力手段愈强，它的帝国主义意图（在对内政策方面的力量对比相同的情况下）就会发展和贯彻得更为强烈。国家愈小，它的实力手段愈薄弱，人们在那里发现的帝国主义就愈少。

七、帝国主义的变化

帝国主义像资本主义和利润意图一样，就本质来说是无限的。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最喜欢靠牺牲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来提高自己的超额利润，喜欢垄断整个世界。追求世界霸权的意图是以帝国主义的本质为基础的。但正是这一意图最容易遇到激烈的抵抗。有时它也许能在一个特别强大的、惯于取得胜利的社会中点起一阵自大狂的烟雾，但是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是可怜的忧郁。

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

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

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已经踏上了通向大大地修改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以此证明，他们的意图并不排除各国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的协议，在有一个优势力量同他们对立的地方，他们是很懂得达成这种协议的。现在的战争决不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即两个阵营的为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就对世界的分割和剥削达成协议。的确，我们甚至必须预计到这样的可能性：世界会亲眼看到一场叫我们害羞的戏，即帝国主义者的国际比社会党的国际更早地生效。

当然，帝国主义者的协议不是我们所努力争取的东西。我们需要各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党国际领导下达成的协议。帝国主义国际也许能带来世界和平，有时甚至能保障和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国际辛迪加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剥削将变得更加有计划和更加大规模。

不过无产阶级的抵抗运动一定会来得更为强大，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那时就不再会由于任何民族分歧而被模糊和打乱了。

不言而喻，这样说并不是在作出预言。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说战争会怎样结束的。帝国主义者的国际协议不过是战争结局的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人们只有把握说这句话：即使国家边界的现状保持不变，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现状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在缔结和约的时候，我们将不是简单地从我们在1914年7月31日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将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如果帝国主义能熬过这场战争，就是说如果欧洲在战争以后还能保持要求世界统治地位的力量，那么帝国主义在摆脱战争时将是面目全非了。

（选自《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
第41—52页。由史集根据《新时代》
第35年卷（1916—1917年）第1册
第20期德文版译出。）

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一、问题

现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一个远比1871年无产阶级取得对巴黎市的统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错误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们尤其

感到迫切,因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质。

但是,我们党的责任在于:在我们透彻地审查过双方的论据之前,对于赞同俄国的兄弟内部争执的一方或他方姑且不作决定。

有些同志想要阻止我们这样做。他们宣称,未经审查就表示赞同现在执政的这一派乃是我们的义务。任何其他态度仿佛都会危害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无非是要把那种恰恰还有待于调查的事情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事情来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其中一派已经打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鼓励它继续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讨论,从而就已经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要求去驳倒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制这种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讨论,另一个方法禁止讨论。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们党内还不居统治地位;我们这里仍然在进行自由讨论。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的论点之后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词不足凭信。必须公正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因此,我们愿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怎样的条件。

二、民主和夺取政权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

然而精确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纲领》）

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须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目的，因为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最理想地实现（就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势必要摒弃社会主义，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甚至恰恰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才不得不摒弃社会主义。

因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

两者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础的其他基础上，也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早在 1875 年谈到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种村社共产主义时就认定了这一点。（《论俄国的社会关系》，1875 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荷兰殖民主义政策曾在一段时期内，在爪哇用所谓“垦植制度”的名义，在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替剥削人民的政府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不民主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最显著的例子还是 18 世纪巴拉圭

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作为统治阶级，在那里利用专政的权力，以一种确实值得钦佩的方式组织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劳动；他们没有使用暴力而赢得了被他们统治的人的拥护。

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教权统治就是无法忍受的了。这种统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比被统治者高得多，而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样高的水平上。一个从事解放斗争的阶级或阶层不能把这样一种监护制度当成目标，而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制度。

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把这个命题干脆就颠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确实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纯粹民主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设想的，譬如，在小农的共同体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好比手段同目的的关系的人，显然就是指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但同时他们往往急于要补充说，民主其实并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结论必须极坚决地加以驳斥。这个结论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运动导向极不幸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

这里涉及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有人宣称，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

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劝说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无产阶级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无论何地的无产阶级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们会驯从地放弃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说可以预料，他们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么人们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该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无论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么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连军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并且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软弱，那么，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调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①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

① 指第一国际。——译者注

谈到其他问题之外，他曾阐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情况都如此。”^①

马克思的预测是否会实现，尚须等等再看。

在上述国家里，有产阶级中确实有某些阶层，它们想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倾向正在增长。但是另外也还有其他的阶层，它们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们想要通过让步来讨好无产阶级的愿望也正在增长。尽管战争状态在其持续期间无论在何处都大大地束缚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然而战争状态却大大地扩大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选举权。目前还根本无法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将如何影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以及民主在促使双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采用和平方法方面将起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民主的存在在这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或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在一个这样的共和国里，过渡的形式肯定将不同于那样的国家；其中军事专制统治迄今一直毫无限制地拥有镇压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权力手段，而且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

然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内，民主对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考茨基使用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删去了其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编者注

民主对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所发挥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成熟所发挥的影响。

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

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生存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起而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比之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产生的;资本家对于大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光靠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毒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

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仿佛应该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组织和管理他们,正如耶稣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组织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预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1849年第3版第312页)

好一个伟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预见。然而,这种预见仅仅建立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领导人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们深信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种组织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只能是一个空想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吗?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论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进行组织和宣传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贵族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们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贫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选举权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间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贫困化学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颂扬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轻蔑地谈论民主。

“共产主义者在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上意见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政治家们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统治，对于从旧组织到完美的新组织之间的过渡时期来说是不适宜的。尽管如此，卡贝^①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统治的原则，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内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领袖欧文，则终于认为每人都应

① 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该按其年纪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统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还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第 147 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统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实行统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中的一些人的偶然的统治。”(见第 148 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伟大的天才来统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议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评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详细地援引魏特林的话,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绍给我们的对民主的轻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轻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工人却在争取这些权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连争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们为了赢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组织、宣传和争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吗?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吗?这个问题今天是颇有争论的,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答案则是坚决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轻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不是一种在我们还不能用实例来进行实际论证之前就可以靠统计数字来确定和计算的情况。无论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过

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没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硬说只有在资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但这样说却是正确的:即大企业愈是发达,也就是说,需要社会化地加以组织的企业的数目愈少,社会主义就愈加易于实现。然而这一点只有在从一个特定国家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时才能加以适用。可是在这个范围内把问题简单化,是会被下列事实所驳倒的:即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引起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从而也就引起对生产加以社会化组织的问题的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而且,我们没有理由来断定:在现代工业国家里,由于有其银行制度和企业主组织,现在已经有可能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和合作团体来把绝大部分的生产为了社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

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和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足以由自己来掌握对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那种能使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实现经济民主的力量和能力?这还不能作肯定的预言;这里所涉及的因素是一种在各个国家里发展得悬殊很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同一国家里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同等程度的力量今天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可能是不够的,而到明天,当敌人陷于道义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崩溃时则又可能是完全足够的了。

同样,同等程度的能力今天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取得政权时可能是不能胜任的,而到明天,当出现了更明朗、更简单、物质基础更好的条件时,则又可能对各种需要都应付裕如了。在各种情况下,只有实践才能说明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只能肯定以下的说法:即无产阶级在人数、力量和智慧方面正在不断增长着,它正在愈来愈接近它的成熟时期。也许不能从一开始就衡量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已经占人民的多数而且人民中的多数已

经表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时,我们不能就肯定地说,它已经达到成熟时期。相反的,我们却可以肯定地断定,只要人民群众的多数还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态度并且不想要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还没有成熟到能实现社会主义。

所以这里又一次说明,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

四、民主的效果

现代国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有机体,是一种握有现代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并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的组织,这种现象在战争情况下最为明显。在这种国家里,人人都能感觉到,国家政权的政策何等强烈地决定着他的生存。

今天国家对个人的关系,无异于从前氏族公社以及后来的村社对个人的关系。但是,如果说这种公社的机构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话,那么,相反的,现代国家权力——官僚机构和军队——却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它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它往往在政治上甚至强大得胜过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且构成一种专制的政府。

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会持久的。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会导向它的僵化,导向一种陷于无止境的连篇累牍和浪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状态。而这恰恰又处在正当工业资本主义正在成长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使种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使工商业务迅速发展并且要求极度迅速的当机立断。

同时,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还导向办事专断和行贿舞弊;而像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生产者都依赖许多其他生产者——这样的社会生产制度,则为了能繁荣起来就需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因此,专制国家就处于一种同生产条件的矛盾愈来愈大的情况下,

并且成为一种妨碍生产条件的桎梏。于是，就迫切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机构，实行乡镇自治和分省自治，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并且把官僚机构置于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中央议会的、也即国会的监督之下。

议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监督政府，在这一方面，议会是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来替代的。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即由专家委员会来拟定法律，然后提交人民公决；那么，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设想的，尽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行。但是，即使最坚决主张直接由人民进行立法的人士，也并不赞成由人民来直接监督政府。领导着国家机关的中央机构的活动，只能由另一个中央组织来监督，而不能由像人民那样的无组织的散漫的群众来监督。

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意图，是现代国家的所有各阶级所共同怀有的，只有那些参与政权的人例外。因而可以说是全体；只有官僚、军官、宫廷贵族、国家教会以及那些同国家之间进行着有利的金钱生意的大银行家们除外。在其他阶级——其中包括乡绅、低级教士、工业资本家——的联合压力下，专制政权不得不屈服。这个政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答应给以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一个议会。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这种发展过程都胜利地得以实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级都想使这个新的国家具备一种最能适应其特殊利益的形式。这种企图在确定议会组织形式的斗争中，也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下层诸阶级的、亦即“人民”的口号，就是普遍选举权。取得这种选举权，不仅符合工资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阶级合起来总会构成居民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在这个大多数里是否占优势，这要看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定。但是，劳动阶级总人数在居民中是否占大多数，却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从长远来看，任何现代国家都不能抵挡这种群众压力，而且，在今

日的社会里,除了普选制以外的任何其他种选举制都会成为荒唐可笑的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其情况经常变化,阶级不可能凝结为固定的等级。各种社会条件都在不断变化。这一点就已经使等级选举制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但是,一个不作为等级而组成的阶级,则构成了一种不定形的、随时流动着的群体;要确切地划分这个群体的界限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阶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范畴,不是法学中的一个范畴;阶级成员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许多小手工业者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觉得自己是有产者,而在大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则又觉得自己是无产者,而且还变成真正的无产者,尽管统计学还把他们算作是有产的独立企业主。现在也没有那种足以保证有产者在议会中获得持久的垄断地位的、根据纳税额多寡为准的选举制。每逢货币贬值,这种选举制就遭到破坏。由于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那种根据教育程度高低为准的选举制也终于愈来愈没有意义了。

因此,各种因素一起发挥着作用,使那种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今日的社会里成为唯一合理的选举权,并且使这种选举权愈来愈得势。

首先,从作为居民中最低层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权是唯一合理的选举权;无产阶级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它的人数;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在劳动阶级中占大多数时,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

但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还在于:选举权不仅应该是普遍的和平等的,而且还应该是无区别的,即男子和女子,或者工资劳动者和有产者等不应区分什么类别来进行投票。这种区分不仅带来一种使那些按其整个社会处境来说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但是在形式上还不算工资劳动者的诸阶层从无产阶级中分离出去的危险,而且还带来一种使无产阶级观念狭隘化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即社会整体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长远的阶级利益相一致,虽然无产阶级的长远的阶级利益同它的暂时的特殊利益并不永

远含义相同。

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重大的社会关系和目标而把自己的阶级觉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就是无产阶级成熟的一个标志；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会把这一认识提高到完全明确的程度，这一认识不仅将由它的理论，而且还将由它的实践来加以提高和普及，如果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时是着眼于整体的而不是单单着眼于它的特殊利益的话。任何把眼光局限于行业利益的做法，都会使观念狭隘；这构成了单纯工会主义的一个阴暗面，而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优越性所在。这也是无区别的选举法与那种把选民区分成不同类型的选举法相比的优越性。

在争取上述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产生了现代民主，无产阶级也在这种斗争中成熟起来。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因素：即对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

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力图永久保持其统治。用暴力来镇压一切反对派，是它的生存原则。几乎在一切地方，要推翻这种统治都只有通过一种用暴力来粉碎其暴力的方式。

民主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正如以上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多数派是在变化着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政权都不能长久执政。

诸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就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象，至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但是，政党力量的变化比阶级力量的变化还要快。而在民主国家中，力求取得统治权的，正是政党。

但是在这里，人们不应忘记，而人们却常常忘记；为了明确地阐明现实起见，理论在抽象表达上的简单化也许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这种简单化仅仅在“直到最后”才适用于现实，在它与现实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环节。

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但是不能进行治理，因为一个阶级是一种不定形的群体，而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进行治理。在民主国家中进行治

理的正是政党。然而，一个政党同一个阶级并非含义相同，尽管每个政党都首先是代表阶级利益的。同一个阶级的利益，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方法来代表。同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其策略方法的差别性，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政党。在这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方针问题。很难得会有一个阶级拥有能够单独统治一个国家的那样强大的力量。如果一个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持这个政权，那么它因而就要寻求同盟者。如果它有可能获得不同的同盟者，那么在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中间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党派倾向性。

英国 18 世纪的辉格党和托利党^①就是这样代表着同样的地主阶级利益的。但是前者力求在牺牲王室及其权力手段的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借此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反，后者则认为君主制度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样，今天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代表着同样的资本家利益。但是其中一个党认为，通过镇压工人来同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才最能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另一个党则害怕这种政策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而力图用微小的让步——首先是在牺牲地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来安抚工人阶级。

正在兴起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是同那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相仿佛的。

因此，政党和阶级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阶级可以分裂成不同的政党，一个政党也可以由不同阶级的分子组成。一个阶级可以继续实行统治，然而执政的政党可以更换，如果统治阶级的大多数认为迄今执政着的政党的方法有缺点而其竞争对手的方法更为合适的话。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内，政党政府的更换比阶级统治的更换要快得多。

① 辉格党是自由党的前身，托利党是保守党的前身。——译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党都不能很有把握地一直执政下去,任何政党都必须估计到变成少数派的可能性,但是国家的性质——如果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的话——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属于少数派。

在民主国家里,从这些条件中就产生了对少数派的保护;民主愈是根深蒂固,民主的传统愈悠久,它对政治习惯的影响愈长久,那么少数派就愈能发挥作用,愈能有效地对那种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保持其政权的任何政党的意图进行对抗。

对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微小的少数派开始的——来说,保护少数派具有何等的意义,这种保护对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有何等重大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是很重要的。任何新的学说,无论是理论性质的学说或策略性质的学说,在开始兴起时都只由少数派来主张的。如果用高压手段把它压制下去而不去同少数派进行讨论,那么多数派就可以免去很多的辛苦和麻烦。在某些情况下,多数派因而就能省去某些不必要的工作,因为并不是每一种学说都由于它是新的并且是被少数派所主张的就都意味着是一种进步。在那些作为新思想而出现的学说中,大多数是在以前早就被人提出过而且已经通过讨论或实践而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只是由于不学无术,才有人把旧货色不断重新提出来。另外还有些思想是独创的,但同时却又是完全荒诞的。然而,即使新思想和意见中只有很少是真正进步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毕竟都只有靠新的思想才可能实现,而这种新思想起先只是作为少数派的意见而出现的。因此,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世界正在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还不为人所知的、用传统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即使从被人提出的新事物中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它毕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不要使我们的运动僵化而且要

使它能日益成长以适应任务的高度要求的话。适用于政党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

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即民主所赋予政治斗争的形式。我在1893年就已经在《新时代》的一篇论《社会民主主义问答教材》的文章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后来在1909年在我所著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又再次作过论述。我从其中摘引几段如下：

“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普选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普遍兵役制），这些制度不仅是一种可供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与那些当年努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诸阶级对比之下能更有利地加以运用的武器；这些制度而且还能使各个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显示出来，并且使鼓舞着这些政党和阶级的那种精神显示出来，而在专制制度时代，这些因素是无法显示出来的。当时，统治阶级也同革命阶级一样地在黑暗中瞎摸索。因为反对派的意见不可能表达出来，所以政府和革命者都无法了解它们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同样都有这样的危险：即在还没有同对方较量之前一直过高估计自己，而在遭到失败之后立即又过低估计自己，于是就灰心丧气。这也许是足以说明为什么在革命资产阶级时代里有如此多的政变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而归于失败，又有如此多的政府突然被推翻、从而出现革命和反革命相互交替局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则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那些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种民主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门。如果有人因而就想说，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这个阶级由于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和痛苦而感到满足，这个阶级已经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么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必然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但是民主能做到一件事：

这就是它虽不能防止革命,但能防止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且能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不必要。民主能明白地显示各个不同的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不会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打乱它们的最终目的,但是民主能使新兴的阶级不去试图完成它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民主还能使统治阶级不去拒绝那些他们已不再有力量来拒绝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不因而有所改变,但发展的历程会更加肯定,更加平稳。在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中不会显出像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代所显出的那样明显的胜利,但是也不会显出那样重大的失败。自从60年代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遭到一次大失败,这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仍然受着帝国统治的后果的影响——帝国是不让人民享有真正民主制度的,法国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达到阶级自觉,起义是被强加给法国无产阶级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也许显得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斗争方法单调些;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较欠缺戏剧性,不够有声有色,但是这种方法所要求的牺牲也小得多。对于富于文艺灵感的人文人们来说,这种牺牲也许是很无关紧要的,这些人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是为了寻找有趣的玩意儿和有趣的材料;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这种牺牲就决不是很无关紧要的。

“这种限于运用非军事手段,议会活动、罢工、游行示威、新闻出版事业之类的压力手段的所谓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在任何国家里,只要它的民主制度愈有效,居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识别能力愈强,自治能力愈强,就愈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前途。”

由于这些理由,我预料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采取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我还预料: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一切地方,都将以“和平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第53页)

我今天的见解还是如此。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仅仅只有光明的一面,人们在民主里也可以发现阴暗的一面。

凡是在无产阶级处于无权状态的地方,无产阶级也许不能发展任何群众组织,在正常时期内也不能进行群众斗争;在那里,只可能由少数杰出的无限勇敢的战士处于同统治的政权经常对抗的地位。他们天天都被提醒有必要、甚至确实亲身感到有必要去彻底推翻整个制度。他们不被日常政治中的小小的要求扰乱思想,而把精力完全集中于最重大的问题上,并且学会随时能考虑通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在那里,无产阶级中只有很小的一个阶层在进行斗争,但是他们满怀最高度的理论兴趣,满怀着被崇高的目标所鼓舞起来的热情。

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之下,无产阶级每天甚至只有几小时归自己支配的时间。民主已发展出那种包含着大规模管理工作的群众组织;民主还唤起公民来讨论和解决许多日常问题,这些往往是极其琐屑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整个空闲时间愈来愈被“小事”所占去,他们愈来愈为细小的眼前成果而奔忙。而他们的思想则缩小在狭隘的圈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不懂理论、最后甚至忽视理论、机会主义,这一切就会日益替代重大的原则而占上风。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德国工人同西欧和美国工人对比时称赞德国工人的理论兴趣的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就会在把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对比时发现俄国工人在理论兴趣上的这种优越性。

虽然如此,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依然还在各地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斗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为此而流血牺牲。

他们很知道,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反专制的斗争的有益效果,仍然只限于涉及少数杰出人物,不能遍及整个群众。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夸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庸俗化效果。其实这种效果是无产阶级目前缺乏空闲时间的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后果。如果享有自由反而一定会比没有自由使人变得更加繁琐和狭隘,那就真是奇怪了。

民主愈能使劳动时间缩短，工人所能支配的空闲时间也就愈长，他们也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除了从事于必要的小事之外还去从事于较大的较广泛的问题。

同时，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并不是没有的。因为，无论民主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只要民主还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单靠民主就总不能消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矛盾。相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正在增长，这种矛盾不断引起重大冲突并且不断使无产阶级面临重大问题，这种问题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认识能力，使之越出日常琐事的界限。而在民主国家里，这种提高就不再限于单单提高少数杰出人物，而会变成人民群众本身的提高，人民群众同时就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被锻炼得具有自治的能力。

在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并不像在专制统治之下那样，光是不断思考和谈论着革命。无产阶级可以单单谈论小事达几年甚至达几十年之久，然而终究必然会在各地都不断出现那种会燃起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努力的形势。

如果这种形势的出现在一个民主国家引起了实际行动，那么下列的可能性就会比在一个专制国家里要大得多：即这种实际行动不致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过早地发生，不致采取徒劳无功的突击，而且一旦获得胜利，胜利也不致再丧失，而能成功地保持下去。这终究比一次新的革命戏剧的那种单纯振奋神经的一时轰动还重要得多。

五、专 政

民主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有在民主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成熟程度。民主毕竟将提供用以测量无产阶级成熟程度的最可靠的标尺。在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而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准备社会主义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需要民主

——之间，总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即过渡阶段。据说，在这个中间阶段里，民主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这种看法并不是新的。我们早已知道这是魏特林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却以马克思的话为依据。马克思在1875年5月写的批判《哥达纲领》的信件（刊载于《新时代》第9年卷第1期第502页起）里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但是，当然按字义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是暂时的应急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地，也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政体。

民主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和平过渡。但是，没有民主，就肯定不可能有和平过渡。

然而，为了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如何，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猜谜语。如果说马克思在1875年没有进一步阐明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什么而言，那么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在几年之前在他题为《法兰西内战》的著作中已经对此加以阐明。他在那本书里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4页。

“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

由此可见，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这本书第三版的导言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普遍选举权……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②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

因此，那些赞成专政反对民主的人是不能依据马克思的话的。当然，这并不因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不过他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证明理由。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当我们把专政作为政体来谈论时，我们就不能谈论一个阶级的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个阶级只能实行统治，不能实行治理。如果有人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么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5、57页。

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本身分成不同的政党,那问题就立即复杂化起来。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如果社会主义诸政党由于它们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态度不同而分裂,如果比方说一个政党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取得政权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变成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应该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谁要是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就不应忘记,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状态,而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出现的状态。

人们也许倒可以推断,通常只有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大多数或者至少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会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在其政治斗争中的武器,除了它的经济必要性之外,就是它的群众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群众的,也即大多数居民的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能战胜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过这样的推断。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这一点也适用于巴黎公社。新的革命政权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有普遍选举权的公民投票。这次在最充分自由之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是:几乎巴黎各区都以强大的多数支持公社。65名革命者当选,而反对派只有21名当选,其中有15名露骨的反动分子,6名甘必大派激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3页。

共和主义者。65名革命者中间有法国各个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虽然他们互相斗争得很剧烈，但是他们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实行专政。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支持的政权使用暴力，不是为了放弃民主，而是为了保卫民主。如果这个政权想要消除它的最可靠的基础，要消除伟大道义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它就简直是自杀了。

由此可见，作为废除民主的专政，只有在下列的非常情况下才能加以考虑：即如果各种有利条件的特殊巧合允许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尽管大多数居民不赞成或者坚决反对这个政党。

在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政治上的训练并且其政党具有固定存在形式的民族里，这种偶然的胜利是不大可能的。这种胜利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很落后的情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普选时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结果，那么这个政府究竟应该按照我们一向所要求于任何政府的那样，服从人民的裁决，同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为争取政权而斗争呢，还是应该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地位而扼杀民主呢？

一个专政在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情况下靠什么来继续执政呢？

这个专政有两条道路可以考虑：耶稣教团的道路或拿破仑主义的道路。

我们已经提到了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赖以维持他们在巴拉圭的专政的手段，就是他们比起那些由他们组织起来的、缺了他们就无依无靠的原始居民来具有精神文明上的巨大优越性。

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争取到这种优越性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诚然在理解水平上发展得超过其他劳动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但是其他劳动阶级在政治兴趣和理解方面并不是没有提高。这些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决不

会是无法克服的。

但是，除了体力劳动的阶级之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成长，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对于生产过程来说他们愈来愈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他们的职业在于获得知识，运用智力和发展智力。

这个阶层处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并不直接对资本主义感兴趣，然而却又对无产阶级抱不信任态度，只要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没有成熟到足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在这个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那些极热烈主张无产阶级解放的成员，譬如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阶级斗争的初期还对工人运动抱过反对态度。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愈来愈成熟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那些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所寄予的信任，是决不能同1914年8月4日以来自由党人和中央党人——甚至德国诸政府本身——对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寄予的信任相混淆的。前一种信任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解放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后一种信任却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有关的社会党人已经不再认真对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了。

完全排除知识分子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在大多数居民对无产阶级政党抱不信任态度或者反对态度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群众尤其会抱这种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知识方面不仅不会大大优越于其余的居民，甚至会在这方面落后于它的对手，即使在社会事务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观点一般说来应该是更高明一些的。

由此可见，巴拉圭的道路在欧洲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剩下另一条道路了，这条道路是拿破仑一世在1799年雾月18日以及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12月2日所采取的，这就是借助于足以胜过无组织的人民群众的一种中央集权组织的优势并且借助于军事威力的优势来进行统治的道路；这种军事威力的优势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府的武装力量所面对着的仅仅是一批没有武装或者对武装斗争感到厌倦的人

民群众。

能在这种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吗？这种生产方式意味着由社会来组织生产。它要求全体人民群众实行经济自治。国家通过一种官僚制度或者通过人民中某一个阶层的专政来组织生产，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组织上的训练，社会主义要以无数个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自由组织为其前提，并且需要最充分的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种兵营组织。

少数派的专政，如果想要给人民以最充分的组织自由，就会因而损坏自己的权力。如果相反地，这个专政企图用束缚这种自由来保持统治，那么它就会阻碍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

少数派的专政总认为一支忠诚的军队是它的最有力的支柱。但是它愈是用武力来代替多数，它就愈来愈迫使反对派用诉诸刺刀和拳头的办法而不是用选票的办法来寻求出路，因为选票对他们说来已不起作用了；这样，内战就成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转化形式。在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情况不是完全冷漠或完全灰心的地方，少数派的专政就会经常受到猛烈的暴动或者长年游击战争的威胁，这种暴动和游击战争很容易发展成为有更广大群众参加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要扑灭这种起义，就必须调动专政的全部军事力量。这样，专政就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并且经常面临着一种被这种内战推翻的危险。

但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说来，再没有比内战更大的阻碍了。在目前这种有广泛的地理分工的时期，任何地方的大工业企业都十分依赖交通的安全和契约的安全。一次对外战争就足以极严重地打乱社会主义建设，即使敌人并没有侵入国境。在目前俄国革命中，俄国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和平对于社会重建的必要性，这是正确的。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内战的危害性比对外战争的危害性还大得多，内战是在国家境内进行的，它对国家所起的摧毁作用和瘫痪作用同敌国侵入同样严重，内战在这方面甚至还残酷得多。

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所牵涉到的通常是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

的取得权力或丧失权力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整个生存问题。但是在战后，不同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都愿意并应该和平相处，即使不会总是友好相处。

内战中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它们进行战争并不是为了从对方夺取一些让步然后同对方和平相处。内战中的情况也不像在民主国家里的情况那样；在民主国家里，诸少数派受到保护，因此，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不得不放弃执政地位的任何政党，决不是因此就必须放弃它的政治活动或者哪怕只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任何政党都一直保留着那种争取成为多数派并从而取得政权的权利。

在内战中，任何一方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失败的一方面临完全毁灭的威胁。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就使内战很容易变得非常残酷。一个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才取得政权的少数派尤其倾向于以最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并且用最凶残的屠杀来惩罚反对者，如果这个少数派在叛乱中受到了威胁并且终于能够把叛乱镇压下去的话。巴黎 1848 年 6 月以及 1871 年 5 月的流血周就以惊人的明确性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长期内战的局面，还是这种局面在专政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群众陷于完全冷漠和灰心丧气的状态，都会使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建设实际上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那种必然会引起内战和冷漠状态的少数派专政竟然成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完美手段！

有些人把内战同社会革命混淆起来，认为内战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并且倾向于用下列理由来替那种在内战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解：即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有革命。据说在任何革命中过去总是如此，而且今后将永远如此。

而恰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抱这种看法：即凡是过去一直是如此的情况今后也就必然永远如此。我们根据迄今所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形成了我们所想像的革命图景。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与资产

阶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专制制度压迫着一切自由运动的国家里爆发的，专制制度依靠一支脱离人民的军队的支持；在这种国家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没有普选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议机构。在这种国家里，反政府的斗争必然采取内战的形式。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将在下列这样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几十年以来，民主——即使不是“纯粹的”民主，但毕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已经扎下深根，而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完全脱离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构成人民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将如何实现其夺取政权，这还需要等等再看。我们无论如何也决不需要推断，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会在西欧重演。如果今天的俄国显得同 1793 年的法国很相似的话，那么这仅仅证明俄国是何等地接近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必须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内战区别开。

社会革命是一种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以持续达几十年之久，而且无法划定这个过程结束的确切界限。实现这个过程的形式愈和平，它也就实现得愈成功。内战和对外战争都是这个过程的死敌。社会革命的序幕通常是政治革命，也即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突然变化；一个迄今一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阶级借此而夺得了政府机器。政治革命是一种能迅速实现和迅速结束的突然行动。它的形式要看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个国家的形式而定。民主——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在劳动群众的力量中扎了根的——愈是居统治地位，政治革命成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就愈大。相反的，如果迄今居统治地位的制度愈是不依靠人民的大多数，而只代表仅仅依仗军事权力手段才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少数派，那么政治革命采取内战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拥护社会革命的人也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要使内战仅仅成为暂时的、迅速进行的一段插曲，要使内战只是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巩固民主，要使社会革命受民主影响的支配，也就是说，

在当时，社会革命不能超越人民群众大多数所愿意达到的程度，因为社会革命如果超越这个程度，就不能获得那种赖以形成持久局面的必要条件，无论那些有远见的英明人士认为立即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何等称心如意。

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也即少数派的专政，难道在法国大革命中没有产生那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巨大作用吗？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些作用是什么性质的呢？那种专政是欧洲的结盟君主们对革命的法兰西所进行的战争的产儿。胜利地击溃这种进攻，就是恐怖统治的历史功绩。这个专政从而就又一次明确地证明了这一条老真理：即专政比民主更能进行战争。但是它决没有证明：专政是无产阶级根据无产阶级观点来实现社会改造和保持政权的方法。

在威力方面，1793年的恐怖统治是无比强大的。虽然如此，巴黎无产阶级依然未能因此而保持住政权。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各个派别之间互相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而且专政终于还变成了结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政策的方法。

下层阶级的专政替军人指挥刀的专政铺平了道路。

如果有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想说，革命是同内战和专政含义相同的，那么他就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革命必然以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式的统治而告终。

然而，这在那些由无产阶级构成民族大多数并且用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局。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具备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

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理解为在民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治。

六、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民主和专政之间的矛盾，目前在俄国革命中获得了十分现实的意

义。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在分裂状态下参加革命的。他们分裂为社会革命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主要代表农民。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俄国的农民还是一个革命因素，因而能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携手并进。同社会革命党人对立的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即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又分成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上，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除非在俄国革命的同时，欧洲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直只相信意志和暴力是万能的，现在不考虑俄国的落后性，想要使革命立即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矛盾加深了。孟什维克认为，在立宪国民议会组成正式政府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参加临时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则想要在立宪会议还没有召集以前就推翻这个临时政府，并且用一个由他们的党所组成的政府去替代它。此外，在媾和问题上也有深刻的矛盾。孟什维克想要立即媾和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布尔什维克，两派都主张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实行媾和——即不割地和不赔款。两派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而且孟什维克在那次会议上属于多数派。但是孟什维克想要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都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只要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俄国军队就应该一直保持作战准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不惜任何代价立即媾和，必要时准备用单独议和方式来媾和，他们为了力图强迫实现这一点，还加紧瓦解本已在瓦解的军队。

他们还获得下述这两个因素的支持：即军队中和人民中的广大群众的普遍厌战情绪以及临时政府似乎无所作为的样子；临时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所做的事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在同样期间内所做的也许已经多得多了，但是还没有做到人们对一个革命政府所期望的那么多。立宪会议的选举，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实现。首先必须对旧的官吏机构实行革新；民主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必须建立。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选民名册的编造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俄国最近一次的户口调查还是在 1897 年进行的。因此，立宪会议的选举连续一再延期。

但是，主要问题是媾和遥遥无期。无论这该归咎于什么因素，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反正总不理解：宣布愿意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当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何等必要。他们奉行着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协约国以及那个与协约国协调一致的临时政府在俄国人民心目中都显得是媾和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要求脱离协约国并且起来反对临时政府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的行动从来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激进。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就在牺牲孟什维克和临时政府利益的同时，愈来愈得势，并且终于能够在去年 11 月里推翻了临时政府。他们的宣传力量显得如此强大，以致于他们能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争取到他们那一边去。社会革命党左派从此就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他们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则仍然站在孟什维克那一边。

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是从他们所鼓动起来的巨大期望中汲取的。如果他们要保持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必须满足这些期望。这可能吗？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建筑在这种假定之上的：即这个革命构成了欧洲普遍革命的起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号召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在这种假定之下，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损害和承受多重的负担，以及媾和将对民族自决提出怎样的解释，当然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于是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保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但是，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的手段。

只要人们承认关于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假定，以上所说的也就随之而变得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个假定还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谁应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态度负责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老原则：即革命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条件中产生的。但是西欧的条件是同俄国的条件如此地不同，以致俄国的革命并不必然定会引起西欧的革命。

当1848年法国发生革命时，革命立刻蔓延到法国以东的欧洲地区。然而它蔓延到俄国边界上就停下了。反过来，当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时，这在俄国以西的地区内引起了一些较强烈的选举权运动，但是没有引起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任何运动。

然而，人们毕竟不该因为布尔什维克预期欧洲会发生革命而过分责怪他们。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这样预期过，而我们确实正在逼近一种可能引起阶级斗争大大加剧和产生许多惊人事件的形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预期这种革命方面估计错误，难道像倍倍尔、恩格斯、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时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估计吗？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预期在一定期间内发生一次革命，从来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确定他们的策略：就是使党的存在，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取决于革命的爆发，并且使无产阶级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破产。

正如一切政治家那样，他们偶尔也在他们的估计上发生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从来也不能把他们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引入一条死胡同。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张牌上。如果这张牌赢不了，他们就不得不陷入一条使他们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的道路。他们必须在没有军队来对付强大而凶暴的敌人的情况下保

卫俄国。他们必须在普遍崩溃和到处贫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人人谋幸福的政权。实现他们所努力争取的一切目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愈欠缺，他们就愈要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用专政来代替所欠缺的方面。人民群众中间对他们的反对愈大，他们就越发有必要那样做。这样，用专政来代替民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关于他们只要取得政权就能引起欧洲革命的估计上发生了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在关于他们只要夺得政权就会有大多数人民兴高采烈地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估计上也同样发生了错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作为反对派在那种由于俄国形势而产生的条件之下确实已发展出巨大的宣传力量。在革命初期，他们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终于变得如此地强大，以致能取得政权。但是他们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呢？

这一点本来应该由立宪会议来说明的；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样，布尔什维克也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大声疾呼地要求过；这是一个要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来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就批准了新政权。当然是在一个强大的少数派的反对之下批准的，这个少数派退出了大会，表示抗议。但是多数派也还没有拒绝召集立宪会议的主张。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在开头是这样说的：“在召集立宪会议之前，为管理国家起见，应成立临时工农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

这样看来，在这个决议里，立宪会议被承认为是比人民委员会更高一级的机构。

11月3日，政府解散了彼得格勒市议会，其理由是市议会违背了人民的观点，这种人民观点是在11月7日的革命中以及“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显示出来的。重选工作被宣布要根据现行的普选制来举行。但是过了不久，人们就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挑出了毛病。12月7日，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决议，其中说：

“无论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的选举办法采取何种规定,只有在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被承认和被行使时,上述机构才能被视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这项真正民主的原则,适用于各级代表机构,而且也适用于立宪会议。……在平等基础上召开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市的、地方的和其他的代表机构——立宪会议也不例外,有权下令限期重新选举。有关选区若有半数以上选民提出要求时,苏维埃必须下令限期重新选举。”

多数选民随时能罢免那种不再符合他们观点的代表,这种要求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的。与此相反,苏维埃怎么会有资格下令重新选举,这一点根据上述的观点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当时对于立宪会议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立宪会议本身的建立以及立宪会议的选举法还都没有受到触犯。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没有得到多数,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因此,《真理报》在1917年12月26日发表了由列宁所起草的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立宪会议的一系列提纲,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篇提纲。其中一篇宣称,选举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不久,在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分裂之前就举行了。所以,左派的和右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并没有明确反映真正的群众情绪。

凡是有这种看法的人,就会根据上述12月7日发布的决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有社会革命党人当选的选区内应限期重新举行立宪会议议员的选举。否则的话,上述决议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制定的呢?但是到12月26日,这个决议已经被人忘记了。突然之间,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两篇列宁的文章中的另一篇这时又弹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曲调。文章先向我们说明,这些刚选出的立宪会议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全体人民群众的真正情绪,然后文章又宣称,任何根据普选制选出的,也就是说由群众选出的立宪会议根本就是没有用处的: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

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①

未免遗憾的是,他们直到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这时,同立宪会议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场冲突以苏维埃的胜利告终,苏维埃的专政则被宣布为俄国的永久的政府形式。

七、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组织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当时曾从事群众活动,为此就需要有一种群众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组织,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一样,都只有几百名成员,受它们影响的工人只有几千人。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政治性的和工会性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建立。革命发生时业已存在的唯一的一种工人群众组织是由资本家自己所造成的:即各个单独的企业。这些企业这时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组织。于是,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所。每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们又联合成代表会议——苏维埃。当时推动这种如此富于重要意义的运动的,正是孟什维克。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所有的形式中最广泛的,因为它包括了一切工资劳动者。这种形式推动了强大的行动,并且在工人的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1917年3月俄国第二次革命爆发时,苏维埃组织也随即重新出现。而这一次,与第一次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的情况相适应,苏维埃是建立在更高级的基础上的。1905年的苏维埃依然是地方性的机构,而且限于各该城市之内。1917年的苏维埃不仅数目多得多,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单个的苏维埃结合成联合组织,这些联合组织又集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63页。

全国性的机构，它的机构就是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一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要反对财政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拥有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迄今所用的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灵验了。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面临一些任务，这种方法就嫌不够了，这时只有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顺利解决。

由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群众性罢工的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也曾被正式提出。1905年的党代表大会赞成过这种主张。后来，1906年的党代表大会曾试图打消工会干部的神经过敏和胆怯畏惧的情绪。党代表大会就群众罢工问题作出决议说：

“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时，应立即同工会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且应采取为成功地贯彻行动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根据在群众罢工方面的各种经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决议是根本错误的。第一是因为群众罢工愈是出人意料地以一种自发的突然性在一定的形势下爆发出来，它就愈能获得成功。如果由党的机构和工会机构经过事先协议而发布命令，那么就必须有周密的准备工作，这就不能获得任何成果。

还有一点理由是，工会官僚机构现在愈来愈反对任何大规模的自发性的行动。工会依然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工会的会员人数愈多，其工会的财力愈雄厚，无产阶级就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受长期训练的管理机构——也即官僚机构，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拥有许多手段的分布广泛的常设组织。工会官僚机构正如工会本身那样是必不可缺的。就像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那样，工会官僚机构也有其阴暗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说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上述两种制度

是不可缺少的那样。

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应该承认工会官僚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职权。这种机构的职权应该限于它的最基本的、而且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任务，也即限于管理工会基金，限于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限于在工人进行斗争时同工人进行磋商。但是它不适宜于领导那种愈来愈标志着时代特征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工会干部正如议会议员那样，可以凭借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实际领导权应该愈来愈属于企业代表机构——工人代表会议。在除了俄国以外的其他各国，譬如说在英国，这种机构（工厂委员和工厂代表）都曾经同工会肩并肩地在群众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这一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同社会革命党左派一起占得了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

当然，他们并不想完全放弃民主。列宁在他4月28日的演说里把苏维埃组织称之为“更高级的民主类型”，称之为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民主完全决裂。对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人们一向把民主理解为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被法律赋予特权的诸阶层，总是享有行动自由的。但是这并不被称为民主。

苏维埃共和国据说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唯一“能够促成最无苦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组织。社会主义仿佛应该从这里开始：就是使那些没有代表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居民阶层都成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

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方面需要讲的话，我们已经阐述过了。我们只需要就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中的表现形式再作几点说明。

为什么同普选制所能做到的相比，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更无痛苦地促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显然是因为用这种方式把资本家排除在立法工作之外。

这样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本家 and 他们的追随者只是无足轻重的少数。那么在普选制之下他们怎么能阻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相反，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之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比起在一种规定得任何人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哪个党真正获得居民大多数支持的选举制之下，更能安分守己。实际上，单把资本家的权利予以剥夺是不可能的。在法律的意义，什么是资本家呢？是有产者吗？

甚至在德国这样经济非常先进、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只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就会有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的从业人员（从业者及其家属）中，职员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就略多于3600万人，独立生产者的人数占1700万人。可见，一个政党也许能获得大多数雇佣工人的支持，但是在全体居民中还占少数。另一方面，在普选制之下，工人如果团结起来的话，也不需要害怕他们的敌人。而且工人在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必需的普选制，比起把政治斗争局限于苏维埃里来，更能使工人团结起来，因为在苏维埃里，阶级敌人已被排除出去，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完全采取了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里是在正式培养宗派狂热，而不是培养阶级觉悟。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种可能。资本家及其追随者不是少数，而是一大批人，他们也许能够在一种在普选制的基础上选出的议会里成为一个厉害的反党派。不许这个反对派在立法机构里讲话，这样会使情况有什么改善呢？

资本家本身在无论何处都只构成一个薄薄的阶层。但是，同社会

主义者对比起来，他们的追随者可能是人数众多的。不能有这种想法：即只有被收买的或者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们才赞成资本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资本主义今日是唯一可能较大规模地进行的生方式。谁若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就必然赞成资本主义，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甚至在那些落后的、对资本抱敌对态度的阶层中间，有许多人还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从而就处在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居民中间直接或间接维护着资本主义的诸阶层的人数可能是很庞大的。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这样并不就能减小他们的反对。他们却会更强有力地对抗这个新的暴政政权的一切措施。在充分民主的普选制之下，一切阶级和利益都按其力量大小而在立法议会里有其代表。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最自由的批评，指出这个法案的缺陷，而且还能显示在居民中间存在的反对力量的大小。在苏维埃里，一切反对的批评都被排除，法律的缺陷也不容易暴露出来。而关于居民中间将会对它进行的反对，起先也完全无从知悉。直到后来，当法律已经颁布时，才出现批评和反对。法律的缺陷不是在讨论中，而是在执行中暴露出来。因此，苏维埃政府甚至对重要的法律，也不得已而用补充规定和放宽实施，使之面目全非，使那些刚刚从前门庄严地抛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门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过：与普选制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选举制具有一种使参加者眼光狭小的倾向。这一切竟然会比普选制、竟然会比那种按实力对比关系参加议会的各政党之间的自由讨论更能促成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很可怀疑的。

而在苏维埃宪法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同这种无痛苦性一样值得怀疑。专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这是否就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在俄国经济结构的条件下，苏维埃只能用下列办法来取得其统治地位：即它们在1917年，不像在1905年那样使自己仅仅局限于城市的

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次，士兵和农民也组织到苏维埃里去了。随着军队的解散，士兵失去了他们在人数上的重要意义。人民委员们所招募的为数不多的军队，其重要性对于人民委员们来讲与其说在他们的选票上，还不如说在他们的刺刀上。当然，红军的选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在各地的苏维埃中，譬如说在彼得堡最近一次的改选中，士兵们保持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席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选票，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与立法和参加政府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在我们面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执行下去，如果一般说来真有一个阶级能直接实现那种本来只有政党才可能实现的这种专政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农民的专政。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掌握在农民手里时才有保证。但是，如果农民在苏维埃组织中构成了大多数，那么苏维埃组织在另一方面也就不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了。

哪些人可以组织在苏维埃里，哪些苏维埃可以参加总的组织，这些观念起先是不完全明确的。往往流行着这种看法，每一个职业组织都能组成一个苏维埃，而且被看成是一个苏维埃。《莱比锡人民报》还在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文章说：

“苏维埃代表机构具有胜过任何民主代议机构的优越特性，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有关国家的一切阶级都享有在苏维埃里获得一种确切地符合其力量及其特定社会比重的代表数目的充分可能性。为此，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自己先行组织起来，当然不是按照迄今所实行的民主主义的公式组成政党，而是按照新的民主形式，组成特殊的阶级组织和工会组织。”

列金^①之流可以对这种把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降低到工会组织下面的做法感到很满意。而那些想要用等级选举制来代替普遍、平等选举

^① 卡尔·列金(1861—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和国际工会运动的右翼领袖。——编者注

制的反动分子们，也会在这里发现一朵可以从中吸取花蜜的鲜花。这位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接着又说：

“资产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在苏维埃里迄今一直没有代表，这并不是因为不让他们参加，而是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一方面对苏维埃实行抵制，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

资产阶级真的不愿意这样做吗？我们的这位布尔什维克朋友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企业家组织这样的组织吗？在他看来，在普选制之下，资本家个人在苏维埃组织里果真比企业家组织更危险吗？然而我们马上就会领教到：苏维埃组织胜过普选制的优越性究竟何在：

“不言而喻，可以这样推断：资产阶级的任何战斗组织都不会被允许参加苏维埃。”

换句话说，比起普选制来，苏维埃组织具有这种优越性：较大的专横。它可以把凡是被它认为是敌对组织的一切组织排除在外。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只能根据苏维埃政府的自意来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又发现，这样行不通。7月12日闭幕的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拟订了一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有权选举苏维埃代表者，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全体公民，而只是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只有“靠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才有选举权。但是什么是“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呢？这是一个确实富于弹性的概念。同样富于弹性的是关于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人的规定。这种人里面包括“以获利为目的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人。有一名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手工艺者，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者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关于剥夺私营商人和居间商人的选举权的规定，可能会使还多得多的无产者变成没有权利的。失业的工人为了勉强维生而开了一个蔬菜铺或者去贩卖报纸，他也就丧失了选举权。

另一条规定把下面这些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获得非劳动的

收入；譬如资本利润、企业收益、产业收益”。这里面没有说明，使人丧失选举权的“非劳动的收入”的数额必须多大。有储蓄银行存折的人是否就属于这一类？许多工人，特别在小城市里的，都有一所小房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还把房间租给房客。这种人是否因而就属于获得非劳动收入者之列呢？最近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罢工，托洛茨基在1909年还把这个工厂称为“革命的堡垒”（《革命中的俄国》第83页）。我问过一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他如何解释这次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抗议行动。

他认为，“这很简单；那里的工人都是资本家，他们人人都有一所小房子。”

由此可见，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被冠以资本家的称号并且丧失选举权，是何等轻易的事情。

足以引起最大专横的选举法在确定概念方面的弹性规定，不应该归咎于立法者，而应该归咎于其所确定的对象本身。在法律上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加以毫不含混和恰如其分的规定，这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我没有找到关于成立一定机构来审查每人的选民资格并编制选民名册的规定，也没有找到关于是否应进行秘密投票或者可以用举手方式进行公开表决的选举程序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具体的选举程序……将由地方苏维埃依照全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之。”

列宁在4月28日的关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中除提到其他问题外，曾阐明以下两点：（1）只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才是选民；资产阶级不在此列。（2）选举上的任何资产阶级手续和限制均予以废止。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由此看来，仿佛任何选民会议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手段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顺眼的反对分子的可能性，也就登峰造极了。

规定中只是顺便地提到：对高级苏维埃的选举是间接选举；这也有助于在选举中发挥那种不利于反对派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还是无法阻止反对派在苏维埃里获得发言权。

但是，向社会主义的“无痛苦的过渡”，显然要求迫使任何反对和批评沉默下去。所以今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说：

“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的代表应被排除在外，同时并建议一切工人、兵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将他们中间的上述派别的代表开除出去。”

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有一定刑事罪行的某些人的。凡被控对现政权犯有罪行者，将立即径予逮捕，毋须再予以开除。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优免权。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但是这实际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意味着凡是站在那些政党立场上的一切无产者都丧失选举权。他们的选票不被计数。这方面是没有一定界限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凡是为了损害社会主义革命而滥用其权利的个人或整个集团，均应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剥夺其权利。”

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剥夺公民权者。因为任何政府，即使是革命政府，都会发现反对派滥用其权利。但是这还不足以保证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把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中派和右派反对派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之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之间立即就爆发了大斗争，他们本来是同这个左派一起组成政府的。于是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的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

因此，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缩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可是，在这方面，任何政权，即使是专政的政权，都有这种需要：即

显得是体现了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而且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是全体人民的大多数。即使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摆脱这种需要。

7月6日的巴黎《人民报》报道了龙格和苏维埃共和国驻伦敦大使李维诺夫的一次谈话。除了提到其他问题之外，龙格说：

“李维诺夫公民，您知道，甚至那些对于你们的运动极其同情的同志们也由于立宪会议的解散而感到痛心。当我上次在一月间见到您的时候，在我这一方面我已经对您谈过。难道您并不认为，为了对付别人对你们进行的攻击，你们无论如何都应该举行(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吗？”

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

“鉴于当前的形势，目前不可能这样做。苏维埃形式所表现的民主——群众意志的正确表现——是目前适合于俄国的唯一的代表制形式。另外，那些对上次苏维埃选举表示抗议的人——那次选举对他们说来是毁灭性的——也会反对选举新的立宪会议，我们毫无疑问地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多数。”

如果李维诺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对此确有把握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选举呢？

如果这次选举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举行而且布尔什维克获得多数，那么现政府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所赢得的道义上的基础，会比苏维埃政府在目前的选举方法和执政方法上所能赢得的基础还要强固得多。首先是：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就会丧失任何反对理由，战斗的无产阶级国际就会一致地全力支持苏维埃政府。

如果对于获得多数如此有把握，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种莫大的好处呢？难道因为普选制目前对俄国不适合，而且只有苏维埃组织才符合俄国的需要吗？但是用什么来证明这种论断呢？如果能回想一下，任何政府都喜欢使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并且喜欢宣称凡是对这个政府不适合的东西也就对这个国家不适合，那么，上述的论断当然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今天的形势是不利于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的。在准备和举行第一届立宪会议选举的当时,俄国国内还处在某种程度的平静状态下。今天,内战已经把俄国弄得四分五裂。但是,难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九个月来的这种结果就构成了证据,足以证明苏维埃组织是最适合于俄国的组织,并且是能实现最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吗?

八、实际事例的教育

对于这里所论述的专政方法的坏处,现在还应该举出它的好处来进行对比:即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十分出色的实际事例的教育,即使这种方法不会保持下去,它也会具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无法再被抹煞的许多好处。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这个论点显然是由于下列的考虑而产生的:在人民的多数派实行统治的民主国家里,只有在能争取到大多数人赞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若走下列道路就能快得多地达到目的地:即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少数派取得了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这个少数派的成绩就会立即产生令人信服的作用,并且使那些以前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迅速皈依社会主义。

这听起来是很娓娓动人的,而且从老魏特林的嘴里已经这样动人地讲过。它只有一个缺点:即这种说法恰恰是以应该获得证明的假定为前提的。反对专政方法的人们恰恰就在反驳这种看法:即社会主义生产可以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来实现。但是,如果这种尝试失败,那么它当然也提供了一次实际事例的教育,然而这是反面的教育,即不是引人入胜的、而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教育。

那些被这种教育所支配而不靠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考察来形成自

己思想的、没有头脑的、单纯崇拜成功的人们，在这种试验失败时不会去考察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的。他们不会在条件不利或不成熟中间去寻找原因，而会在社会主义本身中寻找原因，并且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根本不中用。

由此可见，实际事例的教育有其危险的一面。

我们对这种教育应该抱怎样的看法呢？

我们可以通俗地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内容：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这就是群众所期望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所以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自由的重要性不亚于面包。即使是生活小康者，甚至富裕阶级，也曾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并且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往往在财物和鲜血方面付出最重大的牺牲。对自由、对自决的需要，正如对食物的需要那样，是出于人的本性的。

社会民主党迄今一向对人民群众进行这样的实际事例的教育：即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屈不挠地维护一切被压迫者的自由的；这些被压迫者中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还有妇女、受迫害的宗教和种族、犹太人、黑人、中国人等等。由于这种实例教育，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就远远超出工资劳动者的圈子之外。

而现在，一旦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这种实例的教育竟然立即就被与它背道而驰的实例教育所排挤掉了。它的第一批措施居然就是废除普选制和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因为，关键在于要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一点必须不断反复地予以指出。为了粉碎那 1 万名上层分子的政治影响，并不需要把他们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并不是用他们个人的投票来发挥这种影响的。

至于一切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农、较富裕农民、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立即就由于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而干脆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即使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样，那些因为社会主义为人人谋自由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会因此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这种做法不可能把任何迄今为止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争取过来。它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数目增多。

但是当然，社会主义确实不仅许诺了自由，而且还许诺了面包。这似乎该使那些被共产党专政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感到宽慰。

有了面包和娱乐就能忘记丧失自由之痛的人，不是最好的群众。但是，毫无疑问，物质福利可以把许多以前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或由于共产党的剥夺权利的政策而同共产党疏远了的人们引向共产主义。不过这种福利必须真正来到，而且要迅速来到——不是作为未来的希望，如果这种福利要发挥实际事例教育的效果的话。

该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种福利呢？专政的必要性是以这个条件为前提的：即居民的少数派已夺得国家政权。这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少数派。而无产者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人数，在正常的时期，无产者只能运用这种武器来发挥影响，而且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作为少数派，无产者只有靠诸种反常情况的巧合，也即靠那种使政权崩溃、使国家衰微贫困的灾难，才能取得国家政权。

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用荒唐的政策——譬如毫无结果的内战——来消耗这种财富的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极迅速地扩大各阶层福利的有利的起点。

如果作为已破产的国家政权的继承者而出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是一个专政的政权，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恶劣，因为内战会成为它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下，在物质资料方面所残剩下来的，将由于无政府状态而消耗殆尽。

归根到底，为人人谋福利，就意味着要不断发展生产。摧毁资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继续存在，否则，生产过程将告中

断,从而引起普遍的贫困,这种贫困是现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

只有在无产阶级在合作社的、工会的和城市的自治方面、在参加国家立法和政府监督方面受过了训练而且许多知识分子愿意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在凡是资本主义在新条件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一切地方,立即不间断地替代资本主义。

在一个在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具有这种成熟性。

因此,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推断:凡是在无产阶级只能靠那种与民主相反的专政来维持国家政权的一切地方,社会主义所遭遇到的困难就会如此巨大,以至于看来专政根本不可能迅速实现普遍福利,并且也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那些被专政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民群众同这个暴力政权相和解。

事实上,我们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在存在九个月之后,不但没有造成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

我们看到有一篇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其中有一节论述“情况的困难”。第二十八条就是这样说的:

“二十八、无产阶级在极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执行着积极的组织工作。国内性质的困难是:国民经济的破坏和极度枯竭,甚至由于战争而使国民经济解体;资本家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的政策(有意识的瓦解政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出现之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秩序’);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怠工破坏;旧军官们、将军们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的、反革命的武装和非武装叛乱;**缺乏技术力量和无产阶级本身缺乏教育**(着重号是原文本来有的——考茨基注);缺乏组织经验;小资产阶级——这是极端无组织的阶级——的诸广大阶层的存在等等。”

这一切都是很对的。但是这除了说明条件的不成熟之外,还能说

明其他什么呢？这难道没有确凿地证明：在目前俄国的这种情况下一一种在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实际事例教育”是不可设想的？现在有的是这样一种人所共知的实际事例教育：它使人们有必要就下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争论：即本来应该被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目前还无法显示出来。难道这就会使那些迄今为止还反对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用实际成果来使之信服的人因而就回心转意了吗？

当然，任何新的政权都可能遭遇一些意料不到的困难。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困难归咎于这个政权并且未经仔细考察实际情况就因此而灰心丧气，那就做得不对了。但是如果不顾这些困难而坚持下去，那么就首先对这个政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具有坚强的信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对这个政权产生怀疑。崇拜成功的人总是不可靠的倒戈者。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要回过来再谈谈民主，民主迫使我们力求在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先用最有力的宣传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拒绝专政的方法，这种方法用暴力的实际事例教育来替代说服工作。

这并不就是说，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际事例的教育不能有任何作为。相反，在这方面，这种教育能够而且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不是通过专政来进行这种教育。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一个国家一方面愈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愈是民主，那么它就愈接近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发达，那么它的生产力就愈高，财富就愈大，劳动就愈社会化，无产阶级人数也就愈多。而且，一个国家愈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就组织得愈好，愈有训练。民主有时也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民主是促使无产阶级达到它取得政权和实现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成熟程度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任何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方面愈是先进，那么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冲突中不但能暂时取得胜利而且还能保持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一国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它就会在那里发现,已经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来使经济立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并且立即增进普遍的福利。

这于是就对那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的国家提供了真正的实际事例教育。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于是就会一致要求采取同样性质的措施,而较穷的阶级的其他各阶层以及许多知识分子也会要求国家走这种为人人谋福利的同样道路。这样,即使在那些今天还没有条件使无产阶级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先进国家的实际事例教育也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无法抵挡的。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时刻估计得很遥远。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的团结问题。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更高度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实际事例教育可以加速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一点已经被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指出过: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尽管许多次援引马克思的话,但是似乎完全忘记了以上的这一句话,因为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

会主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国家能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说来,还要考虑到另一种实际事例教育,即一种更高度发达的企业形式能向落后的企业形式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

诚然,资本主义竞争在无论何地都力求把落后的企业铲除,但是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如此痛苦的过程,以至于受到这种过程威胁的企业会千方百计进行抵抗。因此,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时,还会有许多在技术上已经陈旧的企业存在着。尤其在农业方面,农业的大企业经营只会取得很小的进展,有些地方甚至倒退了。

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在大企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起初将不得限于使现存的大企业社会化。如果社会主义农业这时取得了良好收获(如果用一种自由地实行社会化的人的劳动来代替那种在农业中收获不够良好的工资劳动,这种良好收获本来是可以指望的),那么,社会主义农业大企业中的工人的景况就会比小农的景况更有利,然后人们才能有把握地预期,小农也会大批地自愿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去,如果社会对他们提供了为此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话。而在这以前,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仅仅替社会主义准备了不充分的条件。想要在理论上说服农民有产者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促使农民的农业实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只有实际事例的教育才能有所助益。但是这种教育是以农业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为前提的。大企业在全国发展得愈广泛,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快和愈彻底。

大卫^①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目标,

^① 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理论家,1903年发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否认农业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主张永久保留小农经济。——编者注

并且还尽量使之更加显著突出；这个目标就是：消灭任何农业大企业并且把它们支解为分支企业；这个目标对于在农业中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对于一般地在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目前俄国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着爱德华·大卫的精神所进行的工作。在俄国，实际上指导着革命方向的不是列宁，而是大卫。

这就是俄国革命所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这种教育说明了俄国革命在实际上资产阶级性质。

九、专政的遗留物

(一)农业

专政据说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理想的实际事例教育，而且即使专政在还没有达到其目的之前就不能维持下去而陷于崩溃，它也会通过其事迹而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拥护专政的人期望：专政将遗留下许多不能再被消除的遗产，并且还铲除掉许多不能再被建立的东西。

正如其他许多观点那样，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察；一直还在这个革命的影响之下的，有这样的人：他们把一切不适宜于他们的东西一律都冠以“资产阶级的”称号并且予以谴责，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已。

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从这种观察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的结论不同。专政能比民主做到更激进的一些事，但是这些事的后果恰恰并不总是专政者们所想要的。虽然这些专政者何等高高地凌驾于国家其他一切权威之上，但是他们仍然永远要仰赖一个因素，即仰赖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专政者的意志，将决定专政的社会效果最终将会是什么。

法国革命中恐怖统治的最强大动力，是巴黎的无产者和半无产阶级小市民。他们想要的是：平均财产，摧毁大资产。他们在许多情况下

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摧毁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要彻底得多，他们从而就最有效地替新的资本主义大资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种大资产在恐怖统治推翻之后立即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平等主义者的那种专政的遗产就是大资产的兴起，而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平等。

要了解目前苏维埃专政的经济遗产将会是什么，我们就不仅必须也考虑到它的意图、愿望和措施，而且还要考虑到俄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有决定意义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考察也许显得是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这种做法同马克思这样的人在内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似乎是不相协调的。谁也不能有把握地说，马克思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会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会证明是唯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作法，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是马克思的最不朽的功绩之一。如果有人认为在认识问题上单纯的热情比专业知识还更重要，这种人就会被马克思当作空论家而撇在一边。

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是小农生产。全国人口的4/5，也许甚至是5/6是靠小农生产维生的。1913年，俄国（不包括芬兰）的城市人口是2400万，农村人口是1.47亿。农村人口中的压倒多数是农民。革命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毋宁说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情况更加发展了。许多工人回到农村去。城市中的饥荒情况比农民中间要严重得多。

革命以前，农民一直在半封建的压力下生活。诚然，1861年的改革曾废除了农奴制，并且使农民成为在形式上自由的人。但是这种改革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家长式的专制统治的结果，这种统治以父爱的态度关心着要使大地主在改革中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要得到好处。农民为了获得自由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丧失他在改革前所耕种的一部分土地，农民还必须为那片指定给他的土地支付高昂的地价。俄国农户的平均土地拥有额确实比西欧高。革命以前，在俄国，拥有土地5

俄亩(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0.6%，而在法国，拥有土地5公顷和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1.4%，在德国，占76.5%（见马斯洛夫著《俄国土地问题》斯图加特1907年版第19页）。但是，由于农民无知、技术原始和牲畜肥料缺乏，俄国的农业是如此地落后，以至于俄国农业的生产率比西欧农业低得多。在法国，每俄亩土地的小麦产量是70.5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在德国，其产量是77普特；而在俄国，则只有28.2普特(同上书第20页)。

因此，农民在获得解放以后在物质上处境比以前更恶劣了。农民贫困了，农民的企业没有发展，毋宁说反而衰落了。为了避免挨饿，他们不得不从大地主那里佃入土地，或者在大地主自己以大企业方式经营的土地上去当雇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预借工资，因而就陷于债务奴隶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比以前的农户身份还更受压迫得多和更无指望得多。

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时农民的产品能在市场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出售而有所改善。农民们从产品出售中得到了钱币，并且有可能把钱币储蓄起来。但是这只是在牺牲农民自己食用的情况之下才能做到的。在这以前，农民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食用的，因为他们不能销售农产品。这时他们能找到销路，于是就尽可能多地销售农产品，尽可能少地留下供自己食用。因此每逢歉收年就会成为饥饿年。农民这样所储蓄起来的金钱，并不是用来改善其农庄的耕作，而是用来添置土地。

在1863到1892年期间内，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买卖情况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买进	卖出
贵族	821	1459
商人	318	135
农民	335	93

由此可见，贵族的土地减少了，而农民的土地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土地都增加了。但是农村人口增加得更快，于是每个农民平均所拥有的土地的面积减少了，尽管农民土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同时，在受到国家立法鼓励的货币经济的作用下，那种从前往往往发挥着某种使各个农民的土地占有额趋于平均化作用的村社共产主义也日益消失了。个别的农民富裕起来，其他的农民则更加贫困了。但是，这两种农民——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愈来愈贪图大地主的土地，他们指望靠这种土地来挽救自己。他们渴望推翻农村中的财产关系，他们于是变成了革命的阶级。通过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农民的渴望得以表达出来并且具备了表现形式。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曾经是一致的：即对俄国说来，土地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正如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革命那样，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社会主义者中间却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认为，原始的村社共产主义使农民能够、从而也使整个俄国能够立即跳跃到社会主义去，当然是跳跃到一种完全独特的社会主义去。这个派别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后表现为社会革命党的形式。同他们对立的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拥护这样的原则：即正如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即将到来的革命只能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并且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他们受过新近赢得的民主的训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在同西欧的无产阶级处于同样水平的情况下——才能与西欧无产阶级同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别都曾经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农民力求铲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努力。在1905年的革命中，农民显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从那时起，农民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尤其是以社会革命党人为媒介，具备了愈来愈紧密的形式。因此，在1917年革命以后，苏维埃组织不仅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也作为农民的组织而出现。

由于革命，大地产就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

把大地产交给农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要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根本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最合理的办法本来是把大农场收归国有，然后由那些迄今一直在这些大农场中当雇工的农民以合作社的形式来经营这些农场。但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前提是要有农业工人，而农业工人是俄国没有的。另外一个办法本来可以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但是把它们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小农庄只要有可能总是力图取得对其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权。一直到现在，它们无论在何地都还显示出这种特性，俄国的农民尽管有村社共产主义的传统，也并不例外。打碎大农场并且加以分割，这就是农民的纲领，而且农民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纲领。谁也阻挡不了他们。

然而，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起见，妥善的做法也许是：有系统地分割大农场，把土地分给最需要土地而且能够加以利用的人。只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实行这种有系统的分配：这就是立宪会议，它是全民族的——包括农民大多数在内——整个意志的代表者。

但是这要等很久才能实现，农民在各地都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来，与此同时，许多很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已被破坏了。于是，苏维埃组织放弃了由立宪会议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一切希望，并且交给各区的农民这样的职权：着手按照农民的愿望来处置大庄园的土地并且根据农民的意愿来分配这些土地。苏维埃政府最初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个法令规定：

“一、立即毫无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其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庄园建筑物和附带设置，在立宪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之前，一律交由区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处理。”

关于立宪会议的字样，始终不过是纸上空文。实际上，各区的农民可以着手随意处理土地。

这样，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那些有许多富农的富裕地区与那些有真正贫农的贫瘠地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在各个地区，也没有关于谁分得土地的任何保证。凡是富农居统治地位——无论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或者由于他们势力雄厚——的地区内，他们就取得大庄园的大部分地产。关于土地分配情况的通盘统计是没有的。但是常常听人说，在分地时，富农通常分得最多最好的土地。

毫无疑问，甚至苏维埃共和国，也并没有根据平均分配土地的精神来解决土地问题。苏维埃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是无产者和贫农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在许多村庄里，贫农也许只占少数，否则的话，就不需要用剥夺富农和中农的选举权来保护贫农。但是无论如何，贫农在俄国农民中总还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分配土地，看来是要使自己放心。这方面是要谨慎从事的。如果苏维埃共和国触犯了农民的私有财产，对这个共和国说来是很危险的。

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干涉了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城市居民的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农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发给市民，一部分发给贫农。这种做法也许只能被看成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并且是仅仅限于某些地区——大城市的四周——的措施。如果要普遍实行这种措施，那么城市的武装力量就完全不够了。这种措施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平均化，即使年年定期地反复实行它。这种措施到最后也许会成为彻底摧毁农业的有效手段。

如果生产还是私人方式的，而且生产者必须预计到，除了满足他自己所必需的以外，他的全部剩余产品都会被人拿走的话，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生产仅仅局限于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这就是某些东方专制主

义国家的农业衰落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的征收赋税的地方官把农民的除了最必需产品以外的任何剩余产品统统拿走。俄国也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社会主义是要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来消除经济差别。社会从而也成为产品的主人。同时，社会将使生产增长到最高度，并且根据社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观点来分配产品。

相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人生产的继续存在并且经常没收生产者所获得的剩余产品，这样就无异是使生产陷于崩溃，不管这样做是服务于东方专制暴君还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当然并不适用于那种仅仅把它视为临时应急措施的场合。在这类情况下，这种做法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剥夺富裕农民的做法也许仅仅被视为一种应急措施。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办法只会给生产过程带来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就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

但是，即使苏维埃的专政拥有重新划分土地并且完全平均分配土地的力量和意志，这样做也不会对农民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目前的原始生产的情况下，俄国还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使每个农民分得足以使他们摆脱贫穷的土地。

马斯洛夫在那本多次被援引的书里说得对：

“要使农民土地平均化的企图，只有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想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使人人富有，这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空想。如果这种平等无法实现，那么，与此相反，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贫穷的平等，而且，这种情况的蔓延也许几乎不能鼓舞任何人。无论能把农民的土地拥有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土地永远总嫌太少，以致于无法使所有的农户都富裕起来。

想要把农民生活强行纳入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全体小私有者在经济上平等——的框框内，这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反动的。”

（第 240 页）

在目前的人口数量和现有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土地分配办法可以在经济上普遍提高俄国全体农民的水平。为此，就需要过渡到更高级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要求改进农村居民的一般教育水平，并且使农民拥有更多的牲畜、农具、机器和化学肥料——这一切都是在普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起来最困难、也最缓慢的条件。

如果说精耕细作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在俄国只有很薄弱的发展，而且还在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而暂时更为恶化，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在俄国就还根本不存在；后者的条件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只有这种技术，运用科学，运用最完善的机器和操作法以及细密的分工，才能使大企业在经营上有利，而且，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经营有利——即提供更多的产品或者节省劳力——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纳和巩固下来。想要在俄国小农的原始技术和无知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大企业，这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布尔什维克方面确实有人常常谈论：在摧毁大农场并将其土地分给农民之后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我们曾经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提纲第二十四条写道：

“然后必须提出完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土地和耕地被宣布为‘公共财产’。其他任务如下：组织国有的农业，集体耕种从前的大庄园，把小农户联合成一种拥有集体管理机构的较大的单位（即所谓‘农业公社’）等等。”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一项任务，并不能从而就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注定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农民合作社里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经济部门，只是没有包含这个基本部门：耕种土地。以小农技术为基础的耕作，无论在何地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力图使单独的小企业彼此分开并且力图取得对土地和耕地的私有权的倾向。在欧洲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美洲也如此，在全世界正在重演这种情况。难道俄国农民恰恰就是这样的非凡的与众不同的人，以致可以摆

脱这个普遍规律吗？凡是把俄国农民看成普通的人而且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拟的人都会认为，那种指望在目前俄国农业基础上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革命目前在俄国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与 1789 年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国革命的余波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革命铲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土地私有制比以前更纯粹和更强烈地表现出来。革命使那些迄今一直对推翻土地所有制——这是说大土地所有制——感兴趣的农民现在成为这种新建立的土地所有制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革命还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重新巩固起来，而这两者构成了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自然而然地不断重新产生，即使这种生产也会一时受到扰乱，甚至遭到破坏。

甚至较贫苦的农民，也并不想放弃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他们不想用集体企业的办法，而想用增加自己土地拥有额——因而也就是增加私有财产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景况。对土地的贪求，永远标志着农民的特点，这种贪求在大农场瓦解以后现在已经成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在一切已经打倒了封建主义的国家里，农民就表现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农民作为这样的支柱，就被有产阶级当作他们的最可靠的警卫队来加以培养和照料的。俄国的情况也不会有其他的发展趋势。

这将是目前俄国“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无疑问的和存在最久的结果。

因此，一旦农民的新私有制得到了保证，他们对革命的兴趣就随即消失。农民们会起来反对任何想要牺牲他们的利益而恢复旧的大地主所有制的势力。但是农民并没有兴趣去超过这个限度。

而且，正如农民对革命的兴趣那样，农民对他们迄今的同盟者——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

农民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比重愈减小，为市场而生产的比重愈大，愈是依赖现金收入，那么，农民对自己产品售价高昂的兴趣也就愈大。

在封建主义被打倒后，这就成了支配着农民的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使农民同大地主所有制相对立（毋宁说大地主在这种兴趣上是同农民一致的，而且是农民的同盟者），却使农民同非农业的、城市的、工业的居民对立起来。首先是同工人相对立，因为购买食物的费用在工人收入中所占份额比它在资产阶级收入中所占份额大，所以工人对食品价格低廉最感兴趣。

只要封建主义还存在着，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最好的同盟者。他们在从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为止的历次斗争中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农民随即就转向同城市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不仅富农同大地主一样也处在这个阵营里，而且小农也如此，甚至在像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这样。

农民转向这个阵营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随着反封建斗争传统的日益退化以及为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日益被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排挤的程度而逐渐完成的。所以，我们的队伍里还长期保持着马克思还在1871年在他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里所主张过的观点，仿佛农民还会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阶级并肩前进那样，参加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目前还在寻求一种土地纲领，也就是说在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生兴趣的纲领。但是实践却在任何地方都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

在农村里，同城市无产阶级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只有那些自己就是无产者的分子，也就是说，那些不靠出卖农产品，而靠出卖其劳动力维生的、即靠工资劳动维生的人。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工资劳动在农村的扩大，这个过程如果靠农业大企业的增加就只能很缓慢地、甚至往往根本不能完成，但是如果靠工业企业的迁移到郊区，就能迅速完成。此外，无产阶级的胜利还取决于这一点：即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比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增长得快。

而这是一个进展迅速的过程。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里，农村人口不仅在相对地减少，而且甚至在绝对地减少。在德意志帝国，1871年全国人口4100万中，农村人口还占26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64%，1910年，全国人口6500万中，农村人口就还只占2580万，即人口总数的40%。农业人口比农村人口还要少。在1882年第一次职业调查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4520万中还占19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42.5%，1907年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6170万中就还只占177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28.7%。在这1770万人中，自耕农只占1160万，雇工占560万，其余是雇佣人员。由此可见，农民人口在德意志帝国的人口总数中只占1/6。相反，无产阶级的人数在1907年就占3400万，即占人口的半数以上。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的人数无疑还在迅速增加，距离占人口2/3的数字不会再遥远了。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在俄国所占的优势是何等巨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共同斗争，这使革命得以取得胜利，但是却也证明了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次革命愈是作为这种性质的革命而完成和巩固，也就是新赢得的农民私有财产愈稳固，那么就愈加奠定了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引起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增长的基础。在今日俄国所处的阶段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经济趋势是极其强烈的，甚至最强有力的专政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毋宁说，这个专政，作为农民的专政，倒还会促进这种趋势。

(二)工业

俄国的工业是同农业不一样的。虽然这种工业也还表现出许多原始的形式，但是俄国工业的资本主义部分正是由于它是最近才兴起的而表现出最现代化和最高度发展的形式。俄国的产业工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来自农村，完全受着乡村观念的狭隘性束缚；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人掌握了无产者今天所能获得的充分现代化教育；他

们对理论很感兴趣,就像半世纪前被马克思赞扬过的德国工人那样:俄国工人有强烈的求知欲,而在西欧工人中间,求知欲却往往被民主的琐碎工作所磨灭了。

在这个基础上难道就已经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了吗?

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这些厂矿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厂矿单独进行生产,那么,人们也许可以认为能够建立。

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从莫斯科传来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演说;据说列宁在演说里说:

“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①

“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而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工厂和土地属于社会。

个体农民在必要时可以在一种不与任何别的企业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田庄。相反地,一个现代化工厂则处在社会关系之网中,孤立进行生产是无法想像的。由各该工厂的工人来占有工厂是不够的,即使工人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纪律性来正确地管理工厂。如果没有来自其他企业的供应,没有原料,没有煤炭,没有各种辅助性材料,不能经常销售其产品,那么这个工厂一天也不能经营下去。如果原料生产者、矿山或是运输事业不起作用,那么这个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要对这个工厂实行社会主义经营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网。只有当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时,社会主义生产才有可能。

社会民主党不要求把工厂交给本厂工人,而力求实行社会性的生产,力求用一种为满足社会本身需求的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而这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才能做到。甚至布尔什维克迄今也只是宣布使工厂国有化,而并没有宣布把工厂交给工人。后者将只能意味着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像许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所表明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页。

的那样。新的所有者将把他们的财产当作一种特权地位来加以维护，用以对付前来寻找工作的移民；而俄国农民，由于土地不足，尤其一定会源源产生这种移民。

永久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采取把工厂交给在本厂劳动的工人这种办法来实现的，而只能采取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说，归全体消费者所有，以便为他们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生产资料将归国家所有，那些单纯地方性的生产资料则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也可能视具体情况而归消费合作社所有。

人们确实也曾试图目前在俄国走这条路。在这方面他们会做到什么程度，尚须等等再看。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方面的情况还完全处于朦胧不清状态。当然法令并不缺少，但是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如何，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广泛的、详尽的、可靠的和迅速灵通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从核对。

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由于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由于没有一种有各阶级和各党派代表参加并能在其中发表意见的中央代议机构，于是那些实际上的专政者们就很容易只把他们所喜欢的消息向公众发表。不论他们是否利用这种可能性，人们对他们的报道总是不信任的。在这同时，批评并没有沉默，批评只不过在寻求地下的途径而已。批评通过口口相传而扩散开来，其速度几乎就同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一样迅速，但是却不受公众的监督。谣言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我们就是这样地听到无数来自左边和右边的消息，它们彼此矛盾，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一律先表示怀疑。

因此，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主义试验将会造成什么结果，目前还无法肯定，甚至无法对之作近似的估计。但是，如果苏维埃政府不能保住自身，它难道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些不会再被取消而且能长久遗留下去的东西吗？

也许不再有人会认为，苏维埃政府会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它无疑可以消灭许多资本主义财产，把许多资本家变成无产者，但是这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复活，而且必然会复活，而且大概会迅速重新复活起来，而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引起了一次人事更动而已。取代了过去的资本家（他们如今成了无产者）的，是无产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会变成资本家。与此同时，那些能及时地投效一个能在混乱中最终地保全下来并把混乱导向正常状态的政府的人，就能得到最大的好处。现在苏维埃政府就已经感到不得不向资本作出各式各样的让步。早在4月28日列宁就已经在他那篇已援引过的演说（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新闻稿里）中承认，剥夺资本的工作进行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①

但是这种组织工作正是关键所在。对于一个专政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剥夺财产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但是要建立一套庞大的社会劳动机构并使它发挥作用，单靠一纸命令和赤卫队是不够的。

但是苏维埃政府在德国资本面前甚至比在俄国资本面前还更加畏缩，并且承认了德国资本的要求。协约国资本再度流入俄国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只是为了要替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腾出地方才消灭俄国资本的。

不管怎样，仍然可以预期：即使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它所实行的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仍将继续保持下去；除了摧毁大庄园之外，国有化可以被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并且不再能被撤销而恢复原状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尤其可能，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正在所有现代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里实行的运动。战争的需要促成了这种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9页。

动(我们可以回想起美国的铁路国有化),而和平的需要将使它继续下去。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必须对财政垄断有所准备。

但是这已经表明,国家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要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而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今天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农民国家,因为农民已经学会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农民在俄国正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大可能在国家里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适合于这样做。但是农民不再能容忍任何政权忽视其利益——甚至对城市无产者的态度也如此。

面对着农民的商品生产,国营工业也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国家的本身需要而生产。国营工业最主要的销路,即它的国内市场,恰恰是由农民组成的。

农民对廉价买进工业品正像对高价出售农产品一样地感到兴趣。私营工业怎么才能做到会有低廉的价格,是靠压低工资还是靠减少利润,这对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农民对私营工业资本的高额利润不感兴趣。

然而就国营经济而言,情况却并不如此。国营经济的利润愈高,则国家岁入中税收所占份额就愈小;而税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势必主要取自农民。由于这一点,农民对国营企业增加利润正如他们对国营企业产品价格低廉一样感兴趣;但是这却意味着降低工资。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一个矛盾的根源:国营经济发展得愈大,这个矛盾就愈显得尖锐。

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是这种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

把这种情况全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当然是错误的。在那些被人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中间,有许多事情是它所处的形势引起的必然后果,如果别的政权当政,也肯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专政使现有的种种矛盾尖锐化并使之达到极度;这却是专政的本质范围之内的事了。

饥荒不是专政造成的，而是由于沙皇统治的倒行逆施和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但是农业和运输事业在媾和以后的半年内恢复得如此之慢，这却是内战的结果；而内战是在专政之下唯一的反对形式，因此当群众对政治具有强烈兴趣时，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军队的解散也是布尔什维主义早已面临的一个过程。然而布尔什维主义自己曾夸口说，它最剧烈地促进了军队的解散从而迫使媾和实现；而目前甚至连它自己都不再为这次媾和感到高兴。

农民中间的粉碎大庄园制度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始了的；由于农民占压倒多数，本来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件事。然而取消立宪会议却促成了这种情况：对于被没收的大庄园的利用问题所能施加的社会影响，连最后一丝痕迹都没有了，这些大庄园的分配问题完全听任那些具有最切身利益的人用纯粹私人的专横手段来加以处理。

最后，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一定会产生的。这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专政的统治却使那种使矛盾变得尖锐化和深刻化的条件趋于成熟。随着立宪会议解散和军队的解散，最能保护俄国免于瓦解和分裂的两个因素就此消失。恰恰是那些旧俄最富饶的农业地区，现在脱离了它。如果这种发展再继续下去，特别是如果西伯利亚也脱离俄国，那么俄国就不再是谷物出口国或各类食物的出口国。那时，俄国农产品价格将完全由国内市场来决定，而不由国外市场来决定。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将最能表现出来而且最无法调和。在那些输出大量农产品的国家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国与国之间矛盾的形式，而不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也即采取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矛盾的形式。现在，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俄国本身已不再是农产品出口国，并且形成了一种势必会最迅速和最剧烈地引起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经济斗争的

局面。

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完全避免。对于高瞻远瞩的政策来说，矛盾赖以发生的条件若能具有一种可以使无产阶级最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形式，这就越发重要了。创造这种条件——不仅为了对付资本而且也为了对付农业起见——就是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代表们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除了意味着最牢固地奠定民主基础之外不能意味着别的。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现社会性生产，但是这项任务，同实行社会性生产不同，在一个农业国里是可以解决的。

像一切劳动阶级一样，农民也要求有民主。农民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可以生活得很舒畅，正如瑞士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与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的政治兴趣不大会远远超出自己的乡村范围以外；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整个国家机器，这不可能是地方性的行动。农民可能对这样一位皇帝很热情：他是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保护农民的财产，维护农民的利益，就像农民曾经想像拿破仑会做的那样。俄国农民将反对沙皇政权的复辟行动；对农民来说，沙皇的复辟是同那些被农民恨之入骨的旧地主的卷土重来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一个专政者能保障农民的财产，并且允许农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耕种其田地和善价出售其产品，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专政者也可能像共和国一样地受农民欢迎。取消民主，宣布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于是就替那样的专政者廓清了道路；而一个阶级的专政实际上是一党的专政，并且就像列宁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也可能是个别人的专政。列宁在4月28日的演说中说道：

“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必须依靠强制。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

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①

长远地看,对俄国无产阶级说来,最危险的莫过于使农民怀有这种思想:专政——剥夺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似乎是最符合诸劳动阶级利益的政体。如果城市工人一旦同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以及同一种被农民所承认的专政发生冲突,那么城市工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而如果工人自己的专政崩溃了,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下场呢?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另一个可资选择的办法,只能是这个党的毁灭。专政使执政的政党势必力图用一切手段(包括正当的和肮脏的手段)来保持统治,因为这个政党的倒台就意味着这个政党的彻底毁灭。

民主就完全不同。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无论何处的无产阶级,都对民主最感兴趣。在无产阶级构成大多数的地方,民主成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地方,民主又成为无产阶级为保持自己、赢得让步和发展自己而进行斗争的最好的依据。如果居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通过一种短暂状态,即与另外一个阶级结成联盟而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又打算用取消民主、取消少数派权利和取消反对派来使这种短暂状态永久化,那么这将是目光最短浅的实用政策,即只顾眼前的政策。无产阶级自己是在摧毁那唯一能使它在那种短暂状态以后赖以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展开工作和展开斗争的基础。

俄国无产阶级从苏维埃共和国里得到的真正的实际果实(不是法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7—179页。

令),究竟是否比它从立宪会议——也同苏维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更多些,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如果苏维埃共和国崩溃,那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成果也有随之而崩溃的危险。

假如立宪会议能够使民主获得巩固,那么工业无产阶级在立宪会议中以及通过立宪会议而获得的一切成果从而也将得到巩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希望俄国无产阶级全部革命果实不致都被骗走的这种期望完全寄托于此:即专政无法扼杀俄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在经过内战的种种错误和混乱之后终将取得胜利。

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

十、新理论

我们已经看出,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或从俄国情况的特殊观点出发,专政的方法总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结果;尽管如此,仍然恰恰要通过俄国情况才能理解专政的方法。

反沙皇统治的斗争,很久以来就一直反对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已经不再有任何基础,它只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予以推翻。这种情况甚至在革命者中间也可能很容易导致对暴力的崇拜,导致过高估计单纯暴力所能取得的成果,这种单纯的暴力并不以经济条件为依据,而由于某种特殊条件而超脱于经济之上。而且,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必须秘密进行;而秘密政治活动足以助长专政的非民主的风气和习惯。

这些因素的影响当然是同反专制斗争的另一种影响彼此背道而驰的。我们已经指出过,民主包含着许多为眼前目的而进行的小事,而反专制斗争则与民主完全不同,足以唤起人们对重大事态和伟大目标的关心,唤起对理论的兴趣。然而今天却只有一种唯一的革命的社会理论,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这种理论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教导我们，我们的愿望和能力都受物质条件的支配；这种理论指出，哪怕是最坚强的意志，如果妄想超脱于这些条件之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同那种对单纯暴力的崇拜是根本针锋相对的，它同时还促使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识到，他们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的行动有一定的限度；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这次革命最初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

俄国又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它突然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极大权力；因为这次革命导致了军队的全部解散——军队是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制度最强固的支柱。随着暴力手段的瓦解，资产阶级制度的精神支柱也同时瓦解；无论是教会还是知识分子，都无法维持其威望。统治权落到国内最下层阶级——工人和农民——手里，然而农民却不是一个本身能够进行统治的阶级。他们乐意接受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个政党答应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立即恢复和平和立即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无产阶级大众也团结在这个政党的周围，因为它在向他们许诺和平的同时还许诺了面包。

布尔什维克党于是获得了夺取政权的力量。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夺得政权——岂不终于具备了吗？当然，经济理论已经驳斥了这一点：即在俄国的社会条件下能够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同样也驳斥了上述这一点的是证实了以上理论观点的下列事实：新政权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单独统治，而意味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统治，这种统治由于每方都让对方在其领域内自由行动而得以维持下来。无产者不在农村里妨碍农民，农民不在工厂里妨碍无产者。

然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大国里毕竟成了执政党——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一切，毫无顾虑地

扫清它所面临的一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而这个政权尽管它迅即深得人心，但在国内并没有掌握多数票；那么，这对民主就越发不利了。于是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

对于每个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勇气非凡和令人向往着迷的想法。我们为之斗争了半个世纪的理想——我们常常以为它即将来临，但它却又一再迟迟不来——终于将要实现了！无怪乎全世界各国无产者都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欢呼。无产阶级统治的事实要比理论探讨更重要。这种普遍的胜利感，更由于彼此不了解邻国情况而越发加强了。只有少数人能研究外国情况；大多数人都假定外国情况基本上同我们的情况相同——而在人们不作这种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对外国有种种十分离奇的想法。

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轻易的看法：认为无论何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者也因而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西欧各国人民都临近着政治革命，正如以前的俄国人民那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俄国也同西欧一样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诸因素。

在军队已经完全被解散和立宪会议被驱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业已实行的方针所获得的后果而已。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可理解的，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相反地，比较不大能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停留于只从俄国的独特情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做法并且用特殊条件的逼迫来说明这种做法正确；按照他们的看法，由于这种特殊条件的逼迫，他们除了专政或是让位之外未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后来却宁可采取这种办法：即为了替他们的做法找根据而创造出一整套新理论，并且主张这

种理论应该普遍适用。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特点之一——他们对理论具有巨大兴趣——来解释的，我们应该对这个特点很表同情。

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在这里，人们正好记起了马克思 1875 年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现在这个词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维埃统治而出现的那种政体。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在某种情况下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状态称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不可避免的状态。当然，他几乎同时说明，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然而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在专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他也从而自己表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专政的拥护者却并不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有一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就声称，苏维埃宪法、剥夺苏维埃敌人的权利是已经被马克思本人承认为一种与无产阶级的性质相适应并且与无产阶级统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政体。作为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存在就必须与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要一直存在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并且一切阶级差别也都随之而消灭为止。这样，专政似乎就不是在局势一平静时就应该重新让位给民主的一种暂时的权宜措施，而是我们必须对其较长期的存在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提纲”第九、十两项中说：

“九、迄今为止，人们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没有去研究这种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

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组织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不应该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阶级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须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

十、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可以说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经常的战争状态。十分明显：所有那些叫嚷共产党人采取‘暴力行动’的人都完全忘记了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粗鲁的暴力’行动。在各种文字中，专政这个词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暴力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暴力的阶级内容。这从而就阐明了革命的暴力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必须愈严厉。”

由此也就表明，专政的政体不仅应该是长期的，而且应该在一切国家都出现。如果在俄国，刚刚赢得的普遍自由现在又被取消了，那么，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会在下列这些国家里发生：它们的人民的自由已经根深蒂固，自由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更长的时期，人民经过反复的流血革命之后才赢得自由和保持住自由。新理论十分认真地作了上述的断言。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新理论不仅在俄国工人当中获得了支持；旧沙皇制度的压迫在这些工人脑海里记忆犹新，而现在他们因为翻了身而高兴，就像学徒一旦满师而感到高兴那样，因为今后他们可以像师父当年殴打他们那样地殴打那些后辈学徒。不，甚至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家里也有人支持这种新理论。然而，还有更加奇怪和更加难于理解的事。

目前，无论何处都还找不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还必须力求改革和改进。甚至在瑞士，也正在为扩大人民立法权和比例代表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

和遴选方式都迫切需要加以限制。而在那些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国中,我们必须提出更广泛得多的民主要求,以便增进民主,还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要求。正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最激进的斗士站起来向敌人喊道: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才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将是你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为自己所要求的那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丝毫不加掩饰地讲到了这一点:

“十七、从前关于民主共和国以及关于普遍自由(就是说也给资产阶级以自由)的要求在业已过去的那个阶段里,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阶段里,是正确的。工人需要有出版其报刊的自由,而资产阶级报刊对工人是有害的;尽管如此,工人还是不能在这个阶段里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报刊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要求普遍自由,甚至包括举行反动集会和组织反动劳工组织的自由。

十八、现在则已进入直接打击资本、直接推翻和摧毁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直接压制资产阶级的阶段。因此,绝对清楚的是:在现阶段里,在原则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说也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

十九、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领导组织。这些领导组织——作为最活跃的反革命因素——的面目已被揭穿:它们甚至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府。在旧军官支持下和被推翻了的财政资本的钱袋支持下,它们正在以各色各样阴谋最卖力的组织者的姿态出现。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因此也必须用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二十、至于工人阶级和贫农,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他们果真享有充分的自由吗?

“社会叛徒”毕竟也是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当反对派,因此他们也就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地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但是,在资

产阶级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反对派的地方，我们岂不一定要对之表示极度愤慨并且竭尽全力来对它进行斗争么？

当然，我们必须这样做；然而如果那个资产阶级政府能指出像上述言论那样的社会主义言论及其相应的实践，那我们就会啼笑皆非。

我们常常指责自由党人在执政时同在野时完全不同；指责他们在执政时把他们从前的民主要求全部抛弃。然而，自由党人至少还有这样的聪明，以至于不会在形式上抛弃民主要求。他们是根据下列原则行事的：只做不说。

无可否认，提纲的拟定者是比较诚实的，至于他们是否比较聪明，那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德国社会主义党人公开宣布，他们今天所争取的民主，在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后就将予以抛弃，那么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将会作何估价呢！人们会认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民主原则倒过来变成相反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原则；或者认为，对他们说来，民主不过是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一个梯子而已，一旦他们攀登到政权的高处，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梯子而把它一脚踢开；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即使对俄国革命者来说，下述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眼前政策：如果俄国革命者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专政的方法，不是为了去拯救已受到威胁的民主，而是为了反对民主以保全自己。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地，如果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更确切些说目前还只是弱小反对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这种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这些人不但不把专政和剥夺广大群众权利的方法看成我们应该一般地予以谴责的东西，或者看成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俄国那种非常例外情况下的产物，反而竟然把这种方法赞扬为一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力求实现的状态。

这种论调不仅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它是危害极大的，如果这种论调被普遍接受，就会使我们党的宣传力量陷于极度的瘫痪。因为除了

一小撮宗派主义狂热分子之外，整个德国无产阶级，正如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拥护普遍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将愤怒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以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一个新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而开始。无产阶级将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关于全体人民享有普遍权利的要求含有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实际上只是为了替自己争取特权。无产阶级同样也会驳斥这种可笑的过分要求：即无产阶级自己在今天就庄严宣称，它的民主要求不过是谎言而已。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像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像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专政并没有证明是一个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赖以确保其政权的一种手段；专政只能证明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许多它所力不胜任的任务，使它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弄得筋疲力尽和狼狈不堪。这时，专政很容易会损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幸而专政失败和革命崩溃这两者还未必就含义相同。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序幕，那么，上述两者的含义就相同了。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么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

（选自《无产阶级专政》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81 页。由何疆、王禹根根据维也纳伊格纳兹·勃兰特出版公司 1918 年德文版译出。）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1932—1937年)

一、社会主义的起源

社会民主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和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党。工人的解放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曾有一个时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但是后来，他们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怎么也无法填平，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并认为填平它是必要的。这个分裂的发生，不是由于误会，也不仅仅是由于意见的分歧。

为了认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地绝对不能调和，我们首先必须探索社会主义起源的历史。它是从两个根源产生的：一个是伦理的，另一个是经济的。第一个发生于人的自然本能，第二个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和工人的阶级地位。

“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虽然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所提出的，其实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有了。自从有了压迫和剥削以来，这个要求就反映着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及其朋友们的愿望。但是这个要求仅仅提出了一个问题，并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是什么，却因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寻找这条道路的人们所属的不

同的阶级而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由于建立了工人的民主社会经济，这个问题的解决才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了。只有通过经济的研究，而不是通过道德的愤慨，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仅仅是热情的愿望，如 1789 年以来要求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愿望，自然是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

一切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是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和剥削的反叛者，但他们也是经济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者。

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群众的贫困，对于这种贫困的叛逆性的研究，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但也正是这种贫困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压得工人们抬不起头来，以致他们常常是无力反抗。有时偶尔有少数人敢于反叛，他们也只会破坏机器，焚烧工厂，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们这样来发泄他们的愤慨，结果只是加重了自己的苦难。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因此相信，工人阶级不能凭自己的努力来解放自己。他们只能靠比自己高明的人道主义者的努力，才能获得解放。然而，事情不久就明白了，从资产阶级世界的百万富翁和政治家那里是不能指望什么的。但是，和那些依靠好心的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驾前进的，还有社会主义者。他们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的力量只能来自工人阶级本身。但他们也同样对于群众表示绝望。在工人阶级中，他们只寄希望于条件比普通工人优越的一小部分优秀分子。他们和职业革命家一起，企图搞阴谋活动来夺取政权，并想借武装起义来实现社会主义。最后，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为早期的工人运动引起的形势所迷惑，把当时工人的数量和知识力量估计过高，相信工人阶级只要实现民主，就是说，只要实现普选，就可以立即取得政府的权力，并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改变社会。

所有这些学派，不管他们如何显得彼此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把工人阶级总是看作如他们所发现它的那个样子，并想找到一个立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就是说，要立即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被奴役的状态。每个学派都严厉地批判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能清清

楚楚地看出别派的幻想。他们都对了,但是他们都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时间把他们全都毁灭了。

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之而起。他们给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了发展的观念。他们对于工人阶级,不只是看到它当时的状况,而且也看到它的发展。在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认清了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可以立即解放自己的地步,而且也不能靠普选,靠一部分好心的资产阶级的努力,或者靠一些奋发的阴谋分子先锋队的武装行动来求得解放。同时他们还看到,由于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将壮大起来,而在知识和精神力量方面也将不断地增强。这样,劳动者将会得到解放自己的力量。不过这还有待于教育。但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工人阶级不能从自称为工人的老师那些人那里得到教育,而只能从生活条件所强加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到教育。

假定其他一切情形都是一样,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即在普及教育和结社、出版及普选自由的环境中,阶级斗争越是向前进展,它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早在各种民主工具成为工人取得权力的手段以前,在工人的各项任务中,如怎样去取得权力、怎样保持它,以及在建设较高级的社会秩序时又怎样成功地去使用它等等任务中,这些民主工具就已成为工人教育自己的手段了。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立即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在阶级斗争中去支持工人,帮助他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它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生产过程,并且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努力使参加解放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分子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党。在他们以前,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思想家们都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反对一切遵循其他方法的社会主义者。所以,社会主义反而成了分化工人阶级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而并不是要在已有的各个派别中增加一个马克思派。

在《共产党宣言》中(1847年),我们看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追随他们的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说: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①

他们只要求他们的追随者们,在工人阶级各党之内,要力求“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他们的行动和这个观念是一致的。例如在第一国际内,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却有很多的蒲鲁东主义者,后来还有许多布朗基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这些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懂得如何去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运动牢固地联合起来。我们的时代中一切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从上世纪最后的25年间起,已经起来代替了以前各宗派的地位,它们都是以这个联合为基础的。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不只是为了解放工资劳动者,而是为了解放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而进行阶级斗争。

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享受失业保险和举行工厂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

这些社会主义的党,甚至在自己还未觉悟到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时,就在争取实现这些观念了。从上世纪末以来,只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地方,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都已经不可抗拒地在向前进军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最怕的是把他的学派堕落成为一个顽固的宗派。恩格斯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5页。

怀着同样的戒心。他的科学著作和他的朋友马克思的著作是不可分地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每当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总是要牢牢记住,我们所说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

恩格斯对英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最严厉的谴责,就是他们以宗派主义的精神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活着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一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一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位:如果恩格斯活着看到这些,他该会说些什么呢?这种马克思主义就真的可以称为教条狂热主义(*doctrinaire fanaticism*)了。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终极的知识,而只有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因此,他自己的学说不能理解为我们必须信仰的一部教条汇编。马克思主义本身只是建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方法之上的一个明确的学习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方法称之为唯物史观,它的本身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它像一部机器一样,通过运用中不断积累经验而取得的成果,经常是在改进的。作为知识活动的某种既定方法的基础的原理原则,通常不能像知识活动的结果那样改变得快。人们在不断地改变的经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见解比起那些见解所由得来的思想方法和形式比较容易改变。但是这两者却都被看作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的。即使是唯物史观,也不能像雅典娜一样一下子从她的生育者的头上全副武装地跳出来。事实上,唯物史观有两个这样的培育者,他们毕生在不断地发展着它,并且把继续这个发展过程的任务,遗留给马克思主义者们。

认识和理解这条发展的路线,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对于每个愿意批判地研究马克思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只要他是真诚地愿

望求得知识,而不是怀着像诡诈的律师那样不顾一切地只求把对方当事人判处罪刑那种动机。

任何形式的教条狂热主义,以及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不可改变的教条的任何企图,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这并不是怀疑论,怀疑论否认对于世界绝对认识的可能性。这只是承认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真理,不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自在的真理,而只是就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有效的真理。在更进一步发展的认识显示并消除存在于先前所接受的真理内的一点一滴的错误以前,每一个这样的真理就必然要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马克思在他的事业中很早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只能靠自己才能得到解放;从资产阶级中来的父亲式的朋友或少数精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能为群众完成这个任务的。在这一点上,他显得比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高明。但是,也像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不得不承认,要进行这场斗争的话,群众还不够成熟。群众怎样才能成熟呢?依靠从上面来的好心的导师么?成年人不会愿意服从导师的监护。在基督教徒或是无神论者企图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企图,在导师方面,通常总是堕落成为令人讨厌的、僧侣式的傲慢,而在受教导者方面,就堕落为虚伪的服从。

成年人只能从生活中受到教育。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的教育来自生活,这就是说,他期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于工人的影响,能使工人阶级受到教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了这点。工业把工人们大批地集合在一起,从而增进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与雇主的冲突增长的同时,工会也就发展起来。冲突伸展到一切工业时,许多偶然的、地方性冲突就演变成了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就成为政治性的,在政治变动中表现出来。但是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克服使群众赤贫化的各种力量,因为使群众赤贫化无论何处都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共产党宣言》还必须证明工业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

“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①

只有精神和知识的进步，才能使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成为可能，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进步能从何处得来呢？

马克思期望革命的结果会带来这种进步，而革命的到来他是正确地预见到的。他研究过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最初带着纯粹资产阶级的性质，但逐步地变得越来越彻底，最后终于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统治，虽然为时甚短。这次革命不仅大大地增进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勇气，而且同样也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理解，在这以前，他们是无知的、无生气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时期，虽然就已反对布朗基主义者所提倡的阴谋和突袭(coups des mains)的政策，但他仍然强烈地受到雅各宾传统的影响。1850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论文中(1895年恩格斯将其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他把布朗基主义者看法国的真正工人政党。他所给予他们的同情，超过其他一切人。

1847年，马克思断定，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会走着大革命同样的道路，不过那时的工人阶级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将“更发展得多”罢了。革命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足以把工人阶级很快地提高到必需的思想水平。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

这个期望没有实现。1848年德国革命的力量，在几个月之内就消耗掉了，而工人阶级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革命中起作用。那时所发生的情况，马克思后来经常遇到。他正确地预见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但却误断了事态发展的速度。

然而，没有谁能像马克思这样迅速地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甚至当经验和他内心的愿望相反的时候。早在1850年9月的时候，他就出来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4页。

② 同上书，第307页。

对过“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的意见，他并且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①

这个声明和原来的期望，即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的期望，就迥然不同了。可是，甚至这个新的更谨慎的希望证明还是太热切了。自从这个声明最初提出来以后，不是15年、20年、30年，而是80年已经过去了。的确，这些年代并不是停滞的年代。在这一段时期中，工人阶级在政治独立和才能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

在1850年时期，马克思虽然比大部分那些还在梦想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高明，但他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雅各宾—布朗基主义的老传统。他仍然认为武装斗争、“内战和国际冲突”是提高无产阶级达到更高水平的手段。他还没有认清，每一次流血斗争，包括人民的战争，在开始时看来虽也可以起鼓舞和提高的作用，但最后却会使参加者沮丧，不但不能增长，反而会降低他们的建设能力，无论在生产方面或在政治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1850年以后的十年中，马克思有机会研究英国商品生产的规律，即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并且把这些规律比以前任何研究者都阐述得更加清楚。但他也观察到，在英国当时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工人阶级有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他看到在这种自由之下，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克服资本主义使工人陷入绝对贫困的趋势。在他的《成立宣言》^②（1864年）和《资本论》（1867年）中，他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有利结果都表示过欢迎，认为这是对于英国工厂企业中流行的较长工作时间的一项改进。当然，这点并没有使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而赢得的财富和权力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同时那些没有受到国家法律或强大的工会的保障的无产阶级群众，其绝对赤贫化却更加向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

② 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译者注

发展了,而那些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落后于资本财富的增加,所以他们的地位如果不是绝对变坏,也是相对地变坏了。

但是,这却也提供了一个证明,即在有足够自由的条件下,工人以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必经过“内战和国际冲突”,只须经过由他们的政治、经济的群众组织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就能够把自己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使自己能够最后去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斗争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程度的政治自由。在缺乏这个条件的地方,在这个条件还需要争取的地方,“内战和国际冲突”对于获得作为工人阶级兴起的必要条件的民主,也许是必需的。在有民主的地方,工人阶级就无须采用武装力量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了。

这里是马克思在国际的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于 1872 年在阿姆斯特丹一次公众集会上所说的话(据 1872 年 10 月 2 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的报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一切其他的国家中,情况却不是这样。”^①

所谓“其他国家”,马克思所显然意指的,首先是当时欧洲大陆军事和警察集权的大国。1871 年 4 月 12 日,正当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指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79 页。考茨基使用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删去了其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编者注

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①

马克思除去他所指出的工人运动的两个阶段以外，不幸未能亲自看到它的第三个阶段。这个第三阶段在他逝世的前后就已在形成中了。1789年至1871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还不足以破坏大陆列强的官僚—军事机构，但是影响却很大，使劳动群众能从这些强国夺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这种自由，他们不仅学到了很大的政治才能，而且也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幸的是，这个新阶段在开始时就遇到许多重大的阻碍。在法国，紧接着1870年9月4日革命的就是1871年5月对公社的血腥的镇压，以后就是一个黑暗的反动和压迫无产阶级的时期，这个时期差不多延续到马克思逝世的时候。在奥地利，1866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自由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却不长久。同样，德国于1866年以后开始的自由时期也不长久，而以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而告终。

因此，马克思没有机会观察到民主在欧洲大陆各个军事—官僚国家中对工人阶级发展的影响。

恩格斯比他的伟大的朋友过世得晚。他在世时，还能亲见奥地利废除特别法、德国废止反社会党人法以及全欧工人运动迅速高涨的初期情况。因此，他能够亲身把这个特殊阶段的发展的结果为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他在给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著名的绪言中做到了这一点。

马克思从来不相信依靠主观愿望来实现一次革命的可能性。在这点上，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和布朗基主义者不同了。但是，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政治自由的时候，他不得不热切地希望革命能够尽快地到来，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能带来必要的政治自由。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他热切地期待从战争或国内冲突引起的未来革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99页。

征象。

但是，现在局势完全不同了。恩格斯也看到革命的到来，但他希望革命能够延迟发生才好。他怕新的战争。战争可以引起革命，却也使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现有的革命阶级受到破坏的威胁。战争也可以破坏革命，可以损坏工人阶级利用革命的能力，因为所希望于革命的是，革命不仅会带来政治自由，而且也会带来政权本身。

“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许多人过去就已广泛地使用，但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意义显然是混淆不清的。大多数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指的是一个政治目标，它的意义是自明的，毋须解释。不幸得很，它并不是这样。

这个名词来自马克思。1875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对这个极为重要的名词加以说明。他在一封给爱森纳赫党执行委员会的私信^②里用过这个名词，并且假设这个委员会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名词绝无废弃民主而转到专制权力的含义，这仅仅从下面一点事实就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即马克思在上述同一信里，曾把民主共和国的特征说成是这样一个政府形式，在这个政府形式中，“阶级斗争将要进行到底”。他说：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4页。

② 即《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3页。

恩格斯后来也同样地说过。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制订出新纲领的草案以后，曾经送给他征求意见。恩格斯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文，提出了他的批评（发表于《新时代》第20年卷）。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

在恩格斯心目中，这个共和国确实就是民主议会共和国，因为他继续写道，在一切情况下，这个纲领必须包括“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②。（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甚至罗莎·卢森堡，尽管她这样接近布尔什维克，并且一直坚持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可是直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始终坚决相信这样一种专政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面。在《俄国革命》一书中，她写道：

“的确，任何民主制度都有它的缺点和局限性，这是它和人类一切制度所共同具有的。但是由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发现的补救办法，即废弃民主，却比他们设想要去补救的弊病还要坏，因为这就把生命的源泉阻塞了，而社会制度一切缺点的救治办法都是从这个源泉得来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无论如何不等同于废弃民主观念。相反，它同废除官僚—军事国家机构的要求有关，而不是要求加强它的绝对权力。

在1891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新版作的序言，曾以下列的话作结：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12页。

② 同上书，第4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3—14页。

但是，马克思把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特征，看作是这样一个企图，即“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致库格曼的信）^①

摧毁这种形式的国家机器，确是巴黎公社完成的唯一的事。但它却没有存在足够长的时间，来着手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

把专政作为一种政治秩序来说，那么维持一个强大的官僚军事的国家机器，就成为任何专政的先决条件。摧毁这个机器，就意味着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或彻底的民主，而绝不意味着专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摧毁集中的国家机构最重要的目的仅仅是建立民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说明过，为什么要把这种状态说成“专政”，虽然这种状态必然是从民主产生出来的。我认为他们使用这个名词只是表示一个强大的政府。

卡尔·马克思不是唯一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这个观念比马克思主义早得多。它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形式。这种社会主义为了把劳动人民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搞和平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侨居区或互助协会（原始社会主义的另一形式），而是要以武力夺取政权。这个观念是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的恐怖统治有关系的。

在罗伯斯比尔垮台后，弗朗索瓦（“格拉古”）·巴贝夫企图召集山岳党的余众，来和正在上升的资本主义政权进行搏斗，并以“粗陋的平等”（“*crude levelling*”）（马克思语）的社会主义来代替它。他组织过“平等派密谋活动”（“*The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这个活动的任务是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政权。这种政权是要实行彻底的民主的，但不是立即实行。经验曾经表明，工人会让自己被有财产和教育的人牵着鼻子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第 599 页。

那些密谋家怕的是，贫苦和无知的人民将会由于民主而再度成为这些势力的牺牲品。因为这个原故，他们要通过一次人民革命来建立专政。要取消出版自由，凡“与平等及人民主权的神圣原则相抵触的”任何出版物，要一律禁止。指导委员会被赋予当然权力来决定什么是与这些原则相抵触的。要实行普选，但必须待平等完全建立之后。

这里所指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一种专政。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专政(*proletarian dictatorship*)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因为无产阶级还过于无知，因而还没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或“慈父”(*“little fathers”*)的专政。近来新创的“教育的专政”(*Erziehungsdiktatur*)一词，正说明了这种形式的政府的特征。

巴贝夫所谓的专政的原意，并不是指从民主产生出来的一种政体，并不是工人阶级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的产物，而是这样一种政府的形式：这个政府鉴于无产阶级的落后，将不惜一切牺牲，以一切最极端的或无情的方式来保卫工人的利益。这种专政是从下面的信念产生的，即以民主作为解放工人的手段一定会失败，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失败过了，因为它没有能力解放自己。

“平等派密谋活动”被揭发了，巴贝夫被处决了(1797年)。但是他的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工具的概念，并没有随他一起死亡。这是某些特殊条件的产物。因为，除非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总是使劳动人民陷于贫困，无从自拔。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对抗资本。但是在资本统治之下，无产阶级陷于贫困，不但不能取得政权，而且也不能保持政权。

无论哪里，只要有暴动方式推翻现政权的条件存在，并有这样的机会发生，或显得会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这种专政的观念就会显现出来，它的根源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落后和没有办法，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知识、精神力量和独立性达到了高级阶段。

法国在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工人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工人就转

向如何立即解决他们的贫困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一致认为，他们不能从资产阶级那里期待什么。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立即实现社会主义。

七月革命鼓舞了巴黎工人相信街垒战的力量。这就导致了巴贝夫观念在布朗基主义中的复活。

但是，并不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倾向于布朗基主义。有些人却接近于路易·勃朗，他热烈地相信民主共和国。贫苦和没有财产继承权的人们不是占着国家中的大多数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使他们有普遍、自由、平等的选举权，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议会，有出版、结社的完全自由，这样国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向社会主义进军。但是，路易·勃朗却没有看到，要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才能达到这种成就，而在 1848 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动力使这个阶级能够得到发展。

蒲鲁东反对这两种趋势。他看到在当时存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来取得胜利，但是他对于少数社会主义者通过一个全能的国家机构的专政，却也怀着同样的恐惧。他也是只看到无产阶级的当时的状况，而不看到它的将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去影响和掌握国家的政策，但他却也感到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完成。为了使解放成为可能，他企图把问题简单化起来。他认为工人没有能力实行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立国家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他们却能够掌握个别的公社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把国家解散成为一批独立自主的公社，以求达到社会主义。

简单地讲，在马克思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时候，这些就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占优势的几种趋势。关于资产阶级慈善家的空想主义的没有希望，他是从不怀疑的。他唯一严肃地对待的社会主义，是从工人运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了上述三种趋势的缺点。他所看出的缺点，是在于每个趋势的追随者都企图以如他们所发现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任务。

空想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样也认识到,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也看到了教育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个任务的需要,但教育的任务必须由站在无产阶级上面的高超的领导者来担任。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人才有可能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并因而能够学到如何民主地管理自己。所谓“只有在完全的社会主义之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启示,而是一个原始的、前于马克思的概念。

马克思看出以这种形式来教育无产阶级的弱点,因为这些教育者或者是自居领袖的职务,或者是由一个无知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动或其他方式把他们提拔出来掌握绝对权力而统治自己的。这就意味着使工人的解放依赖于历史的偶然事件,完全靠不住的偶然事件。因为一般而论,不能期望少数社会主义的阴谋家,受到一个微弱无知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就能取得没收资本所必需的绝对权力,更不用说去克服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困难了。

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教育之要得到保证,不能依靠于反常的情况,而只能在它的发展途中,依靠于作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的那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其力量来说,是残酷的;就其影响来说,是强有力的。这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地从这种阶级矛盾中产生的。阶级斗争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不管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怎样把它说成是马克思的“发明”。

马克思并没有发明阶级斗争。他也不要求阶级斗争。他只是记录它的存在,指出它的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他着重指出,这些后果之一就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而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成功。

马克思在 1872 年的时候,把欧洲国家划分为两大类。在一类国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看来工人阶级无需使用暴力就可能取得政权。马克思把大多数的大陆国家都包括在另外一类,在这些国家中,要想不经过革命而取得政权,看来是不可能的。

德国废止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出现了第三类国家。同过去一样，大陆军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要经过革命而取得政权看来仍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现在非常需要尽可能推迟同国家发生决定性的冲突。而另一方面，在俄国，却又十分需要尽快地爆发人民反对专制政权的起义。

建立于 1889 年的第二国际的存在时期，正包括了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就看到了这三种明确的趋势。它们在地理上也是划分清楚的，它们是从当时大陆各种形式的政府统治下发生的。每一种趋势各自表现着对条件的适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他们都能彼此并存，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并不是没有磨擦。

人类心灵总是渴望绝对的解决方案。和相对的东西进行斗争，是违反人类心灵的本性的。所以，在上述三个类别中，各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在革命问题上所站的、只能适合各自国家的特别的立场，看作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有效的东西。这种情况由于活跃的国际交往而加甚，活跃的国际交往使观念的传播甚至比商品的流通还要快。上述的三个类别，产生了三种观点，都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但从这三种观点，却又产生了三个派别，他们不但在国际内，甚至在各个国家中，都是彼此对立的。

虽然如此，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在范围、在统一性、在精神力量方面，却一年年地增长了。

三、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

俄国也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于是就有马克思主义以及根据这个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兴起。但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在沙皇统治下却比早期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政党遇到更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它的经济落后状

态。由于经济落后,就大大延迟了资本主义群众性大工业的发展,也就大大延迟了大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缺乏民主,对于一个从事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发展,也是一个并不较小的障碍。因为缺乏民主,就使任何政党活动、合法的群众组织、出版自由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除此以外,由于经济落后,俄国迄至上世纪末叶为止,还保留着农村原始共产主义的显著痕迹,这是欧洲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由于这些因素,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还继续带着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特征,比在西方延续得更长久。俄国为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战士从西欧继承了各种社会主义的趋势。他们很自然地看到,要使沙皇俄国得到社会主义的新生,其力量不能来自数量上微弱的城市工人,而是要来自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城市工人多数是从农村来的,他们大部分还保存着农民的思想感情。

城市工人群众以及在知识分子即学生中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们,所受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比在西欧为晚,对于俄国城市工人的影响,也就增长得很慢,而且也难于增长。

一直到了1898年,那些抱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才有足够的数量,敢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这是一个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党,它培养出了许多领导者和思想家,他们不但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然而,当时在俄国存在着的特殊条件,仍然不利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随着它的重工业的兴起,以及在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借以创立了自由的工人阶级组织,出版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书刊,以及群众参加了罢工、选举斗争之后,这才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有效的发展。俄国甚至在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之后,产业工人在数量上仍然比较小,同时还保持着他们的农民观点,没有任何工人阶级的觉悟。除此以外,只有秘密出版和结社是可能的,自然,这不能超出受到讨厌的严格限制的范围以外。

不利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甚至许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受了这些不利条件的支配。他们往往以一种相当狂热的意义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自觉地带着马克思主义以前时期的、布朗基主义的或巴枯宁主义的色彩的各种观点,不断地注入马克思主义。

弗·乌里扬诺夫(他更以列宁的名字著称)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突出的人物。他在社会民主工党创立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党。他接受了他所帮助起草的党的纲领。在党内,最初使他和那些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是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在沙俄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组织必须是秘密的。虽然如此,但还必须使它具有这样一个形式,即一方面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发展党员的知识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促进最大多数工人的独立思考。要达到这点,就只能靠党内所有同志最密切地参加党的工作,并和工人运动紧密地接触,也就是说,只能靠党内有最广泛的民主。这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符合的。马克思在运动开始时,就认为把民主作为取得政权的工具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民主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盟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情况下,不得不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的确,在开始时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有必要赋予领导上以独裁的权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愿接受这个权力。他们参加同盟,只是在它不再是一个阴谋团体之后,虽然由于当时缺乏结社的一切自由,它不得不仍然保持为一个秘密组织。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经作过如下的说明:

“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①(恩格斯为马克思著《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三版作的序言)

1864年的第一国际,也像它的前身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被迫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0页。

有些国家中保持为秘密的组织。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反对如马志尼所要求的那样，把国际变为阴谋组织的企图。马克思说服了马志尼。所以，第一国际不是按独裁形式，而是按民主形式组织的。马克思也同样反对 1863 年在德国组织的总工会的形式，在这个工会里，拉萨尔掌握着独裁的权力。和拉萨尔派相反，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爱森纳赫派，是按民主形式于 1869 年组织的，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在德国，组织的独裁形式终于让位于民主形式。

然而，凡是组织不得不采取秘密形式的地方，在群众还没有掌握他们自己的运动，而政治组织不是被看作教育无产阶级走上独立的手段，而是被看作一举取得政权的手段的地方，那么，那里就继续出现搞阴谋组织的要求，组织内的领导者具有无限的独裁权力，而成员们却只能盲目地服从。因此，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起义或政变被引到了最注意的地位；随着这一形式的军国主义思想一起带到党组织中来的，就是不求提高群众的知识和经济水平、只求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群众仅仅被看作是炮灰，没有独立思考和自己的意志，越是服从命令，就越容易加以利用。

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民主组织。但是，列宁不久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他开始为党中央机关要求愈来愈大的权力，同时不断地限制党员的权力。

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尤利·马尔托夫，以及后来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都反对他。甚至罗莎·卢森堡虽在其他事情方面是比较倾向于袒护列宁的，但对于他要在党内搞独裁的企图，也就表示疑惧了。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小册子（1904 年）中甚至肯定说：

“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51 页）^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8 卷第 396 页。

我现在把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第22年卷第2期)对列宁的批评引在下面。她说:

“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以盲目服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使关于党的组织和活动的一切事情,甚至在最微末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一个中央的权力;这个中央权力思考一切,关注每一件事情,决定每一件事情,并把党中央从周围革命的环境隔离开来,——如列宁所要求的——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企图把搞布朗基主义阴谋活动的那些工人团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中来。”(第488,489页)

“列宁的思想主要是要助长对党的活动的控制,而非其发展;要扶植对运动的限制,而非其增长;对运动的扼杀,而非其团结和扩大。”(第492页)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列宁主义从其一开始时起所有的特征。

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已经发现,党内独裁所能做到的,只是阻碍和窒息工人知识的发展。只有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工人才可能自愿地承认运动的某个领袖的独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中,教育工人独立思考和行动,比那些领袖们取得权力还远为重要。

因为这个理由,罗莎·卢森堡早在1904年就已经看到,列宁主义是妨碍工人阶级向上发展的一个因素。自然,她当时还不能预见到列宁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破坏影响。

同时,列宁主义除开扼杀和窒息工人运动这一点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有害的因素,这从其一开始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像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别的神存在。党内如果有人不相信他的神明不谬,就会引起他的剧烈的憎恨。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别的领导者表示更大的信赖的倾向,或者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们进行斗争。

因此,正像任何要成为一个党的独裁者的人一样,要列宁和那些意

见上偶然与他有些分歧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他和那些品质好的、具有独立思考的同志站在平等的地位一起工作一个时期,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会在精神上堕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堕落下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党。

党内独裁一开始就会带来党内的分裂的观念。就独裁的性质来说,这是很明显的。独裁者不但不愿意把他的组织和别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合并组成一个更高的总机构,甚至也不想到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暂时的合作。

列宁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刚刚开始显现的时候,就使这个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党的知识上的贫乏,工人的知识发展受到阻碍,工人阶级因长期内部冲突而引起的虚弱——这些就是列宁主义的党内独裁甚至在1917年俄国革命以前就已产生的后果。

这次革命在一切社会和政治关系上都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四、列宁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俄国1917年三月革命^①,是在最有利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这并不是就最有利于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沙皇的政府机构崩溃了,腐朽的贵族已成废物,而资产阶级,他们的资本大部分是从外国来的,也显得毫无力量。只有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联合在一起,具有无上的威力。在这些人中间,社会主义者占压倒的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间;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工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中间。

^① 即二月革命,这里是指新历三月。——译者注

沙皇政权垮台以后，各社会主义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将在苏维埃内一起工作，并且各党的合作应包括社会民主党的两翼，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都显得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他们不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土地吗？

但是列宁却极端厌恶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任何这样的合作。早在革命以前，他就和社会民主党内组成了自己的组织。这个第二重的组织是建立在军事路线上面的；在这个组织内，列宁确立了他自己的独裁。由于这个缘故，他在1903年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造成了分裂，并向拒绝盲目地服从他的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员们宣战。

在1903年的分裂以后，直到1914年7月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列宁都激烈地反对和孟什维克统一。在战争中，他不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内宣传分裂的思想。因此，当工人统一战线在1917年革命后有成为可能的时候，他就激烈地反对这个统一战线。

当1917年三月革命在俄国发生的时候，列宁正在瑞士。他在革命后一个月回到俄国，看到了一个使他非常激愤的局势。在他到达之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次全俄苏维埃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曾经显出很大程度的协调。

“会议结束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接着举行过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两派统一的问题。列宁一到，谈判就停止了，他把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轮子陡然扭转过去，虽然并不是没有受到许多有势力的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的反对。”^①

在俄国革命中，列宁的目的不仅要破坏一切自治机构，而且还要破坏除开他自己的党以外的一切其他的党派和社会组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了谎言、诽谤和残忍的暴力来对付一切

^① 费奥多尔·唐恩(Theodore Dan)，见他写的马尔托夫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一书续编(第296页)。——考茨基注

敌对者，他把一切社会主义者，除开那些愿意服从他的命令的人以外，都算在敌对者之列。最后经过他在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coup d'état)之后，他终于打垮了他的一切敌对者。

然而，有些人还在继续努力，企图实现一个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

“这时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里亚扎诺夫、洛佐夫斯基以及其他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都要求组成一个包括苏维埃一切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府。他们宣称，组织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将会导致恐怖统治以及革命和国家的毁灭。”^①

但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又获得了胜利。他希望那时正在进行的全俄立宪会议的选举会给他带来一个多数。

到1917年为止，布尔什维克本来是把党内独裁作为争取国内民主的一个手段，而且列宁的争取国内民主的斗争也是循着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同样的路线进行的。所以迟至1917年，他也像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仍然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表明，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远没有得到多数。而是各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会议中构成了压倒的多数。^②布尔什维克再度有一个机会参加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将是政府的基础，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一个政府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实际上就是有全体人民站在它的后面，不难打垮任何反革命的企图。事实上，任何这样的企图在酝酿中就会被打垮的。

那时候，布尔什维克如果同意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俄国也许就会免去三年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可怕的贫困。和平和自由将会使经济的迅速恢复成为可能，工人阶级也就可能迅速发展，这样又一定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及其成功的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所有这一

① 费奥多尔·唐恩，同上书(第307页)。——考茨基注

② 布尔什维克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票数，社会革命党得到了多数。——原编者注

切,无须专政,无须恐怖,只要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就可能实现。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说,这一切就一定会确切实现,但是,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它给人民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以便在当时情况允许之下通过革命取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和福利。但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的革命政府,这一切才有可能。而这个政府只能够建立在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面。

可是,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由于无厌地贪求权力,终于使这个统一战线不可能组成。他们以前曾经为立宪会议进行过热烈的斗争,现在却把它解散了。他们以无限制的和不负责任的种种诺言,赢得了从解体的军队中吸收来的士兵们的支持,他们就借助于这些没有政治经验的、无知的士兵们,终于夺取了政权。于是他们又借政权的力量,加强了自己按军事路线组织的党,最后彻底地打垮了一切敌对者。

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而且一直统治下来,却从不是依靠人民多数的信赖和支持。

摆在面前有两条道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路,或者布尔什维克压倒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而独占政权的路。布尔什维克却利用了有利的综合情况,使任何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以便建立自己的专政。

建立专政之后,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情势,这就是:不要过分顾虑理智和道德的约束,只用铁拳就能取得胜利。

为了强调他们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从1918年起,他们自称为共产党。

直到1917年为止,列宁曾为了民主一直进行着斗争,现在他却在民主的废墟上树立了他的政权,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构,一个新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就给他以反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种种武器,甚至比无耻的谎言还更有力量。他现在手中掌握了沙皇政权所用过的一切镇压工具,除了这些武器以外,还有作为生产资料所有主的资本家用来对付工资奴隶的那些压迫工具。列宁现在支配着一

切生产资料，利用了他的国家政权来建立他的国家资本主义。

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像一个没有有效民主的国家所实行的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那样，能够使工人绝对地依存于它。也没有任何政治警察，像全俄肃反委员会或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那样有权威，那样无所不在。创设肃反委员会或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都是那些和沙皇的警察进行过多年斗争，深知他们的方法、弱点和短处，并且知道如何去加以改进的人。

如果列宁在 1917 年同意了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就绝对不必使用任何这些镇压工具。如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所表明，这些党派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时所争取实现的每一项带有真正进步性质的事业，也都是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纲领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会一一付诸实施，因为人民已经授权给他们去这样做了。没收大地产这一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都计划了；他们在格鲁吉亚并已付诸实行。扫盲、婚姻法改革、社会福利措施、幼儿园、公立医院、工厂代表会议、失业保险以及劳动保护法，苏俄正在为了这一切大忙特忙；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要在工人民主取得了相当大的力量的地方，这一切都已在更大、更完备的程度上达到了。重工业社会化，只要在经济方面显得有利，也就会被立宪会议的多数批准的。

社会福利方面的一切革新，是共产党十分引以自豪的，也是给访问者造成深刻印象的东西，这些都可以经由立宪会议多数通过实行，而且会比在专政之下做得更好，因为那样国家经济条件会好得多。俄国现行的一切社会福利措施都受着资源缺乏、匆促实行、筹备不周以及使用暴力方法的影响。独裁者们甚至在不使用暴力还更有利的情形下也在使用暴力。许多工人对新政权深怀不满，然而他们的自愿合作本来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例如，苏俄反宗教的斗争形式是多么不必要和令人憎恶啊。独裁者不肯设法以促进独立批判的思考和知识来代替宗教——这样的方法

是和专政的性质不合的。宗教仪式和机构对于虔诚的信徒们是神圣的，却受着最粗暴的侮辱和亵渎。无害而虔诚的信徒们竟毫无必要地被搞得严重不满，深受痛苦。同时，自由思想的人也被低级的反宗教宣传形式弄得堕落下去。

如果社会改革成为立宪会议的工作，那么，改革的这一切困难，如由物资缺乏、不适当的匆促、人民的反对所引起的种种困难，就大部分可以避免。因为这些困难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内战造成的，而内战却是列宁在 1918 年 1 月假手他的水兵们解散立宪会议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拥护立宪会议的人既是占着这样压倒的多数，因此哪一个沙皇的将军也不会敢于起来反对立宪会议。如果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敢于冒险这样做，也会得不到追随者的。这些将军们之所以胆敢发动反革命叛乱，只是在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之后，使他们得到一个恢复立宪会议权利的借口。

如果列宁没有解散立宪会议，俄国也就会免去内战及其一切的恐怖、残杀和破坏，国家将会怎样地更加富裕，社会改革的利益将会怎样地更大啊！军事—官僚的警察机构用于镇压目的方面的一切巨大开支，就能够节省下来。这些经费也就能够用于生产目的，以促进一般的福利。

这样人民就已经取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出版、集会、结社和自治的自由。在这种条件下，群众无论在经济、物质、知识方面，一定已经迅速地提高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间的相互信赖和独立思考受到这一切的鼓舞，结果就一定会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发展。

这个崇高的发展，在列宁命令他的军队解散立宪会议的那一天起，就戛然而停止了。

自然，立宪会议所以容易被解散这一事实就已指出，当时统治彼得格勒的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熟的——那些完全无知的士兵，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立刻实现和平；他们并且感觉到，列宁的专政是实

现和平的唯一有效的工具。

使布尔什维克上台的，不是工人阶级多数的信赖，而是由战争所引起的革命的复杂情况。布尔什维克没有得到这种信赖，所以在一旦掌权以后，就不得不采用恐怖主义来维持自己；而时至今日，这种恐怖还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人们常说，恐怖是革命的一种属性，革命从来不是用玫瑰香水和丝绢手套搞出来的。

说某事从来如此，以后也必然永远如此，这真是一种特别的革命性。而且，说从来没有不带有恐怖的革命，这也是不正确的。法国大革命是在 1789 年开始的，但恐怖之来却是 1792 年 9 月以后的事，而且只是战争的后果。不是革命，而是战争，才产生恐怖，也才产生专政。只有当革命被拖入内战时，才不得不诉之于恐怖。

在 1917 年的俄国，恐怖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民主已经得到了，工人和农民已经当权了。工人阶级的要求，在与农民利益一致和物质资源允许的限度内，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予以满足。

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由绝大多数人实行的统治，在一个民主国家内，就根本毋须使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一共投了 3600 万张票，其中只有 400 万张是投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投社会主义各党派的达 3200 万张。所以，会议根本不会有从右翼方面来的威胁。它有充分的成功希望，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使俄国新生和准备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照布尔什维克的看法，立宪会议只有一个大缺点：他们在会议中没有得到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得到 900 万张选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却得到 2300 万张。对勇敢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立宪会议可以为了工人的利益实行一切可以实现的事情，而且比布尔什维克单独地干要做得更为合理，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这样就得要求布尔什维克只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干，不能作为一个专政的党，从上面来发号施令。

为了反对任何这种民主程序，布尔什维克曾竭其全力来进行斗争，他们利用了有利的形势，解散了立宪会议。他们的这个打击，反对的不是沙皇、贵族、资产阶级或“白卫军”的反革命，而是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在争取工人、农民的拥护而进行的斗争中曾比布尔什维克获得更大的成就。

因此，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都被取消了，从而恐怖到来了。这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民的必然后果。因此，事实是布尔什维克不但在内战期中，而且在内战结束以后的年代内都离不开恐怖。他们采用恐怖，不仅是作为一个反击反革命的手段，而且是作为镇压和消灭工人、农民中一切革命者的手段，因为这些革命者拒绝对新的“红色”沙皇及其共产党哥萨克的鞭子无抗议地屈服。

夺取了政权之后，列宁立即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用空想的方法自上而下地来实行一项任务，即借助于一个不成熟的工人阶级来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秩序。在这以前，作为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经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注意，这不是农村共产主义的问题，因为个体农民的私人经济当时还被保存着^①，而是工商业方面的国家经济的问题。

这是列宁反对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而承担的任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曾宣称这个任务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也抨击专政，抨击废除民主。

五、共产国际

俄国人民和我们资本主义文明的别国人民的不同之点在哪里呢？首先，当然是在于他们经济和政治的落后。在现今的俄国，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果由于非常情况的力量而取得政权，却没有大多数人民的支

^① 保存到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为止。——原编者注

持；如果这个党的幻想又迫使它自己来担负立即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由于这种落后状态的结果，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空想主义的和专政的方法。这里就可以找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说明。一百年以前，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验就是如此。他们的实验也是迫于自己国内工人阶级没有达到足够的发展而实行的。老的空想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两者的方法，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而都是由于不成熟的条件而使然的。但是正像在空想主义者的时代一样，这个说明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些方法就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要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明智的，人们就得首先证明，俄国工人具有西欧工人所缺乏的某些特殊的、固有的社会主义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的存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证实。

这就是列宁自己迟至 1918 年实际上所持的见解。他相信，俄国革命将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只有这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才能够给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出方向和方法。列宁是寄希望于一个世界革命而担负这个建设任务的。照他的信念，世界革命立即就会爆发。

但是，他想错了。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到来的是俄国的内战。这次战争对于建立一个军事化的国家经济却有些帮助。确实，这是每一次战争的结果，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只要战争持续的时间很久，而且又要求很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强制的经济决不能被看作是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只是在极端紧急时期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个临时措施。

当俄国内战平息下来，对世界革命的一切希望都已落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者们心中开始迟疑起来，“军事共产主义”是否可以长期延续下去。这个新政权既然在工人阶级的训练和创造精神方面缺乏基础，就只能靠臃肿而无能的官僚机构、工厂的军事纪律以及遍布全国、具有无上威力的政治警察所实行的残酷的恐怖来维持自己。“军事共产主义”的结果是生产的不断下降，给国家带来了经济的逐步衰落。

这种情况不久就被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看到了。列宁在这种共产主义中开始打开了一个缺口，给私人经济作出了一些让步（新经济政策，1921年），这样使国家得到了一个短期的喘息。列宁自己称之为暂时休息。事实上，俄国在“军事共产主义”之下是喘不过气来了。

在世界大战之前，列宁在社会主义国际中没有看到那些促使他在俄国进行党内独裁的有利条件。为了避免陷于孤立，他不得不在事实上，而不仅仅是在空洞的理论上接受国际内的民主制度。历次国际会议的某些决议，不管他觉得怎样不合他的口味，他都仅仅限于行使自己批评的权利，而不敢反抗这些决议。

世界大战使国际暂时停止活动之后，这个情势就改变了。1915年有一部分人代表国际的某些部分集会于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人要恢复旧的国际，而另一些人却提议创立一个新的第三国际，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凡不接受新国际创始者的要求的，就一律排除出去。在列宁的指挥下，布尔什维克就组成了这个新团体的核心。所以，从一开始起，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重建国际，而是要分裂国际。

战争刚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着手组织一个新的第三国际，以与旧的国际对立，同时（1919年）旧国际则已经重新开始活动。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庞大实验，不能不影响到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这些党原来是团结的，现在分裂了。它们有一部分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西欧和美国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各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兴起的。但多数人仍然信奉旧的社会主义原则，在一切情况下拒绝采用共产党的方法。在这两个主流之间，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个。这第三个主流拒绝把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应用于他们的本国，但相信这些方法用在俄国却是正确的。和第一、第二国际的民主结构相反，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严格地独裁的。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常设机关，完全成了俄国政府的工具。俄国政府就这样得到了大批的国外代理人，有些是忠诚热情的拥护者，另一些是重价收买的代理人，但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心的盲目

的工具,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

时代似乎有利于苏维埃统治者。他们期待一个世界革命,由他们这些世界最成功的革命家来领导。他们要把在俄国的专政扩展至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专政。

但是,他们据以计划统治世界的种种打算,证明都是错误的。他们的专政适合于当时俄国的特殊条件,但对于西方文明的人民来说却是令人憎恶的。而且甚至在俄国,共产党专政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由于1917年军事崩溃后的种种反常的条件。

只有从来不懂得现代国家性质的那些人,才会期望战争结束时每个交战国家内都会爆发革命。革命只是在战败的军事君主国家内发生了。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共产党人也没有取得胜利。不管专政带着多少无产阶级的色彩,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都不会接受它作为解放的工具。

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的观念比起共产党在俄国的专政来,遭遇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后者是胜利了,能够维持到现在还不垮台。前者却遭到完全的失败。但是要把共产党世界革命的观念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却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了。

外界的社会主义观察家看不透隐藏在表面以下的东西,只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表景象来看,因而受到感动。这样的观察家不懂得,在这个新国家内,任何一项真正进步的事业,都是俄国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为它开过路、作过准备的,现在不过加以执行罢了。这一切本可以在立宪会议经过社会主义党派压倒多数的通过,在更有利得多的条件下,由人民热烈地参加,并用比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所能做到的更合理得多的方式来付诸实行的。内战就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挑起的,结果是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以及人民积极性的广泛的瘫痪。

这种肤浅的社会主义观察家,由于主观愿望主宰了他的思想,因此也不懂得:在民主形式之下,革命将会导致人民知识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迅速高涨;而在专政之下,甚至对于群众发展富有希望的一些初步成就也被打得粉碎了,这些成就本来都是在沙皇统治下经过几十年的斗争

而得来的。使这种肤浅的观察家获得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内、欧洲最大的国家内掌握了政权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这个缘故，共产党俄国在西欧社会主义人士中最初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党内独裁变得强大起来，终于做到了在国内的专政。现在它所能满意的，就是要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专政了。在俄国国外的那些人，即使承认共产党警察制度的专政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是完全合适的，但他们却不能向这种专政低头，他们就会被指斥为敌人。这种承认并没有使莫斯科的独裁者满意。他们号召一切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这种专政对全世界也是明智的和值得企求的。

许多人不愿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到这样的地步。然而，布尔什维克却坚持，服从他们的专政是每个工人，特别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凡是不愿这样做的人，就都被诬蔑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可鄙的叛徒，比直接的阶级敌人还更危险、更堕落”。

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党派只是敌人而已，在一定条件之下，还可能和他们进行谈判，约定休战。反之，他们却把社会主义者看作怯懦的逃兵或无赖的捣乱分子，只能处以绞刑。

当许多国家旧的政权已经崩溃，世界革命却无望到来，而工人阶级在整个欧洲已经达到了具有更大重要性的地位的时候，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削弱了各国工人的力量。共产党人由于认为他们的专政比工人阶级的团结更重要，所以在战前，他们就分裂了俄国国内的各社会主义党派；而在战后，他们又分裂了俄国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他们还把分裂主义伸展到工会组织中去，因而更加深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

作为这个政策的一个结果，在俄国以外兴起的共产党，是不准有任何自己的意见的，而必须盲目地遵照莫斯科中心的命令行事。这个中心得到的关于国外情况的汇报是很糟的；因为它的雇佣工具和情报员不是根据实在情况来作他们的汇报，而是按照莫斯科独裁者的愿望来

作的。历史上每一个暴君总是这样被他的谄媚的工具引入迷途。这样的后果就是，国外的共产党常常被拖入毫无意义的冒险，使他们遭受严重的、甚至往往是覆灭性的失败；而这种冒险所引起的长期的反作用，对于那些国家的工人是非常有害的。

这个罪恶政策的最后表现就是，每当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共产党人不但不支持他们，反而从背后插进一刀，就这样来帮助和安慰反动派。削弱工人的力量、增强敌人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政策的结果。共产党人把他们全副精力专门用来破坏社会民主党、自由的工会和合作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整个地削弱了革命和工人运动，而另一方面使情况有利于独裁者兴起的各国反革命获得胜利。那些独裁者所运用的原则，正是支配着克里姆林独裁者的那些原则，那些原则要求我们摆脱“理智和道德的一切约束”。这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列宁在30年前开始的党内专政、国内专政、国际专政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政策已经成了他的宗派的基石了。

六、苏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们不知道，列宁是否会把新经济政策继续执行下去。他在1924年逝世了。他逝世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了分歧。新经济政策的发展，确实要求采取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决定：或者是延长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这就保证了经济的上升，但却威胁着专政的存在；或者是取消这个政策，回到完全的共产主义。斯大林决定了后面一条道路；他在列宁的追随者中间，已经获得无限的权威。

但是，国家工业已陷于极度不稳的情况，面临着立即的崩溃。它的生产机构必须进行详细检查。于是布尔什维克又一次回想到马克思的学说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开始时毕竟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的。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先进的重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

布尔什维克决定借助于一个五年计划，以特快的速度来创办这种工业。从1928年开始，五年之内，计划建立一个工业组织，甚至要超越美国。

五年计划的实行是苏俄绝望的经济形势的结果。世界大战和内战破坏了一切工业。除此以外，还有1918年工厂企业最初的国有化所造成的结果，国有化以后，工业就处于无政府和军事化两者之间的动荡状态。俄国工业产量很快地接近于零点。

这种形势因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而更加严重起来，终于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延续至五年计划开始的1928年的前一年为止。回到和平和新经济政策带来了经济生活暂时的复苏。然而，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够停止在新经济政策上。他们不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要是没有足够数量的有能力的并具有良好训练的知识分子自愿的充分合作就不能解放自己，也不能使生产达到更高的阶段。

布尔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这样的原始和浅薄，以致他们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宣扬工人阶级铁拳的福音，把非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及资本家列入一类，并把他们降到没有任何权利的巴利阿^①的境地。但是共产党不久就了解到，他们在自己内部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才来管理工厂企业。工厂企业的经营不得不委托“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从开始时起就认为新经济是有破坏性的、领导错了的，他们的反对更由于受到恶劣的待遇而加剧。他们因为不被信任，所以受到那些完全无能的、狂热的共产党员的经常的控制，并被作为每一次失败的替罪羊。在当时普遍绝望的情况下，失败继续不断地在发生，苏维埃工业的这些经管人处于有增无已的恐怖之下，发现自己在共产党主人的手中是毫无办法的。

技术工人的缺乏，构成了更加一层的困难。由于缺乏相当的教育设施，这种工人的缺乏也是沙俄的特点。战争使技术工人的数量更为

① Pariah, 印度贱民, 南印度居民中最受压迫的一个阶层。——译者注

减少，同时也断绝了补充力量的训练。在革命时期，许多技术工人——如果他们是共产党员或“无党派者”——又从工厂调到政府工作，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恩宠，因而这种缺乏就更加严重起来了。

这一切使工业处于一种极大的不利情况。但是，最坏的还是为了维持专政而建立起来的那些惊人庞大的国家机构所产生的影响。国有化的工业被置于这个机构的管辖之下，而这个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不断地扩大范围。专政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种情况，即凡隶属于专政之下的一切组织，都被剥夺了独立。由于公开批评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随着国家机构的变得更加庞大、更加臃肿，就不得不相应地不断扩大监督这个机构的任务。这个缓慢的、头重脚轻的、人为的官僚机构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效率。这些情况的不可避免的伴随而来的结果，就是贪污腐化的蔓延，这当然是不能改善情况的。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看到由猖獗的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生活的堕落，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于是个别部门受到了苏维埃报纸的批评。这就是所谓“自我批评”。对官僚主义分子所爆发的一切愤慨，其结果仅仅是处罚了少数的替罪羊和少数特别显著地无能的个别人员。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工业生产虽然比1918年至1921年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稍有增加，但为什么不能向前发展，从而获得显著的成功，其理由就在这里。

工业商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战前和国际市场的水平。由于国家坚决压低农产品价格的结果，农民的购买力不断地降低了。这就引起了农民方面的危险的反对情绪。他们就在人口增长速度令人不安的情况下，以削减生产来作回答。当时的人口正以每年超过30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最坏的是，尽管各种价格都在上涨，工业生产却只能支付工资和原材料的成本，没有任何剩余来弥补机器的损耗，至于要创造一些剩余来扩展工厂和设备，以赶上人口增加的可怕的速度，就更不必说了。苏维埃政府从先前的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的生产机器设备，正在很快地损坏。这就使工业受到完全陷于停顿的威胁。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因此就决定进行一次巨大而大胆的尝试，企图从有吞没自己的危险的泥沼中拔出脚来。俄国的一切资源都要被动员集中起来，作为发展重工业之用，而不管其他一切部门的活动。等到取得了成功，再计划发展轻工业、农业，最后是文化事业。重工业要尽可能快地发展，因为怕的是，即使像俄罗斯民族这样的坚强，也不能长期忍受这个任务所压下来的过度的紧张。重工业将要在五年之内全部改组，但同时希望新结构的有利结果在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将会在两三年内显现出来。

这就是所要实行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就以一切可能调动的热情和精力，立即付诸实施。但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业失败的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技术工人的缺乏，工厂管理人员的没有法律保障，特别是生产的瘫痪。生产的瘫痪是由畸形庞大的官僚机器造成的，它既是专政机构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是生产机构的管理工具。

除了五年计划所继承和延续的苦难之外，又加上了一大堆新的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实现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从何处得来呢？资本主义工业创造着惊人的巨大剩余价值，不但能让资本家享乐和维持开支浩大的海陆军，而且还能让他们积累大量的资金储备。苏维埃工业却只能够偿付工资和材料费用。军队、警察、官僚机构、国家控制的出版社、共产党等等的费用，绝大部分都要靠剥削农民来开支。在这些情况下，实现五年计划所必需的巨额物资将如何能够搞得来呢？通过向“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吗？

是的，这种借款是布尔什维克竭力要去取得的。但是通过道德上可疑的策略所得到的贷款，还远远地不够。所以，五年计划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在俄国内部去找，因为外国资本家供应的机器是必须付现金的。

俄国人口中实际上已经没有资本家，只有工资劳动者、农民和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不致起来反叛或饿死在街上的限度内，只能靠剥夺他们的劳动产品来解决问题。一切可能从人民那里榨取出来的东西，都送到世界市场上以任何价格出售。所得的款项就被用来向外国资本家

购买机器设备。在五年计划中间，确实完成了许多巨大的事业，引起资本主义世界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惊奇和称羨。这些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以前是采取怀疑态度的，现在他们有些人却抱着他们以前自己所否定的见解，他们说：“是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适合于我们，但在俄国，看来却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在沙皇时代，在他讥笑沙皇政府的时候，曾经亲自提出过一个对于这个见解的间接批评。1905年1月，他在《前进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清楚地指出，这些败仗是俄国缺乏自由的结果，缺乏自由，就阻碍了富有精力和自信的人民的努力，而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列宁写道：“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①

对用于军事破坏的机器和用于生产的机器这两者，这些话都是适合的。如果没有胜任的人来照料它们，机器是无用的。

确实，现代生产的特点是，不仅要有高度发展的技术，还要有高度合格的工人，知道如何去操纵最新式的机器，而这种合格的工人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能找到足够的数目。要建立一个可以保证全体人民的福利和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工人是先决条件，甚至比机器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但是，俄国无论在沙皇统治下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一切的努力都是用在输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技术，不是用在输入自由，而自由是能创造“现代人”的。

上世纪60年代，一部分俄国贵族受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影响，曾经搞过一次自由主义运动。这派人在废除农奴制之后，想摹仿英国的贵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39页。

族来实行一个现代经济。有些地主由于农奴制的废除，获得大量的补偿金，他们就用来购买英国的农业机械。但是他们不能把英国工人随着机械一起输入进来，即使能够，也不过是很小的数目而已。按照法律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实际上仍然是专制政治和地主的奴隶，他们没有能力掌握现代机械。这些机械不久就损坏了，成为废铁。

五年计划的创始人漠然不注意这些早期的经验。他们也同样地相信，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尽可能地多从工业国家输入新的机械。他们忘记了，也还需要创造政治、社会的条件，以进一步培养现代人。他们更少想到，要培养现代人，不能像创造新机械那样的快，为此目的，五年计划是不够的。

但是，要创造新机械而缺乏合格的工人，这就意味着不是在增加国家的生产力，而是在消耗国家的资源。

再加，斯大林和他的人在五年计划期间消耗国家财富的方式，和60年代那些自由主义地主们很不相同。后者用来购买机械的资金，只是那些本来要浪费在赌博、巴黎旅行等等方面的。他们的农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坏。就斯大林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俄国的一切财富（这些财富是俄国的剥削者在世界大战前由于把流进他们口袋里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才得以储积而成的），最初是消耗或破坏于世界大战，其次是消耗或破坏于内战，最后则消耗或破坏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官僚主义的国家经济。因此，创设新工业机构所需的大量金钱，只能靠从劳动群众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尽可能地抽取出来。但是这些群众的生产力是非常低的。在沙皇统治下，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本来就低得可怜，而在世界大战和内战期间又进一步下降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稍有上升，现在因为要抽出钱来购买机器，又大大地降低了。

俄国的外国旅行家们站在新建的巨大企业之前，默然惊羨，就像是站在金字塔前面一样。可是他们很少想起，同这些巨大企业的建设密切相关的，是什么样的奴役与人类自尊心的降低啊。

俄国地主之输入机械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增进他们的自由。这是他们技术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却是通过大大地降低工人的生活条件并剥夺他们的自由而输入机械的。他们以破坏最主要的生产力——劳动的人来为创造物质生产力抽取资金。在五年计划所造成的可怕的情况下,人民迅速地死亡。苏维埃电影当然不会放映这些东西。谁如果不信,谁就可以去询问一下那些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他们为了逃出资本主义地狱,要在苏维埃天堂中寻找幸福,曾经到俄国去做工。可是在那里经过一个短期逗留以后,他们就匆匆地回到原来的“地狱”中去了。这里的情况可能是够坏的了,但比起在苏维埃境内的工人、甚至特权人物的情况来,仍然要较能忍受一些。

五年计划的结果所以成为非常可怕,大部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不满足于建立大批巨大的工业企业,还要将个体农民经济立即改变为巨大的集体经济。他们所做的正是列宁慎重地避免去做的事。因为,列宁所以能够胜利,是由于他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决意夺取地主土地的要求。但是,必须注意,这个支持对农民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支持了农民,并且已经宣布要在农民中间分配土地。

但是,斯大林需要钱来大规模地尽速实施工业化的计划。原有的那些企业,是在亏空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此,从农民抽取更多东西的方策就显得更有必要了。这个办法在采用于个体自由农民的时候,碰到了许多困难,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抗拒力量。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把个体农民的财产合并到国家统治的、大规模的集体机构,即所谓“集体农庄”中来。他们以为国家从这种企业可以比从个体农民征集到更多的产品。但是,农民不愿参加“集体农庄”。因此他们必须使用暴力强迫农民参加。这样,不自愿的、被强迫的农奴劳动就代替了自由农民的辛勤和自愿的劳动。这种强迫劳动的产品,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总是很差的。进行这种劳动,只能使用最原始、最简单的生产

工具。一个人被强迫工作时,就很容易损坏任何种类复杂的工具。然而,集体农庄在农业经济方面据说是效率和现代化的最高成就。它们被供给最好的美国工具。随着转变到新的生产方法,耕畜被大批地宰杀了。集体农庄的庄员被迫使用和他不适合的新生产工具来进行工作,但新生产工具却需要有自由的、有高度技术的工人。这些庄员所习惯使用的旧工具一去不返了。一个人在违反他的意志和利益进行工作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很容易想像的。事实上,自从“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俄国农业生产力已经显著下降了。目前^①,在那个农业国家,正发生着一个真正的饥荒。在沙皇时代,我们指斥俄国的饥荒是那个政治制度腐败的证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年俄国的饥荒是前所未有的。饥荒实际上遍及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下游地区,即这个国家最肥沃的部分,也正是农业集体化最广泛的部分。

有些人虽然承认苏维埃政权经济上的弱点,但他们对它的目的和可能性还继续具有信心。但是,这个政权经济上的弱点本身,其原因不正是在于:这种在苏联现有的历史和结构的条件下可能的社会改造,就事情的本质来说,是不能被看作社会主义改造的吗?除了一个纯粹的政府经济加上一个庞大的、不生产的官僚机构而外,苏维埃政权在本质上是不能创造任何东西的。这不就是那种其社会主义性质从来为社会主义者所否认的经济吗?

某些苏维埃工业企业高度合理化的技术,像其余的苏维埃经济一样,从真正的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可悲地不生产的,而从国家福利的观点来看,就算是一个积极因素,也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水而已。然而,布尔什维克还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现在所必需的“最大牺牲”就是“未来幸福”的代价。

巨大的牺牲不能这样容易地撇开的。谁能保证专政下面的“未来

^① 本文写于1933年。——原编者注

幸福”不会是海市蜃楼呢？

有些人把这种专政说成是这样一批少数人的专政，这些人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想，有信仰，有热情，有随时准备作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并要想强使 1.7 亿人的最大多数接受那个理想。

我看现在一代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些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而是那些当权者——就简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中间有少数人也许仍然可以被看作是理想主义者，但受到专政滋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所驱使的人却是太多了。这些就是任何一种专制政治的后果，专制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和鼓励一批无良心的分子，热切地只求适应当权者的需要，因而成为间谍、骗子、特务、野心家。

在统治阶层中，这类从专制政治中培养出来的分子日益增长地支配着这个专制政治，同时又不断地排斥那些正派同志的影响。这样一个统治阶层，怎能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理想随时准备作高度的自我牺牲呢？无疑地，他们也像许多德国的纳粹分子一样，说了很多关于牺牲的话，要求别人作无限的牺牲，却从不要求自己。只要共产党继续当权，他们自己是很舒服的。

俄国共产党要强迫 1.7 亿人去走这条“未来幸福”之路，本身却只拥有大约 200 万个党员。他们中间有多少是间谍、特务、野心家呢？

只有绝大多数人民的独立运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遇到这个多数表示冷淡时，就得设法去启发这个多数，把它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用暴力和强迫手段来统治它。只有当剥削者的少数企图用武力压倒被剥削者的多数时，我们才认为使用武力来反对这个少数是正当的。但永远不能认为用武力来反对人民群众的多数是正当的，无论这个多数是怎样的反动。

在沙皇政权之下，俄国工人阶级曾经不得不为了反抗政治和社会发展中非常有限的机会而进行斗争。然而，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曾经最

有利地利用过任何可以得到的机会，并在反对压迫者的持续的、顽强的斗争中扩大了这些机会。1917年专制政治垮台后，原来的期望得到了实现，即在新的民主条件下，俄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将继续得到迅速的进步，并将带着群众一起前进。

于是，布尔什维克来了。他们把一个更具有压迫性的政权强加到人民头上，因而破坏了一切已经非常有希望萌芽的种子。老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成为共产党员，有的就被杀了，有的就被流放了，有的就被关在监狱中缄默了。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也有许多人失踪了或者死了；另有许多人在绝望断念中屈服了，或者在当权的职位上被腐化了。现在新起来的一代，属于共产党的越来越少。这少数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了品质败坏的牺牲品，品质败坏是由于掌握无限权力而培养出来的——这在国王中间是如此，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是如此。但是，绝大多数人民却被剥夺了人类的一切尊严、一切行动的能力，被降贬到了挨打挨饿的役畜的程度。他们没有抗议，怀着疼痛的心，表面上服从或沉默地忍受一切沉重的牺牲和困苦，即由他们的新主人堆到他们身上来的牺牲和困苦，这样的事不能认为是属于英雄的本质，而是极其令人沮丧的。

俄国工人阶级从1917年所达到的高度，一年一年地走着下坡路。它不是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是不断地背离社会主义，而在劳动过程中，也不断地丧失自决的能力。不能仅仅因为驱使奴隶的人自称为共产党员，国家奴役统治就会变成社会主义。

一般地说，专政的方法，特殊地说，五年计划的方法，都不能构成通向社会主义的路，只能构成背离社会主义的路。

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就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必须决定谁来支配这些生产资料。当另外一批少数人代替了资本家的地位，脱离人民并且常常违反了他们的意志来支配生产资料时，那么，这样达到的财产关系的变更，丝毫没有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意义。曾经有过东方专制政治的形式，这个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支配着全

国的生产工具^①。和这种形式的国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还远没有这样大的压迫性,而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也有更多的希望得到结果。在俄国支配生产资料的是政府,不是人民。因此政府就是人民的主人。

社会民主党要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高出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主义却构成了一切生产方式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阶段:大工业以及还无权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工人。大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的经营管理,加上工人最充分的自由:这就是高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资本主义不仅高出于基尔特手工艺人的小工业,并且也高出于带着强制劳动的大工业和一切以征用的劳动为基础的国家经济。任何这类的经济都应该加以否定,即使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不同意马克斯·阿德勒,他有一次反驳我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的职责是参加并同情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这是一个道德原则。”

我们的职责不仅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秩序,而且在于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秩序来代替它。但我们必须反对那些力量,它们的目的是在破坏资本主义之后,仅仅建立一种野蛮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它。

为此理由,那些具有民主信念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威胁工人自由的一切专政的趋势,不管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表现出来的,还是发源于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团体方面的趋势。

因此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人民剥夺了现在当权的剥夺者的时候,这才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因此,俄国社会主义群众发现,在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上,他们自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俄国那些正在进行

^① 关于埃及总督(1797—1849)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有一个传说:“穆罕默德·阿里曾经使自己成为他的王国内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唯一的农业家和工业家。国内生产的棉花和蚕丝都由农奴在总督的工场里做成制造品。居民只允许从这些工场购买他们的必需品。”(弗拉泽:《革命与恢复时期》(Flath: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第376页)——考茨基注

剥夺的剥夺者自称为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并不产生丝毫的差别。苏俄和西欧的差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并且也把权力关系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重要经济垄断企业的社会化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工人的一项政治胜利；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一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

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一。

更坏的是知识自由全部遭到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共产党党员这个集体。没有了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

奥托·鲍威尔对这种情况的特点曾经作过如下的叙述：

“俄国是一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在沙皇统治之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有无上威权。除开符合政府意旨的集会以外，不准有任何集会；除开执政党的报纸以外，不准有任何其他报纸。一切其他组织的成员，最好的情况是被监禁，最坏的是被枪决。警察对人民的控制达到了自由国家中的人们所几乎不能想像的程度。这是一个绝对专政的政权，一个具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的政权，它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控制在手里，而它本身却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这样一种专政制度破坏了一切知识的自由。在俄国，只有一种形式的科学——就是由政府正式批准的科学。如果有人所持的学术见解和官方规定的不同，就会被放逐挨饿；的确，如果没有被流放或枪决，他必然会认为是幸运的了。”

没有任何地方像在苏俄一样，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党员们自己都被剥夺了学习科学世界的现状、探索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机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群众，比起在那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上的人民来，有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求得真正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整齐划一的

共产党的说法；也不止多一百倍的机会来打破统治阶级的教育垄断。只有法西斯意大利在这方面可以和俄国相比拟。正是在教育方面，俄国人民还有待于争取西方人民早已享有的东西。只要专政在继续统治，这是不能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也不能通到社会主义，而只是离开社会主义。

但是，俄国人至少在计划经济方面不是比我们优越么？我们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正遭受着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灾难性的后果么？苏联的计划经济和这种情势对比起来，不是应该受到赞赏么？

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只要哪里总的生产机构集中在一只手中，那里的计划经济必然是可能的。这种经济并不需要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的自决。甚至一个专制君主的国家经济也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人类一切不仅仅起源于自然原因的社会生活，如果要达到某项目的，都需要有计划的安排。任何工厂企业就是必需有计划安排的明证。

布尔什维克从开始统治时起，也曾设法作过这样的安排。但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不能成功，因为这是使他们取得政权的独特条件所决定的。

当社会主义者在民主国家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将已经得到人民的多数对他们的纲领的支持。他们将能依靠那些有训练的同志的巨大群众组织，如政治、教育、工会和合作社的巨大群众组织来支持自己。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在发展起来的社会企业的组织工作和行政工作方面，将已经具有广泛的经验；并且由于在自治体内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担任代表，担任国家官员或部长，并在另一方面担任工人合作社或劳动银行的领导者，担任大型报纸的经理等等，他们将已取得经济事务的实际知识，而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他们也还将得到现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不断增长的支持。

当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时，这一切将使我们有可能实行生产上的计划和制度，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掌握生产过程。党的经济知识及其对群众的责任感将使它避免执行冒险主义的政策，并在每一个步骤上

都能防止拙劣的行动。

当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时，任何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先决条件在俄国都不存在。因为沙皇政权把各阶级参加政府的任何机会都堵塞了，并把一切社会生活的安排都置于严格地集中的官僚、警察、军事机构管辖之下。

当这些机构在 1917 年崩溃的时候，各阶级人民在军事失败当中，发现他们是自由了，但却没有任何自治的知识和经验。在一个民主政体之下，毫无疑问，他们就会很快得到必需的知识能力。但是最初，民主本身表现得毫无力量。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个时机破坏了民主，同时借一个严格地集中的阴谋组织，加上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水兵的支持，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布尔什维克作出无限度的诺言，争取了这些分子的支持。他们的诺言大部分是为了煽动而提出的，但无疑地也是由于对任务的困难估计不足而提出的。

那些领导者和群众一样，在沙皇统治的条件下，也没有培养成必需的能力，而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对付警察和博取贫苦无知的棍徒的喝彩这些方面，都具有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却缺乏管理政府和经济机构的任何知识和经验。他们在理论上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在传经布道的意义上来说的，因为他们从来就缺乏机会来较为亲切地研究马克思讨论过的经济现象。

布尔什维克以非常不够的人力，自己又完全没有准备，却冒险要把有 1.7 亿居民的国家翻过来，并在俄国建立起一个没有先决条件的生产制度，不，甚至在更发达得多的西方还没有这种制度的范例。

甚至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只有许多幻想家如辛克莱、肖伯纳、巴比塞等人才会被布尔什维克的大胆所感动，但这种大胆却是由完全无知而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被迫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计划经济的东西。但是计划的草拟而已——没有比草拟计划更容易的事了。它还必须有系统的和一贯的执行。只有达到了这点，我们才能谈到计划经济。但是，苏俄从

来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点，因为完成计划的先决条件在那里是不存在的。由于每一个连续的计划都是匆忙而无准备地着手实行的，所以失败就更是一定的了。一个计划刚一付诸实施，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于是他们认为有改变的必要，最后就把它抛弃了。自然，只要计划显得还有一线希望，循着已经确定的道路还能稍有进展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推迟作出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计划只是在再也不可能坚持时才被抛弃。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又赶忙另搞一个计划。

因此，在苏俄，计划的经常变更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罪^①不可避免的后果。它以为借助于几千个无知的士兵和水手，搞一次政变，就可以改造世界。

我们在俄国方面所看到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成批的经济计划，不断的一连串的计划，这是布尔什维克从其开始时起就有的特征。这些计划常常是庞大的，但是每一个计划都只有开端，没有一个是平平静静地执行到头的，总是不断地修正、删削、改变，直至发现计划不适合时就用一个新的来加以“改进”，或者就予以抛弃。我们在苏俄看到的是，秩序、反秩序、无秩序，或者是调整、再调整、乱调整。

难道俄国的专政不是因为某些真正的成功而有功绩吗？它不是将国家经济工业化和集体化了，“因而不仅改变了苏联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就未来而论，它不是作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大的贡献”吗？

在斯大林统治下实行的建设计划，决不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以前的其他统治者们也曾支配过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役，他们残酷地牺牲那些驯服的、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以实现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原始时代也能建设起令人惊叹的巨大建筑物，为了建设这些巨大建筑物，牺牲了不知多少的生命，可是却丝毫也没有感动过那些“领导者”。金字塔的兴

^① 原罪，original sin，原为基督教用语，指人类由于亚当犯罪而继承下来的罪恶。——译者注

建者在这方面是常被提到的。罗马的凯撒和印度的莱雅^①使用了在他们统治下的成百万奴隶的廉价劳动，也曾以同样显赫的工程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他们的建设也并不限于奢侈性的一类。罗马的凯撒们不仅建筑了大的剧场和浴堂，而且也修建过水道系统、联系大帝国各部分的非常良好的道路等等。许多人惊羨这些成就，却没有了解，由于它们是依靠于奴隶劳动的，它们终于导致了国家的毁灭。

埃及的法老和印度及巴比伦的暴君不仅修建了大宫殿、寺庙、陵墓，还修建过大工程、堤坝、水库、运河，没有这些建设，农业是不能维持下去的。马克思把这些工程看作那些地区的君主专制的一部分物质基础（《资本论》普及版 453 页）。他并没有把它们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

克里姆林的现在统治者模仿着亚洲暴君的这些榜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世界面貌的什么根本改变。这些成就既没有改变统治者的残暴，也没有改变被统治者所受的奴役。具有重要性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的面貌，而不是技术和经济的革新。许多人只看到工厂企业和集体农庄的建设，却忽略了一种新的贵族政治正在兴起，它支配着这些新的生产资料，并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在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在这个贵族政治之上，站着一批共产党员贵族，而权力更高的是政治警察这一批贵族，他们掌握着党员和官场的命运。

这一切贵族分子，各被赋予种种特权，都隶属于现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国家最高中央权力机关的统治。他掌握着予取予夺的大权。他把那些讨他喜欢的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地位，而把那些触犯他的人投入湮没无闻的境地。在所有权制度确定地建立之后，旧的贵族既不是从亲王那里，也不是从沙皇那里取得他们的土地，并且随时都敢于表示自己的不满。在现代专政的国家中，这是不可能的。它的那些贵族完全是一些谄媚分子，缺乏一切品格和独立性。

① 莱雅，Rajah，印度对君主的称呼。——译者注

这些特权分子本身又分成了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也不是偶然的事。为了使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维持不坠,不仅需要血腥的恐怖,也还需要按照着那个分而治之的老原则把人民分裂开来。为了这个缘故,共产党独裁者灌输一种情绪给工人们,使他们感到,他们对农民来说,是得到政权的宠信的统治阶级。而在工人阶级本身之内,那些奴性突出的分子和人员就被看作宠儿,受到特别的宠爱,被给予专有的特权。在旧的阶级消灭之后,就这样搞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分化,一种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

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初看之下,人们也许看不见他们,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词汇中,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在那里。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要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那些还在严肃地对待共产主义、对于新的贵族制度敢于提出反对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者被这个制度的受惠者弄得毫无办法,或者就被监禁、流放,有许多人甚至被处决了。其他没有被这个制度所腐化的也愤而辞职,在愤怒的缄默中终其余年。但是,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经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经从革命者的水平堕落到谄媚的廷臣的地位。那些昔日宣扬过平等学说的共产党员们,现在变成了逐级上升的党阶制度的暴发户,成为布尔什维克教会的教皇以下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而新的一代的共产党员们,绝大部分是无良心的野心家,他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罢了;他们的活动无非是为了取得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取得和保持这些特权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不是消灭一切阶级,而是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这就是 1917 年布

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正如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一样。那时，革命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后，他们没有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而只是助长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兴起罢了。

七、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与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

克里姆林独裁者中间的旧的理想主义者，不是死了，就是被免职了。现时正在掌舵的那批人，只想从他们原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参加的工人运动中，利用工人阶级，以求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再也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只在于加强他们的专制了。不独是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他们的炮灰了。在克里姆林统治者的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这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任务。

莫斯科的独裁者在力图建立他们对世界工人阶级的专政，并且要不顾后果地把它拖入冒险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坚决的抵抗。因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共产党的愤怒，主要不是针对着外国资本家，而是针对着组织在社会党、工党和自由的工会中的工人。

俄国的统治者看起来很能和外国资本家及资产阶级政府打交道，并能和他们做生意。因为资本家对于专政的种种方法、政治警察的无上威权、为了“原始积累”而对群众的剥削，都丝毫不会感到困惑的。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有这么一个政权，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会大大地高兴的。

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消灭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

通过他们的政策，他们总是在为反动派铺平道路。资本家再也不害怕苏俄了。

整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是根据这样一个期望，即全世界资本家会争着把改良的生产工具供给苏俄；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没有想错。资本家在政治上也和在经济上一样，都不害怕苏俄了。墨索里尼的成功，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应该归功于共产党的。使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也是他们。许多国家的反动派，取得议会的许多席位，也须归功于共产党。从大战^①结束时起，无论哪里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在制造摩擦，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一直造成最大的损害。

无论哪里，不仅各国共产党在热切地研究和仿效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而且凡是在工人阶级民主派太微弱而不能起决定性政治影响的地方，那里的反动派也在热切地研究和仿效这些方法。

随着中欧同盟国^②的军事崩溃，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凡是社会民主党在掌舵的地方，他们的行动还是和 1830 年、1848 年、1871 年、1905 年及 1917 年的革命同样的仁慈和宽大。但是，由于战争和战胜国没有远见的结果，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和半社会主义政府，都曾经面临着许多不能在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就是问题解决了，也不能立即带来繁荣。这就很快地激起了四分五裂的各个集团的严重敌意，结果是无论资产阶级党派或反资产阶级党派上台执政全都得碰运气。结局就形成了一个少数特权分子的、独裁的、强制劳役的、恐怖的和专横的政权。

德意志共和国崩溃的原因可以总结如次：

1. 凡尔赛条约的后果。
2. 共和国由军事失败而产生的内部弱点。
3. 经济危机。

法国大革命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军事失败后的耻辱和疲竭，没有落到法国人民身上。他们可以把全部战斗力量，贡献于革命。

德国 1918 年的革命是在战争终结之后发生的。战争使德国人民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原编者注

② 指德、奥、匈三国同盟。——译者注

陷于空前的疲惫状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法国大革命不久就和欧洲各君主国家发生战争，最后把那些国家打败了。虽然我们在感情上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一个民族击退外国敌人的进攻所发生的爱国热情，可以构成惊人的巨大推进力量。当革命热情和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就会大大地加强起来。这一个因素，在1920年证明是对布尔什维克有过重大的帮助，他们从对波兰的那次战争中，就曾经吸取了新的力量。这个因素也曾在1792年后大大地加强了法国革命。当然，在唤起了好战精神的情况下，即使革命者成了胜利者，民主却终于要遭到损失。

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相反，1918年的德国革命是从战争带来的可怕的困苦中发生的。而且，它还被迫接受一个最耻辱、最致命的和约。这个君主国发动了战争，在战争中失败了，但君主主义者在缔结和约之前就溜走了。耻辱的和毁灭性的凡尔赛和约是德国皇室派的政策的结果。但是签订这个不可避免的和约的工作，君主主义者却留给共和国的人们来做。

政治上无知的群众，不找事件的原因，只去找寻一批替罪羊，所以在那些群众的眼光中，社会民主党对于和约是负有最大责任的。

民族情感的力量，曾经是这样地加强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锐气，但对于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命运却发生了相反的结果。那些民主的战胜国通过他们强加于德国的和约条款，尽量地激起德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来反对被迫接受这些条款的共和国。那些战胜国也不让德国人民回复到平静的状态。他们强迫执行那个疯狂的赔偿计划，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和鲁尔的占领，这两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同样地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其后果是重演了大战所产生的情势。德国的反动内阁，让自己陷入于鲁尔冲突，听任通货膨胀，因而把德国引到了无底的深渊，并且在这个决定性的关头溜走了，把古诺(Cuno)先生及其同僚所堆起的那堆垃圾，留给社会民主党来清理。

赔偿计划的最坏后果还未克服、赔偿还未停止的时候，世界经济危

机就出现了，影响及一切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地严重。这是希特勒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1932年7月，德国2000万工资劳动者中间，只有少数人充分就业；有750万人失业，500万人半失业。

工会的统计也同样雄辩地表明：1928年，即危机发生的前一年，在有组织的工人中间，只有8.2%失业，1933年3月则有46.1%。1928年，半失业的工人只占5.7%，1933年3月的数字是23.4%（2月中是24.1%）。在危机的3月，充分就业的只占有组织工人的30%！

加重这个情势的，还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分裂，最后分析起来，这也是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在德国发展得特别严重。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大战以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大战的一个后果，没有别国工人曾经受过这样多的痛苦。没有别处的工人，像德意志共和国的工人一样，曾经被迫经历这样多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斗争，也没有别处的工人遭受过这种折磨的考验。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33年这一段时期中所付出的精力，在国外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理由很简单，当时德国的情况只是偶然以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卡普事变中；而一般的局势只是一种旷日持久地顽强地争夺权力的斗争，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轰动事件，因此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

当人们考虑一下德意志共和国所由产生的条件，和它的最好的捍卫者的力量的不断消耗——德国工人在帝国崩溃和1918年11月革命发生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那么，对于反革命的胜利，正如对于反革命在1789年和1848年后终于取得胜利一样，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胜利是在15年的斗争之后才达到的。

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是真的，但仍然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民主党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因此就打开了通向灾难的大门。

确实，支持兴登堡做总统来反对希特勒，并且容忍布吕宁(Bruening)的准独裁政府作为反对纳粹主义最后可用的堡垒，这种“选取较

轻祸害的政策”，并没有避免最后的大祸，这个政策证明是失败了。

在上述历史条件所发展出来的情势中，社会民主党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是祸害较轻的道路，或者是不可避免地会引到更大祸害的共产党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至少是暂时可以避免更大的祸害——希特勒的独裁。如果社会民主党追随了共产党的政策，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会已经亲自将希特勒送上台了。

如果革命显得有最小的成功机会，共产党就一定设法制造一个革命。不幸的是，群众有时可以陷于这样一种瘫痪状态，甚至使最乐观的人也毫无办法，不能行动起来。

因此，和资产阶级各党中最民主的党派联合起来，借以挽救德意志共和国及其艰苦地取得的社会成就，这就成为必要了。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及其后果所引起的经济崩溃的结果，由于和约所引起的结果，有许多条件虽然有利于组成一个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但因为缺乏一个社会主义者多数的支持，也一定会使这个政府的任务陷于困难。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情况就成为简直不可忍受了，危机使社会矛盾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社会民主党再也不可能留在政府里了。所以，在1930年3月，弥勒（Mueller）的社会民主党内阁辞职，由布吕宁内阁继任。

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议会多数，自然不能终止危机。那些期望社会主义者做到这点的人，就得给他们一个议会的多数，使他们至少要得到必需的权力。的确，社会化的措施，甚至在那时也只能减轻、而不能完全克服危机。单独一个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也有一些危机的现象是可能加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受到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多数的支持；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少受一大堆的痛苦了。但由于当时各党派和各阶级间力量的分散，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地位甚至还不足以成功地击退有产阶级对劳动者的进攻。历届纯粹资产阶级的内阁甚至使祸害更加严重了。

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很大一批的工人，都非常痛切地看到

和感到时代的困苦。他们恼恨这种困苦。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看不到：灾难的根源是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无权，所以必须帮助它去取得权力。他们对于参加议会斗争、并且争取在议会里和通过议会来贯彻主张的一切大政党，都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在各政党力量的平衡方面，也不在资产阶级政党的不能胜任方面，更不在社会民主党的无权方面，去找寻困苦的原因，却从议会制度本身去找。他们看到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反映在议会里的影像而生气。他们认为打破了镜子就能改善影像。

经济危机在英国打击了工党，在美国打击了共和党，因为那时这两个党都在掌着国家的船舵；但在欧洲大陆某些立宪国家中，危机却被利用来攻击议会的本身。既然有议会，既然国家的政治生活都集中于议会，那么，议会就得负一切祸害的责任。因此，取消议会就成为另找更好的办法的先决条件。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议会呢？

在德国有三个反对议会的党：共产党、德意志国民党和国家社会党。在危机到来时，这三党中，以国家社会党为最弱。在1928年，这个党在国会只有12个席位，共产党有54个，德意志国民党有73个。从那时起，共产党增加得很慢，德意志国民党则下降得很快。后者已经不能和国家社会党竞争了。国社党大部分的支持是从德意志国民党的选民方面挖来的。纳粹的优势部分地是由这个事实产生的：虽然德意志国民党和共产党理论上都是反对议会的，他们实际上却和德国的议会斗争非常密切地相互结合；而由于在1930年以前纳粹在国会内数量上还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种矛盾行动倒不能归之于纳粹。

一切其他的党，无论是当政的或是反对党，在议会的意义上，都是过时的了。但不能这样来说纳粹。它具有新事物的一切光彩和引诱力。纳粹年轻，因此，在许多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也就显得貌美。

在上述条件刚开始发生影响的时候，还又加上了一个新的因素：成功。这里也可以引用一句老话：“成功就是一切。”要群众相信一个独裁

者,他必须成功。他必须行使权力,他必须使人相信他能做出英雄事业。共产党人也提倡专政;他们也把成堆的黄金许给饥饿的群众。但他们在德国的发展,始终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使人希望能够得到立即的实际结果。因为饥饿的群众立即就要面包。他们不肯等待,也不能等待。在另一方面,德意志国民党,首先不仅是工人的死敌,而且到了经济危机时期,他们就已经大大地失势了。从魏玛立宪会议时期一直到1924年,他们一直是在上升的。在1924年,他们在国会有111个席位,以后就开始下降。1928年他们的代表席位减至73个。在1933年的选举中,他们继续倒退,他们的代表人数降至41个,而国社党的代表却从12个跃至107个。那些期望从上面得到拯救的群众将对谁给予信任,这在当时就已经很明白了。

这就是使国社党成为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是他们的纲领,因为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能制订一个一贯的纲领的能力。

德国社会民主党败于反革命之手,只是在经过了15年最顽强的抵抗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得不和占着压倒优势的敌人的联合力量进行斗争,包括共产党以至人民党、德意志国民党和国社党。

人们曾经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对希特勒作一次强烈的抵抗。为了指出这种谴责的不公道,我希望要强调说明的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所作的这一点谴责,可以同样有力地适用于德国共产党,因为它的选举力量比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更强大。

在某些时期,这个党几乎和社会民主党同样强大(1932年11月共产党差不多有6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只稍稍超过700万张)。就这样巨大的群众支持这一点看来,要来责备个别的人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应该寻找更深的的原因。1300万工人怎么会让自己被剥夺去选举权而不作猛烈的反抗呢?

当人们把工人的这种态度和他們前次在反对把独裁强加于德国人民头上那个企图时——即1920年的卡普事变——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对比一下,就会觉得更为奇怪。当时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柏林后,就

受到异常迅猛的总罢工的回击，结果反革命的暴乱在几天内就被打垮了。

完全不同的是原来同一的党派甚至原来同一的领导者在 1933 年的行动。单是这一事实就已启示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之所以不同，原因不在于个别的人，而在于情况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不难确定的。那些参加 1920 年卡普叛变的人，不久就了解到，他们在人民中是得不到支持的孤立的一群人。他们是要使曾经把血腥的战争和可怖的失败带给德国人民的这一阶级复辟。在 1920 年的时候，人民对这个事实记忆犹新。因此，进行反击的那种统一意志，就在大规模的总罢工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共产党人在那个时候，自以为已经足够强大，企图在鲁尔和福格特（Vogt）地区组织武装暴动，当然很快就失败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却能够真实地说，在它反对独裁的努力中，它有的是德国人民大多数的支持。

1933 年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希特勒分子登上显要地位，不是通过几个团发动一次政变的结果，而是不断地争取群众的好感的结果。他们以 1928 年以前仅仅一小撮的人，勃然而起，一下子就把取得选票的力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到了 1932 年 6 月，他们就已成为在国会中拥有 230 个代表的最强大的党了。而且他们的前途还方兴未艾，正如 1933 年 3 月 5 日选举结果所表明的，单是投给纳粹的选票差不多就占了全部选票的一半，而投给纳粹及其政治上的同盟者的选票加在一起就超过一半了。

这一点就指出了一般人民心理的深刻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必然要影响到一切政党。除了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派别、而它的力量又不是来自广大群众的那种政党以外，没有一个党能够逃避这个转变的影响。

在国内斗争当中，反革命所取得的种种胜利，并不意味着是反革命进程的开始，而是反革命进程的终结。这些胜利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态度的转变所促成，因为他们已经对革命失望了，或者相信革命已危及

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对革命丧失了信心，甚或转过来反对革命了。1848年德国和法国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子，在二、三月间还是革命的，后来就是这样转变为反革命了。促使二、三月间还在躲藏、逃避的反革命分子重又诉诸武力的，也就是这种心理的转变。

初看起来，似乎“一个中尉加上十个士兵”在1932年7月就足以消灭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实际上是国社党的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间不可抗拒的进展，才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战斗精神不起作用了。

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国社党党纲的优越性吗？是来自它的战士们的更高的道德观念和智慧吗？是来自它的追随者的更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气吗？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远远地把国社党抛在后面的。

谁要想知道国社党的感情不可抗拒地高涨的原因，只需查考一下它在德国开始的日期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国社党还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团体。在1928年国会选举中，他们只赢得12个席位。但两年以后，他们竟能成功地使他们的代表人数差不多增加十倍，他们夺得的席位，从12个跃至107个。这正是世界危机开始的两年。这次危机无论在哪里都带来了革命的发展。所谓革命的发展，其意义并不是指它们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各政党的成功，而是指它们使人民群众的生存陷于绝望的境地，群众因而把危机所造成的困苦，归咎于政府或当权的政党，并且相信只有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才能拯救自己。因此，谁要是保证最快地、最成功地打倒那些政府和政党，谁就正是那些群众所需要的人，就是他们所希望能够拯救他们的人，不管他的纲领是什么。人民大众原来完全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经验，只是被战争及其后果所刺激而从事政治行动的，他们的推理方式是军事主义的，而不是经济观点的(*its consequences, was militaristic, not economic*)。

有些社会主义者因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的日子里没有使用武力而感到遗憾，并且相信，他们如果这样做了，现在就已经掌握了政权，

而他们的敌人也已经被消灭了。

认为一个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运动，能用暴力加以摧毁，那是危险的幻想。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对敌对者采取任意谋杀或抢劫的方法；另一种是采取合法地镇压在政治斗争中的犯罪和残暴行为的方法。其次，还有一点也必须区别清楚。一方面，我们有纳粹的方法，它保证每个党员，无论是胜任或不胜任，都有优厚待遇的政府职位，而对于纳粹在政治上的或私人的敌对者，则一律不予录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所执行的方法，他们所要求的是打破民主的敌对者在管理国事方面的垄断，并且他们还要注意做到，国家的法律对于民主的敌人和对于其他的人民一样，都要严格地执行。

如果我们单独考虑社会民主党这部分纲领的执行，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不该受什么谴责的。它在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它做的还不够的话，那么，过错在不小的程度上应该落在那些提出谴责的人的头上，尤其是共产党，他们在国会里，竟投票赞成对谋杀犯和纵火犯的大赦，可是这些罪犯，谁都知道是民主的敌对者。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在 1918 年 11 月以后对于政治上的敌对者没有实行恐怖统治而应受谴责的话，那么，那些提出谴责的人就该记住，这种恐怖统治首先就会影响到共产党，因为他们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同伙们对于俄国各派社会党人正在使用最残酷的方法，而他们自己也想在德国使用同样的方法。在社会民主党政权之下，要建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的企图，并不是没有，例如一批反动军官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暗杀，就可以证明这点。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感到幸运的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于疯狂的军官们强迫它采取恐怖措施的一切努力，都一概憎恶地拒绝了。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让自己被迫建立一种恐怖统治来对付政治上的敌对者，将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军事失败之后，并在面对着全世界的敌视的时候，德国所最需要

的是精神上的征服，而非军事上的征服。德国人民必须争取全世界的好感，以结束自己的孤立。只有精神上的征服才能持久，也才能产生好结果，但这种征服却不能用暴力达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既已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决心在民主基础上加以管理，那么，它就要设法尽最大的努力，以争回德国在世界上以往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地位。

德国社会民主党假如在 1918 年和 1919 年建立了恐怖制度，这就就会使德国陷于孤立，使德国经济生活陷于停滞，像希特勒现在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现在褐衫党徒所受的严厉的谴责，一定早已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头上来了，而且会更严厉十倍。这个制度可能早就把德国人民，尤其是德国所有的工人阶级投到了困苦、污秽的深渊，并且可能早就把社会民主党在精神上毁灭了。

为了建立以流血和谋杀为基础的绝对权力这种很快就会破灭的幻想，而付出如此可怖的结局的代价，那是太过分了。

有人以为将经济生活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繁荣和自由，这是错误的。为了打垮敌人，并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建立特权地位，同时却把其余的人民降到巴利阿的地位，为了这些而争取建立独裁，作为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完全平等的手段，这也是同样错误的。但是，由于没有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因而企图把一个人道主义的政权建立在残忍的基础上，这是最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个共和国必须体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自由、平等、博爱”。

八、社会主义与民主

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需要民主，不下于需要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获得前者要早于后者，因为其他的劳动阶级，如市民、农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发展，有着同等的利害关系。

在为民主以及为当前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

中,工人阶级从原始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更高的形态。这种斗争的后果创造了更肥沃的土壤,使开化了的工人阶级,在有组织的群众中,通过自由的活动和运动,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力量,从而使他们的发展上升至更高的阶段,而他们也就能够成功地进行争取达到社会主义最后目标的斗争。

人们可能会很快地承认,民主的方法不适用于、事实上也不可能用于对付极权主义的斗争,而却把恢复民主作为我们的斗争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个观点没有被清楚地区别开来,因而许多混乱就产生出来了。有些人主张,民主在法西斯主义当权的地方既已失败,那么,在法西斯主义没有当权的地方也一定会失败。

这是一个自明的道理:在没有民主的武器可用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用民主的武器进行斗争。现在有些人在民主的方法和革命的方法之间作了一个区别。据说,我们中间有的是坚持使用民主方法的,其他的是坚持使用革命方法的。革命方法的特点被说成是只包括暴动和总罢工。但是将民主方法和其他方法相提并论,其错误不下于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相提并论。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也是革命的。我们为进行斗争,究竟应该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并不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只是当我们从国家、社会及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特定情势的立场来观察我们的策略时,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这种特定情势是不能由我们主观地决定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在行动上采取民主方法还是革命方法的东西。

中欧国家上世纪的一般情况的特点,就是缺乏群众所要求的运动自由所必需的民主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者就是革命主义者;因为除革命的方法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可用,所以他们就是用革命方法为民主而斗争的人。那时候,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的概念是同一的。

但是,心理上囿于过去这个时期的情况,认为在已经达成民主制度的国家内,仍然必须宣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

有些人相信，甚至在一个民主秩序下，工人阶级也应该利用“革命”、暴动、总罢工的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达到社会主义要比投票的方法来得快；他们还相信，在民主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最后分析起来，只会对暴动和总罢工屈服。

在否定民主时，他们甚至相信，在一个民主国家内，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少数也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最后他们还主张说，甚至在工人阶级占着最大多数的国家中，只要社会主义的敌对者继续保持着控制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权力工具，社会主义者也不能达到一个选举的多数。

对于这点，我们的答复是：是的，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掌握的权力，工人在经济上的附属地位，报刊的影响，选举舞弊等，甚至在民主的情况之下都能够被利用。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即使有这些阻碍，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不能得到人民多数的支持，那么，就更不能用武力和总罢工的方法来取得这样一个多数。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控制着的武器，比在民主斗争的形式下甚至会变得更有效力。暴力的道路比民主的道路，需要工人阶级付出更大得多的牺牲。

在另一方面，如果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使用暴力，那就必需有人民更大多数的支持。51%的多数是不够的。

在武力对抗武力的情势下，统治阶级控制着的政权将比在民主形式之下起着更大得多的作用。要去掌握那个政权，我们就需要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数量上的优势是工人阶级在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所能掌握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武器。诚然，许多工人在街垒战斗和总罢工中，不是没有得到过不少次的胜利，但是只有当他们战斗的目标，不仅对于工人，而且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全体都是亲切的，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热情和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这些胜利。

这些目标永远是民主的目标。但在武装斗争中，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胜利。要保证胜利，还必需削弱军队和官僚机构所给予现政权的支持。

巴黎七月革命(1830年)，1848年2月、3月的起义，以及后来1905

年俄国的和 1920 年德国的总罢工，都是这种情形。

但当人民的少数利用暴动和总罢工来推翻的，不是一个精神上破产的政府，而是一个被人民的多数所支持的政府的时候，暴动和总罢工历来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当一个政府不仅掌有国家的政权，而且受到人民多数的支持的时候，要用武力来推翻它，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要成功地用武力来实现我们的主张的企图，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多数，而是一个压倒的多数。

而且，武力的道路比民主的道路需要更大的牺牲。说服一个人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比鼓动他放弃他的工作或他的生命时要容易得多。

因此，武力不是一个使工人阶级的党在民主国家中得以前进的方法，不是使它能够获得用民主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成就的方法。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正如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的最好的工具一样。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

那些大剥削者不是没有感觉到这个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痛恨民主，一有可能，他们就努力破坏它。当民主有利于工人阶级兴起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努力就随之紧张和猖狂起来。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者轻视民主价值的理由么？暂时看起来是民主的弱点，实际上却是工人阶级的弱点。现时没有力量来捍卫民主的工人阶级，如果阶级力量关系没有改变，自然就极少有能力对剥削者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民主在哪里丧失了，那里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夺回民主。

说社会民主党在一切情况下都有义务使用民主的方法，这是无聊的话。我们只对那些自己也只限于使用民主方法的人，负担这样的义务。暴力行动是不能用投票、报章论文、群众大会来击退的。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被迫以暴力对抗暴力的那些情况中，他们首先必须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不管他们使用民主方法还是别的方法，这是胜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民主总是工人阶级所能有

的最有价值的工具。

在没有民主的地方，摆在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去建立政治上的自由。如果说工人首先必须要在经济上解放自己，然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那是非常错误的。

无论我们是否认为一个由普遍、平等的选举产生的，拥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强大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一种“形式的”民主，这都没有什么差别。事实是，没有这些制度，工人就不能在经济上解放自己。诚然，当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时，民主制度将会改变性质。可是在今天，民主制度却是工人阶级必要的斗争工具。在社会主义之下，它们将只是自由的社会管理工具。这一点将构成现今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关于“真正的”和“形式的”民主的时行的概念，仅仅是抽象的东西而已。

有些人会说，苏俄的例子就驳倒了我的关于民主的概念。他们说，在苏俄，一个无产阶级的少数就曾经用武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这是用民主的方法永远不能达到的。

提出这个论点的那些人忘记了，沙皇政权不是被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少数在反对人民的多数的情况下推翻的。沙皇政权的垮台是因为政权的主要工具——军队——被德国军国主义的武力打垮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转过来反对沙皇。再加，全俄国人民都加入了叛变的队伍。不幸的是，俄国没有任何阶级受过自治的训练。结果是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中，布尔什维克就以一支新军队和一套新的官僚机构作为工具，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至于希望这样的事重演一次，那是无益的。产生这种情形的事态发展是特殊地反常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的继续存在，决不能作为反对现代国家的民主的论据。

现在还留下一个反对民主的论点要加以驳斥，就是，民主意味着一个软弱的政府。只有采用极端的压力才能对付金融、工业、土地的垄断资本家，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某些国家中，资本的主人们碰着被剥夺的危险时，将会不顾一切地来维护自己。但是，这并不一定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包括用资本募集的私人军队。

只有在政治上落后的国家内，法西斯主义才成为剥削者最有希望的工具。在西欧民主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内，资本家使用经济工具的时候，就多于使用军事工具的时候，正如工人阶级在以往几十年历次有决定性的政治斗争中，不使用军事武器而只使用经济武器来斗争一样。资本家所用的方法基本上和工人所用的相同：罢工、使生产陷于瘫痪。工人以停工作为武器进行斗争；资本家以停止资本流通进行斗争。他们用这种手段来推翻他们认为损害他们利益的政府。

只有站在财产私有权面前不怀着迷信的恐惧心理的政府，才能对付垄断资本家的抗拒。这样的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没收任何实行消极抗拒的企业，并为社会利益而加以经营管理。

从健全的政治学观点看来，要一下子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有许多资本主义企业就将必须暂时照旧经营下去。

确实，让这些企业不受阻碍地继续经营下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将是有利的。可是，这些企业的所有主，只有对他们的企业感到安全，感到不会被没收的时候，并在我们保证他们的企业在最后社会化时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补偿金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继续经营。

正是这个对补偿金的希望，才会使有关资本家不作消极抗拒、经济怠工和妨害新政权的行为。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怠工的资本家，我们就要毫不留情地夺取他们在社会上必需的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没收的威胁将是强迫他们和社会主义政府合作的最有效的武器。

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考虑起来，有两件事情是必需的：保证那些愿意合作的资本家，不直接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于新经济采取敌对态度并拒绝适应它的任何企业，就决心无情地一律予以无偿没收。

但是，有一种假设，说只有专政才能表现出这样的决心，这是最为

错误的了。的确,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政府,自然更没有任何联合政府曾经能以这样的决心采取过行动。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妨碍了他们,而是他们没有掌握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者的多数这一事实妨碍了他们。

只有这样一个多数才能不仅有勇气和意志、而且有力量来无情地打垮资本家的抗拒。如我们所已指出的,这样一个多数只能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才能达到。

因此,从任何观点考虑起来,民主决不会阻碍、而是会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的。

九、取得政权之路

近来我们时常听到人们谈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阶级掌握着绝对权力,不管这个阶级的发展和知识的水平如何。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一种制度和民主不同,它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不管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怎样。

在有些国家中,工人阶级还太微弱,不能建立或捍卫民主,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我们在这里无需多谈。我已经强调说过,工人阶级通过民主去获得民主和政权,比建立并维持自己对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专政,所需要的力量、知识和独立性要少得多。

为便于讨论起见,让我们假设工人阶级在打垮了敌人之后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专政,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专政是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权威集中于一个意志,任何对于这个意志的批评,都要被作为重大的罪行来对待。因此,无产阶级真正的专政就必须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个统一意志的存在为前提。许多人常常假定这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即工人阶级是由一个统一的、清一色的群众所构成的,是和一个清一色的“反动群众”相对抗的。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现象,也不是一个一致的、同种类的,用一个德国的词来说,“总体的”(totalitarian)群众。

认为工人阶级与贫苦的群众是同义词,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包括那样一些工人,他们没有或不控制他们所必须用以谋求生活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严格地说,农民、艺匠(artisans)、小商人,无论他们如何贫困,都不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这些分子所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在于他们出售的商品涨价。他们的理想是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成为大农民、大艺匠、大商人。

在另一方面,工人自身也分成两类,但都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劳动力的买主。而只有在资本控制了工业,需要工资劳动力的地方,这才有成为大规模的可能。在这种发展成为事实之前,没有财产的群众只有一条路可走——行乞或偷窃。这种类型的无产者不是社会基础所必需的。相反,他们是多余的负担。他们只靠有产阶级的救济或者靠抢劫有产阶级来生活。这种工人不能理解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更不适于为了这个理想而进行斗争。随着他们依赖富有阶级的善意所达到的程度,他们就成为阿谀奉承的人。他们中间那些性格强悍的个别分子,就产生了剧烈的愤恨,成为罪犯。国家对于这些分子是容易处理的。

由于特殊有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无产者在古代罗马曾经操过政治上的大权。当时罗马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建成了一种民主制度,但大部分的公民由于连续内战的结果,都弄得穷困不堪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产者取得了国家的权力,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选票卖给那些在面包或竞技场方面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把自己卖给那些成功的、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去当雇佣兵。

罗马个人独裁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得力于无产者这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助,后来就演成凯撒专制,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形式。

马克思称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为流氓无产阶级,他把流氓无产阶级和挣工资的无产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认为,只有后一类型的无

产阶级才能通过许多次斗争的过程并通过长期的考验，能够培养必需的力量和才能来解放自己，从而将社会推进到更高形式。

在这种觉悟成为可能以前，需要几百年的斗争。即使到那个时候，这种觉悟最初也只限于少数的优秀分子，他们认识了自己的社会力量和意义，给自己提出一个达到社会根本改革的目标。

在一定条件下，这些优秀分子能够在数量上很快地发展起来；但是，在这些优秀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后面，还有一批群众，马克思根据这批群众的特点，适当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没有发展起来的形象”（undeveloped figure）。在经济上，这些群众发挥着挣工资的无产阶级的作用，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并不比流氓无产阶级高出多少。他们不再乞求救济，只是乞求工作，他们总是认为雇用他们的那些资本家，不是依靠他们的劳动而生活的剥削者，而是他们的主人、慈善家，工资劳动者要依靠这些人的善意才得生存下去。这些无产者也偶然模糊地开始看出情况的真实性质，使他们作出一些反抗的表现。但是，他们却不能进行持续的、有系统的斗争。

他们只是偶然被迫爆发出一些绝望的行动，可是接着就是很快地颓丧和屈服下去。比眼前利益更高的目标，是这些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所不注意的。

这个关于无产阶级的成分和性质的一般分析，就足以表明：他们可以分成三大类，各有各的思想方式，各有各的斗争能力，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无产阶级这一先进部分的增长可能快于其他两部分——没有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但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危机刺激了后述两类数量的增加，不仅损害了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而且也损害了艺匠和小农。再加，各种不同成分的界线也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随着政治和经济情势的变化，他们也互相交错，互相转化。

各个劳动阶级本身之内，在思想能力和斗争能力上，也有许许多多

的差别。这些差别有的是地域性的：城市、市镇、乡村之别。消费城市和工业城市也有差别：我们在前者的工人中间比在后者的工人中间，可以发现更多的腐化、奴性的反动分子。除地域性差别以外，还有许多职业上的差别，其中一些有利于教育、启蒙、组织和斗争的工作，另一些却使这种工作大为困难。妇女常是比男子更难组织起来。孤立的职业中的工人比起大规模生产部门的工人来，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与发展起来的和未发展起来的工人间的差别平行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分类：组织起来的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间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差别并不是相互一致的。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从来不曾要抛开没有发展起来的同志；相反地，那些构成优秀分子的工人，从来是不知疲劳地努力以求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在另一方面，我们曾经看到某些行业中的工人组织为自己争取了一些很实际的利益后，就摆出特殊的资格来，并对于外面的人采取贵族式的态度，设法加以排斥，听任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由命运去支配。在这种例子中，我们在工人阶级的一致性方面发现了另一个明显的罅隙。例如，第一国际瓦解后，这种特殊的界限在英国就持续了几十年。

在欧洲大陆各国，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工人在能够开始组织起来以前，就已经被迫为民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在那个斗争中，也像在其他斗争中一样，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总是起着带头作用。但他们的目标只是一个，就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农民和艺匠的利益这个目标。同时，紧张的政治运动所起的作用，阻止了各个工会中自私的小集团思想的抬头。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继续在增长，而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却增加得很慢，在某些例子中，实际上是减少了。作为一个一般规律，工人阶级中较为发展起来的分子，即对较为没有发展起来的分子发生影响、并且激起一般的阶级觉悟以反对行业及其他差别的影响的那些较为发展起来的分子，增加的比例最大。

但还有种种趋势，起着相反方向的作用，并不断在工人阶级队伍中

引起新的差别。

除上述那些外，还有薪给雇员，即所谓白领工人(white collar workers)的那一类。薪给雇员比起工资劳动者来，主要是执行资本家性质的职务。生产的资本家不仅仅是剥削者，他还要执行重要的经济职务。他组织并经管企业，购买并积聚生产资料，他还须关心商品的处理。利润的因素不是从这些活动产生的，而是决定于资本的数量，并不决定于资本家自己所提供的劳动量。虽然他在小企业中常常必须比在大企业中更紧张地工作，但利润的先决条件，却在于实现生产资本的任务。可是生产资本任务的实现并不在于体现资本主义的人。生产资本的职务只是转移到了雇用的帮手的肩膀上。任何企业一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必需有这种帮手。

一个企业发展到股份企业的规模，资本家的全部活动就转移到了雇用队伍，即工资劳动者和执行资本家职务的其他雇员的手中。这些雇员分子在社会出身方面，较接近于资本家，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和教育，过着资产阶级标准的生活。

曾经在一个长时期中，这类雇员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享受资本的“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并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恭维。资本主义企业增长得越快，这类新中产阶级的发展也越广，他们和旧中产阶级相比，在数量上比工人阶级的工资劳动者这一部分增加得更快。

但是，最近以来，已很明显，随着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品，这类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已经相应地在下降。一个企业的行政和商业的机构越是扩大，它的等级的差别就越显著。只有少数的领导分子，即超出于商业和行政的雇员群众之上的那些分子才能达到顶点。商业和行政的雇员群众在社会地位上，逐步接近于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而在他们上面的那些分子却逐渐养成了“主人”的心理，甚至达到比资本家自己所表现的还要显著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工厂企业的经理和监督人员有这样优厚待遇的缘故。

多数的“新中产阶级”就这样逐渐更接近于真正工人阶级的地位，扩大并增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是在工人阶级内，他们形成了另外一类，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心理、生活标准和斗争能力，转过来又反映出不同的手段和政策。

工人阶级一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知识、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他们就开始对某些部分的旧中产阶级发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小农或个体农民和小商人，发现他们的直接利益是分裂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因此，他们究竟效忠于哪一个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是动摇不定的，依照历史的条件而定。上述农民和中产阶级分子，就其特点来说，不能认为是工人可靠的联盟。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上的发展总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间反复交替，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随着这些分子在经济上更接近于工人阶级的地位，而工人阶级本身又取得了力量和势力，工人阶级就逐渐得到了这些分子的信任。在另一方面，这些分子越接近于工人，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就越变得复杂和多样。

另一个要提出来的差别，就是近年来已经显出重大意义的差别：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差别。

马克思曾经指出，长期的部分工人阶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以往，无论失业对于个别工人是如何的痛苦，一般地说，失业总还是暂时的痛苦。但是自从世界大战，特别是自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失业对于不断增加的工人群众，已经成了持久的灾难。失业引起了许多工人间一种心理的发展，这种心理不幸正和罗马无产阶级的相类似。当时罗马的无产阶级，如我们所已指出的，构成了凯撒们独裁的主要根源之一。

在工人阶级各个组成部分之内，也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别，我们在这里不拟多谈，但熟悉问题的人还可以援引出许多这一类的例子来。

上面提出的许多差别是最重要的，它们使工人阶级不可能组成一个牢固的、清一色的群众队伍，而无需其他力量的介入就能够表现出一

个统一的思想 and 行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倒是一批不同种类的群众，由五光十色、毫不整齐的分子所组成。马克思以其洞察力看到了许多的共同利益终于会使一切分子鼓舞起来。但是，要实现他们的共同任务和利益，却又有赖于深入的启迪和教育。

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发展，确是会促使工人阶级的各类分子更为相互接近，但是由于有新的分子不断渗入到工人阶级的团体中来，这个接近过程就总是受着干扰和损害。这种渗入也并不总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倒是经常地扰乱了他们的政策，并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更为困难。

只有在工人阶级更统一起来，并组成一个共同战线的时候，工人阶级政策的影响才能相应地加强起来。所谓共同战线，我们指的是在多于一个的意义上统一起来的意思。第一，这个战线必须避免走弯路，这条路会把它引到矛盾和失败的尝试中去。其次，它必须设法克服行业的和地域的利益的差别、传统的和斗争能力的差别等等，这些差别，引起了构成工人阶级以及最接近工人阶级的各种分子的和愿望的暂时或长久的差别。

这些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分子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只有通过提出高尚的目标和崇高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必要的政策，在还没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地方，迟早都必须组织一个工人党。无论是谁，只要赞成这个党的理想，就该被欢迎参加到这个党的队伍中来，但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发展党的潜力，所以它始终是这个党的最重要的、起决定性的成分。

至于说到民主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过分地强调说，较高的社会理想只能通过自由和探讨才可以达到。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自由讨论，工人阶级的福利才能得到进展。

十、“统一战线”

现在时常听到要求有一个统一战线的愈来愈高的呼声。在 1914

年以前，除俄国外，差不多世界各国都曾有过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曾经给予劳动群众一个机会，使他们成功地表现了自己的主张。以后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就造成了中欧各国 1918 年及 1919 年的革命没有得到当时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结果。

表面上看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是要努力使工人阶级两个对立的趋势合并在一起，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有些人会问：“这和俄国的专政的性质有什么关系呢？停止工人阶级队伍中兄弟相残的斗争不是迫切的需要吗？”工人们充分了解，他们要取得权力，要达到目标，关键在于他们的统一。他们反对任何威胁统一的东西。他们憎恶任何妨碍统一行动的任何理论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让那些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以往冲突的回忆妨碍统一工作的进行。我也想起了各种趋势的分裂和冲突，各个有关阵营的追随者彼此之间曾经因此发生过深刻的仇恨。然而，正是这些人，在冲突的原因已经消除，大家已经可能用共同的方法为了共同的目标又一起工作的时候，后来又学会彼此以可贵的同志和朋友相待了。

这一切我完全知道，但我对于为了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而正在进行的努力，却没有什麼热情。

“统一战线”这个名词本身就引起疑惑。为什么不和共产党人“统一”呢？因为共产党人不要统一。人们所提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间的统一，因为在这种统一之下，两方面就都会要通过民主的方法、自由的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以追求共同的目标。

是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都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两者的成员中工人都占着压倒的多数。其中许多人在同一个工厂企业中并肩地进行着工作。他们分担同一的痛苦，面对着共同的敌方。然而，在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深远的分歧。这不仅是属于同一阶级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的问题，是各个工人从自己的组织上如何得到他们的口号和指示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口号和指示是按民主原则发出的。

它的组织和整个自由工人运动一样，是民主管理的。但并不是工人所参加的一切组织都是如此。例如，有些组织的工人，政治上被编成队伍，穿着制服，情况就不是这样。这些工人遵循着一种军事纪律。他们从上面接受口号，并必须无疑问地服从这些口号。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并不决定于这个组织是否由工人组成的，而是决定于它的最高指挥部对待社会主义政党所采取的立场。

上面所说的情形，除去某些方面和一个军事组织稍有不同外，对于共产党来说，也是完全正确的。与社会民主党不同，他们不是按民主方式而是按军事方式组织的。他们不是选择自己的领导者和口号的，而是由最高指挥部派出或颁发给他们的——最后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训练有素的地方卫士。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员对于独裁者，比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沙皇还更恭顺得多罢了。因此，从根本上说，统一战线不是意味着在工人运动内行动自由的工人之间的合作，而是世界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专政的合作。

在某一个国家内，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缔结的统一战线，总是要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即这个统一战线不是根据共同利益和思想而缔结的，而是由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的特殊情势所产生的。这是特别正确的，因为背信弃义是专政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独裁者，只要他往日的同志成了他决心要去取得绝对权力的绊脚石，他就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

苏维埃国家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自然是根本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但却也同样远离于工人阶级要从一切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俄国共产党专政兴起以前，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总是将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说成是一种感化院式或兵营式的经济。社会民主党从来就郑重地否认这点。我们不能想像，有一天会出现一批自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真的要把这种感化院式或兵

营式的经济变成事实，并激起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钦佩和赞许，而不是被一笑置之或是受到谴责。

这个政权的血腥的恐怖，竟受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赞赏，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因为在苏维埃经济的兵营里，的确没有资本家的地位了；他们只间或被允许作为访问者进去参观。他们被请去作客，受到最友好的接待，很有礼貌地被引导到各处访问，对于这个感化院所供应的佳肴，还被请求给予品评。

了解这一切事实的人，将会看到苏俄新统治贵族和自由工人运动之间，实在很少共同之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一个成功的统一战线所必不可缺的共同利害关系，也实在太少了。

他们在方法上和性质上，彼此距离太远了。两方面任何持久的合作只能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虚伪是它的突出的特征。苏维埃政权从没有间断地一直在夸耀它的奴隶经济是劳动大众解放的标志。但社会民主主义是不能在谎言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甚至在谎言看来似乎是真理的时候，也不能如此。任何这种情况势必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导向衰落，甚至最后的毁灭。

从布尔什维克开始活动时起，他们就一直是工人运动中削弱和不睦的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专政的结果。工人运动中各种不同的趋势，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和谐的合作。在不同的时期，共产党人走着迂回的路子，在多种多样的伪装下，设法爬进工人运动中来，并且总是抱着一个目的，要么将工人组织置于莫斯科意志之下，要么分裂他们。

工人阶级的统一——对的！但是只能在自由工人运动中求得统一！不要欺诈的“统一”——不要那种只会引起分裂和不睦的“统一”。

有些人说，我们绝对反对俄国以外的共产党，但不反对俄国的专政。实际上，反过来说才对：有些共产党组织正在摆脱他们对俄国现时统治者的依赖，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的，和他们合作倒是可能的。经验

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另一方面，那些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党所以怀着难于和解的敌意，不是由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目标，因为这种目标也是共产党的对方所具有的；而是由于莫斯科统治者所要求的不是有独立思想的同盟者，而是驯服的工具。

使任何统一战线成为不可能的敌人是在莫斯科。莫斯科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党的冲突，不在于一种误会，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各自的性质，这种冲突之不能解决正如民主与专政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一样。共产党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一直是他们对民主的蔑视。

许多受了他们的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也采取了这种蔑视态度；这种态度已经结出了恶果。它削弱了工人阶级，并造成了永久性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共产党人自从1918年以来在许多国家内所造成的；近年来民主遭受多次痛苦的失败，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些失败的后果对于苏维埃国家是这样的严重，以致它自己也不得不求助于国外的民主了。它给各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现在要采取民主立场，并为此目的要和他们曾经疯狂地攻击过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一条统一战线。^①

就这一点来说，情势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的高兴在事实面前不能不稍稍冷却下来，因为共产党人的这种转变不是原则性的，而只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只有在他们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地方，他们才捍卫民主；而在他们当权的地方，他们就消灭它，并对任何形式的人民的自由，都实行最残暴的压制。

在俄国的几个强大的邻国内，横暴的专制主义剥夺了民主，这对俄国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些专制主义的国家，按照他们的性质，都在走向军事扩张。其中两个，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方面威胁着俄国。但是俄国的军队单靠自己却很难抵挡从两方面而来的压力。

俄国需要同盟者，但这种同盟者只能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中找到。

^① 此文写于1937年。——原编者注

在那里，也有着敌视民主的分子。他们同样是俄国的敌人。苏维埃共和国最强烈地关切的，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力量，并且也在于他们民主的力量。这就说明了苏维埃对民主突然发生兴趣的道理，但是只在那些国家——而不是在本国。

他们对民主的帮助，每个民主主义的党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是这种帮助却不可过分地信赖。它是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外交政策的产物，与俄国国内政策是直接相反的。

最近以来，斯大林不得已对民主思想作了一些让步。他给予俄国人民一部新的苏维埃宪法，以代替原先的宪法。他自己宣称这部新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

如果有任何一种民主配得上被称为纯粹形式上的民主，这就是斯大林最近的宪法。这部宪法没有真正民主的属性，没有群众运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它的国会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仅仅是一只唯唯诺诺的鹦鹉。

这个国家的生活在这部宪法之下是怎样真实地进行的，从苏维埃政府一直在上演的著名的政治审判事件，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但是，它们不仅仅暴露了今天俄国的“民主”的虚伪性质。从它们继续在统治集团内部找到牺牲者这一事实，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正受着普遍不稳定的痛苦，不稳定一直往上达到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尽管有最猛烈的镇压，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并没有停止。

我们等着瞧可怕的惊人事件吧。不管这些惊人事件将是什么样子，他们准会刺激群众行动起来，因而会带来对民主真正的让步。如果民主会实实在在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在形式上——在俄国占到上风，那么，一切地方的工人就将是受益者。由于广大群众将会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他们道路上的障碍将会减少，他们将以更大的力量和速度继续前进。

于是，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纪元的到来主要依靠俄国的共产党人。但是今天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要在和共产党进行的一切

谈判和讨论中，向他们指出这一个事实，并且要向他们解释，全世界工人阶级政党的继续前进，主要靠俄国开放真正的民主；只要他们在那个国家内继续排斥民主，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又将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只要俄国继续受着企图使全世界工人阶级屈从于自己的专政的统治，要想重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统一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个专政只要一旦消逝，统一战线就会自然出现，因为有了专政，各国共产党就会丧失他们的生命力。只要从俄国来的口号和金钱一旦停止，只要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铁环和金环除去，他们就会很快地分崩离析。

对于现代工人阶级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构成最大的威胁和造成最大的损害的，不是俄国的专政的崩溃，而是它往后的继续当权。

（选自《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13—93 页。由
李石素根据纽约兰德学校出版部 1946
年英文版译出，郑之驥校。）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茨基文选/王学东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人民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07006 - 3

I. 考… II. 王… III. 考茨基, K. (1854 ~ 1938) — 文集
IV. D1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787 号

考茨基文选

KAOCJI WENXUAN

王学东 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1

字数:44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 - 7 - 01 - 007006 - 3 定价:5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封面设计：肖 辉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ISBN 978-7-01-007006-3



9 787010 070063 >

定价：52.00元